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全/球/文/化/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任天石

原著=【英】戴维·莫利
凯文·罗宾斯

译者=司艳

认同的空间

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

责任编辑　孙　[illegible]
装帧设计　[illegible]
责任校对　[illegible]

“我深信不疑，这本书很快就会成为这一领域的一本重要的教科书，书中精华汇萃，希望它能得到应有的密切关注与尊重。”

——斯图尔特·霍尔，公开大学

我们正经历一个旧的同一体——国家、文化、特性——消融的时代。《认同的空间》一书研究了在后现代地理条件下运用有线和卫星通信的传播环境里，人们是怎样重新塑造集体文化认同的。作者审视了欧洲与其最主要的他者们——美国、伊斯兰世界、东方——之间的关系这个当代政治主题，来探讨目前的认同问题。他们表明，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欧洲自己的认同都是相对于上述他者来界定的。《认同的空间》一书对当代文化同一体复杂而矛盾的本质的阐述颇具启发性。

戴维·莫利是伦敦戈德史密斯学院传播学系高级讲师。凯文·罗宾斯是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文化地理学系高级讲师及城市和地区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ISBN 7-305-03738-9

9 787305 037382 >

ISBN 7-305-03738-9/C·102
定价:20.00元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全/球/文/化/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任天石

认同的空间

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

原著＝【英】戴维·莫利
凯文·罗宾斯

译者＝司艳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英)莫利,(英)罗宾斯著;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8

书名原文:Space of Identity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宾主编)

ISBN 7-305-03738-9

Ⅰ.认… Ⅱ.①莫…②罗…③司… Ⅲ.传播媒介-作用-文化交流-研究-世界 Ⅳ.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784 号

Copyright © David Morley & Kevin Robins 1995

First published in 1995 by Routledg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utledge.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0-022 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

原 著 者 [英]戴维·莫利 凯文·罗宾斯

译 者 司 艳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www.njupress.com

电子信箱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阜宁书刊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81 千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5-03738-9/C·102

定 价 20.00 元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编委会

主　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任天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任天石　许　钧　张一兵

张凤阳　周　宪　周晓虹

倪梁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于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

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

等待野蛮人

我们都挤到广场上在等待什么呢？
　　野蛮人今天要到来。
参议院里众人为什么这样无所事事？
参议员们不制定法律那还坐在那儿干吗？
　　因为野蛮人今天到来。
　　参议员们现在应该制定什么法律？
　　野蛮人来了，他们就制定法律。

皇帝为什么今天起来得这么早？
他为什么此时来到最宏伟的城门边，
非常正式地头戴王冠危坐在宝座上？
　　因为野蛮人今天到来。
　　皇帝正等着接见
　　他们的头人。事实上他已经准备好了
　　给他的讲话。其中
　　已写下将封赠给他的所有名号和头衔。

为什么两个执政官都出去了，他们俩和行政长官
为什么今天都穿上红色刺绣的官袍呢？
他们为什么戴着镶满蓝紫色宝石的臂镯，
手指上满是光芒四射的翡翠戒指呢？
他们为什么今天要握着珍贵的手杖？
那银质手柄和金色的顶端都精雕细刻着美仑美奂的图案。
　　因为野蛮人今天要到来；
　　这类东西会让野蛮人头晕目眩。

而为什么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没像往常那样来到这里
发表演说，言其必言呢？
　　因为野蛮人今天要到来；
　　他们厌倦了雄辩和演说。
为什么突然间出现不安
和混乱。人们的神情变得那么严肃。
为什么所有的街道广场顷刻间空空荡荡，
人们都心事重重地回家了呢？
　　因为夜幕降临了，而野蛮人还没到。
　　接着有人从边境回来；
　　他们说那里不再有野蛮人了。

　　现在没了野蛮人，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那些人曾经不失为一种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

（引自C·P·卡瓦费《诗集》，
译者：约翰·马弗罗高达朵，
霍加思出版社，1971年，经准许采用）

目录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1

序言

- 重建全球媒介 1
- 塑造今日欧洲 2
- 欧洲和"他者" 7

第一章 全球化与认同危机——全球媒介新景观

- 从国内媒介到全球媒介 13
- 媒介新秩序 17
- 媒介新秩序下的文化和政治 23
- 全球化与欧洲认同危机 25
- 对立认同和整体 28
- 我们同一体中的隐形者 31

第二章 重新设想的社会群体？——新媒介，新可能

- 超越福特主义？ 36
- 图像空间 42
- 重新设想的社会群体？ 49

第三章 文化、社会群体、认同——传播技术与欧洲改形

- 构建文化同一体 58
- 表示差异的认同：构成关系 60
- 一个特例 64
- 欧洲与美国的关系 67
- 带尾翼的《达拉斯》：粗俗的品味政治 71
- 欧洲：一个地理问题吗？ 78
- 出口能力级别 82
- 收看本土节目成了民族习惯：家庭、电视、民族 86

第四章 欧洲文化——通讯、空间、时间

- 通讯、文化、认同 95
- 后现代地理？ 98
- 文化共同体 103

● 想像中的美国 107
● 欧洲与他者 111

第五章 无处似故乡
——家(祖国)的形象

● 引言 116
● 把一切都带回家 117
● 传播、记忆、认同 122
● 德国为何是这般模样? 127
● 为何欧洲是这般模样? 133
● “边界线正好穿过我的口腔” 136

第六章 传统与转变
——全球背景下的民族文化

● 传统与转变 144
● 地理的构成 146
● 全球积累 148
● 全球文化 151
● 全球—地方关系 156
● 论需不需要安迪·卡普 160
● 认同的重负 164

第七章 在西方的注目下
——媒介、帝国、他性

● 媒介帝国主义 170

● 文化、地理、媒介 173
● 生活在传播世界里 180
● 在西方的注目下 183
● 西方的荧屏、西方的心理 188
● 播映波斯尼亚 192

第八章 技术东方主义
——对日本的恐慌

● 日本现在说不 200
● 偷窃美国的灵魂 203
● 日本崛起了吗? 207
● 闪米特人和东方人 210
● 现代性和种族特性 217
● 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 219
● 技术东方主义和未来的现代性 227
● 对日本的恐慌 234

第九章 缄默政治
——社会群体的意义和媒介的用途

● 媒介与社会群体 239
● 新欧洲的社会群体 246
● 社会群体和控制 255
● 政治缄默 261

第十章 什么的终结？
——后现代主义、历史、西方世界

- 历史的终结？ 273
- 整体改良世界的臆想 275
- 从历史的终结到种族中心主义的终结 280
- 时代划分和空间划分的问题：现代主义和帝国主义 283
- 讲述历史：西方的说法吗？ 285
- 作为异族的欧洲人 286
- 西方的看法：显而易见的命运？ 289
- 后现代主义：你觉得生疏吗？ 297
- 媒介（仍旧主要）是美国的 301
- 下属在听吗？ 305
- 回到文化帝国主义 306
- 卫星电视：全球时间和偷窃历史 308

参考文献 313

索引 347

序言

本书贯穿两条主线，一是当代诸文化同一体自身复杂而矛盾的特性，一是传播媒介在这些文化同一体重组当中的作用。上述问题主要是置于欧洲与其主要“他者”（Others）之间关系的范畴内进行研讨的。从古至今，欧洲的身份特性都是相对于美国、伊斯兰世界、日本乃至东方来界定的。

重建全球媒介

传输新技术的一个后果就是信息传播媒介正在发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我们看到，正在重新构建信息图像空间并形成新的传播地理，其特征表现为：全球性网络和国际信息流动空间；国家这个范畴面临着愈演愈烈的危机；出现一些新形式的区域性与地方性活动。我们正在大大改变空间与地域的概念。

人口、文化、货物、信息的迁移、流动方式表明，现在并不主要靠诸如地理位置间隔、海洋、山脉等自然分界来划分社会或国家的“自然边界”。我们越来越需要根据传播和运输网络及语言文化这样的象征性分界——由卫星轨道或无线电信号决定的“传输空间”——来划定在这个时代里具有决定性意义、呈现渗透性的边界。

我们强调新的空间动态中两个主要特征，这两方面似乎是背道而驰的，但它们都必然对欧洲传播策略及欧洲认同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技术与市场转换使全球图像业和世界市场应运而生；我们正亲眼目睹着视听产品的“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sation)和跨国传送系统的精心运作。然而，另一方面，地方生产和地方销售网络也取得长足发展。于是，有线传播技术与微波技术促成大众市场的分化，并有利于大型媒介和广告公司向特定受众播送。地方性和区域性生产综合体也得到发展；尽管它们还脆弱不稳固，但是给地方经济文化带来了希望。当然，在全国性广播电视的重要性日趋减化(对此人们尚存争议)，而且国家媒介系统为公众服务的准则也在不断弱化之时，全球主义与地方主义之间的关系便紧张起来。这不是一个全球媒介或地方媒介的问题，而是全球性和地方性如何结合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发展分散式媒介业和肯尼思·弗兰普顿所说的那种真正的“临界性区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是否可能发展一种地方区域性文化呢？这种文化并非是内向型的，而是将自己看作全球文化的一种变异，这种文化兼容差异性、多元性、不连续性。这些提法虽然都从国家的视角出发，但它们使我们摆脱了在有关公共服务性广播电视事业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困境。重要的是关于超国家领域(supra-national sphere)与次国家领域(sub-national sphere)间的关系问题。一种可能是全球大一统。另一种可能是在吸纳目前已有进展的革新基础上，重新组合并塑造各国、各地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塑造今日欧洲

欧盟现在愈来愈意识到传播新技术对于给(可能形成

的）泛欧市场和受众提供物质支持，对于在今日今时定义"欧洲人"方面所具有的潜能。欧盟的政策也愈来愈反映出文化是设计欧洲时的核心（或者更坦率地说，文化问题乃是泛欧市场潜在收益的底线）。欧盟已将视听等传播业定为创造欧洲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手段。问题在于那种颇为理想化且过于简单化的"欧洲"观与当今这个"欧洲"内外存在的部族主义现实之间的差异太大，前者是现今政策大力推行的，却不顾后者是否已造成"种族清洗"的恐慌。要想弄清楚传播业目前及将来在欧洲的作用，就必须先弄清楚其目前发展的环境。

建立泛欧视听市场的起因主要是想以之作为在全球媒介市场竞争的一块基石。欧洲委员会曾试图利用上述进展来促成其所谓的"欧洲视听空间"。该委员会试图通过"媒介计划"、1988 年的"欧洲电影电视节"、"竞赛计划"、"视听 Eureka 计划"（译者注：Eureka 是希腊语"我找到了！我想出了！"的意思，据说是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在发现检验纯金的方法时所发出的惊叹语。）这一系列行动为建立后国家视听领土奠定基础。立法与管理的自由化和协调化都以"无疆界的电视节目"（"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时代为目标。"无疆界的欧洲"（"Europe without frontiers"）指的是"在欧洲共同体消除购销及发送接收视听产品中的一切壁垒"。有观点认为，在此基础上，欧洲媒介业就可以与美日的大集团并称为"全球性选手"（global players）了。

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在经济技术上逞强的事。欧洲广播电视事业的议事日程中也包含大量文化内容。媒介新市场的问题跟增进欧洲各国人民间相互了解，加强他们对共同生活与命运的意识都紧密相关。欧洲委员会鼓励节目制作人吸引广大的欧洲受众，因为这样的节目能有助于培养对这个由利益休戚相关的不同国家组成的共同体的归属感。这样主张共同

文化的认同显然对于目前重振欧洲自信心的力量具有战略意义。

但它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欧洲认同感兴趣，而且至少许多人无法断定所谓的欧洲文化"求同存异"("Unity in diversity")倒底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无疆界的欧洲的观点和媒介跨国界流动的作法会使人们产生忧虑和文化迷乱感。面对这些激变，一种反应是到较为局部性的地域意识和认同意识中寻求慰籍；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化地区主义和(巴斯克、苏格兰、布列塔尼等)小民族主义愈发兴盛。欧洲认同也没给现在居住在欧洲大陆的众多移民和散居民族以多少宽松的容留条件。在内部有那么多人感到被排斥的情况下，欧洲的概念又有何意义呢？欧洲认同尽管表面上充满自信，但是它只剩下一个脆弱、令人担忧的表象，而且越来越多地和泛欧白人种族主义的回潮纠缠不清了。

要说欧洲认同的内部关系紧张，其实，它还面临着外部挑战。我们所目睹的在欧洲边缘地区(或者在欧洲之外地区)出现的新情况就发出了严峻挑战。欧洲以东、以南地区的新情况对巴尔干、中欧、波罗的海地区、北非、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地中海等地区的领土和同一性，及其对欧洲具有的意义提出了种种疑问。这些地区的新情况会逐渐削弱欧洲的小视野(指欧洲西北部)吗？抑或是有潜能去拓展、丰富它呢？上述地区寻求同欧洲建立什么样的良好关系呢？在多大程度上它们正被推向与此相反的关系位置呢？欧洲"文化空间"可能有多大的认同范围？它们又如何与地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元素相融合？社会集团、文化集团、种族集团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界线、新区划？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西欧文化同新兴的充满活力的东欧民族主义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欧共体之外的国家必须考虑自己与这块经济文

化空间的关系.同样,欧洲也必须接受这些“欧洲外地区”(“beyond Europe”)对它的影响。

除了探讨有关逐渐成形的后现代欧洲地理上空间和认同之间关系变化的问题外,我们还设法将这些结构变化同日常消费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人们是在日常消费的过程中体验那些主要结构的。我们从传播新技术国内用户和受众的角度出发研讨其潜在影响。现在的问题是诸如,国内消费在日常运作和国内庆典活动时是怎样过滤并传输用新方式提供的电视节目,从而使现代电子村落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近年来,按地理位置划分的社会群体与按电子影响范围划分的社会群体的关系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诚然,人们已愈来愈意识到广播电视在穿越时空构筑并维系社会群体方面发挥的作用,人们同样意识到其在构筑民族认同中的作用。有些人甚至提出,在思考有关民族认同及其他文化同一体的问题时,或许应该首先考虑传播系统与形成和保持该民族同一性或文化同一体的关系。还有些评论人士——要么从录像打乱原有广播电视模式设定的社会体验“同步性”(“simultaneity” of social experience)所造成的时间转移(time-shift)效用出发,要么从各式“小范围播送”(“narrowcasting”)(指针对具体目标受众的节目)和新出现的针对不同受众的地区性特殊传媒产品出发——指出了传播新技术以更为复杂别样的方式介入社会体验而产生的作用。

我们探讨由发展新形式的地区性分散化传媒生产和消费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这些问题相互作用而引发的种种问题。本书诸章节研讨的内容为:当原有广播电视形式(及其受众)的分解不过是大面积多领域内更大规模分解过程的一部分时,广播电视在满足认同感上所能起到的作用——这里指认同一个象征性或者说虚拟的“祖国”。我们

的观点是，电子媒介实际上正开始以新方式运作，经常设法满足散居的各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的需求，这时候，满足各种——寻求社会群体感、传统感、身份感和归属感的——“怀旧情愫”的重担就日益落到电子媒介的身上。

我们还特别关注回忆在界定欧洲及欧洲文化中的问题。我们正是基于这一点，以一些论辩为特例来探讨“Heimat”即“故乡”这一比喻说法的向心力的，该论辩因埃德加·赖策的影片《故乡》首先在德国展开，我们将重点放在“故乡：异域（Heimat：Fremde）”的对立上。我们既将“德国经历”视为欧洲历史上众多最有争议的议题的菁华代表，又将其视为当今欧洲现实政治的一项核心事宜。

在思考欧洲一体化的可能性与局限时，我们一开始就碰上了关于集体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问题。欧洲目前正经历着一场削弱其原有体制结构的社会经济变革。在日益明朗化的全球一地方关系（global-local nexus）的背景下，欧洲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正在改变着。在此过程中，营造新型联结纽带有广阔的范围和可能性：新的社会群体观；新的民族感情与效忠之心；新的认同与主观意识。问题是人们心目中将出现什么样的“欧洲”。危险在于高压作风的欧洲传统与历史将会故态重萌，欧洲仍会固守着长久以来一直决定了它以统治身份同“他者”世界的关系的“地理格局”。危险还在于帝国权威会以新的方式重现。我们必须在此背景下思考信息传播新技术的重要影响。它们会从哪些方面促成新的地理格局和社会群体观？它们会怎样增进利益相同社会群体与利益相左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不能简单地臆断“无疆界的电视节目”不言而喻就是有益并且有助于一体化的。真的存在跟贸易和市场无关的疆界，而我们最终不得不无条件接受的恰恰正是这些人们想像出来的、虚拟的疆界。

欧洲和"他者"

欧洲不仅是个地理场所,还是个概念:这个概念与西方文明的神话无法摆脱,紧密相联;令人痛苦的是,这个概念还是由欧洲与作为自己殖民地的"他者"之间那延绵不断的冲突所形成的。本书中的论文涉及欧洲文化事业日程、其理想、压抑和病症。我们关注在欧洲发展过程中承袭历史与割断历史的部分,关注一再被创造的历史传统,还关注与欧洲/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的文化遗产。这意味着我们不可避免地还要关注其各种自我变体形态(alterity),欧洲过去都是与之对照来定义自己的同一性的。很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文化里自有其塑造"他性"(Otherness)史(参照:麦格雷恩,1989)。正像阿特金森所写的:

> 文艺复兴学说里相关的道德体制和知识体系都是宗教性质的。非欧洲的异类(alien)被冠以"异教徒"、"不信教者"、恶魔附身的字眼。启蒙运动时期,"他者"的主要特征是"愚昧"、"迷信"。到了19世纪,现代人类学诞生,就用"进化"和演进期等词语来表示"原始人"。
>
> (阿特金森,1992:40)

爱德华·赛义德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东方主义》一书自1978年首版发行,数年来改变了我们对"西方与其余地方"关系的认识(参照:霍尔,1992a)。本书后面几章将研讨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讨论"技术东方主义"(见第八章)时,首先要谈的是近年来对日本乃至东方的偏执潮,这股

浪潮在美国和欧洲都曾泛起(在美国,人们担忧日本人接管好莱坞,在欧洲,人们对日本商业占领西方的帝国主义阴谋群情激愤就是明证)。就此而言,人们觉得似乎未来世道的管理权将落入东方人之手(这个主题在当代欧美流行文化产品,例如影片《刀械走私者》、《黑雨》、《忍者神龟》,以及政治新闻中反复出现)。人们愈来愈注意到世界经济动力中心已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了环太平洋地带。在这种情形下,将西方等同于现代化、将东方等同于异域(不发达的)古代的传统观念也陷入了危机。在书中我们思索何以人们愈来愈把东方(尤其是日本)看成西方世界面临的麻烦,何以人们现在给日本、东方、"他者"之间东拉西扯出一大堆的相似之处。更确切地说,我们探索的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恰是这个"他者"会在西方的想像中占据如此可怕的地位。

对欧洲来说,1992 年是建立欧洲单一市场日程表中重要的时刻,同时它还是具有另一个重大意义的年份。这一年还是西班牙"发现"新大陆 500 周年纪念,即标示着哥伦布蜚声世界的航行的日子,和西班牙再度攻占格拉纳达,将摩尔人、犹太人清除出西班牙的日子。斯图尔特·霍尔(出处同上)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场双重运动,西班牙既逐出了"内部他者"(摩尔人和犹太人)又发现了新大陆的"外部他者"。我们借助德·塞尔多(1988)、格林布拉特(1992)、托多罗夫(1992)有关权力与表述问题的研究成果,探究上述帝国主义侵略史与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结构之间的相同之处(见第十章)。我们认为,他们提出的有关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即谁讲出对谁的看法,谁得以有权讲述关于哪些"他者"的什么事情,谁被讲述了但又缄默不抗议——与当代控制信息娱乐流动的结构极为相似(参照:希勒,1969,1992)。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探究文化帝国主义模式,该模式假定

存在纯粹的内在同质的现实文化，而这些文化又被认为早就遭到了外来势力的破坏腐蚀。要想弄清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力，那么吸收同化"外来"影响的概念模式就应该比传统的媒介效应模式做得更细致（参照：莫利，1992：第一章）。我们同意阿朱·阿帕都莱（1988：39）所说的："或许从来就不存在本地人……，不存在囿于自己所属那片天地的人们，不存在与更广阔的天地接触却仍保持自己纯洁性的群体"，也同意詹姆斯·克利福德（1992）关于建立一种"游动文化"模式的重要性的说法，这种"游动文化"的菁华并不是以地理位置为土壤而孕育出来的。赵（1993）提过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问题，说"所有的本地人都到哪儿去了？"，这句话问得妙，向过于简单化的第三世界"本土"文化模式发出了挑战。

我们一方面关注西方媒介对"其余地区"（"the Rest"）的影响，那么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他者"的形象对西方受众的影响。今天，大多数西方人只需坐在沙发上按键，就可看到异域的"他者"；全球性新闻媒介使我们大家都成了坐在扶手椅上的人类学者、人种史学者，成了在晚上观看"他者"新奇风俗的人。我们尤为关注的一点是这样连续不断地"播映""他者"可能带有的相反效应。"他们"（"they"）被展示在"我们"（"us"）面前，但是是怎样展示的呢？苏珊·桑塔格（1979）针对扑面而来的视觉形象描述，指出展露与阻隔是同时并存的。我们以海湾和波斯尼亚等为例分析西方媒介的危机报道，探索是否可能有某些心理分析模式，使得我们更透彻地了解电视屏幕采用什么方式在向人们报道事件内容的同时还充当了过滤器和阻隔手段，使得我们还能够"剔除"透过媒介被迫"目睹"的那些事件当中令人不安的内容。我们再度论及心理分析概念可能对发展媒介理论起到的作用时联系到我们对民族主义危害的分析，审度新欧洲的焦虑和恐惧分布

的“心理地理”。

面对考碧娜·贝瑟(1990)提出的“差异绝对难以共存”之说,身处当代欧洲,我们却发现四周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再度抬头,听到回归(哪怕是神话般的)纯粹且确实无误的“老传统”的呼声,回归毫不掺假的同一性的呼声,这种同一性被认为是那些老传统的基础——即萨曼·拉什迪(1982)所描述的回归“绝对纯洁论”(“absolutism of the pure”)。我们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探索现今英国“遗产”产业的复苏,它既是回归“小英格兰主义”,又是试图复苏纯粹本土的区域性文化的怀旧情愫,以抗衡被人们看作是危险的文化杂交物。

还将“历史”等同于西方及其帝国主义侵略的家谱不再行得通了。正如莱维纳斯(1983)曾指明的,这样做是沉溺于孤芳自赏式的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一种本体论的帝国主义,即从欧洲和西方的角度出发看待一切人类历史,且将其至高点也定在欧洲和西方。这种观点本身(但愿是)在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走到了自己的至高点,文中分析不加批评地庆贺美国在“世界新秩序”中取得统治地位,认为这是历史本身合理的必然结果(见本书原著第200—206页关于福山作品的论述)。在我们看来,现在利害攸关的问题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种族中心主义的结束。正如科内尔·韦斯特所说,对后现代主义的最佳理解也许应是视之为“对欧洲非中心化的一系列反应——即生活于一个不再以自1492年开始的欧洲霸权为支柱的世界”(1991:6)。

我们希望大家在读下文时心中记住这一背景。这些章节是1987年至1994年完成的一个合作项目的一部分,有的为单独执笔,有的是合作完成。鉴于这一合作的程度,我们觉得若是把各人独自的成果与合作的部分区分开来并不合适,尽

管书中部分章节的早期文稿曾经作为我们个人名下的论文分别发表过。有些主题在不同章节中反复提到过　　其中最重要的我们在本序言中已经尽量标示出来。虽然我们已力图在编辑过程中删除章节之间最明显的重复之处,但是由于事涉关键性质时,我们在合著的不同阶段不能不反复述及,因此读者肯定会在不同的上下文里读到某些论题反复出现,如果那不算累赘重复的话。另一方面,在写作这些文章初稿的7年间世事发生了很大变化,可当我们校对每篇文章删除最明显已经过时的言论时,我们仍完整保留了论证的基本结构——再多改动就要冒险可能弄到一切得另起炉灶的地步。但愿最初完成的部分仍能经受现在的检验。我们将这些文章奉献给读者,算是对一场仍旧在进行的讨论的草稿;在这场讨论当中,至少我们两人都获益非浅,因为在探寻共同关心的问题时,我们把各自不同的学术经历与思考融汇到一起了。

(文中除注明处外,全部译文为作者完成。——原作者注)

第一章

全球化与认同危机
——全球媒介新景观

从商业角度看……划分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就跟赤道一样并非现实存在。它们仅仅便于标示种族、语言、文化实体而已。它们不界定商业需求和消费趋向的范围。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1990）

从国内媒介到全球媒介

直到这几年，在英国乃至欧洲其他地方占主流的一直都是公共服务性广播电视系统，在大家都能收到的国家频道上规定必须播放各类节目——还严格控制外国节目的数量。主导广播电视事业管理工作的是“公众利益”的原则。广播电

视应有利于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用英国广播公司(BBC)首任总裁约翰·里思的话说,广播应充当"民主政体的融和者"(引自卡迪夫和斯坎内尔,1987:159)。它还应当帮助建立国民团结感。在BBC成立之初,人们有意识地利用广播媒体"将分散各地完全不相同的听众与国家生活这个象征中心联结起来"(出处同上:157)。战后则是电视担当起塑造国家集体生活与文化的中心机制。广播和电视相继"形成一种全体国民共享的文化,一种全新的共同社会生活"(斯坎内尔,1989:138)。历史事实表明,广播电视承担了双重职责,一是民族国家的公共服务行业,一是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心。(即便在情况迥异的美国,尽管那里一开始就以商业性广播电视为准则,但是国家利益也是至高无上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以及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全国网"成为国家生活、国家利益、国家各种活动的中心。)可以说,在大西洋的两岸,广播电视已成为一个关键的社会机构,由于它们的影响,听众和观众已将自己视为国家社会群体中的成员。

然而,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而且是决定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管理、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变化带来相互间的复杂作用而引起的一个后果就是,媒介业发生了戏剧性的激变,为所谓的媒介新秩序奠定了基础。影响最大的是管理原则发生决定性转移:从管理面向公众利益转向一种受经济和企业需求驱动的管理新制度——有时有些人错误地将这种制度称为"解控"("deregulation")。改变之后的情形是,不再从政治的角度去对待观众,即不把他们当作国家社会群体的公民,而是把他们当作经济实体,当作消费市场的组成部分(罗宾斯和韦伯斯特,1990)。在公共服务时代那些对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考虑——包括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对民族文化和同

一性的考虑——都逐渐地被看作是制约拓展媒介新市场的因素。媒介新秩序的头等大事就是铲除这类“贸易壁垒”。媒介公司和企业不再受公众宗旨的束缚，或者说不必为其负责了，他们现在只需满足消费者需求并最大限度地给消费者提供选择即可。

现在，新型媒介公司在利润和竞争原理的驱动下首要目标就是将自己的产品提供给最大数量的消费者。于是，扩张主义倾向运作起来，永不停息地向构建更大的视听空间和市场推进。迫在眉睫的事情是打破原来国家社会群体间的边界和疆界，这些界线现在都成了阻碍上述重新制定出的商业战略的武断而不合理的障碍。因此，视听地理正逐步脱离民族文化的象征性空间范围，而在国际消费者文化这一更为“普世化”的原则下加以重新调整。媒介新秩序的一大理想是做到自由而不受阻碍地广为播放节目，即“无疆界的电视节目”。这种理想的必然逻辑是最终努力实现在全球播放、形成全球市场——我们已经看到正在崛起一些意欲实现这种理想的全球性大公司。媒介新秩序的定位是一种全球化秩序。

让我们首先从该如何认识这种全球媒介的神话入手来思考这些问题。有个好例子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介公司——时代华纳公司已故总裁史蒂文·罗斯(1990)在1990年“爱丁堡国际电视节”上发表的“世界纵览演说”。罗斯说，时代华纳公司赞成“信息完全自由”，即“本着公平竞争的精神、自由流动观念、产品和技术”。他视国界为历史的遗物：“国际媒介现在的情况是，与其说受民族认同不如说是靠市场机遇推动的”。罗斯说，我们正“走在通向真正自由公开竞争的道路上，这是一场受消费者口味和需求指挥的竞争”。这是一个以消费者为真正统治者的世界秩序。

时代华纳公司渴望建立一个(对于该公司及其产品的消费者来说)“更加美好的世界”。罗斯坚持认为:“竞争思维和经验的市场只会使全世界更加紧密相联”。“我们运用新技术所能提供的服务和观念可以将甚至是世界上最遥远的地区也引入国际媒介社会”。他认为,一个“更加紧密相联”的世界将会更加民主。在思考东欧近年来发生的事件时,罗斯认为传播自由与极权社会的瓦解有关系。他反问道:“过去谁能想到把卫星、传真机、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电视——甚至唱片和电影——用作民主革命的手段?”由此看来,媒介公司正站在世界新秩序的前沿阵地。罗斯称:“我们这些思想观念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凭着一个大世界公民对自身职责的敏锐意识,理应促成民主运动并投入其中……。我们能推动实现全球人民,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国籍,都享有平等与尊严。”

罗斯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的全球性媒介公司正在最终真正实现麦克卢汉在 60 年代的预言。在罗斯看来,传播是件好事情,而且越自由越好;借助新的传播媒介,全球共享的体验会帮助我们超越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间的差异,最终走向“真正的相互信任与理解”。这段话简单却令人振奋:这是一个全世界共同迈向自由与民主的传奇,是时代华纳这样的公司有责任“积极开创美好新世界之路”的语录。

史蒂文·罗斯提出了一种看待媒介业全球化影响力的见解。而且事实上,就其“世界纵览”中呼吁世界民主以及“诸文化互相联系”而言,的确有引人入胜之处。不过,很容易看出,在现实中媒介产品“自由传播”可能是跟公司实力和收益而不是跟“美好世界”相互联系的。现在要人们接受的是媒介新秩序这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概念,这个概念跟目前我们身

边正在形成的现实秩序几乎没什么瓜葛。

媒介新秩序

赫伯特·希勒对媒介新秩序的看法跟史蒂文·罗斯的相差甚远。希勒辩称:“无法在国际舞台上新近协调成的利益关系中找到人们现在所称的全球化的实际源泉”。他认为现在情况是“跨国公司文化统治”;这是一个“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与地缘政治背景,私有经济巨头们——有时相互竞争,有时相互协作——追求资本主义历来的目标,即获取利润、积累资本”的世界(希勒,1991:20—21)。这段话所强调的是企业动机的历史延续性和一致性。它意识到并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追求市场和竞争地位的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争夺势力和利润的斗争现在在全球范围展开(阿克索和罗宾斯,1992)。

现在我们目睹的是相对占少数的全球性选手,如时代华纳、索尼、松下、鲁珀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沃尔特·迪斯尼公司以其企业家的策略来构建媒介秩序(参见表1)。从观众的角度来说,随着英国天空电视网(BskyB)、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音乐电视(MTV)、卡通电视网(the Cartoon Network)等新的商业频道的开播,媒介新秩序便昭然于世了。现在我们目睹的是形成以新型服务、新型传送系统、新型支付方式为特征的媒介新市场。现在涌现出分门别类的频道(体育台、新闻台、音乐台、电影台),替代了“传统”的节目混合型广播电视频道。据估计,1992年英国有59个频道注册运营,到2002年,这个数字将增至约130个(布兹-艾伦·汉密尔顿,1993:9)。在美国很快就可能出现200多个频道。当然,投资这些频道的还是那些全球性媒介选手(而英国在全球份额中

只占一小块位置)。

目前,全球性企业正运筹帷幄,争夺世界霸主地位。诸媒介公司面临着三种基本选择:"其一是成为制作节目的广播电视公司。其二是像音乐电视(MTV)、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家庭票房公司有线电视网(HBO)那样做批发节目的公司。其三是成为硬件传输系统,这个硬件可以是有线网也可以是随身听"(奥来塔,1993b:81)。真正全球性选手的目标是从事两个甚至于全部三方面的活动。正是这一抱负促动了收购好莱坞制片厂(环球被松下公司,哥伦比亚/三星被索尼公司,福克斯被鲁珀特·默多克收购)。正如史蒂文·罗斯(1990)所评析的:"集团化至关重要,只要能把它跟从生产到销售全部过程的一体化结合起来,而且明智地管理最终的结合体"。为了建成全球性企业,现在媒介公司的问题是决定他们需要达到何种规模的一体化并且要有能力管理它。

但是事情远不仅是媒介业内部的一体化。我们将要看到一个更加根本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娱乐信息业与电信业结合了起来。1993 年,贝尔电信拟与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公司电信公司(TCI)合并,虽然最终没有达成,但是这件事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图景。如能合并成功,新公司就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媒介企业。贝尔大西洋公司董事长曾称之为"信息时代的完美婚姻"和"下世纪传播业的典范"(迪克森,1993)。这个新型"拥有多种媒体的"巨型公司将能够不仅提供传统的有线电视节目,而且还有电信服务、电脑游戏和软件、家庭银行和购物,点播录像节目及其他一些互动式服务。其目标仍旧是发展信息传播的"高速公路",这条路将带领我们走出大众媒介时代,步入个人化媒介和单独选择的纪元。

表1　营业额排名世界前20位的视听公司

排名					
1991	1990				
1	1	时代华纳	美国	11 517.0	12 021.0
2	2	索尼公司	日本	24 977.7	28 372.1
3	13	松下电器	日本	45 578.4	55 303.2
4	3	首都/美国广播公司	美国	5 386.0	5 382.0
5	4	日本广播协会	日本	3 743.4	4 029.0
6	5	德国国立广播电台	德国	3 557.8	3 580.2
7	10	菲利浦(宝丽金)	荷兰	30 624.0	30 478.7
8	8	菲宁维斯特公司	意大利	6 310.8	8 138.0
9	9	富士通*	日本	5 127.0	6 000.0
10	11	贝塔斯曼	德国	8 972.6	9 613.7
11	7	通用电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美国	58 414.0	60 236.0
12	6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美国	3 260.0	3 035.0
13	15	新闻集团	澳大利亚	8 248.0	8 590.6
14	14	意大利无线视听台	意大利	2 502.6	2 732.6
15	16	沃特·迪斯尼公司	美国	5 843.7	6 182.4
16	12	英国广播公司	英国	2 687.4	2 743.3
17	18	荆棘百代	英国	6 352.5	6 343.0
18	17	派拉蒙	美国	3 869.0	3 895.4
19	19	任天堂	日本	3 114.7	3 767.4
20	23	东京广播公司	日本	1 343.4	1 586.4

* 据估计

来源:欧洲视听与电信研究所(IDATE),蒙彼利埃,1991。

但是，这种个人化媒介和单独选择当然是建立在那些可以制作出来并供出售的产品基础上的。全球性企业将确保控制节目制作（生产、存档资料）、销售、传输系统。图像与产品两者流动的深度与广度都比过去加强了。还应该强调的是，尽管美国的或美国式产品也还是非美国利益集团的主要食粮，但是美国文化统治在这一新秩序中到底还能保留多少基础份额（希勒，1991）。《金融时报》的一位作者最近这样评说："马上几乎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至少可以接收到正在用轻快的语调报道最新新闻、介绍最早期影片的美式英语"（斯诺迪，1993）。

企业谋略所策划要试图实现的是一个全球媒介空间与市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萨奇公司就在谈论"世界文化融合"，并称"人口统计、行为、共享的文化要素这些方面的融合将为在广阔地域范围里接受单一产品和见解创造更为有利的氛围"。人们看到诸如《达拉斯》这样的电视片，或是《星球大战》、《E·T·外星人》等影片"飞越了诸多国界，让全世界都知道其中的情节、人物，等等"（温拉姆，1984:21）。西奥多·莱维特那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销售想像力》帮助勾勒出萨奇公司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指明全世界的市场正日趋标准化和同质化。他指出："全球性企业看待世界各国不是看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而是看他们的相同之处……这种企业不断地寻求在各方面将一切事物标准化，形成一个共同的全球模式"（莱维特，1983:28）。当然，只要有利可图，全球性公司会响应市场特定部分的需求。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会寻求向遍布全球相互类似的部分销售的机会，以达到使其成本具有竞争力的规模经济"（出处同上:26）。其策略是"把这些市场份额当作全球市场而不是局部市场来对待"（温拉姆，1984:19）。

看起来 20 世纪 90 年代里起作用的是同一个原理。

(《打火石》和《侏罗纪公园》等)美国影片现在仍在全世界创下票房纪录(由此引发收购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和存档资料的激烈斗争)。卫星频道和有线频道也在全球范围销售标准化节目这方面取得进展。最近,音乐电视(MTV)被请进立陶宛帮助推进民主政体,而此刻,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用12颗卫星面向"地球村"发送全球新闻,他们似乎已经快找到全球销售的办法了。尚处发展初期的新的"信息高速公路"似乎决心进一步大力推进标准化进程。但他们给专业化"小生境"("niche")市场提供"个人化"与"单独化"的服务,这样也就可能变得复杂化了。应该强调的是,这类战略"不是否定或是反对全球同质化,相反,乃是确认它……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市场小份额要销声匿迹。相反,它意味着这些小份额向全球范围扩展"(莱维特,1983:30—31)。

企业雄心壮志的逻辑就谈到此为止。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当这种逻辑遇到由现在已确定的市场与文化构成的现实世界并顺利通过它时表现如何。由美国大企业家泰德·特纳于1980年创办的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在全球范围传送同一套英语新闻节目并已取得非凡成功。然而,该频道越来越多地遭到斥责,称其企业的身份过于美国化。人们称,CNN在全球播放是美国文化统治的一种表现,因此显然对其作为全球新闻供应者的可信度提出了疑问。而在公司总部,这也变成了市场战略与地位方面的一个主要难题。CNN目前的新闻节目已经成功地影响到世界上的商业和政界精英,但还没有有效地渗透到与地方感情隶属关系强大得多的大众市场。要想影响这类观众,"CNN得不得不对其做单单使用英语的全球电视网的看法作出重大改变",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特纳得寻求伙伴,搞本土化"(奥莱塔,1993a:30)。CNN现在不得不承认,追求下一步成功必须在世界不

同地区用不同语言制作不同版本的节目。为此目标，同当地同行合作便是非常必要的了。在（尤其是来自天空电视网新闻台，BBC 环球电视台及路透社的）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CNN 必须学会让全球化的宏伟目标符合地方复杂性。

卫星电视（Star TV）的例子提供了另一个佐证，说明有必要使全球动力与地方动力一致起来。媒介公司争夺全球霸权的战略中包括把全世界切分成大的地理经济区。卫视的总部设在香港，1991 年 8 月开播，该公司已经有效地构筑起其亚洲经济区；卫视覆盖了从土耳其到日本，从蒙古到印度尼西亚的 38 个国家（不过目前仅有 13 个国家接收其信号）。该电视台把泛亚洲的各式节目及广告结合到以"定点市场"（比如说印度、台湾）为目标的一定数量的材料上。它还力求把亚洲节目（比如，印度、中国的流行音乐、电影）与"西方国家的"频道（音乐电视、BBC 环球电视台、强档体育台）平衡起来，许多西方电视节目非常热门，以其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受到人们的欢迎（普尔，1993）。1993 年 7 月，默多克新闻集团花 5.25 亿美元买下足以控制卫视的股份，昭示着卫视在这片广阔地区的成功。对默多克来说，亚洲地区是他"全球梦"的一部分，因而他显然会试图在此地推销其天空频道。但是他也承认该地区内存在巨大的文化语言差别，因此正筹划分别给印度和中国提供不同的节目，有可能还给印度尼西亚也搞一套（斯诺迪，1993）。鉴于这片市场纷繁复杂、加上在政治上（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在宗教方面（如马来西亚）特别敏感，所以默多克在"当地"的同行成了卫视未来成功的关键所在。成功取决于能否在市场一体化与市场多样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斯蒂文·罗斯（1990）在其"世界纵览演讲"中承认，全球性媒介必须"敏锐意识到我们所运作的每个地方的文化环境和需求"。由于希望避免遭到搞文化同质化和文化统治的谴

责，所以全球性企业也想在地区内获得承认和信誉（当然，不过在这里，“地区”或许就是一个多国地区）。

媒介新秩序下的文化和政治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看到欧洲共同体为了欧洲媒介企业的利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构建“欧洲视听区”。我们能够从中找出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些紧张关系和问题。欧洲共同体的明确目标就是创立跟索尼、时代华纳旗鼓相当的欧洲企业。它试图完成从旧的公共服务时代向一个新体制的痛苦转变，在前者广播电视业者为市民观众提供了各式各样搭配均衡的节目，而在后者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致力于满足全球市场消费需求的欧洲媒介业的竞争地位。这就是工业集中与工业一体化的必然结果——努力创建几个巨型媒介企业。这同样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推进产品更为标准化，更为同质化，并将媒介文化同地域和环境的特性分离开来。

然而还有一支反面力量在起作用，挑战着全球化的必要性。我们已经看到，为了和节目制作国际化相抗衡，弥补因全球广播电视网而造成的标准化及丧失民族特性，欧洲内部重新涌起地方主义的热情，这恰恰投合了那种看来已被全球化的逻辑侵蚀掉的位置感和归属感。这种新地方主义重视欧洲各文化同一体的多样性与差异，寻求维系保留地区和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广播电视业一直被视为追寻此目标的一条主要途径，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在欧洲的各地区和小国内促进媒介业和媒介活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运用地方公众利益的原则对抗跨国市场势力的利益。人们在游说争取欧洲共同体的支持时是这样摆道理的：“对于用欧洲本地语言制作节目的地区性电视台这种特例，

依据的标准不应该是观众收视率和占讲该种语言人口比例，也不应该是精确计算出的经济成本效益"（加里涛南迪亚，1993:291）。他们自80年代后期便赢得了欧共体一定程度的支持，主要表现在欧共体的"媒介计划"，该计划为整个欧洲大陆的小制片商提供贷款和资助。欧共体内部对欧洲的文化差异日益敏感，愈发致力于保护其各自文化的特性。

这里我们再举一个有关全球—地方关系的例子。然而，"地方"一词在这里同在企业专有词汇里的意思大相径庭。在这里，它指的是地方社会群体和地区社会群体独具特色的同一性和利益。在当今全球时代，有些人渴望"重新划分媒介领土"（"re-territorialise" the media），也就是说，重新确立媒介与领土的关系。他们打定主意，认为媒介应该有助于维护地方和地区文化的鲜明特色和完整性，抵制"取消领土划分"和同质化这些威胁势力。在此意义上的"地方"实际上是对全球性企业的战略发出的挑战。

如果说全球化进程激起了人们的恐惧和不满情绪的话，那么这些情绪绝大部分往往会和人们已经觉察到的来自美国文化和"美国化"的威胁有关联。长久以来，美国大众文化被看作是一股侵蚀、瓦解欧洲文化传统的势力。好莱坞的文化统治似乎危及到欧洲文化业的根本生存大计。人们认为欧洲大陆的文化"受缚于美国的金钱——而从最根本上讲就是受缚于美国的价值观念"；简言之，从这个角度看，"好莱坞是敌人"（马尔科姆，1990）。美国现在占据了欧洲电影市场75%的份额（而美国之外地区的影片在美国票房收入当中只占2%）。因此，欧洲已经对非欧洲（实际就是美国）制作的节目限定了配额，目的有两个，保护文化主权和增强本地制片商的竞争力。这曾是关贸总协定（GATT）最后一轮磋商（1993/1994年度）的一项重要议题。虽然美国以贸易自由、传播思

想自由的名义呼吁废弃定额限制，但是欧洲利益集团下定决心维持配额限制。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为了捍卫欧洲文明的文化特性和完整性。法国人一直相当敌视英国，因为英国为泰德·特纳提供了通往欧洲观众的途径。一位批评人士说："特纳只是个前锋，诸多美国大公司则坐视欧洲的反应。如果他得手了，那么迪斯尼和时代华纳就随即跟进"（鲍威尔，1993）。他认为欧洲把这看成一场争夺表达自由的战斗："我们希望美国人能让我们生存下去。我们斗争是要争取欧洲文化的多样性，以便我们的子孙能够在影片中听到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出处同上）。说来说去还是在导致自身独特性和差异瓦解的威胁面前强调这两点。

不论在新的全球媒介空间内部还是其整体上，经济动力与文化动力都在相互复杂的作用。在这一切当中，哪里是政治的位置呢？公共服务性广播电视业扮演的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中心，还是政治民主生活的中心。过去，认同的问题跟公民地位的问题紧密相联。目前公共服务系统正在发生的情况给政治文化的未来提出了非常现实的问题。在跨国空间里构建有力的宣传、辩论机制将遇到艰难险阻。至今欧洲共同体没能形成适当的政治文化，也没能给欧洲公民权定下基调。认同的问题和公民地位的问题已经分离开来，而当前非常要害的危险恰恰在于欧洲视听空间内人们为文化认同所做的补偿将超越大众传播和辩论这样的政治目的而占了上风。并且，这种"民主赤字"当然不仅仅是世界媒介新秩序中欧洲区里值得关注的问题。

全球化与欧洲视听危机

问题是，第一，欧洲将如何跟正在重新塑造当代世界体制

的全球化势力达成一致？第二，欧洲能设想自己在世界新秩序中拥有何种同一性？似乎有三种范畴的效忠关系可行。最宽泛方便的是做一个欧洲人、归属于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的观念。“1992”运动试图促进推广的正是这种欧洲共同社会认同的观念。我们前面论述过，或许可以把这种行动恰恰看作是试图建造一个文化统一体，以其作为一个大市场的基础，这个市场是令欧洲在世界三足鼎立的经济体系里跟日本、美国竞争。然而，为此目标所宣扬的却是欧洲传统和遗产这些人们熟知的老调了。人们所召唤的是 T・S・艾略特（1948）所歌颂的“欧洲精神机体”，一种植根于希腊、罗马及 2000 年来基督教的共同血脉。

更好处理且吸引力仍旧很强的范畴是国家同一化的观念，这个观念在过去的大约 2000 年里与欧洲这个概念大体上能平和地兼容并蓄。艾略特宣称：“我们说到‘欧洲文化’时是意指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发现的各种同一性……如果将这些国家降格成各自不同的同一体时，那就不会有欧洲文化了”（出处同上：120—121）。当民族主义的幽灵再度遍布欧洲时，可以看到伸张差异和独特性的主张如此之强大。尽管说一度有这样一种信念，认为 1992 年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消亡的开端，但是自那时起，岁月却显示出国家民族主义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归属方式。随着德国重新统一，便有人再度提出法英的差异及各自的主权和利益问题。更可怕的是，这段时期里，类似法国让－玛丽・勒潘领导的“民族前线”（Front National）争取“重新按种族划定”（“re-ethnicisation”）民族同一性的运动还表明种族民族主义一直是种颇具吸引力的归属方式。这类运动的目标是“重新创造真正的民族社会群体并且以之对抗那种被他们诬蔑为全球化的、‘世界主义的’开放社会”（塔吉埃夫，1992：35）。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中，民

族差异要的是民族纯洁。

新欧洲的第三种效忠关系表现为认同小规模的地方性。这一范畴的归属观念表现为欧洲由不同地区、不同行政区及不同小民族构成。这个观念与理论性较高或者普遍性较强的主张不同,它倾向于一种排他主义的社会群体观。丰富多元的地区传统、语言、方言、文化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群体更有意义的阅历的基础。这种新地方主义跟艾略特的地区"文化星群"("constellation of cultures")的观点一样,也努力抵制一律性的势力,认为这些势力危及到欧洲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它竭力鼓动地方情愫抗衡毫无个性可言的全球文化标准化;它重申地方独立权以抗衡跨国机构空泛的官僚主义的权势。这个由——巴斯克人、伦巴第人、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等的——"诸祖国"构成的欧洲所诉求的是一种更"真实"的归属途径。

上述几种认同代表了欧洲面对全球化和全球重组势力所做出的不同的回应。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看作仅仅是几种选择方案:现在做欧洲人牵扯到(欧洲大陆、国家、地区)全部三方面含义,因此做欧洲人就要处理好这些不同范畴的认同。当然,做法将是百花齐放。变化或许会造成一些人躲避在退化了的保护性的同一性里,但是或许又会激发另外一些人去创造更加普遍团结、世界主义的同一性。纵然小民族主义通常指的是寻根,但也能用它推进民主,以抗衡国家集权和欧洲集权。纵然"欧洲"似乎提供了一个范围更大、后国家的归属方式,但是它也能很轻易地转变成一个堡垒式认同和一种超国家心态。将如何解决这些不同的可能性,是防御式还是革新式,尚需拭目以待。欧洲人将具有什么身份或是哪些身份,这个谜仍待解开。

但是有多少可能真正做到呢?在世界新秩序里哪些可能

真正令欧洲繁荣呢？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全球化似乎是一种威胁而不是开辟新天地；是因为它似乎的确给欧洲造成了身份危机。欧洲及其中的国家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不再位居世界的中心，不再是全世界价值观念的发源地。“那个叫强者和世界领袖的欧洲不复存在；那个是一切上等文化灵感源泉的欧洲已经干涸”（赫勒和费尔，1988：156）。欧洲曾经象征着文明和进步，而现在却是指紧缩和抑制。欧洲的事业曾经是世界主义的，而现在要复苏的理念是欧洲排他主义（或是各种排他主义）。并且他现在是要“欧化，不是指欧化世界其他地方，而是……指欧化欧洲自身”（桑塔格，1989：80）。马格里斯以非常戏剧化的语言展示了这个问题：“或许欧洲完了，沦为由其他帝国在别处的控制室里决定的历史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地区了”（1990：265）。欧洲自身的神话破灭了，但它必须熬过来，它不得不顺从那个将其置于从属位置的世界。要经过什么曲折才能到达这一步呢？

对立认同和整体

这与其说事关欧洲是什么样的同一体不如说事关欧洲是哪种同一体。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描述过人们过去总是怎样围绕着对立的整体和社会群体观构建欧洲的概念的。他指出：“过去那些搞乱了欧洲整体这个问题的模糊认识当中，首当其冲的是，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起就尤为明显存在的一种倾向，即仅仅从敌视和反抗别人的角度来思考欧洲这个问题。这个别人可能是希腊人或阿拉伯人，或是土耳其人；不只一次是英格兰人；今天（1963 年）是指苏联”（1963：53）。在新欧洲，同样的排他性原则继续在起作用，建立欧洲认同仍旧是针对那些（内部的和外部的）看起来是非欧洲者或反欧洲者。

今天被视为威胁欧洲理想的最主要的或许正是日本人、穆斯林人和穷人。日本人是第一支加入现代行列的“非白人”文化群落，针对他们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其他文化群落的灵感源泉。针对穆斯林和穷人——指本地区的 5 000 万和所有来自北非、土耳其、罗马尼亚、孟加拉国等所有地方的吉卜赛人——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导致无政府主义和政治混乱的因素。欧洲是与这些“他者”相对立的“欧洲”。

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当中，民族团结观一直与国家疆域的完整和主权紧密相联。在新的欧洲共同体里，疆域完整仍是至高无上的。随着消除共同体内部的经济壁垒以建立单一市场，欧洲外部疆界的安全问题变得格外重要。如果说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光里，苏维埃帝国标志着东方的一条“天然”疆界的话，那么冷战结束便终止了这种便利的状况。人们再度提出“东部问题”，随之是“南部问题”。事实上，随着“巴尔干问题”大举重登欧洲媒体的头版头条，我们似乎面临着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福山，1992）不如说是“历史的重现”。在其东部和南部一线，欧洲现在正不得不重新划定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的领土范围。正如 J·G·A·波科克指出的：“欧洲又成了个担忧自身边境安全的帝国”。他所处的境地是“必须决定是将其政治势力拓展至边缘上尚未进入其体系的那些暴乱而动荡不安的文化群落还是拒绝这样做：这指的是可能成为奥地利人的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和要是土耳其被接纳为‘欧洲’成员后的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1991：10）。

谁可以被同化了？而谁又必须被排除在外？波科克眼中的“新野蛮人”是那些没有高度发展的人们，缺乏高度发展，全球市场就对他们几乎无所供、无所需（出处同上：10）。但是这不仅仅是个用于检验能否将其纳入欧洲的经济标准、甚

至政治标准的问题。沿着这些东部和南部边界所正发生的状况也是缝合欧洲文化认同的问题。这种澄清问题的愿望,这种精确了解欧洲止于何处的需要,是为了构建一个区分开自己人与外人(指他者)的象征性地理。这些话中暗含的意义是下一个铁幕会是将欧洲跟伊斯兰世界这个他者区分开,并与之隔绝。

这项议程显然不仅仅指的是领土完整。似乎息息相关的是像欧洲精神凝聚性和认同这样的事宜。欧洲认同也像其团结一样是围绕着对立原则而构建的。发挥作用的是科尔内伊·卡斯托里亚迪所说的"不排除另一者就显然不能够确立自身——而不贬低乃至最终憎恨他就显然无法排除这另一者"(1990:29)的普遍原则。意见分歧在于该原则在历史上是如何发挥作用来树立欧洲身份的。纵观殖民主义、福音主义、东方主义的历史,他者是如何被造成并排除的,而且如何可能针对这位被憎恨的他者而形成欧洲大陆认同心态。按照斯科特·马尔科姆逊的说法,"白人"与"非白人"的对立正是将欧洲人与非欧洲人和反欧洲人区分开来的核心所在。欧洲人相互面对的时候是德国人、英国人、瑞典人,但是"面对其他肤色和宗教的人时,欧洲人视自己为白人、基督徒、开化的文明人"(1991:10)。他们所构建的是泛欧种族特性。欧洲的"精神机制"就是围绕着该种族特性构建的。当今欧洲的认同危机是这种泛欧种族神话的危机。

然而,这不仅事关种族特性,而且事关宗教,或者说有关地理、种族特性、宗教等问题在历史上是如何错综交织一起的。因此,伊朗驻梵蒂冈大使评述说,简直不可能把西方的形象跟基督教的形象分离开来:

基督教并不只在西方有。我们甚至也不能说某

一特定的基督教派等同于“西方”。但是……西方人在遇到“外人”时，即便他们自己或许不信教，也视自己是这种宗教……这种基督传统的承载者。因此，西方人在遇到“外人”时，即使自己或许不是基督徒，他们的自我形象几乎都是基督徒。（尽管说）不好讲基督教世界必属西方的，但是说西方世界必属基督教，在大体上是正确的。

（1994 年 2 月 26 日英国电视台第 4 频道，
《伊斯兰与基督教的对话》访谈录）

我们同一体中的隐形者

欧洲的同一性是什么样子的？欧洲文化群落的官方语言意义重大：这是具有聚合力、群体性、统一性、一体化、安全性的语言。尽管从未公开承认，但是人们召唤的是有可能形成的欧洲新秩序，其特点是具有明确的自我凝聚意识和完整性。人们设想欧洲同一性具有理想化的完整性和充实性。人们设想这样的同一性有边界、自成一体（参照：梅西，1992）。因为同一性是在这种思想中孕育而生，所以它必然注定会永远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对付世界上起分化瓦解作用的势力，必须一直完备保存、妥善维护它所渴求的凝聚性和完整性。在和这类想像中的势力的不懈斗争中，自身才能加强对同一性的维护。

正是欧洲民族主义历史最彻底地阐述并实现了这种防御性“绝对同一主义”（“identitarian”）思想。建立民族国家包括消除芜杂，去除或是说排斥危及民族感情“清纯度”的因素。这便是净化空间和同一性的过程。民族国家并不轻易地容许

差异。乔治·科尔姆指出:"围绕着民族国家构建的(涉及自然疆界的宗教、民族、政治和领土的)同一性已经成为欧洲现代化的基础"(1989:58)。似乎那种大一统并一心不外骛的单一民族国家体现了同一性的亲和力和完整性的愿望。

当然,我们或许会认为与其说是实现了这个愿望倒不如说正是建设国家的现实政治创造了能够产生这个愿望——这样一种愿望——的条件。这种龟缩式的自我封闭式的存在与归属方式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才变得似乎既自然又理想。现在贯穿当前锻造欧洲同一性的尝试的正是这种尽管处于更高层次,但是势头已变弱了的认同思想,我们一定为此感到遗憾。单一民族的大陆的思想看起来最符合我们现在对同一性的期望,最能让欧洲公民感到舒服。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在历史上"欧洲人"的涵盖面远不止于此。我们应该记得,过去这个称谓对公民的要求更加复杂、开放。科尔姆提请大家注意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王朝这两个多民族帝国。他指出,由于在该帝国广袤的疆域里各种族、宗教、语言群体间迁移流动的错综复杂,所以帝国人口的同一性特征繁杂缤纷。一个人除了可能是斯拉夫人中的东正教信徒,还可能是斯拉夫人中的穆斯林教信徒,斯拉夫人中的天主教信徒;不仅可能是东正教信徒中的斯拉夫人,还可能是东正教信徒中的希腊人或是阿拉伯人;可能不仅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或是阿尔巴尼亚语这些地方语,还讲帝国的官方语言和上层社会语言;可能是混居在形形色色的天主教徒、穆斯林、犹太人当中的东正教徒。科尔姆认为:"并不说这样就是诗情画意,尽善尽美,而是至少在这种状态占主流的地方,人们从不把差异当作一桩丑事或是同一性方面的缺陷"(出处同上:50—51)。那时,认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一种资源和繁盛的源泉。

这听起来或许像是在怀恋湮没了的帝国，其实本意并不在此。更确切地说，目的在于引人关注到这样的事实上来，即同一性曾经，而且能够以比单一民族国家所赋予的更丰富的方式存在。它们更丰富是因为它们更难办到，因为它们牵扯到与不同的事物进行协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对这些差异之处承担义务。当然，认为这样做于其本身是值得的是个价值评价问题。能否设想或许欧洲面对现实的复杂状况也会做出这种选择？或许上佳的，且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要是它不这样做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事实上，在欧洲历史的此时此刻，回想起那些人口大量流动，超越民族界限的古老帝国，并不是题外之义。由于我们面临的是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所以无可避免地将看到欧洲人口流动更多，流动性也更强。与那种认为将大陆分隔成民族领土，社会群体将束缚人口重新分布的信念相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边界和边境无法控制欧洲的人民过往旅行。全球化意味着我们当中将出现越来越多的被我们视为他者和异类的人们——“新野蛮人”。我们该如何正确对待他们在欧洲城堡内的存在？欧洲已经暴露于全球化势力的面前，但尚未对其敞开大门。欧洲民族主义一直竭力使人们感到差异是件丑事和同一性方面的缺陷，但其成果还难以确定。这样，一方面我们不能够避免“陌生人”，另一方面我们除了不自在地跟他们共存别无它法。

然而陌生人或外国人不仅在我们当中，而且在我们自己身上。朱莉娅·克雷斯特娃说：这是“我们同一体中的隐形者”（1991:20）。这个隐匿或压抑在我们身上的东西令我们对存在产生不安和不祥预感。构建我们同一体时被离异（alienated）的事物又复苏了，它纠缠我们的想像，扰乱我们平静的脑海。克雷斯特娃称，在我们充满恐惧的预感里，陌生人是

面前隐约可见的"威猛的迫害者,'我们'团结一致就是为了报复他……难道我们一定不能紧紧团结一起,继续和我们的自己人一起,逐出入侵者或是至少让他待在'他'的地盘上吗?"(出处同上)。不让"他"接近就是保持"我们"在一起。克雷斯特娃提出了新型国际性都市里另一种认同原则:"与他者、与外国人生活在一起使我们面临着**成为他者**的正反两种可能性。这不仅仅——从人本主义来说——是件我们能够接受他者的事,而且是要我们**当他者**,这就意味着要自我想像并自我塑造"(出处同上:13,黑体重点为本书所加)。这必然是个令人头痛的主张。里科厄这样指出:

> 当我们发现存在好几种文化而不仅是一种文化时,结果我们在承认一种文化垄断终结的同时,不管是幻觉还是确实如此,我们都受到……来自自身发现的威胁。倾刻间情况变得可能是只存在他者而我们自己则是诸他者中的"他者"。
>
> (1965:278)

差异是资源和繁盛的源泉,其可能性似乎渺茫得很。鉴于眼下欧洲认同状况,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处于何处和不处于何处了。

第二章

重新设想的社会群体？——新媒介，新可能

> 还有很多事情要通过仔细讨论与计划来解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再容忍现在这种“国际化”经济与“单一民族国家”并存的混乱状态。如果我们不能找出比现有的更坚实的社会形式并加以传播的话，我们将被判处忍受那种步伐日趋加快的民族主义和全球跨国主义，前者不切实际、狂热，后者则草率、无法控制。
>
> （雷蒙德·威廉斯，1983）

现阶段，我们正目睹着政治经济的改革与重组，这些进程表现在积累的历史体系和社会构成的变化上。这些历史发展的核心是空间重组与构成更换的过程。该过程便是随后论述的重点所在。它同时既涉及到社会空间基体的变革，又涉及

到主观上对空间与空间性的体验及定位的变更。思考这些问题需要一种由地理想像贯穿的社会理论。

我们尤为关注的是媒介业,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卷入到这些社会空间进程之中且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希望探索当前变革的本质,其中突变与承续的部分,并评估"图像空间"不断变化的布局的含义。透过地理分析这面棱镜,便有可能探讨有关这些变革的经济与文化层面之间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探索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关联。沿着这一线路探索下去,围绕着通信策略的问题与空间和地域的策略便汇聚到一起。通信方面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群体的性质和范围。在一个充满"不切实际、狂热的民族主义和草率、无法控制的全球跨国主义"的世界里,争取有意义的社会群体和"实际社会认同"的斗争愈来愈艰难:"我们不得不探求各种各样新形态的社会,其中关于全部社会宗旨,是根据不同类别的问题和结论来界定不同大小的社会"(威廉斯,1983:198—199)。

超越福特主义?

媒介业和媒介市场的变革发生在什么样的大背景之下呢?对现阶段巨变的看法最有启发性的是政治经济学家中的管理学派(Regulation School)(尤其参见:阿格里艾塔,1979;比约多和戈隆,1985;博耶,1986a,1986b;利皮茨,1987)在分析他们称为福特主义(Fordism)的社会制度的衰退时所提出的。这种看法将以大生产与大消费为中心的特定的"积累机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与恰当的"管理方式"("mode of regulation")结合为一体,依此角度来认识福特主义。"社会管理"("social regulation")既指包括了(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机器的组织结构与体制结构,还指支配生活世界的

准则、习惯、内化了的规章——“社会所有化的结构”（“architecture of socialisation”）（比约多和戈隆，1985：22）——它们在特定时间段内确保了社会再生产并常常暂时吸收了冲突和紧张关系。他们现在指出的是，福特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积累与管理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统一体，现在已经走到了极限。福特主义在控制方面固有的问题——比如，工资上涨与生产力下降，生产能力过剩与市场饱和，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社会服务价格上扬——令该体制陷入危机。此外，这是结构性危机（而不仅仅是周期性的），它不仅是经济上衰退停滞，同样是政治、社会、文化的危机。在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已经江郎才尽的境况下，资本主义未来发展需要一种从根本上创新改革的积累和管理。

虽说福特主义的历史本质及其危机的动态正日趋明晰，但是有关承续其的积累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难以捉摸、颇具争议，超越福特主义之外是什么呢？对福特主义的描述很多，越来越凝结成一种新正统派乐观主义，它确定了一种以人们通常称作新兴弹性积累机制为核心的新型社会统一体。所谓的弹性专门化表现在新式分散化生产和瞄准专业化市场的设计生产综合体；非整体化的企业（其生产不再集中在位于单一地点的大型工厂里）放弃了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而青睐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据称，工人掌握了新的技能，承担着新的责任，具备一种新的自主观念。这类观点在迈克尔·皮奥尔和查尔斯·萨贝（1984）和其他颂扬“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和“艾米利亚模式”（“Emilian Model”）（一个某种程度上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理想模式，它基于那些运用新型电脑科技，以手工艺人为主的小型公司组成的分散式网络，与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情况一样）的人们的作品中达到了极致。这些作者从某种封

建主义回潮来认识超越福特主义，这种回潮表现在新手工艺阶层的发展和出现本土化工业区。虽然这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深刻见解——对此我们会在后面再谈——但是这种新的有关弹性的神话之中还渗透着浓重的意识形态因素。事实上，他们把后福特主义想像成反福特主义：它实际上仅仅是福特主义这种刻板的、整体化制度的反面和对照物。

这种理想化的目的论的描述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现实世界中任何超越福特主义的变革无可避免地是非常复杂、难于驾驭且不确定得多。它不会是一场从一种鲜明的社会制度进化到另一种鲜明的社会制度的运动；恰恰相反，它看来是个充满动荡和混乱的进程。设计好的蓝图不会不费吹灰之力便毁掉遗留下来的坚深的社会结构、基础结构和各种关系。变革的进程复杂而不平衡，因而实在是难以确定现阶段是否标志着后福特主义社会的出现，亦或应称之为新福特主义，亦或事实上仍属福特主义晚期。那么，凭什么将弹性专门化划定为后福特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呢？事实上，用于定义和划分时代的依据根本不会不证自明。在复杂的变化进程当中，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用什么标准才有可能确认出积累新阶段的成分，而且我们怎样做才不会落入目的论学说的陷阱。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变化的走向取决于斗争和争执的话，那么对于超越福特主义的任何社会来说，它的出现及其本质都不是必然的，也是我们无法预定的。

现在的论述是关于一个主要变化领域，其核心是空间的本质和意义。社会对空间、地域、空间性的塑造正在发生哪些变革，这又启动了什么样的新政治逻辑？我们的论点是，空间在这一转型与变革期里至关重要：

> 目前的危机**正使空间性日益突显**，并比过去越

来越清楚地显现出资本主义积累的空间战略和位置战略，以及为了在所有地理范围、所有领地建立具空间意识的对策对劳动力和因资本主义发展变革而“被置于边缘地位”的一切社会分支的必然需求。

（索亚，1985：188，黑体重点为本书所加）

诸理想化的后福特主义观都注意到了空间的这一新特色，但是他们的工作还很不彻底。他们看出了从空间上集中的经济向新的分散式或与散布型经济的演变；强调如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20世纪初所描绘的本土化工业区、工业带日益增强的作用。然而现实情况更加复杂且矛盾重重。如果说新马歇尔式地方经济区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是可以确证的趋势，那么同样明显存在着朝向全球网络性经济的反向趋势。曼纽尔·卡斯特尔斯颇具说服力地描绘了他所谓的基于传播新体系和信息新技术的信息发展模式正如何造成“从空间地**域**(places)到**流动和渠道**(flows and channels)的转变——就等于是**消除地域对生产消费过程的影响**”(1983:5，黑体重点为本书所加)。卡斯特尔斯认为，企业的信息网将巩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与一体化，变构成世界性装配线的可能为现实，开辟真正的全球市场。他写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新空间是一个形态各异的空间，它由在不断变化的流的网络中分等级排列的地点构成”(出处同上：7)。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基本不受地域影响的世界秩序，该秩序连接于少量“集中的知识生产和信息存储中心以及图像信息发散中心”(出处同上：6)，中枢集中于世界金融工业体系的控制系统网络、指挥、控制总部。卡斯特尔斯认为，其结果是“形成空间与社会的新型历史关系”(出处同上：3)。

两种相反动态的必然结果便是开启新的空间秩序。当

然，这种复杂性常常是资本主义塑造空间的特征。资本主义空间性的历史后果经常透过领土发展不平衡的地理显现出来，它是向心力与离心力、集中与分散、附聚与消散、同质化与分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戴维·哈维（1985）明确了作为这一矛盾过程基础的根本发展原理。资本常常试图跨越空间障碍，提高"流动连续性"。然而，只要"在空间的某一特定点继续进行生产，就必须将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那么空间限制就必然存在并保持下去（出处同上：145）。在一个整体中流动性和稳定性必然相联："资本和劳动力两者……在地域间移动的能力取决于建造稳定、安全、主体上固定的社会与物质基础结构。超越空间的能力是根据塑造空间来预测的"（出处同上：149）。于是有了努力同时加强和瓦解固定性与一致性的势力；两者皆是同一个空间发展全过程的组成环节。

那么在现阶段，这一空间原理自身是如何产生效果的？在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基础上，人们现在能够称资本是流动性极强、非常灵活，有非领土化和不受地域限制的倾向。但是这不是现阶段惟一特有的趋势。即便资本大幅削弱了地理间的摩擦，但它仍不能逃脱对空间稳定性的依赖。空间和地域不可湮没。正如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所指出的："空间更加无关紧要这个结果深刻影响着某些地域，影响着这些地域内能维持的生活方式——当代发展或许恰恰突出了这类地方的特色"（1987：86）。企业的流动性越来越强与这种可能有关，即有可能分割、细化企业，再把它们安置在不同地域，在此过程中利用不同地方本质上的细微差别。当代资本主义这个空间基体事实上结合并明确反映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方面趋势。这些新形式的空间布署深刻反映出不断变化的积累组织结构，尤其是反映出结合了企业一体化与解体化的新模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一种原理是既朝横向又往纵向的双向整

合，它拓展了垄断性的集中原理，这是福特主义积累机制的特征所在，而且是在越来越全球化的规模上进行这种双向整合的。这一持续不断的一体化进程却与某些趋向企业纵向分解，把组织要素划分成单独的但在功能上又相互联接的专门化单位的趋势相辅相成。总体上这是指以转包合同或市场环节的形式使非战略的、或者说是不可预言、反复不定的职能与劳动过程外化——从而也使不确定性和风险外化。

这些正在兴起的组织变革是在空间内部并通过空间来进行的，而且对领土演变具有深远意义。企业纵向解体的结果是形成由小型单位构成的局部网络，常以一个或少数举足轻重的大公司为核心，带有密切的承包人/分包人关系，进行不间断的信息交流并由此形成空间邻近性。新的弹性专门化动态倾向于在空间上附聚，结果是将给地方经济注入新的向心力（库莱和朱代，1986）。人们正是在地方的层面上努力推动新的重要社会经济发展。理想化的后福特主义工业区的佼佼者们认定，具决定意义的恰恰是这一方面的组织—领土的变革。然而，它们进行的方式相当片面，将地方结构同其全球体系割裂开来。半一体化组织的地方综合体对由全球流动性和游动性企业造成的外部瓦解极其脆弱："企业内部灵活性的演变……意味着人们为了生产和消费的目的更加迅速地开辟领域并竭力使用这些地方"（思里夫特，1987：211）。

在"区域'内爆'成地方，国家'爆裂'成全球组合空间"（艾伯森，1986：4—5）的情形下，我们在地方与全球之间搭起愈发直接的关系。而且应该强调的是，在该进程当中，单一民族国家尽管仍旧雄心勃勃，但其作用和重要性已变得更加难以捉摸、疑问丛生。曼纽尔·卡斯特尔斯认为前景暗淡："一方面，势力空间正转变成流体。另一方面，意义空间正削减成由新部落群体组成的微领土"（1983：4）。他设想有一个新的

"集体间离空间",其中"人与空间形态分离","外部体验与内部体验割裂开来"(出处同上:7)。不应小看卡斯特尔斯的预测。但是目前的形势是否包含其他情况,有进步的和充满希望的可能性吗?

图像空间

这些社会空间的变革进程是认清媒介业发展的本质和重要意义的至关重要的背景。在本节和下一节我们想专门从视听业运作原理的角度审视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我们想调整通信策略,使之趋向空间和地域的政策。眼下正兴起的新型图像市场和图像空间的本质是什么,而它们对于"虚构空间"(加尼埃,1987)、空间观和地域观有何意义?重构图像空间的背景是公共服务管理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后者正是强调民族这个舞台和民族文化。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于是,当技术变革和经济变革逐步超越单一民族国家调控能力的事实日趋明朗的同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仍存在一种过分的逆流,那就是"渴望重建已经死亡的国家以及随之湮没的既成道德与社会事实……在国家褪色的图像上杜撰一个虚构的整体"(麦凯贝,1988:29)。国家的勃勃雄心和诸多努力不会轻易消失。鉴于此,有什么范畴可以让人们调和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呢?卡斯特尔斯(1983:16)又是做了最糟的打算:"大的广播电视网的信息垄断同地方狭域文化越来越狭隘的规范共存,这种狭域文化的中心是以地方观念为指导的有线电视。"是不是未来一定无可避免地就是隐逸主义、地方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在全球电子村内愈演愈烈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从复杂的重建动态这个角度审视新媒介业,我们业已从更宽泛的角度,尤其从全球化

和本土化的互动，对该动态进行了探讨。最为昭然耀眼之处是全球传播霸业的迅速崛起，诸如默多克、贝鲁斯考尼（Berlusconi）、贝塔斯曼建立的帝国。国际化当然不是什么新现象，但是现在它正迈入一个新阶段，而且“由于经济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单位愈来愈多地超越了国家边界，所以维持国家主权和同一性的努力也变得愈加举步维艰”（柯林斯、加纳姆、洛克斯利，1988:55）。我们眼见着真正全球性、没有中心的企业正在逐步形成，在这里，形形色色的媒介产品（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物、音乐录像）被汇聚到包罗万象的传播帝国。在一条全球流水线上完成合资共同制作的产品，并瞄准世界市场。这些巨型企业正在公共服务传统逐步溃败，国家广播电视体系随之解控的情形之下构筑全球图像流动空间。

全球化进程的根本功用是加强企业一体化。显然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上都存在各种形式的横向联合，有广播电视公司、电影电视制片厂、出版商、唱片商等等之间结成的新联盟。洛吉卡（Logica）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1987:131）讲得十分清楚，正是“纵向一体化的新型媒介集团的出现才是欧洲商业电视的惟一的最重要的本质特性和扩张元素”。鲁珀特·默多克从福克斯电视网、20世纪福克斯、天空电视网，一直迈向实现制作、销售、播出一体化控制，他的这些进展便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洛吉卡公司（出处同上:268—270）所划分的电视节目制作一条龙当中的要害职能部门是创作者、节目制作者、广播电视公司、信号传输和广播电视网经营商，它还认为新型媒介集团正志在完成上述部门乃至全部职能纵向一体化。事实上，全部一体化可能不如某些职能部门关键性的结合那么有意义，而且也不易实现，洛吉卡公司认为传输部门/广播电视公司，广播电视公司/节目制作部、节目制作部/创作部之间的结合对于巩固传播业势力集团至关重要。

纵向一体化的趋势也不是不受限制、包罗万象；它还和部分纵向解体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迈克尔·斯托珀和苏珊·克里斯托弗森（1987）提出，就美国电影业来说，当大制片厂控制主宰了资金和产品内容、分配和销售之时，还出现了迈向生产具体化及启用小独立制片商的步伐。这种非纵向一体化的进程（即逆转了纵向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与风险外化和图谋利用最多样的创造性资源携起手来。一个重要结果便是形成独具特色的外景拍摄地新模式：独立制片商"因为其服务工作的特性和产品总是不断变化，要求与其他公司，如制片公司和大电影制片厂进行非常规的、频繁的市场交易"（克里斯托弗森和斯托珀，1986:316），因而它们在空间上集中起来。因为临时雇佣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加之与广播电视网相联十分重要，于是引发了相当显著的地域附聚趋势。

有很多人认为，这种纵向解体和领地本土化趋势宣告了以弹性专门化与文化工业区为特征的良性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到来。然而，有一点很重要，即必须强调纵向解体主要适用于生产环节。正如尼古拉斯·加纳姆所主张的："势力和利益的核心所在是文化传播，而不是文化生产。文化多元的关键在于获得传播的权利"（1986:31—32）。同样很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体化与解体之间的必然联系不是相互矛盾，相反，是非常互补的。虽然解体和本土化十分重要，然而，一体化和全球化仍是主流（阿克索和罗宾斯，1992）。

本土化媒体制作的演进也已经成为欧洲的一件大事，人们根据具体国情和地区情形采用了独特的方式（罗宾斯和康福德，1994）。英国便是部分纵向解体的范例，尤其是其政治含义含糊不清、自相矛盾，堪称典型。尽管先前英国广播电视业也已完成了制作、编辑、确定保留节目以及播发这些职能部门的一体化，但是1982年第四频道的开播又向分解这些部门

迈出了一步。美国电影业关键的创新在于节目制作外化，其结果是崛起并强化了独立制片商这--小商业群。这类公司大多常常搞政治上激进的项目，它们将自己的活动定在远离大都市中心的地方，在（诸如英国威尔士东南部港市加的夫、英国英格兰东北部港市纽卡斯尔、英格兰西南部港市布里斯托尔、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英格兰西北部港市曼彻斯特、英格兰中部城市伯明翰的）地区性城市里逐步形成小型本土化聚集群。这些发展促动了一些人所真切期盼的在视听业搞分散、分权、大众化的愿望。结果紧跟着《皮科克报告》（1986）的推荐，在政府作出决定的情况下，出现了第二次非纵向一体化的浪潮，即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独立电视公司（ITV）得将其25%的节目转包给独立制片商。然而，这股改革新浪潮严重破坏了理想中的期望和规划。当时越来越清楚的是，制作外化和转包正在造就的不是“独立”自主的节目制作人，而是一支散乱、随意、不稳固的劳动大军。建立一支外部劳动大军的战略其重中之重是打破广播电视联盟的“限制性做法”。诸如泰恩河－提兹河台，伦敦周末电视台、TV－AM台、泰晤士河电视台所实行的“弹性工作制”意在坚持对雇员的纪律要求和控制，从而当然就增强了赢利能力和相对优势。弹性转变成了权力：通过与内部员工的新型合同关系，通过与外部转包商的市场关系的力量。所谓的弹性专门化将组织与功能上的解体同控制与合作方面持续进行的一体化结合了起来（康福德和罗宾斯，1995，即将出版）。

现在我们一定要问，这些综合了一体化与解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进程，其政治含义是什么呢？事实上，正在兴起的是另一种国家构成形式，它倾向于顺应超国家和次国家两种动态的观点和议定任务。在这一进程中一些新问题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有关经济空间与市场空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是

有关文化消费与集体认同的活动范围。

全球通信策略的中心围绕在国际"图像业之战"和"图像巨业"之间的斗争上(弗雷歇,1986)。跨国企业间的这场"地位之战"在欧洲委员会的事务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这个充斥着电视图像的世界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片子将来自何处?谁将占领制作和传播这些片子的市场——及雇佣权?"(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6:3)。有人认为,要想将来挑战美国的霸业,那么构建泛欧行业和市场便是极为必要的:这个共同市场"必须创造条件形成规模经济,使得欧洲企业以尽可能最低的成本生产更多产品,来弥补其投资费用"(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8a:3)。技术进步现在正"嘲弄着疆界","纯粹属国家内的受众、市场和频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发展的逻辑肯定是走向一个"欧洲视听领域"(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6:3)。人们担心,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时候,欧洲视听市场有可能被美国、日本、巴西企业的产品占领了。

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支持欧洲大企业,并将它们整合起来。人们把开放的空间和广播电视网流视为创建能巩固欧洲工业和经济复兴的单一大市场的基础。鉴于此,"无疆界的电视节目"(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4)同样必然意味着开放全球广告市场和广告空间。迄今为止,"欧洲对电视广告的限制和制约说明,相对而言,电视机仍没被人们利用为一种广告媒介"(泰德曼和凯尔姆,1986:63)。图像业的未来深深地扎根于全球广告业的未来;人们打算用欧洲视听领域来支持、推进欧洲商业之声的自由(霍迪斯,1985)。

人们还把该泛欧积累空间规划为一个文化和认同的空间:"创建起的大市场建立了一个基于共同文化根源以及社会经济现实的欧洲地区"(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7:3)。这事关"维护、增进欧洲文化认同",事关"增进我们各族人民之

间的相互了解，提高他们对共同生活命运的意识”（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8b：3，11）。人们从表达欧洲内部的联系与对欧洲忠诚的角度出发制定了跨国文化政策，尤其针对的是大西洋组织成员的文化认同。但是问题是，这种“人民的欧洲”应该是什么样子，这种“对由一些各不相同相互却又有密切依存关系的国家组成的共同社会群体的从属感”是什么意思（出处同上：4）？是否有可能将一个多民族行政统一体转变成某种有意义的团结的同一体？或许正是这些差异，即该委员会（1986：8）所称的“丰富性”和“文化多样性”，才是创立建设性的附属关系和认同中意义更重大的地方？必须认识到还有一些势力在抵制文化一元化和跨国主义。由传播全球化引发倾向统一的背景下，还存在保护、保存本国语言文化的分离倾向（吉夫鲁，1986）。人们切身认识到“社会事务全球化”（“globalisation of social transactions”）是一个“国际化进程”，它逐步剥夺了欧洲的独创能力并涣散其公民，以至于现在欧洲的文化差异一点点消散（巴桑，1988：72），可是这种“全球化”还图谋搞本土化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和认同。

在超国家的通信和文化策略里，集中于当地和城市文化认同的次国家议事日程日呈上升趋势，但这又与前者背道而驰。地方媒介被看作是“地区建设手段，这不仅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地区意识、文化认同、语言定型），而且是从经济的角度（提供就业、公众对通信技术的敏感化、地方市场能量等）来说的”（克鲁克斯和维泰特－菲利普，1986：4）。正如托斯坦·哈格施坦指出的，在许多活动已经“摆脱了地域的束缚”，媒介“几乎提供不了什么有关世界图景中地方和地区的内容”的系统社会里兴起了一些反趋势，探索地方媒介的“可能性空间”，建立大众辩论和文化表现的地方性舞台，事实上就是发展有意义的地方大众领域（哈格施坦，1986：10，16，18）。

英国的情况还是颇有教益。在这个国家体制素来受集中化大都会文化支配的社会里，视听业组织结构朝向制作部分解体和外化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地方文化创新运动结合了起来。在一些城市和地方，图像业已站在了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的最前沿。（“欧洲文化城”）格拉斯哥、设菲尔德、伯明翰、利物浦、纽卡斯尔、布雷德福、（“媒介城”）加的夫都发起了许多新的亮点行动。它们的战略效仿大伦敦市政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作法，依据新马歇尔主义原则，努力发展地方性文化工业区。在许多地方，这个有关地方工业文化大众领域的问题引发了有关大众空间的问题，而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质量问题也纳入到关于城市结构和环境发展的政策当中。

这不仅仅是个经济和文化激进化的事，而是：地方领域是被激烈争夺的领地。地区文化也不仅仅只受到革新派地方政府的关注。它同样在大型传播业企业集团的工作日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些企业寻求将全球营销与瞄准地方和地区消费者结合起来。文化业不仅仅是搞节目制作的，而且还要搞传播，这一点也非常关键，但只要不让平等进入有线和微波系统等新的传播渠道，那么文化激进主义的愿望仍将沦为空谈。

地方创新运动也受外部政治干预的影响：地方自主权和责任权因集中实施的发展战略而受到削弱。虽然“核心机关给予的官方讲法是为了让政权和自由不再受官僚统治”，而人们本以为自由商业区和城市发展公司（UDC）所代表的“自由市场”实际是靠政府几乎空前巨额的补贴和资助来支持的（邓肯和古德威尔，1988：272）。我们从发展工业、娱乐业、城市建设的企业的综合战略中看到的是早期地方主义政策身上的机会主义特征的影子以及对其的吸收。文化艺术业已经被纳入这一企业创新运动的核心。有线技术被当作“处理市内

正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取得成功复兴”的手段（有线传播管理局，1987）。而且，据艺术委员会称，艺术

> 是巩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整个文化、环境、娱乐设施中的必要成分。它们激发旅游业及由其创造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它们能成为一个地区全面复兴的主要促动因素。它们为社会群体的自豪感和认同提供了焦点。
>
> （1988：2）

新企业文化召集文化业制造出相互差异的城市或地方特性。它们的中心工作都是塑造一种形象，一个虚构的不真实的同一体，一个假的氛围，通常做法是通过“挽回（或真实或想像或仅仅是重新创造出的模仿的）‘历史’和（同样也是或真实或想像或仅仅是缔造者们为推销而包装起来的）‘社会群体’”（哈维，1987：274）。这样做的背景是因为城市和地区身负更大压力，要求它们采纳企业家的姿态以吸引流动的全球资金。推销当地特性和形象是城市间激烈竞争的一个目的，而成功“往往由于其他地方出现具有竞争力或是新的替代物而变得短暂或有待争议了”（出处同上：278）。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经济岌岌可危，地方特性和文化或许也是虚假脆弱的了。

重新设想新社会群体?

至此，我们已经结合图像空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趋势，从更宽泛的政治经济改革的角度探讨了媒介业近期的发展情况。现在我们想从另一个视角探讨上述过程，即从文化

改革的角度来看待媒介。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认为:"当今新的现实情况及其必然面对的文化政治的中心就是空间的中心"(斯帝芬森,1987:40)。这不仅涉及到空间的变幻和结构,还涉及到空间主观的一面,即空间内定向和体验空间。而且全球空间和地方空间两者均涉及到:"需要……全球文化风格与具体当地情况或国情的特殊性和需求之间达成一种新型关系"(出处同上)。我们如何在新的全球文化空间中给自己定位?我们如何调和自己在多维空间、在电子网络的虚拟空间中的认知存在与在地方性空间里的肉体存在?我们能不能重新在地方空间里定位自我,而不陷入对社会群体和团体(译者注:原文为德语,Gemeinschaft。)的怀旧伤情?用雷蒙德·威廉斯(1983)的话说就是,可能出现什么样适宜的新式认同和亲密关系?

当代文化理论一直关注的是在全球空间中无所适从的体验,而这一思考的基点是全球图像空间的冲击力。理查德·卡尼(1988a:1—2)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图像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这是一个"图像文明"("Civilisation of the Image"),这里"现实成了图像暗淡的倒影……几乎无法区分现实和虚幻"。卡尼指出,由于"自相抵毁的图像无所不在,这些图像在镜子般无限制的映射下互相模仿,所以心理世界同物质世界一样成为整个图像业的殖民地"(出处同上:1,5)。图像流和图像空间的全球化正从根本上改变空间性和人们对空间与地域的观念。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参见:斯帝芬森,1987:33)提到"当今'后现代新空间'中关于存在的迷境",认为这就是一种"人在其中无法定位自我的文化"。

"后现代化"的这一层面在让·博德里拉尔的著作中表达得最为明白。他认为,在这个图像的社会里,个体"现在仅仅是个单纯的屏幕,是所有颇具影响力的网络的一个转播中心"(博

德里拉尔,1985b:133)。通过电视图像,"我们自身和周围整个宇宙成了一个控制屏":"仅仅由于电视机的存在便将栖息地其余的部分变成了一种古旧的外壳,残存的人际关系(它们能幸存下来仍旧令人费解)……一旦行为在某些屏幕和控制终端定型,那剩下来的东西似乎就仅仅是个庞大的无用的躯体,遭人唾弃"(出处同上:129)。这便是屏幕和网络的世界,"光滑的通信操作平面";这是个具有"绝对接近性,事物完全瞬时性,没有抵御、退避感"的世界(出处同上:133)。

这个多维空间恰恰是跨国广播电视网和传播流在文化领域的回声,曼纽尔·卡斯特尔斯认为这些跨国广播电视网和传播流表现了积累全球化与电脑化的特征。卡斯特尔斯(1983:4)认为其结果是"人类经验的毁灭,从而是通信的毁灭,继而社会的毁灭",而博德里拉尔(1985b:132)却讲要庆贺"与这可恶的通信妄想有关的着迷与迷惘状态"。他被新的传播网络,被信息图像流,被与其相联的分散的没有定位的同一体吸引住了。这种流动新空间由跨国资本塑造和控制:这是个IBM和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空间,是默多克和贝鲁斯考尼的空间。正是他们不断演进的网络式商品流和广告展示市场引发了博德里拉尔的"通信迷情"。正是他们的屏幕、网络、模拟、控制系统激发了他对尖端技术的敬畏之情。

当然,这的确与20世纪后期的重要发展密切相关。我们不应该低估这真实的时刻;或许甚至能经历这个时刻都是令人兴奋的。但是关键在于必须进一步推进它。正如理查德·卡尼(1988a:380)指出的那样:"单纯知道图像业的技术殖民化是由计算机在全球控制的'第三阶段'多国资本网的一个征候并不够"。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必然会提出一个更难的问题:"我们在哪儿能找到一处居临界距离的地方,我们或许能在哪儿开始设想另一种社会存在的图景,这种社会存在有

能力抵消‘尖端技术’令我们产生的麻痹症?”

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和理论的非凡之处在于它十分关注中介(译者注:mediation,心理学语,指在初期刺激或观念与其最后结果之间的观念或意向的插入。):图像、模拟、广播电视网、屏幕、展示。依马里克·芬利(引述自:扬,1989:86)看,后现代主义是“为了不失去参照认同的一种精神病态的防卫”。技术中介(technological mediation)跟与现实的脱离有关系。从哲学上说,这种属于精神病态的现实感丧失是由科学理性和管理理性的逻辑最终导致的,是抽象理性和形式理性全部总共的夙志。从更社会化的角度看,这是经过合理化、官僚主义的、由技术专家治理的社会特有的“普遍文化精神病”,这种社会现在于全球范围建立间接关系并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整合;在这个社会里,超越空间范围的信息和传播技术使得能够“创建非常复杂、‘非人格化’的组织,以致于它们很容易便物化了”,而又让人觉得“不是人类行为的产品而是自动系统的产品”(卡尔霍恩,1988:5)。

不管是政府形式的还是精神病态的合理化改革,其特征皆如迈克尔·拉斯廷(1987:31)所谓的抽象的普世主义,表现在“否认人类于时空的特定定位”,无地方特性的和无所指性的认同观。拉斯廷认为,文化干涉和政治干涉都非常需要顾及社会构造特征、密度、差异。所需要的是“一种新单一主义”,它认为“集体认同是通过共同占有空间形成,以单一主义类式的关系建成”(出处同上:34)。这指的是开拓或是重新设想有所指的认同观,重新估价具体的特有的体验。用理查德·罗蒂的话来说,这指的是休戚相关性,而不是客观性,它是一种置人的生活于大背景下的方式。启蒙主义理想中的客观性认为个体“将他自己(原文如此)与实际身边的人们间隔开来……借助的方式是使自己成为某种无需参照任何特定

人类就能描述的事物”(罗蒂,1985:3)。另一方面,对休戚相关性的渴求是有所指的,且融入到背景之中:个体讲述他(或她)对群体的贡献,这个群体可能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现实中的历史群体,或者是另一现实存在,但属遥远时空的群体,或者是完全想像出来的群体”。这个结合的过程会发生在热衷于明确界定领土的地方,尽管人们不应该把这看作是一心追求回归到礼俗社会(译者注:Gemeinschaft,德国社会学家F. Tonnis所著《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一书中阐述的由自然意志推动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如原始社会、家庭、宗族、宗教社区等。)那种着重地方观念的社会生活。休戚相关性和集体性应该还有强烈愿望去超越地区。理查德·罗蒂从全球图像空间的角度出发,要求“发挥想像回应他者发出的后现代之声,这种呼声通过由媒体中介的凝眸注视传过来”:

> 在这面映照自我的梳妆镜遥远的另一端,除了假面具和镜子的影响外,有人在受苦在抗争,有人生来死去,有人希望绝望。甚至那些传递这个星球最遥远角落的事件的电视片,也至少是潜在地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他者们来向我们叙述的……我们中看这些片子的人难道不得不既要对屏幕的表面映像还要对它们传播的人类的呼声做出回应吗?
>
> (1988a:387—388)

对欧洲的诸同一体而言,这意味着什么?躲避进某种单一的、具凝聚性的国家认同而且是民族主义的认同里,这并不容易支撑。至少在欧洲,民族主义“想像出的诸群体”是越来越令人困惑。一方面,为了痛苦地捍卫国家和民族性,人们正

在旷日持久地进行一场残酷却又无望取胜的战斗，而另一方面，显然20世纪后期社会空间的变革要求新的定位和新型亲密关系。对这些新情况最明显的反应当然便是试图建立欧洲共同体的努力：建立"一个共同市场"、一个"居住者的欧洲"、一个"文化的欧洲"。这种试图同时解决分散化和全球化的努力导致的是政治妥协，并借以将民族文化包裹保存到行政官僚统治下的假国际主义中。尽管它是针对美、日"威胁"来界定的，但是这实际算是一种超民族主义（亦或是极端民族主义呢？）。

但是，那么真正重新设想的群体的前提条件和要求是什么呢？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迈向2000年》（1983）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探索新型的多变社会和多变认同。必须依据不同的多元认同详细阐述后现代文化，而不是落入某种虚假的一致和统一中去。这一定涉及到在地方和全球空间中的位置和定位：涉及到切身存在的环境和在中介空间的存在。在一个层面上，这指的是使个体们发生直接社会接触的有界限的地方性空间舞台，指的是重新估价大众地域和重新创造市民文化。但是，正如克雷格·卡尔霍恩（1988：27—28）指出的，我们必须承认，"分散的群体虽然或许可取，但是它们至多是系统整合的补充而不是它的替代物"。有必要改进大规模系统的运作方式，而这意味着学会如何运用大众媒介和传播新技术创造"大众新论坛"。

此间许多论述都是强调全球图像企业令人窒息的强势。然而，积累空间与文化形态空间布局的新变革的确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来重新想像休戚相关性。近期分散式节目制作的发展至少使得地方媒介空间成为可能。设想"扩大地区和地方内部通信流动""或许能为大众辩论和特有的文化表现设立讲坛"，这是可取的（哈格斯特兰，1986：18）。应该能在地

方的公众领域详细阐述建立在空间构架上的大众学说。这时候必须把媒介文化视为一项宏大战略的组成部分，该战略通过刺激文化创新、认同、差异来进行地方发展（巴桑等人，1986）。当然，这种地方主义可能蜕化成闭关自守、恋旧的历史第一主义和对传统的固恋，但也可以从更激进、更富革新精神的角度看待地区观念。新形态的流动使得对地方的忠诚心不再指的是被硬性划定的认同，而日益变成一个事关选择、决定、具可变性的问题。此外，地方文化受到外部影响熏染浸透。肯尼思·弗兰普顿这样指出，现在只能把地方文化建成全球文化的地方性变奏。在他看来，需要“临界性区域主义”战略“用从特定阶段的特质里间接得来的要素传递普世文明的影响”（弗兰普顿，1985：21）。临界性地区或地方文化一定要同全球文化进行对话。

但是当代文化认同也一定直接涉及国际性，涉及我们在跨国空间的位置。这在某个层面上可以是指超国家语言和文化群体：比如，“操法语者的特征”（儒昂尼，1988），或者更激进的有“拉丁视听空间”（马特拉尔，戴顾尔和马特拉尔，1984）。但是它也必须超越欧洲中心观，达成其他形式的对话和集体。这里根本之处是与第三世界诸文化群落的休戚相关性：指那些欧洲之外，但还属第三世界的群体，现在以其所有变体形式落户欧洲领土内的文化群落。欧洲认同再也无法那样简单直白、毋庸置疑地单指西方智慧传统和文化传统了。欧洲好斗多战、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带来的结果是，现在它容纳了千姿百态的文化群落和同一体。问题是，种族（及性别）差异是否遭到否认和压制，或者说它们能否被接受——而且是接受其差异形式。

第三章

文化、社会群体、认同
——传播技术与欧洲改形

欧洲是我想像出来的
——很多人将看见她，
很多人不会——
尽管这不过是古老而熟悉的世界
而不是什么虚幻的梦境。

艾伦·金斯伯格

理查德·柯林斯在多伦多举行的一次贸易论坛会上发言时着重提到一位法国独立制片人的话，说今天的"电视是彩色、立体声、说英语的"(1988:1)。拉美小说家曼纽尔·普伊格(Manuel Puig)的回忆同出一辙，他说在阿根廷看好莱坞电影让他得出的结论是："我童年的一段时光里……现实是用英语讲出来并带着翻译字幕的"。我们或许还能记得，据报

道，当圣雄甘地被问及对欧洲文明的看法时，他只回答说他认为“那该是非常美好的概念”。

当代技术进步，尤其是卫星电视的出现，已给信息流问题提出了新的紧迫要求。柯林斯(1988:6)于是已经注意到民族国家在管理电子产品流通时所面临的的巨大困难，确切的原因在于它们是无形的(不像电影书籍，海关可以更方便地处置)。同样，菲利普·施莱辛格(1986:126)也注意到，卫星播送威胁着削弱现行国家空间管理政策的根基。柯林斯指出，卫星电视有可能预示着那种向美国文化势力俯首称臣的“加拿大经历”会普遍化(1988:13)；他还注意到，卫星电视或许真将宣告他所谓的“欧洲电视加拿大化”的到来(出处同上:20)。因此，已经有人辩称，这些新技术给已有的国家(事实上是大陆的)认同造成了令人担忧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它们不仅对分解已有受众/社会群体，还对创建跨越国界的新受众/社会群体潜在地具有无法管理，从而“令人不安”的作用。不同的作者既从相对出口物质商品而言，(语言/文化)照理给出口信息产品所带来的局限性出发；又从经验上讲，欧洲人担心被美国文化吞噬，但其实受众一直偏好“本土”节目，这条经验性证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这种担心是矛盾的；从而指出美国文化出口能力是有限的(参照：米尔斯，1985)。

构建文化同一体

直到较近期，围绕着文化认同和文化帝国主义这些问题的辩论都是运用“文化同一体”的模式展开的，对该模式定义的“文化同一体”人们罕有质询。总体上说，(由于不同程度的技术决定论的影响)人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是探问(卫

星播送等)"新技术"给一系列预定目标,指国家(或文化)认同的潜在冲击。这类构想(和假设)似乎奠定了欧洲共同体就这方面议题的许多辩论(及政策)的基础。因此,比如说,常有人假设,社会群体及其政治体制要想保持完整并继续存在,关键靠其手中的传播统治权;如果一个社会群体消费"过多"(没有专门指明的)外来信息,那么其"本土政治体制的合法地位便会受到威胁,该社群终将灭亡"(班克斯和柯林斯,1989:2)。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才能深刻理解欧洲共同体新近的方针,该方针是人们看到"可口可乐化"的威胁所做出的反应,它关心的是促进、培养欧洲认同观,这种观念认为统一是目标,信息/文化(人们觉得信息/文化具有"同质化"作用,参照:施莱辛格,1987:220)是达到该目标的手段。或者用让·莫内的话来讲:"假如我们重新构建欧洲共同体,我们应该从文化入手"(引文出处同上:222)。

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意大利有可能"丧失独立国资格"等等的讨论(因为人们认为意大利生产基础薄弱,所以有变成一个纯消费地区的危险,参照:施莱辛格,1986:137)便具有了另一番重要意义。施莱辛格认为:"集体认同及其形成是一个难题,不可以假定它已经存在,是政治机构的先决条件"(1987:240)。从这个角度说,只得将文化看作是个(民族间和民族内)永恒的角斗场,因而我们不能把民族文化的"成果"看作是某种一劳永逸的任务,其实已经"完成了"的任务可能跟"没完成"一个样。恰恰相反,它必然是个持续的过程,而且持续令人费解的过程(参照:格拉姆西,1971,论霸权是不稳定均势间的持续运动)。与此类似的是唐纳德曾指出的,颇有助益的办法或许是集中注意力于

话语、技术和(出版业资本主义、教育、大众媒

介等等)体制这些通常被认作是造就“民族文化”的构件……民族是上述文化技术的结果,不是其起源。一个民族不是通过其文化来表现自我的;是文化构件造就了“民族”。所造就的不是一种认同也不是单一的意识……而是(分等级构成的)价值观念、性情和差异。这个多种文化和社会成分混杂的异质体因为“民族”中系统有机的原则而获得一定的稳定性。“民族的”一词借将文化统一体同其他文化群落区分开来,并借划定其边界来界定该文化统一体;当然这是个虚拟的统一体,因为身处其中的“我们”自身常常就是有差别的。

(1988:32)

表示差异的认同:构成关系

在索绪尔(1974)的经典语言学著作中,他指出,语言的王国里只有差异,不存在正面的关系。因此,他在分析语言中的同一性问题(指两个语言单位被算作同一范畴下的实例)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同一性完全是一个系统内的差异功能。因此,如他所言,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时必须从这样一种根本认识出发,即我们希望认清的语言“单位”是“纯粹不同的,我们界定它们不是以其正面内容而是逆向出发,是以其与系统内其他项的关系。它们最确切的特性在于它们与其他单位所不同的地方”(索绪尔,1974:117)。

我们想指出的是,应将该原则应用到文化认同的分析上来。与其一个个地分析文化或(民族)认同,(有可能)随后思考它们是如何互相(以结盟或敌对,主宰与隶属的关系)联系

的，不如我们牢牢抓住索绪尔所称的这些“同一性”是怎样只有在它们互相间的关系当中且只有通过它们互相间的关系构成。为了更具体地表述该论点，举例来说，如果首先就界定“欧洲文化”，随后分析其与其他文化同一体的关系，这样做就不合适。恰恰相反，从这个角度看，“欧洲文化”恰好是通过它相对于美洲文化、亚洲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的独特之处和反差之处而构建起来的。因此说，差异构成了认同。施莱辛格还做出了有益的系统阐述。他是这样说的：

> 认同同样涉及到排斥与包含，因此界定种族集团至关重要的因素便成了界定该集团相对其他集团而言的社会**边界**……而不是边境线内的文化现实。
>
> (1987:235)

看来，集体认同是建立在记忆的(选择性)过程之上的(参照：赖特，1985)，从而特定集团通过对共同历史的记忆来认识自我。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动态认同观，集中注意社会集团连续不断地重新组成、重新界定其边界的能力(施莱辛格，1987:230)。

于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认同是种特定形式的集体认同：

> 所有认同都在一套社会关系体系内构建起来，并要求与其他认同相互认知。不应把认同……看作个“事物”，而应看作“关系与表述的体系”……维系一者的认同是……一个持续重组的过程，而不是个已知物，在此过程中人们一再纠缠于自我认同和确认差异这两个构成元素……认同被看作是动态的、

自然发生的集体行为。

（出处同上:236—237）

迄今为止陈述的论点都是社会文化分析层面上的。然而，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唐纳德在分析英语文化构成时做了详细阐述，他在分析当中还强调了构建和维持认同与差异时的精神过程。唐纳德在论证过程中设问道，为什么流行小说中有那么多怪异的外国恶棍（如，傅满楚（译者注：傅满楚是英国侦探故事里的中国恶棍，此人的形象特征是从嘴角垂直挂下的胡须。）、“不博士”等等）？为什么流行影片总是在屏幕上惟妙惟肖地刻划“危险女人”，以表现认同问题（如，黑色电影）？他的观点是，这些流行小说紧扣根深蒂固的精神过程，关注它们能帮助我们理解他所谓的“流行文化中的偏执思想、墨守熟悉的思想归向及对差异的恐惧”（唐纳德，1988：44）。他指出：

种族主义表现出来的暴力性厌女癖，憎恶异族文化、异族意识形态和“内部敌人”，这其实是一种惊恐之情，担心失去了熟知的边界，一切将崩塌，变得乌烟瘴气，乱作一团；认同给化解了，于是“我”就给窒息或淹没掉。

（出处同上）

不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民族层面提出“认同”问题，这都是其中根本的忧虑所在。如马特拉特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担忧的驱动下，捍卫特定“文化认同”很容易便退化成陈腐至极的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并且作出民族主义性质的断言，认为一个集团优于另一个集团（参照：马特拉特，德

尔考特和马特拉特,1984)。这个问题并不抽象:它指的是不同集团界定民族认同的相对权力,以及它们通过控制文化机构使其定义流通起来的能力。进而我们步入了霍布斯鲍姆和兰杰(1983)所谓的"创造传统"的领域。传统不是传下来也不是被动接受的一系列固定的或特定信念、习俗。与此相反,正如赖特(1985)曾指出的,传统确指的是现今政治,是实权机构选择过去某些价值观念并使它们在现今实践中流通起来的方式(参照:撒切尔夫人呼吁回归"维多利亚时期价值观念",梅杰在英国发起的"寻根溯本"运动)。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再生产机制,塑造了特定版本的"集体记忆",进而塑造了特定的民族认同观。

然而,虽说强调从文化上构建认同(及强调媒介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很重要,但是仍然值得牢记舒德森(1994)的批评,这些论点在他眼中都是"理想主义的"看法。舒德森指出,我们必须专注于文化在整合社会各集团中的作用,但不是说文化整合就必然是社会凝聚的惟一的、或充分的、甚或是必需条件。舒德森在论证这一点时对比了洛克伍德(1954)对结构功能主义划归文化名下的作用进行的批评(参照:洛克伍德对"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区分,及认为这两者能够各自独立变更的论点)。舒德森还再述了阿伯科比等人(1984)对有些甚嚣尘上的主张的批评,有时这些主张称"媒介"在意识形态再生产当中充当惟一(或首要的)阐释社会秩序的职能。

如舒德森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常常是由不同的整合机制——基于领土,或是基于通过交换和市场这样的经济锁链或通过政治结构而形成的亲缘关系——维系起来的。事实上,文化未必非是许多社会里的核心整合机制,"肩负着将大众整合纳入现代国家重任的"恰恰是"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而

不是文化势力”，而且，如同舒德森也指出的那样，“文化……即便其自身是紧密统一的，也不足以完成社会层次行为的一体化”(1994:164)：它能充当一个十足的分裂元素。

面对近期出现的有可能给予文化整合形态方式以特权，使之凌驾于相应的政治、经济整合形态方式之上的趋势，对待这一切必须只有采取谨慎的态度。于是，舒德森继而评述道：

> 或许最好不讲有好几股势力促成社会协调成一体，而是提出社会整合采用了好几种不同的方式。社会或许是具一致性的**制度**，指人们有效行使着政治控制。社会或许**协调**一致，指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设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和平互动。而且社会或许是紧密团结的**社会群体**，一起忠诚于共同的一系列价值观念。
>
> (出处同上:65)

然而，舒德森在上述每句话中都强调了个或许：就我们这个的议题来看，正是他最后那句——针对“社会”必然构成“社会群体”的假设——告诫才最有意义。

一个案例

不同的评论人士(特别参见：阿谢森，1988；格伦尼，1988；施莱辛格，1989)都提出了近年来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运动(尤其是随着苏维埃霸权放松挟制、继而崩溃后在东欧出现的情况)，还指出了这些要求民族自治的主张的政治矛盾性。显然，这种危险的情况在整个西欧(参照：还有巴斯克和布列塔尼运动)和东欧都一样。然而，因为我们是英国人，所以应

该试图通过集中分析我们更为熟悉的，因而我们必然更直接参与其中的文化进程来探索这个问题。

斯图尔特·胡德(1988)曾指出："文化民族主义假定民族坚如磐石，否认建立在地区特性基础上的次文化的重要性及该民族政治统一体内的阶级" 他根本指的是构建英国文化认同的方式，该方式否认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这些联合王国各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事实上，人们是围绕着占主导地位的英格兰文化认同来阐述不列颠的文化认同的。这在本质上是"满怀嫉妒、令人可怕的民族主义这种危险传统"的表现，它既具侵略性又对外部事物表现出畏惧(实际是种族主义)，它"借攻击异己寻求并发现释放自己恐惧和狂怒的出口"(出处同上:30—31)。

胡德和拉裴尔·塞缪尔(1988)都曾指出，近年来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性文化进程是忙碌于重新塑造英国往昔，剔除掉其中不佳之处：极端保守地幻想着充满田园诗情的英格兰。塞缪尔称这一进程是创造"新生的文化民族主义"，该进程跨及数个领域展开。因此他提请人们注意骤然繁荣的保护/遗产运动；注意对英格兰风景画的重新评价；注意针对作为教学核心课程的英语和历史课，要它们回归"传统标准"的教育改革；注意建筑和设计领域又回到运用"传统材料"，如居室模型已用"英国传统厨具"替代了斯堪的纳维亚松木，科文特皇家剧场(Convent Garden)的新购物广场被重建成(狄更斯风格的)走道，它沿着英格兰的记忆跑道，走过呈现出"传统精神风范"的"店铺"，仿佛时间在梦魇中历历再现。塞缪尔十分尖刻地阐释了这一总体趋势，他说这是在捍卫民族传统的大背景下抗拒欧洲理智史……"一种(上层——DM/KR(译者注：指本书作者 David Morley 和 Kevin Robins，以下译文皆用"两作者"代表。))阶级对20世纪60年

代现代化（意指欧洲国家经济一体化——两作者）的报复”（出处同上，lvi）。

显然，这里遇到威胁的不仅仅在于一个人是否喜欢“传统佩斯利涡旋花呢式样”。另外也遇到威胁的是种族问题，因为以这种方式重建的“英格兰”毫无疑问是围绕着白人的传统而形成概念的——但当今英国人口状况并非如此。保罗·吉尔罗伊（1986）在他研究英国种族主义的著作《英国国旗里没有黑人的份儿》中直白地指出这一点，将这一切描述为“庆祝英格兰与英国化的可怕活动，而黑人被成体系地排除在外”（吉尔罗伊，引自唐纳德，1988：31）。

斯图尔特·霍尔在论述这一点时，贴切地点出“种族特性是今天英国种族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这种种族特性表现在文化差异悬殊的英国观和英国独特的封闭、排外、复归形式的民族认同”（霍尔，1988：29）。他辩称：需要“解除种族特性……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国家的对等关系，独具特色的英国（更确切地说是英格兰）种族特性便是围绕着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国家这些连接点构建的”，需要“建立……包含有差异而不是压制它的新文化政策和新的种族特性概念”（出处同上）。

当然，这种情况决不单在英国出现。事实上，或许正如斯瓦南丹（1988）指出的，我们会很快看到逐渐从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形态的种族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或是泛欧形态的种族主义转变。娅斯明·艾利巴（1989）曾特别提到：“一股强大的畏惧外来事物的情绪正在整个欧洲大陆如雨后春笋般滋生着，它促动着一些关于1992年将实现什么样集体的梦想簇拥到这样的欧洲概念上来，即欧洲是白人的，带种族歧视，且比战后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强大”。民族认同将转变成“白人的欧洲大陆主义”。欧洲统一体将相对于“异域”文化，

并围绕着自认为欧洲优越的认识来界定。她从撒切尔夫人祈求根植于欧洲民族国家殖民史的“共同经历”看出这一点。1989 年,这位当时的英国首相在布鲁日(译者注:比利时西北部城市。)发表了一次臭名昭著的演说,她竟能满怀自信、恬不知耻地宣称“欧洲人探索、开拓殖民地——啊,是呀,没有歉意——并开化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的经历(是)一部充满才干、技能、勇气的非凡传奇”。正如艾利巴总结的,所有这些“提出了一个核心的却又被人忽视的问题:在这种认识中哪儿是非白种欧洲人的位置?”

欧洲那好战、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历史的一个后果便是,现在它容纳了千姿百态的文化群落与同一体。问题是,种族(还有性别)差异是否遭到否认与压制,或者说它们能否被接受——而且是接受其差异形式。

欧洲与美国的关系

让·博德里拉尔(1988a)写道:“再也无法从欧洲自身出发去认识欧洲了。”欧洲认同必须听从它“想像中的美国”,听从“美国化的幽灵”。美国在构成欧洲文化认同中发挥的作用令人费解。一方面,它是“反欧洲”的;人们鼓吹它是没有传统的范式和讲求物质的国家,而非文化之邦。但是它还是欧洲的他我,即把欧洲担心自己将变成、或许欧洲已经成为的样子放大后的形象。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因而也没有真正的文化,它已成为“威胁全世界每个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的未来范式”(赫布迪杰,1988b:52—53)。在此进程中,美国的反文化好似一位大撒旦,人们把它同令人惬意的价值观念和传统对立起来,欧洲人正是借这些价值观念和传统认识自己并将自己不仅标定为“欧洲人”而且是“有文化的”和

"文明的"。本节我们从先前概述的结构主义观出发，探讨欧洲有关美国文化的论争动态。我们尤其要指出，反美国主义中通常隐匿着阶级成分，这就是说它还捍卫主流阶级对人们所论争的"民族"文化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由来已久。密特朗总统曾担心有一天对欧洲人的定义会是用日产电视机收看美国肥皂剧的人，如果说他的"梦魇"成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种现象的话，那么在时任艺术委员会主席的凯恩斯勋爵1945年讲述的有关英国的一席话中我们能发现同样的情伤：

> 假如不同阶层的公民再像过去那样各行其道，那该多令人满意呀。让欢愉的英格兰的每一寸土壤以其自己的方式欢愉吧。去死吧，好莱坞！
>
> （引自唐纳德，1988：32）

即便是最近时期发表的这类言论似乎也常带股古怪的陈腐的腔调——马甘·莫里斯（1987）就评述过说，博德里拉尔的《美国》读起来颇像是新版的德托克维尔的书。

当然，这个问题远比"欧洲与美国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有一点，"美国的电影、畅销书等等远比任何欧洲媒介更早成为欧洲货"（温德博，1986：15）。大西洋西岸明日的信息产业已经是欧美组合了（参照：美国的麦卡恩·艾里克森广告公司在欧洲的重要地位，以及反过来的，萨奇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军美国市场的情形）。这便是"嚷着要保持民族特性，反对杂交商业化下的多少有些半美式的假欧洲的哭喊声"身后的背景（沃尔克，1988a）。

所有这些评述都揭示出：近年来欧洲委员会试图在其媒介政策中复兴欧洲认同观，这种认同观与"西方文明"（或者

是如肯尼思·克拉克在他那部著名的电视系列片《文明》中所命名的那样)遗产紧紧联系在一起。人们在意识形态上鼓动的是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引力。人们召唤的是基于假定欧洲大陆的道德、政治、美学、科学是优等的这个认识之上的共同历史与命运。现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统一的"是试图重振欧罗巴公主(译者注:希腊神话中腓尼基王 Agenor 的女儿,被宙斯化作白牛劫到克里特,后嫁给克里特王 Asterius。)昔日富裕、自由、强大的形象的努力"(基恩,1989:30)。

博德里拉尔的言论传神地体现出这种虚无的态度:

> 一旦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由一个固定历史进程集中起来,那么当他们试图创立有望可行的亚单元或是结合成某种内在一致的大实体时便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目前试图找到一种欧洲精神和文化、一股欧洲推动力的努力碰上重重困难。无力造就联合的事态(欧洲)、本土化的事态(权力分散)、种族的事态(多种族平等共处)。由于我们受自己历史的羁绊太紧,所以只能造就一种作为辩解的中央集权制(保护性杂色多元主义)和一种作为辩解的混合物(软性种族歧视)。
>
> (1988a:83)

我们在阐述对美国媒介与文化方式在欧洲"冲击力"的认识时,当然应该还记得阿曼德·马特拉特的警示,他说:

> 设想建立一个辉煌的统一帝国,它抹掉了一切多样性并将所有文化同质化,这种想法滑稽可笑……必须摒弃帝国主义以清一色的方式入侵社会

> 不同环节的想法。必须替换掉要求分析阐明利于（或阻碍——两作者）这种渗透的特定环境的呼声。
>
> （1979:61）

这不仅仅是个学术观点：承认“民族差异”一直具有针对性同样就表明了承认许多美国公司需要针对欧洲不同国家市场研发产品（和广告）的“各国特有品”，而不是靠着“欧洲牌”。同样，柯林斯(1988)曾指出，许多热衷“欧洲”卫星电视的企业家从原先泛欧宏图退下来，迈向修正后的蓝图，这个前景容纳了欧洲各个独立的语言/文化市场的局限和划分。

这似乎是要重现霍华德·约翰逊酒店/餐馆连锁店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经历。1972年该连锁店董事长宣布退出其全线出击欧洲市场的企划，声称

> 我们在欧洲做这一努力时过于美国化了……我公司现在正起草计划搞新的更为欧式的连锁汽车旅馆……寻找欧美之间文化差异较为不明显、造成麻烦较少的市场领域，如商务旅行和饭店业。
>
> （引自比格斯比，1975）

因此，至少在某些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和商人们能够意见吻合。然而，这里探讨的问题事实上仍旧更加复杂。柯林斯曾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产品在一系列市场里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参见：霍斯金斯和米洛斯，1988），文化差异在这些市场中的作用是“折扣”或是限制特定产品“出口能力”的范围，霍华德·约翰逊公司董事长的言论与柯林斯的分析的相似之处令人关注。但是“文化折扣”并不是个简单的地理接近性问题。柯林斯继续引述了《世界电影新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

份调查报告，其中报道说苏格兰工人阶级聚集区的电影院老板们

> 总体上对更加充满活力的美国电影感到满意……（但是）差不多一致认为大多数英国电影不适合这里的观众。一位苏格兰电影院老板写道，按特定的地方观念来看，英国电影更应该被称作英格兰电影；对他的观众来说，它们比远在6 000多英里之外的好莱坞片子更“陌生”。
>
> （引自柯林斯，1988：7）

带毛刺的《达拉斯》：粗俗的品味政治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当捍卫文化认同与捍卫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混淆起来时，这项斗争便冒着扮演不折不扣的保守角色的危险，这跟给所“捍卫”的真正/民族文化下定义所面临的困难大相径庭，真正/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起初是外来的元素。

《达拉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充当了这种“文化阉割”中最招眼的“仇恨象征”，英国广播公司前总裁阿拉斯太尔·米尔恩担心英国电视解控将导致“无处不在的《达拉斯》构成威胁”，这其中永恒的情绪正是如此。正如伊恩·昂所述，《达拉斯》享誉国际的事实被频频用作强有力的“证据，显示美国式商业文化给所有真正的民族文化和认同造成的威胁”（昂，1985：2）。我们希望提请大家注意，对这些论辩需要放在长期以来欧洲文化当中酝酿反美主义的背景下来看待，而且特别是，思考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着将商业电视引入

英国的论辩时出现的反美之辞对于认清目前关于美国商业电视节目对欧洲冲击力的论辩颇有教益，目前欧洲的许多成员国里占主导地位的仍旧是非常传统的公共服务性节目制作方式。

截止5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完全垄断英国电视业。起初授之垄断权是因为当时英国文化精英看到自己地位受到似乎滔滔不绝的美国流行文化洪流，如好莱坞、流行音乐、“廉价美国小说”等的侵蚀。英国广播公司的职责便是（在里思勋爵的管理之下）直面这股对大英帝国文化传统的威胁力量（参见：马尔甘和沃波尔，1985）维系民族标准。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独立电视公司（ITV）一开始发送节目，提供依托工人阶级和区域文化元素的新形态文化（情节剧、不拘礼节的节目主持人、不标准的腔调等等），大批大批的工人阶级观众便抛弃了英国广播公司。马尔甘和沃波尔这样写道：“英国广播公司……拒绝搞南方上层阶层文化传统之外的任何东西，这样便留下大片的文化真空，早期独立电视公司的企业家们当然就兴高采烈地去填补它”（出处同上）。

这项进展对文化产生的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大量论辩的焦点（康内尔，1983和加纳姆，1983的文章中有所总结）。康纳尔指出，造成那种情形的关键因素是，独立电视这家商业频道“引领了联系并表达通俗情感与品味体系之先河。按照商业电视台的根本运作原理，它必然要努力迎合观众的品味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康内尔，1983）。英国广播公司很快便懂得，如果要生存下去，它必须仿效独立电视这项成功之举，即只能照葫芦画瓢，制作更多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品味和文化偏好模式的节目才行（用新型的节目，利用传统歌舞表演的元素，突出节目主持人和表演者来自各地、形形色色的“非上流社会的”口音）。

左翼势力及其反美同盟的传统作法是借指出美国电影电视制作商由于拥有规模宏大的国内市场，所以占据了相当大的经济优势，以此解释美国节目能主宰国际电视市场的原因。这些优势当然值得重视，但是如果他们的节目还含有某种内在物质是其吸引其他国家工人阶级观众的根本原因，那又该做何解释呢？沃波尔（1983）为了调查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学品味曾采访了一些人，他们回顾了自己发现20世纪30年代美国侦探小说时的愉悦之情，一位前码头工人解释了为什么这种美国文学比英国传统文学作家对他更具吸引力。

> 我读过英国作家的作品，有H·G·韦尔斯、阿诺德·贝内特……但是他们不属于我这种人。你总是从中发现阶级优越感……美国作家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他们用我们说话的方式叙述。
>
> （出处同上：30）

在这部分的最后，我们要回到这点上来：现在让我们仅仅注意俗语对于美国式流行文化焕发魅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说英国或者欧洲的"高贵文化"正面临着被无情的"美国民间轶闻传说"的洪流吞没的危险，这种观点很难称得上是什么新思路。迪克·赫布迪杰（1988b）说这种担忧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像保守派人士伊夫林·沃与社会主义者乔治·奥韦尔这样分歧颇大的作家却因对现代建筑、假期营宿、广告、快餐、塑料制品及（后来出现的）口香糖都迷了心窍般的厌恶而携起手来。沃和奥韦尔都认为，上述事物代表着"闲适的"、堕落、"懒散生活"的方式，它们有扼杀英国文化特性的危险。到了20世纪50年代，就此的论争便壁垒分明了：一方是"真正的文化"、品质和品味，另一方是可抛弃的

软商品、精简高效的汽车、摇滚乐、犯罪和乱交这些哄人的赝品。赫布迪杰写道，人们（至少是那些搞教育或是职业文化批评的人士）一瞅见任何美国的商品就往往把它说成是“终结的端倪”。赫布迪杰描述了犯罪、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城市危机、精神偏移这样的意像是怎样“一起聚集到美国流行商品的四周，在英国人的共识中彻底积淀下的一系列固定的联想”（出处同上：57）。尤其是美国（快）餐成了标准下滑的标准比喻。电视的“美国化”这个概念现在恰恰代表了整个一系列与商业化、平庸、摧毁传统价值观念有关的联想。

由赫布迪杰开始的争论回到了理查德·霍加特在《有文化的好处》一书（1958）中的研究上来。霍加特的书详细评述了传统工人阶级社区的生活，同时批评美国文化对工人阶级生活产生的趋向单一化的影响，他认为工人阶级生活正遭到引进的美国文化那“空洞的辉煌”、“异彩的愚昧”、“精神衰败”的摧毁，导致美学分崩离析，在此过程中传统价值观念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由充斥着刺激的廉价小说的“浮夸世界”。

这类哀悼美国化危害的悲泣声过去，而且继续是从政坛左右两派同时传来。然而，赫布迪杰的中心论点是，美国产品是简约高效、塑料制成、富有魅力的，但恰恰是这些“粗俗的”的美国货吸引了庞大的英国工人阶级群体（参照：本书前面关于独立电视台在工人阶级观众当中大受欢迎的评述）。赫布迪杰指出，从持“传统英国价值观”的人士那种家长式的角度来看，这些从美国进口的产品是“向我们逼近的铬矿”，然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它们营造了一个能够商讨表达（与英国文化主流传统）对立价值的空间。

在继续论述之前，我们还想再打个转折。奥韦尔和霍加特用来表明美国流行文化破坏力的意像中一再出现这样的主

题：英国产业工人阶级失去了真正的力量与阳刚之气或是说“女性化”了，他们认为这是因为遭受了过多美国民间轶闻传说的袭击，而美国轶闻传说的特征表现为钝性、悠闲和个人小天地、热水浴、日光浴、舒适的生活；这在霍加特描绘的美国文化令英国工人阶级“行动的活力懈怠”的情形中表现得最为生动。当有关美国节目制作的讨论与有关以肥皂剧的风格制作节目的讨论搀和起来，而人们把肥皂剧本身主要看作是种女性化事物时，（从霍加特或奥韦尔的立场来看）我们显然是在论述最最低级的东西，或者，按夏洛特·布伦斯登（1986）的描述，是人们眼中的“垃圾中的垃圾”（参照：哈伊森，1988）。

比格斯比曾写道，在人们常常把有关“现代的”体验同“想像中的美国”等同起来的世界里（参照：韦伯斯特，1989）：

> 反对流行文化、抱怨美国化常常已经不过就是哀叹变幻中的世界……在这里“美国化”经常意味着不过是发生了变化，而变化，尤其是变成新形态文化便激活了已有的对抗方式。新事物被标定的特征是粗鲁、粗俗、不细腻、无知、（马修·阿诺德坚持认为）破坏品味和传统。于是“美国”被鼓吹成没有传统的范式，对立于**“文化之邦”**的**物质**之土。
>
> （比格斯比，1975：6，黑体重点为本书所加）

科拉·卡普兰在论述英国围绕美国流行文化论争的文稿当中建设性地指明一种方法，能敏锐地分析出同样的产品在不同国情中具有的不同含义，从而让我们远离迄今为止这方面争论中很多辩词常用的毫无意义的“本质主义”之辞。她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本土”

> 从某种意识形态角度看，恐怖片/西部片等等某种意义上"本质"属于右翼……（然而）在英国，美国流行文化的样式和叙述像是一根楔子，硬是挤进旷野，与……认可英国文化的"伟大传统"沾沾自喜地园囿于阶级形成鲜明对比。
>
> （引自韦伯斯特，1988：179）

正如赫布迪杰指出的，英国的这场论争和流行文化在其关键的时期，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点放在"现代"美国产品的设计或是风格问题，而且尤其是其"以简化求高效的特性"，人们用已有的欧洲设计标准作参照，认为这种简化之风是粗俗的（品味拙劣）。这些"简约高效的"产品（以美国汽车为首）被诋毁成颓废、装点门面、过为已甚，可（令人遗憾地是）它们在工人阶级消费者当中大受欢迎。按严格意义上的"俗语"来衡量，这些东西被看作是"粗俗的"：是普通人的，也适合他们。这些美国产品被英国文化精英嘲讽为"绘图板上唬人的东西……短期、低租、外表镀铬的理想国的产品"。而最糟糕的当属风行一时的卡迪拉克轿车，它的尾翼被比喻成"产品设计领域的越南"（赫布迪杰，1988b：65—66）。

当然，批评家们面临的问题是，美国产品虽然会遭人诋毁、让人遗憾，但是它们红火的事实却不能随愿而逝。这些产品同传统的基于阶级观念的"上流品味"绝裂，真真切切地符合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实际品味和需求。对这些消费者而言，这些产品是他们物质生活质量大踏步提高的明证。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个非常积极的象征（参照：弗里斯，1983），其主要作用是对抗他们眼中的由文化精英界定的英国传统文化那种死硬作风。

我们在前面曾指出，认同常常既事关差异也事关相似性，

重要的是认识谁正在与谁区分开来。对欧洲人来说，长久以来“美国”给了我们借以界定自我的负极，它是“我们”所不是的形象，或可说是“我们”不愿想像自己具有的形象，或可说是担心“我们”将要变成的样子。但是这场论争的条件现在已经带有了某种相对其物质基础独立存在的历史固定性（参照：奥尔萨瑟，1972）。正如昂和莫利所述，因为现在：

> 当欧洲各国仍在为各自试图保护其文化主权不受“美国入侵”而争争吵吵之时，关系却正在又一次发生转移，因为我们眼见着西班牙语将跃居全美洲第一大语种，美国则面临着沦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下场。随着世界经济中心从大西洋移到太平洋沿岸，经济均势正在形成重大调整，人们也已开始在文化领域感受到其冲击力。索尼公司购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便预示了有可能结果出现国际文化势力根本重组，预示着欧洲大西洋沿岸旧有文化堡垒或许结果恰恰朝着绝对错误的方向。事实上，欧洲各国现在或许面临的是以别样的方式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这种前景将“美国化”的威胁抛入一个全新的视角。
>
> （1989：140）

如果（简约高效、塑料制成、富有魅力的）“粗俗的”美国产品一直很吸引欧洲受众，那么问题或许真正不是出在粗鲁、讲求物质的美国文化身上，而是出在伪善的、“古老的”欧洲身上吧？或许美国现在已经在欧洲了，已经是欧洲文化整体的一部分，是欧洲同一性的成分了。德拉姆（1993）彻底改变了该议题，他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探问“美国”在哪里：他的

观点是，“美国不在这里，不在这片特定的（指北美——两作者）国土上。它在欧洲。它是欧洲的幽魂……”（出处同上：249）。与此同时，他敦促欧洲人把其“永久居住的殖民地”（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视为“你们最出色的成就，你们的文化……你们的标准、你们恰当措施的最合理的延伸，而不是当成你们否认的畸变体”（出处同上：144）。里科厄（1992）指出，卡尔·贾斯珀斯将“欧洲”理解为从旧金山至海参崴的领域才是最合适的。相反，昂（1992）明确指出，目前“欧洲的问题……是学会如何让自我处于边缘，看清其现在的历史特性及局限性”（出处同上：28）。

欧洲：一个地理问题吗？

在讨论欧洲地理的问题（参照：麦金德，1904）时，最好要记住人们尚未完全搞清楚那个叫“欧洲”的存在体：界定这个词汇的行为本身便涉及到历史和政治。一旦我们背离了自然地理的疆域，这些问题自然变得更加复杂。班克斯和柯林斯指出：

> 欧洲的经济、政治、文化范围并不一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单一市场与欧洲文化单位并不相符：欧洲四个讲德语的国家中有三个游离于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尽管最大的德语国家加入其中）。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两个讲英语的国家还身为本语言（及文化）世界团体的属员——这种体验在欧洲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它们的“文化”觉得巴黎比波士顿更陌生，汉堡比墨尔本更遥远。
>
> （1989：10）

在上述定义中基本的文化议题已再度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正如柯林斯所问："要是土耳其这个伊斯兰（尽管是个现代化的世俗化的）国家加入到欧共体，那欧洲文化将变成何种模样？"（1988：17）

我们前面曾指出，有关欧洲文化的论争主要是因担心大量收看来自其他（主要是美国）文化世界的电视节目会在一段时间后侵蚀了欧洲各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而引发的。时下欧洲创新的行动是针对这种担心而展开的，因而可以视其为一种干预的企图，目的是（重新）创造独具特色的欧洲文化——柯林斯称这项事业最终是"倒退到中世纪寻求一致的欧洲认同观的荒谬景象"（出处同上：22），或许倒退到（显然是电子时代之前的）时期，如唐纳德指出的，那时，"欧洲各种书面语言提供了定义与留传民族语言的媒介，抵御跨国界流通的晦涩的拉丁语和次民族的地区方言"（唐纳德，1988：33）。这种处境危险的文化政治具有非常矛盾的特性。

或许目前最明显、最引人瞩目的情况是全球性传播帝国正在加速建成，诸如默多克、贝鲁斯考尼、贝塔斯曼、索尼、迪斯尼、派拉蒙，等等。当然，国际化不是什么新现象；它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组成部分。不过它现在正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而随着经济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越来越多地跨越国界，维持国家主权与同一性变得越来越难。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指出的，现在越发显而易见的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就真正社会宗旨的范畴来说，欧洲传统形态的单一民族国家立刻显得既太大又太小"（1983：197）。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还需要集中注意地方与全球之间新的对立关系。在这个似乎越来越由全球性文化节目主宰的世界里，人们总是不断地建起并重建新的社会群体和认同。在很多时候只是个伪造的假群体观：

> 资本主义越是变得世界性，就越像是披上了朴实的外衣：其活动越具游牧性，就越突出了其与地方的从属关系……从地理上说，人口流动性或许正越来越强；在想像中，它坚守着地域精神。田园式的民族神话——认为"真正的英格兰"在乡村的观点——从未像现在这样广为流传……爱国主义的话语或许不时髦了，但对根的欲求——甚至是假装的欲求——却难以得到满足。
>
> （塞缪尔，1988：30）

但是地方主义也能成为更为积极的力量，尝试煞费心机地对全球性资本入侵的影响作出当地富有创造性的回应。如果地方在日渐成形的全球网络中越集结，那么地方意识和地方行为就会形成新的"可能性，它让地方社会群体的人们更加有效地，而且是自觉地参与世界事务"（阿尔杰，1988：322）。

空间和地域的政策便至关重要了。关键问题是，能否为了认同更有意义而超越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认同，或者说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认同是否仅仅以退化的和疏远的方式转变。一些评论人士预计，未来将在电子"全球村"内出现日益高涨的隐遁主义、地方主义和"文化宗族主义"。曼纽尔·卡斯特尔斯认为前景暗淡。他预计的进程是"势力空间"转变成我们越来越难于控制的图像流，而"意义空间"缩小成了新部落群体的"微领土"（"microterritories"）（卡斯特尔斯，1983：16）。

与此相似，马特拉特和皮埃姆在分析技术与权力分散时指出，小的并不必定是美好的：

> 在资本的领域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资产阶级放眼全球，却鼓励小资产阶级着眼当地……地方似乎标志着回归具体。与此同时，由于地方重新发掘的具体使我们……更加不可能理解广阔现实，而具体正是从广阔现实中获得自身的意义……所以地方只有在允许……更好地掌握……抽象/普遍和具体/经验的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才真正有意义。
>
> (1983:415)

欧洲各国作为对外播送节目的国家当然不仅互不相同而且从各方面讲都互相意见不一。(鉴于英语是该地区通用语的地位)我们或许应强调欧洲共同体里讲英语国家的优势地位。因此，英国是向欧洲其余国家地区出口电视节目的主要国家，而且单凭它与美国共享一种语言来说，它与美国节目的关系跟欧洲其余地区与之的关系就大不一样。费利普·施莱辛格(1986)既指明"四强"(英、法、德、意)是如何主宰了欧洲广播电视联盟(EBU)内的一切电视交流，还指明该联盟自己是如何给东欧国际广播电视组织(OIRT)出口了达进口额三倍之多的节目。当然，也还有些历史性议题出现了问题。正如沃尔克(1992)在讲述1992年的重要意义时指出的，欧洲内部有那么些人或许就恰恰视1992年为"阿登高地的最后一场战役的第三次战斗，当时盎格鲁－萨克森人被最终击败……英国在第四(指德国马克)帝国取得了(卑微的)地位"。当然有些人预计应该围绕着法德组合建立"富有活力的欧洲"(法国财政部长皮埃尔·贝雷戈沃，引文出处同上)。跟定义民族文化认同一样，欧洲文化和认同也是围绕着各方的相对势力来塑造的。

当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想当然地看待冷战时期产生的

一系列特定的假设，即我们说“欧洲”时，我们实际意思是指铁幕以西的欧洲。我们在辩论中必须考虑近期有关中欧（译者注：原文为德语，Mitteleuropa。）的讲法和苏联要求定义我们“共同的欧洲家园”的呼吁。还有那么些人想宣称，从历史上看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当居欧洲文化的真正中心（参照：昆德拉，1984）。我们还必须既考虑到东欧各势力之间关系不断变化的本质，还要考虑到“两个欧洲”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西班牙社会党《2000 年计划》的协调人曼纽尔·埃斯库德罗就曾预言：“东欧人民（将）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发挥同南欧人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样的作用”（引自沃尔克，1988a）。尼尔·阿谢森（1988）提出的设想更加耸人听闻：“2018 年的欧洲将由一个西方超级大国和周边贫困的‘班图斯坦’（译者注：Bantustan，班图斯坦，也称“黑人家园”，指南非当局控制的“班图自治区”或“黑人定居区”）式家园构成，这个超级大国的地板由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来擦”。

出击能力级别

让我们现在于这个更大的范围里思考文化跨国化当中的核心议题。在这个进程当中，国家社会群体内人们的“纵向”组织正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背景下由社会群体的“横向”组织所取代——人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电子而不是凭借地理上接近。克劳斯－迪特尔·拉思在分析跨越疆界播送对创建电子社群所产生的日趋显著的重要性时指出：“国家、地区或是文化群落的边界已不再有意义了：更重要的是传播领土的疆界……该疆界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领土越来越搭不上什么关系”（1985：202）。

我们要是希望避免技术决定论之嫌，当然就不应该假定

任何这些技术进步效果会一致。我们认为，关键问题是关于一系列社会文化（比如，负责生育和教育的）部门如何转变对传播新技术的接受及这些技术对文化产生的冲击。鉴于商业广播电视业者及其市场调研机构必然对受众研究、渗透率等等问题很敏感，所以他们有能力根据经验更清楚地解释这些问题。

比如说，已有证据表明，在北欧，卫星频道最热心的观众是年青人。因而，帕姆·米尔斯在总结收集到的欧洲内国际受众发展方面的经验材料时明确指出："进口节目对年青人的吸引力更强了。上了年纪的观众出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更有可能避开进口节目。然而，年轻观众却对外语节目越来越亲近"（1985:493）。约翰·克莱门斯的报告与此相似，他称AGB国际电视台的工作表明"（天空和超级频道的）娱乐含量很高的节目正吸引着荷兰的年轻观众，或许也恰恰预示着未来的模式"，还表明在比利时，"孩子们中间的……（消费模式）再度偏离了国有广播电视业者"（1987:306）。理查德·柯林斯再次指出了尤其出现在音乐文化领域的趋势，即"民族文化群体沿着年龄这条断层线断裂开来"（1989:11）。

当然，这不仅是个年龄的事情。我们在上文引述过米尔斯的一项调查，她在当中概述了英国的整个情形："可想而知，外语节目在受过良好教育、属社会较高层次和居住在首府附近的人群当中接受程度最高"（1985:4）。我们需要问一些更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关心什么抽象的文化"欧洲化"或是"跨国化"。这种预期对哪些特定集团，在哪些类型的地方能成为现实？而这能让我们对未来有何了解？马丁·沃尔克（1988a）担心会出现标准的"欧洲商业"阶级，这类人手上紧握着他们不可或缺的备忘记事本，身穿标准的"从格拉斯到那不勒斯都一样的欧洲制服"，十分惹人注目。"欧洲"大概

正是对这些人而言才将变成有形的现实。他们还是柯林斯在评述欧洲报业市场目前发展时所指的那些人——处于整个欧洲社会阶层分界线上层的人们——鉴于其英语能力，他们特别有可能"从同语者中分离出来、融入到全新的世界性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加强与其他地方相似阶层的'水平'联系将替代长久形成的与(本)民族语言群体的'纵向'联系"(1988c:11)。

当然，这让我们回到有关欧洲文化走向跨国化的条件问题上来，即便这只是对欧洲诸社会里的特定集团而言。而确切地讲，条件当然是指英语——或者说是讲英语的人。我们在分析任何形式的统治对文化的冲击时必须有所区别，要考虑在什么地方建立什么集团是其(不)易于接受的。同样，我们现在想指出，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同一种文化的不同产品，探讨中的(这里指英语的)文化产品的相对受欢迎程度或出口能力。现在正是操英语的，主要是美国的视听媒介横扫全世界的受众，吸引、唤起大众的热情，并常常将他们聚拢到跨国性的文化统一体里。它们正"重新划分国家这种社群的阶层，将精英与大众或流行的品味区分开来，从而危及民族文化精英们享有的文化霸权"(柯林斯，1988:10)。

然而，并不是所有操英语的文化产品都一样容易出口。我们必须提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就是在何种情形下，什么类型的英语产品能出口给谁。科林·霍斯金斯和罗尔夫·米洛斯提出了"文化折扣"的概念，来解释这样一种根本历程，即"某节目，它根植于一种文化，因而在那种环境里具有吸引力，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吸引力减弱了，因为观众发现很难认同所论及的事物的风格、价值观念、信仰、制度和行为方式"(1988:50)。然而关键在于，可以认为文化折扣也不同形式地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出口信息。柯林斯在试图进一步区别分析时指

出："视听产品可能比书面作品的文化折扣要低，而在视听产品当中，几乎不含语言成分的作品的文化折扣比语言占重要成分的作品要少"（1989：8）

因此继续得出这样的论点，语言成分多的节目在"异邦"观众中不受欢迎，因为它常遭很多误解。相反，音乐电视这种频道在国际上受欢迎恰恰是建立在语言几乎不成问题的事实上，按照音乐电视欧洲首席执行官的话说，在"我们大多数的音乐节目里，歌词实际上无关紧要"（引自：柯林斯，1988：30）。这个观点得到米尔斯的支持，他认为"不依赖于语言理解的节目——比如，歌剧或芭蕾频道或是流行音乐频道——会吸引大量四处分散的、有时候是潜在的观众，但是知识性节目……会遇到语言障碍"（1985：501）。

与试图创建欧洲广告市场的努力不同，试图用英语节目吸引欧洲观众的努力看起来的确主要是由于不同观众群的语言和文化分歧的较量而失败的。超级频道（Super Channel）等试图推出泛欧节目的计划所经历的困难便可为证。我们现在似乎正目睹着广告商与主要卫星频道联手搞一种修正主义，即修改策略，以适应整个欧洲大陆各种不同的语言（参照：马尔甘，1989）。

总体来说，尽管不同的评论人士提出的未来设想相互矛盾，但是每个人似乎都在困难的问题上意见一致。柯林斯（1989）的意见是，娱乐节目的文化折扣比知识性节目的要高，而与此相反，克莱门斯（1987）认为，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私有专营娱乐节目、有多语种版本的泛欧频道集团与专营新闻时事节目的国有频道并存。

尽管未来最有可能的发展道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有些事情是清楚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美式商业节目在欧洲的成功从非常特定的含义上说与环境分不开。美国进口的节

目只有在国内电视台不出品类似的娱乐节目时才会成功。一旦观众另外有了本国语的类似娱乐节目供选择，那美国节目就要退居其次了。

因此，可以把关于未来发展的问题重新阐述为关于在特定背景下某些类型的美国（或泛欧）节目对（由国家节目政策而定的）特殊受众群潜在的文化冲击力的问题。我们即便是在这样更具体的范畴下归结节目（对观众）的影响时也需要相当谨慎。这不仅因为节目对其观众不具有简单或者直接的效应，这里的效应是指能通过分析其内容（或过去播映状况）轻易预测出来的。还因为，恰恰是为了能够出口，像《达拉斯》这样的节目不得不搞得十分抽象，而这种争取吸引大众的方式的代价是产生很多意义或是很多重音。昂（1985）及利布斯和卡茨（1989）的研究使我们记起这些类型的节目又是如何任由出品国之外的观众重新诠释。而这最终带给我们的是有关观众的问题。

收看本土节目成了民族习惯：家庭、电视、民族

我们已经花了一些功夫根据人们通常所提的问题，探讨了有关文化认同、新技术和文化跨国化的争论——即，从生产经济学、不断变化的传输技术及其对媒介受众潜在的文化影响来说的。现在我们想调转论证的方式，根据这些新技术在日常家庭文化里发挥的作用，从它们本土用户和受众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新模式供应的节目在本土消费过程中是怎样经过滤传播的呢？我们觉得，关键问题涉及这些技术对于（同时在国家和家庭层面上）瓦解已有界线并以新方式进一步阐明私有与公众领域的作用。我们的论点是，要想分析创

建图像新空间和新文化认同的进程，就得建立在分析日常惯例和家庭习惯的基础上，当今电子社群正是通过日常惯例和家庭习惯在日常的基础上建起并（在宏观和微观上）再构造的。

我们在评述这些议题时将主要凭借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广播电视媒介在构建国家社群中的作用的一系列著作。我们前面论述过，相对于目前许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演进，国家这个概念已经不够用了。鉴于此，我们意识到现在面临威胁的不仅仅是（或甚至首要是）国家社群。而我们对这些论辩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们可能提出一种模式，来理解传播技术在构建整个一系列（包括地方、地区、国家、国际各层次的）"电子社群"中的作用。然而在其中每种情况下我们都要指出，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大众世界与私人世界的联接，尤其是本土集团——广播电视的基本受众——与其作为组成部分的更大群体的关系。

伊莱·扎罗茨基指明，从历史上看，"早期资产阶级就懂得家庭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一座小教堂、一个小国家'，是社会权力机构阶梯上的最底层。他们眼中的社会不是由个人而是由家庭构成"（1976：42）。与此相似，方丹注意到，在当代工业社会里"家庭还是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单位；同样它是大众领地的一部分。一个合法的住址是公民应有的标志"。于是，虽然家庭享有隐私权，这意味着有权利排斥（除非警方有搜查令）和有权利行为自主，但是"隐私权同深墙效应一样，也是个社会定义"（方丹，1988：280）。此外，雅克·唐泽洛特（1979）指出，家庭不具有独特的或是确切的地位。在特定（如法律）意义上说，它是私有的；在其他意义上它是公众的。比如，各种国家福利机构插手管理家庭内抚养孩子（或是收看电视）的事，这种行为因为属于国家对"合

理"培养国家未来劳动者的合法关心,所以是合法的。在唐泽洛特看来,家庭不仅仅是个私有机构,还是汇聚了医疗、司法、教育、精神病治疗整个全方位活动的交点——它决不是个某种程度上处于社会之外(或者实际上,设置了社会的界限)的完全私有的王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既没有与国家完全隔离也不与国家对立;相反,"私有"本身是个(法律条文中,司法上)构筑的空间,国家和其他机构也介入其中。当然,这些机构当中包括传播和信息组织。

帕迪·斯坎内尔(1988)对广播电视在不经意中一天天、一年年保持所有人的生活和习惯的方式作过有益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关注媒介恰恰在构筑时间和将私人领域社会化当中的作用。斯坎内尔集中关注了作为国家核心文化机构的国家广播电视媒介对调动大众参与国家生活日程的作用。他分析了广播电视媒介是怎样构成亿万人共享的文化资源,分析了比如说长期连播的热门连续剧是怎样给所有人赋予了共同的历史。

于是,斯坎内尔指出,现代民众民主政治将论坛设在全新的、由广播电视构成的公共领域。卡迪夫和斯坎内尔(1987)在分析英国广播电视业的历史发展时,集中关注其在联系分散、各不相干的听众与象征意义上的核心国家生活当中发挥得至关重要的作用,关注其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上在受众当中增强共同认同意识的作用。比如,我们可以认为英国广播公司过去一直主要关注的是"给予那些各自孤立的听众一种他们已经丧失的社会群体意识,这种群体从地方层次转变成国家层次甚至全球层次"(出处同上:162)。从中我们确实看到对联接起私有和公共领域的关注:将家庭和国家联系起来。正如卡迪夫和斯坎内尔指明的,受众常常被视为由家庭单位组成——由"一大群的家庭,而不是由不同社会阶级或是不

同品味的人群所组成”(出处同上:161)。里思勋爵本人最关心的便是广播电视有可能“使举国万众成为一个人”。这在广播电视业运营最原始时期就表现出来了,卡迪夫和斯坎内尔叙述了1935年的一档帝国日(译者注:Empire Day,5月24日,英国节日;现改称联邦日(Commonwealth Day)。)广播节目,当中,人们听到一位母亲向女儿讲解到:“玛丽,不列颠帝国是由一个大家庭组成的”。玛丽问到:“您意思说是像我们家这样的家庭吗,妈咪?”,然后母亲回答到:“是的,亲爱的。只不过是大得多得多”。从一开始,统一的普遍象征就是家庭,“意味着不列颠母亲和她帝国的儿女,同样还意味着王室和由听众组成的每个小家庭”(出处同上:162)。

这个观点绝非古怪也不是历史遗迹。与此极为相近的是,布伦斯登和莫利(1978)指出,较近期时事和“杂志类”节目的核心形象恰恰是家庭——而国家是由家庭组成。在这类广播电视节目里,核心家庭是诸多节目话语中未言明的前提:不仅这种节目是面向“家庭受众”的,而且这种对家庭的重视也决定了节目的内容(是“具有人情味的故事”)和表现风格(是强调涉及日常民生的大众议题:“新法对普通消费者有何影响?”)。人们假定将受众、将“由家庭组成的国家”统一起来的是他们所体验的家庭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电视不仅仅使人们获得先前只有亲身到场的人才能获得的体验(总决赛,班级舞会)。除此之外,在增进象征意义上的国家的统一,将个人及其家庭与国家核心生活联系起来,赋予受众一个自我和国家的形象这些方面广播电视技术的“神奇地毯”已经发挥了根本作用,这里的国家是个可认知的社会群体,是超越了日常狭隘存在的更广阔、公共的世界,是这些技术给予了通向它的象征性路径。

与此类似的是西蒙·弗里思在分析广播中轻松娱乐节目

的发展时所评述到的，广播将公众事件带到家庭里，它所做的远不仅仅是使人们可以接触到这些事件。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条接触社会群体的路径……那时（而且现在）令人愉快的是那种打开开关你能变得也值得注意的感觉”（1983：120—121）。因而，虽则家庭收听收视或许是“种非常特殊的大众参与形式”，但它赋予了参与（热爱家庭生活的）国家社会群体的意识；观众“能感到自己是一个想像中整体的一部分”（拉思，1988：37）。

马丁－巴伯罗从拉美的角度着眼，认定传播媒介的关键作用是“将大众转变成一国人民，将一国人民转变成一个民族”。他指明，在许多拉美国家，最重要的是“国家广播电视系统的发展给不同地区和省份的人们提供了第一手的国家每日情况”（1988：455）。正如他所指出的，如果不考虑传播技术的作用就不能正确认识民族认同的构建和出现。这些技术允许人们有一个“认同的空间”；不仅仅是重新唤起共同记忆，更确切地说是“体验冲突和休戚相关性”。于是，不应将国家仅仅看作是个抽象的概念，而应看作广播电视技术实现的亲历体验，广播电视技术的成就在于“将国家这个政治观念演化成亲历的体验、情感和日常的事物”（出处同上：456，461）。

或许我们可以开始确定在联系起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在联接起对作为基本家庭媒介的电视的分析和对诸如构建国家民众和文化认同这种更大规模文化进程的分析时所必需的条件。

我们该如何设想家庭事物与国家事物间的联接？数年前，约翰·埃利斯颇为精辟地将电视称作“民族国家的私生活”（1982：5）。可以说，他的评述与布伦斯登和莫利（1978）的一个论点属异曲同工，后者认为英国电视常常精心构造一

个“我们”的国家的形象,这个“我们”的组成部分是“普通家庭”。这经常成了广播电视者宣称自己代表受众——及他们暗含吸引力,可令受众以各种形式认同节目制作人——的根基。同样,约翰·哈特利曾指出:“一个国家是为其成员搭建在数片主要桩基地之上的,电视便是这样的一片桩基地”(1978:124),他跟其他许多人一样是运用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国家是“想像出的社会群体”,是特定话语形成的抽象概念的思想。正如安德森所言:“一个美国人见到过的同胞,甚至于仅知道他们名字的人数决不会很多。他不知道他们任何时刻要干什么。但他完全确信了解他们固定的、无个人特色的、大家同步进行的活动”(1983:31)。这种同步性在哪里?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来源是通过广播电视节目安排调控的同步经历。何以有这样的自信?在诸多来源中,安德森尤其指出报纸是给予国家群体成员间想像中的联系的机制。正如哈特利这样写道:报纸“都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是最大的虚构,因为它们构筑了想像中的社会群体,构筑了千百万的人每天进行的群众性习俗或活动的基础”(1978:124)。

赫尔曼·鲍辛格进一步提出,报纸是联接家庭习惯、组织日常生活安排及构建国家这个“想像中的社会群体”的机制。他评述了因早报不能出版而引起混乱的本质原因。他关注的是失去的东西。他是这样写的:

> 这是……关于错过报纸内容的问题吗?或者说,这不正是人们想念报纸本身吗?因为报纸是其中的一部分了(很多人早餐习惯的组成部分),读报证明了早餐时间世界仍旧秩序井然。
>
> (鲍辛格,1984:344)

因而当然，反之亦然。

鉴于收看电视节目必然是同步的，所以可以提出一个相似的，而且实际上是更有力的论点，这是有关许多观众收看晚间新闻报道的——即收看，并与成百万的其他人参与到共同的习俗活动，可以说这个事实至少和从广播电视节目中获得的信息内容同等重要。就我们的意图而言，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鲍辛格在分析中提出的模式对于我们集中分析传媒在联接我们的私人世界与大众世界中的作用所具有的潜在益处。

下一步不可避免地便涉及上述论点在目前及未来广播电视格局演变中的重要意义。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出现令节目频道数量剧增，从而有可能将我们的社会带入一个比传统全国性电视台时更加分散零落的世界。这些新型通信方式或许事实上在分解民族文化群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视频等传播新技术潜在具有相互影响和“重新制定时间表”的能耐，这或许把我们认为任何社会体验“必然同步”的假定搅得一团糟。

有大量证据说明，电视是一大批人或多或少依赖的一支重要的文化源泉，以满足其在信息和娱乐方面的需求。进一步还有证据表明，电视对于组织、安排我们（不管是按日程表还是日常性）参与政治和休闲活动这样的公众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卫星电视正令节目供应的范围和性质产生剧变（直接方式是通过其自有的节目，而间接方式是通过现有广播电视机构为了跟这些新对手竞争而做出的对应措施）。在上述前提条件下，显然需要在当前这个广播电视史上的关键时期密切监控节目供应的这些变化对文化的冲击，人们估计在此期间欧洲和北美已有的消费模式会分裂出现好几个走向。关键议题是关于这些新技术在提供变化了的（而且仍变化着

的）文化资源列表方面的作用，我们都将从这些文化资源的角度并借助它们来构筑自我认同观。我们在分析这些进程时必须密切关注文化认同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是怎样产生的，并探讨各种媒介在构筑自我——指不同层次意义上的个体和社会群体成员——认识当中发挥的作用，不论是家庭、地区、国家，还是超国家的社会群体。但是首要的一点是，我们绝不可将这些议题当作一系列抽象的政治观念来看待，因为它们终究是（通过媒体中介的）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

再回到我们开始时谈的有关传播新技术、变化中的文化认同及形形色色的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问题，或许我们该向那些长期无法归避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的人们讨教。由于我们现在感到害怕美国的和跨国的新传播产业公司的统治，所以出现旨在挡开“美国”退回到“欧洲堡垒”架势的趋势，出现捍卫本土民族文化不受“布鲁塞尔”（译者注：比利时城市，欧盟委员会所在地。）的威胁的关切之情，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正如马丁－巴伯罗（1988）所述，这种行动表明将我们的本土文化界定为一个“自然事实”、一种先存的现实、静态的、没有演变，用以测量现代性的起始“静止点”。从此角度来看，

> 如果本土性变成同一性的试金石，那它似乎就成了惟一留给我们的“真实”，惟一存留我们纯洁的文化根源的隐密地方。其余的一切都是被污染、失却了同一性。
>
> （出处同上：459）

对任何此类以捍卫“民族文化”为名的“真实性”和“纯洁性”的呼声持摒弃态度，这才是我们切实融入正在进行的欧洲文化改形的前提。

第四章

欧洲文化
——通讯、空间、时间

本章重点是地理和历史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关注欧洲演进当中的历史延续性和断裂性，关注一再被创造的历史传统，关注与“欧洲文明”相联的文化传统和遗产。我们还关注现阶段地理方面的变化：关注地域和领土的改形；关注新型空间定位和参照方式；关注不断变化的社群内涵和社群观。另外，因为任何关于通讯和文化的论述都一定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权力的问题，所以这也将是我们探讨的核心问题。我们必须思考地理、历史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1950）所指的“帝国问题”。

通讯、文化、欧洲

像鲁珀特·默多克和西尔维奥·贝鲁斯考尼这样的传播

业巨子的帝国是地道的世界强军，所以说有那么多观察家认为他们享有极权实在不令人吃惊。理查德·皮特指出："趋势是产生一个世界思想、一个世界文化，继而是人类过去的地方特性所形成的区域意识必然消失"（1986：169）。在人们看来，全球媒介无疑将俘获受众的心和头脑，并制造一种越来越一致的全球意识和全球文化。按照皮特的话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超文化"时代，全世界的人们都给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机器上不易觉察的螺丝钉"（1982：298）。

我们视跨国媒介巨业的势力和影响为已知的事实。在我们看来，真正意义重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势力的运作和效力。传播、文化和认同三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盛行的观点是从传播新技术对文化及文化同一体"冲击力"出发（以不同程度的技术决定论）来认识这种关系的。恰恰是这种认识法贯穿于理查德·皮特所描述的由全球传播业创造"全球综合意识和文化"。这种构想存在很多问题。媒介的势力是人们假定的而从未验证过的。这种假设的基础是贯穿于这种方法的通讯过程模式，即詹姆斯·凯里（1977）所指的"通讯的传输目标"。在这种模式里，传播技术是起决定作用的积极因素，而文化和认同是被动反应的因素。传播技术是因，认同是果，它因技术的"冲击"而形成并修正。还有——而且这也将是下面论述的重点——这种看法没有从理论上认识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个黑匣子。它所提出的惟一实在的问题是文化认同面对"外来"传播帝国这些外来势力的进攻时的脆弱性。于是，问题在于抗拒文化入侵和强化本土性。人们觉得变革扑朔迷离，指的是文化侵蚀甚至文化灭绝。例如，皮特的论著中显然特别担心积极的民族认同将被一种全球无认同所取代。在那些为了回应自认为的"殖民化"威胁，试图维护、捍卫"欧洲认同观"的战略里——这些战略很容易陷落于

"欧洲堡垒"这个保护主义心态——这种思维亦是昭然。

从这个角度去看，文化认同是个毋庸置疑的残留范畴。我们要想真正认清通讯、文化、认同三者的关系，就必须超越这种决定论式的通讯过程模式。在这种主流框架里，文化同一体只能够对传播技术的控制性刺激作出回应和反应。需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更确切的阐述，要将文化认同看作是个需要质疑的核心范畴。正如菲利普·施莱辛格所指出的，在讨论民族认同时：

> 我们现在需要转变传统论点的讲法：**不是**以通讯及其所谓的对文化认同和文化的效应为开端，相反，开始是摆出民族认同这个问题本身，试问该怎样分析它，通讯活动在其构成当中会发挥何种重要性。
> (1987:234)

重要的是认清社会文化认同是如何构成的，思索现阶段重新构造文化认同和定向的参数。在这个较基本的议题构架下，我们于是能够开始探问有关传播新技术的能量和潜力的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

我们关注的是集体文化认同。与主导传播模式中那种静态固定的概念相左，我们需要提出另一个概念，它强调集体认同的积极、动态、竞争的本质。集体认同需要行为个体和社会集团达到某种一致性、凝聚性、连续性。这种紧密关系经常是暂时性的，并且具有或多或少的不稳定性。正如艾伯托·梅卢西指出的：

> 塑造集体认同是一个微妙的过程，要求不断投入。当集体认同到了类似较制度化的社会行为的程

> 度时，它会形成组织形式、一套规则、领导模式。对于制度化程度较弱的行为，其特征更类似那种必须不断作用才有可能实现的行为过程。
>
> （1989：34—35）

必须**经年累月**，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维持它还必须**跨越空间**，借助疆域与疆界的复杂构图，借助界定“我们”与“他们”的包含原则与斥异原则。在某些特定时期，已经确立的集体认同的标准的基石陷入了危机。一致性和连续性遭到分裂和间断的威胁；赋予认同感的情感投入被割裂开来。1992 年就是象征着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的年份。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驾驭这场危机：是否可以借重申“传统的”认同和效忠对象使之变成一种倒退，或者是否有可能想像新的凝聚形式和集体形式。

后现代趋势？

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深刻的结构转型期。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标志着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移，而另一些评论人士则认为这是指从有序资本主义向无序资本主义的过渡。最有影响的系统阐述是法国管理学派提出的，他们根据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历史轨道来加以描述。改革进程的本质是个难题，无法在此笼统阐释（参见第二章）。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场转型的特征表现为相互矛盾的发展，表现为变革与延续错综复杂。对于那些本想让我们相信即将到来的后福特主义已是格局明朗的人们来说事与愿违。我们必须指出，前途并不明晰、并不是坚定不移、且尚非确定无疑。

现在我们只能说，我们正处于危机时期，一个似乎正超越福特主义的时期。任何未来的积累机制尚待创造，而且仍旧是个争论点。

我们尤其关注的是该改革进程中的地理动态。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利用了空间作为自己壮大和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包含了历史上一系列的生产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s of production），每一个都与“不同地域内的活动之间的新型关系、社会组织的空间新模式、新特征的不平等、新型支配和隶属关系”相关（梅西，1984：8）。企业组织结构的职能逻辑与特定地域的疆域逻辑一直在复杂地互动着。正如雷·赫德森指出的：“资本改革、劳动力空间划分不断变更及地方的特殊性三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1988：493）。这一历史进程就算曾出现重大间断，但也承袭有延续方式和累积形式。意义和传统、忠诚和效忠围绕着地域意识而生，政治经济组织模式、权力与附属模式铭刻于特定地域（城市、地区、国家）间的关系当中。

虽然尚无法确定当前地理重组改型的最终结果，但我们已经能够肯定该进程的某些关键元素。看起来，一种与积累的日益跨国化紧密相联的新的空间范围——指全球、国家、地方领域的——结合正在兴起（罗宾斯和吉莱斯皮，1988）。公司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并一体化，这将令全球空间和地方空间更为紧密、直接地结合。某些地方和城市被纳入跨国网络的逻辑当中。先进的全球化方式“从战略角度出发创造相互联系的生产群，其中每个都与该地区和社会的形形色色的天时地利相契合，都是按照一个全球战略观把每个当作区间网络来散布”，并且经济的成功机率成了“其在全球环境内串接起一个组织严密的存在体的能力的结果”（戈登，1989：116）。看起来，在这一进程中正在形成一个由发展并不均衡

的地区、城市、地方织起的新的全球网络和策源地。而且,在这个全球—地方的界面下,国家对经济和政治的控制变得越来越难以定夺。正如戴维·赫尔德指出的:"生产资金和其他经济来源的跨国化无疑正在侵蚀(民族)国家掌握自己经济未来的能力"(1988:13)。

我们现在描述的这些进程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是政治与文化上的,它们与20世纪末集体组织和集体认同形成巨大的共鸣。资本主义社会里政治附属的根本原则一直是透过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认同,透过单一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现在这种忠诚正被日益削弱——尽管我们恰可把最近民族民粹主义理念(*national-populist ideologies*)的抬头看作是对这种趋势发出的无望取胜的回应——而且我们正目睹着既浮现出扩大了的公民概念(指整个欧洲大陆)又浮现出有限范围的公民概念(指地方、地区、省际)(阿曾伯格,1988)。人们正从这个全球—地方关系里锻造出新的结合、从属、包容形式(阿尔杰,1988)。当然,创造并维持一种国际主义观念要困难得多,而且大趋势是走向一种新的或是改头换面的地方主义。问题在于这种归属关系是否将是保守、狭隘、自省的,或者是否有可能从更普遍、更世界性的角度来重新想像地方社会群体。

这个全球—地方动态的某些文化特性在后现代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当中反映了出来。空间和地域被凸显于后现代情感和特性的中心位置。按照爱德华·索亚的话说:"伴随着当代改革期的是空间性和空间化、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突然显形并为人意识"(1989:173)。一种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国际传播图像网络所造就的新空间性的本质和体验。这是一个由图像、屏幕和外观构成的全球空间,在这里,现实的秩序与想像的秩序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无中心的超空间,这个具完全

接近性和瞬即性的空间里，要么体验迷失方向、混乱、分解，要么有可能"心甘情愿地想办法解决无序"，承认迷失方向和分解是种现实状态（拉斯廷，1989：121）。另一种后现代主义借激发地域精神，以防御手段对付这种势头猛健的空间意识和体验。该战略指望着再现地域和社会群体的魅力来重振地域的本来含义、其根深蒂固性及人在其中的份额（利，1989）。比如，在新民间风格和新复古主义样式的建筑、设计及城市规划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演变。还可以在后现代恢复的遗迹和史实中发现这类演变，这时的遗迹和历史或许是"确有其物，或许是想像出来的，或许仅仅是重新创造的模仿品"（哈维，1987：274）。尽管这两支后现代主义流派似乎相当矛盾，但事实上，它们都是由共同关注的问题支撑起来的。它们对新全球空间内的方位和认同这一个根本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思考技术与后现代地理构成的关系。虽然我们不应该把信息传播新技术视为起决定作用的起因性元素，但是，它们无疑在新空间结构、关系和定位的萌生过程中正发挥着强大的影响。企业传播网已经塑造了一个全球电子信息流空间。新媒介集团正在创建一个全球图像空间，"一个传输空间，（它）（作为一个有自己主权、自己保证人的新地理存在）无视权力地理、社会生活地理、知识地理，而这几者界定了国籍空间或是文化空间"（拉思，1985：203）。新技术使得有可能出现一种新型的空间—地域关系：因为新技术有能力越过疆界、打乱疆域，所以它们卷人到非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复杂互动当中（杜普伊，1988）。尤其重要的是，新技术必然造成边界与空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以其边界、界线或疆界来界定、区分事物（拉夫利赤，1989）。我们可以说，人们提出的边界这个概念本身——比如说，民族国家的疆界，或是城市的自然边界——就有很多问

题。保罗·维里利奥描述了在历史上人们是怎样"从可知的与不可知的角度出发不断改变边界面。最近一次变革",他觉得,"或许是分界面的变革"。技术构造和自然地势构造在某种程度上连绵不断起来。边界已经变成信息和通讯可以传流、可渗透的"渗透性薄膜"(维里利奥,1987:17,21;参照:沃克,1988)。(信息网、卫星"覆盖区")这些全球性系统也在有形的疆域格局之上布下了抽象的空间。结果,旧有的社会群体和旧有的本土化的群体意识消散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该怎样调合网络和社会群体(施蒂格勒,1987)。

尤其是,欧洲不得不在新的空间分级体系和国际新秩序下给自我定位。正在进行的欧洲一体化运动是对美、日经济强势,对所谓的东南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逐渐有力的挑战,也是对东欧剧变的反应。必须在战略上找出办法对付打破了国家界线并削弱了国家主权的新型超移动性(hypermobile)资本。必须认识到信息网络和图像空间,而这两者正在创建新的跨国通讯领域、市场和社会群体。

什么样的政治统治和调控方式能够在这种变革的情形下充分发展呢?有一种行之有效的保守办法,它注重保存民族国家并维护国家疆界的完整。伊诺克·鲍威尔(1989)明确表达了英国政府的立场:"这不是一个'没有疆界'的欧洲。国皆有疆界;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即撒切尔夫人心中的欧洲,是一个有疆界的欧洲。"与此相反,有一种超越了疆界,更富想像力,持向前看态度的战略。欧洲共同体的想法是希望通过形成多国集团来实现跨国管理。但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个靠不住的想法。问题是,这种观点是否能最终带来解放,还是将塑造一个欧洲超国家,即规模扩大了的民族国家。一边是"欧洲社会"("social Europe"),另一边是以保护主义、中央集权、军国主义为特征的"欧洲堡垒"("Fortress

Europe")，模棱两可的可能性在这对比鲜明的规划中显而易见。"社会群体"意味着什么？正如艾琳和斯蒂芬·约(1988)所强调的，社会群体是个有争议的概念。它在历史上曾拥有一系列的意义：有指密切关系的社会群体；有指作为服务机构的社会群体；而在最近指的是作为国家的社会群体。最后这个是种抽象的强制性意义，其中社会群体的理念是用来与国家权威相匹配，这种概念大有在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危险。我们能令超出这个范围的欧洲群体成为现实吗？社会群体这个概念能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切实可行吗？

文化共同体

> 欧洲文化的标志是其多样性：即气候、乡村、建筑、语言、信仰、品味、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必须保护这种多样性，而不是淡化它。这是欧洲大陆的一项主要宝藏。但是这种多样化下孕育的是亲和性、家族相似性、共同的欧洲认同。多年以来，欧洲大陆的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张力促动了古与今、传统与革新的融汇。这无疑是欧洲文明优秀成分之所以伟大的一个缘由。
>
>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3:1)

文化是欧洲事业的核心。它被视作欧共体"内部市场"和远景目标的绝对根本所在。文化是欧洲联合的基础，尽管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或许很重要，但这种联合的目标远非仅仅如此；欧洲文化认同"是达成那种团结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该大型市场的形成及其将令欧共体内的生活状况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要保证其得到所需的大众支持的话，那么这种团结

便至关重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7：1）。这种对文化的关注反映出对"经济、技术、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意识日益增强（出处同上：3）。该委员会召唤丰富、正统的"共同文化遗产，其特征为各族人民同有教化的人们（原文如此）在民主、公正、自由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交流"，这种遗产"深深地根植于当地居民的集体意识之中"（出处同上：1）。这份欧洲文献中还贯穿的一个主题是"求同存异"的主旋律。这种呼声看起来似是而非，它唤求的是"地区和国家文化多样化史所展现的那种欧洲文化统一"（出处同上：3）。

传播新技术——尤其是现在正广为推行的"高级消费电视"——被视为这种最终演进的根本要素。该委员会强调指出，电子、航空航天、电信、视听这些产业将成为20世纪90年代主要的发展部门。以视听业来说，将来有必要搞一个欧洲的技术生产基地，以迎接外来竞争对手的挑战。该委员会还强调，广播电视的共同市场，尤其是促进所谓的"商业之声"自由流动的那种共同市场应该有助于孕育出包罗一切商品和服务的内部市场。但是还应指出，压倒一切的要求是坚持工业复兴与文化复兴之间的关系和谐。它认为，电视可对"增进欧洲文化认同"发挥重要作用；它能通过加强归属一个共同体的意识来帮助形成同一民族的欧洲，那个共同体的构成国家虽然各不相同，却多少紧密团结在一起（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8b：4）。电视确实能成为一项进行整合的工具。该委员会坚称："电视将在形成并孕育'欧洲共同文化历史遗产是丰富多彩'的这种意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跨越国界传播信息能够极大地帮助欧洲各国人民认识到他们在诸多领域分享的共同命运"（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4：28）。

但是这又如何与20世纪末不断变更的地理充分协调起来呢？新传媒真能必然直接地增进欧洲在21世纪的和谐统

一吗？这项欧洲文化一体化的计划，这个“求同存异”的理想，事实上真像该委员会表面上认为的那样意义深远吗？这种观点对欧洲和其遗产的看法是什么？

欧洲委员会正试图给与西方文明遗产紧密相联的欧洲认同观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目前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统一的工作“是试图重振欧洲‘公主’昔日富有、自由、强大的形象”（基恩，1989：30）。我们并不奇怪再度泛起对共同文化和认同、对欧洲公民“集体意识”（不管其为何意）的呼声。但是我们一定被其在当今的涵义给搞糊涂了。很难看出这种借向后看得到的辉煌感对于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欧洲重新作出任何重大定位，对于欧洲认同重新进行任何真正且有意义的想像具有什么意义。

这里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对近来中欧、东欧动荡作何反应。欧共体“无疆界的欧洲”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负责任并行之有效地对付了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共同的欧洲家园”呢？这项举措要是随着前南斯拉夫的危机失败了，代价将是什么？这种欧洲观将如何直面东欧西欧之间那条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想像中都不断变更的边界线？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真正考虑过将怎样融合这两个部分欧洲。米兰·昆德拉指明了地理的和历史的分水岭：西欧“在中欧看到的仅仅是政治制度……它在中欧看到的只是东欧”（1984：118）。与此同时，中欧人却依据西方文明和遗产来界定他们自己的认同：“对他们而言，‘欧洲’一词并不代表一个地理现象，而代表着一个与‘西方’一词同义的精神概念”（出处同上：9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他们坚信西欧“不再把其统一视为文化上的统一”；而就西欧自身而言，“欧洲不再被当作一种价值观念”（出处同上：110，118）。欧洲共同体将怎样跟这另一个欧洲，这个“失去的”欧洲协调起来呢？这两样的世界、两

样的欧洲怎样才会进入对话？有没有可能将集体认同观和文化认同观扩展至涵盖两个欧洲呢？历史沉甸甸地压在上述愿望的脊梁上。很难相信"我们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类文化群落并将一切残余污秽剔除掉，也就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乐观派们目前显然正在做的工作。通常，家丑即便不去抖，它自己也要张扬出去的"（施莱辛格，1989：15）。这不是说这种理想是空洞的，而是指要实现它需要政治上的成熟和大度。

欧洲共同体内部也有些家丑：那些必须驱除的历史和记忆。"求同存异"的想法要是不想变成软弱的口号，就需要以政治意志去面对遗留下来的旧的权力、不平等和劣势体制。詹姆斯·唐纳德明辨出一直影响着欧洲政治文化地图构成的一条原理："可以把文化群落视为认同、标准语言、国家这几支向心力抗衡文化差异、语言变体、狂欢作乐这几支离心力的战场"（1988：33）。文化多样性和同质性一直受到集权化、标准化及统一这些势力的束缚。到目前为止，这种抑制性原则一直是在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态内得到最充分地发展。在此期间，现存却无国籍归属的那些文化群落一直被置于边缘地位，一直挣扎着偷生（德·莫拉加斯·斯帕，1988）。被视为反映出欧洲文化多样性的绚丽图景的实际上是通过单一民族国家的力量而形成的领土和文化分级体系。

关键问题是，欧洲一体化是否能带领我们超越这个单一民族国家的逻辑。它事实上会不会像欧洲委员会所推测的那样，促成一个全新的、更加主张平等的文化地理。而传播新技术在此进程中会扮演何种角色？上述问题的部分答案是，鉴于新传媒超越国界的能力，它们有可能促动削弱单一民族国家的权力并为新的不同形式的国际主义和地区主义开辟道路。然而，相应的危险是，詹姆斯·唐纳德所说的向心力/离

心力实际上或许会存在于更高的层面上，以一个欧洲大巨国为内聚和抑制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时我们或许便发觉自己将民族文化当作文化多样性的根基来加以捍卫，而且尽管感到勉为其难，但仍将国家主权当作抗衡全球标准化和同质化的堡垒来加以巩固。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超越这种国家逻辑，走出“国家主义者臆断的……政体与文化群落规范性的一致”，重新想像“一种将这两者割裂开来的新型人类社会群体”(柯林斯，1988:20)。真正彻底的文化多样性可能需要更加从根本上着手(而且或许是不切实际)的规划解构这种遏制逻辑，而不仅仅是在更高层次上以防御为目的地重建它。

想像中的美国

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中欧与西欧的关系或许也能对我们认清欧洲对美国的态度有所助益。每当“心爱的欧洲”似乎不再把文化当作最高价值观念范畴时，中欧人便坚称自己是西方文明的宝库：“他们正拼命地想办法重现往昔，重现往昔文化，重现现代时期的往昔。中欧仅仅是在那段日子，仅仅是在维持文化特性的世界里才能继续捍卫自己的认同，才能让人看到真实面目”(昆德拉，1984:118)。中欧认同历经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及其“长期以来就欧洲人性可能走向的归宿的沉思”激起了从根本上的不稳定：

> 因此，欧洲的脆弱本质，欧洲所有的脆弱本质正是在这个由那些“尚未消亡”的小国组成的地区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清晰可见。实际上，在权力越来越倾向于集中到少数大国之手的现代社会里，

> **所有**欧洲国家都有沦为小国并与这些小国共命运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欧的命运昭示着整个欧洲的命运，中欧文化具有深重的实际意义。
>
> （出处同上：109）

这种脆弱本质在欧洲各国对反文化的美国强势的回应中清晰可见。这里同样有一场战斗，抗击"时间残酷而无痕的压力，将文化年代甩在身后"（出处同上：118）：美国、未来都被摆在欧洲人借以认定自己为欧洲人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对立面。在这里，欧洲认同也必须忍受被威胁、受损失的感觉。

实际问题是关于变幻世界中的欧洲认同，而"美国"可以作为出于防御目的抑制，而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工具。想像中的美国被赋予多变和混乱的特色，与此同时便巩固了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传统保守理想。这种策略与心理分析学家所说的投射认同法（*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同出一辙。欧洲认同的一个方面被砍掉并设想成是外部的东西。这种策略可以采取"仅仅期冀推迟与尚不能容忍的某种体验交锋的温和防御"方式，也可以采取较尖锐的方式，即"就是旨在**否认**认同，或许最好该称之为投射非认同法"的（格罗斯坦，1981：131，黑体重点为本书所加）。其结果是从未直接面对欧洲文化危机。而"美国"作为"不能容忍的体验"的容器，披着幻想的色彩，总是威胁着要"污染"或是吞噬欧洲文化的纯洁性。

当然，我们不是说美国文化仅仅在幻想中才威力巨大。1986年，美国娱乐业的贸易顺差为49亿美元，仅次于航空航天工业，位居第二（霍斯金斯和米洛斯，1988：512）。美国在电视节目制作和贸易方面拔得头筹。正如雷蒙德·威廉斯直言不讳的，情况是，新传媒正"努力争取在（其）自身的图像中重新塑造意识，而且（正在）取得节节胜利"（1989：311）。如

果确是如此，那我们就必须非常认真地考虑当今世界文化权力和文化统治的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能首先（利用哈伯玛斯（1984）所说的“批评疗法”）弄清楚并直面那些曲解了我们对“美国化”的认识的一整套幻想和自欺欺人之说，那么我们大概也只能非常认真地考虑上述问题了。前提是我们跳出那种无法抑制地重复自马修·阿诺德（译者注：马修·阿诺德，（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和评论家，主要著作有抒情诗集《多佛滩》、叙事诗《邵莱布和罗斯托》及论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等。）至今欧洲关于其“想像中的美国”的学说精髓的冲动状态。

美国文化不是无法抗拒的。就电视节目制作来说，有证据表明，“美国节目没有吞没外国观众”，而且至少在欧洲大国里，“最受欢迎的国产节目总是比最棒的美国节目走俏”（沃特曼，1988：144）。迈克尔·特雷西觉得国际传播体系比通常估计到的要复杂得多，而且人们一直严重低估了“各民族文化的力量，语言和传统的能量，仍旧在国界内流动的势力”（1988：22）。受众也比普遍承认地要更有鉴别力：“美国电视节目从来没有像猜测的那样受欢迎，甚或是那样广为流传……国民基本上更喜欢国产节目”（出处同上：24）。而且，当观众真的在看美国节目时，他们也不如通常所估计地那么容易受影响。通讯过程的传输模式遭到了许多理论观点的强力抨击（布雷顿和普罗克斯，1989：186－190）。将受众定位于日常生活中的调查工作往往会强调积极地调拨媒介信息并让其通过。然而还有一种谣言，似乎美国文化也令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很多人很感兴趣，颇合心意。自愿收看美国节目的消费者们一直都没有把美国文化视为同质的整体。相反，

> (好莱坞电影、广告形象、包装、服装、音乐)这些美国大众文化提供的是不同集团能够一而再装配成简直无数组合的丰富意像,一系列象征符号、物体和人工制品。而且每种组合的意义被转化成一个物体——牛仔裤、摇滚唱片、托尼·柯蒂斯发式、女孩穿的短袜等等,都被从其原本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抽出来,跟其他背景产生的那些标志并置对照。
>
> (赫布迪杰,1988b:74)

或许这里真正问题所在是关于所谓的欧洲居民共享的"共同文化遗产"、"集体意识"。这问题有多重大呢?多愁善感的昆德拉怜惜道:"在巴黎,甚至在非常高雅的环境里,晚宴上人们谈论的是电视节目,而不是时俗讽刺剧。因为文化已经谢幕退出舞台了"(1984:117)。昆德拉意指传统欧洲艺术文化已经失去构筑欧洲文化统一体的能力了,此言正确。但是他说文化死亡了,这就不对了。文化正在被改形。现在大众媒体越来越重要,"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间的界线正日渐淡薄,而美国文化产品正是该进程的核心。现在在某些领域正得到承认的是,这种状况对传统"美学"标准产生深刻影响。正在出现的"不仅有全然逃离了'现代'艺术和文学思想的美学价值概念,而且有感觉完全适宜这种新美学标准的受众"(伊科,1985:181)。我们需要服从于这种后现代——而且在某些地方,是后文化的——美学标准及其对欧洲认同的影响。对待美国文化需要的是开放式、创造性的立场,而不是出于防御目的说教性的立场。

欧洲与他者

美国是个令人不安的源头。但是还有件事令欧洲文化更头痛，一个吞噬欧洲认同灵魂的事物。娅斯明·艾利巴写道："整个欧洲大陆上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大量的恐外情绪，它正把一部分有关 1992 年的集体梦想聚拢在这样的欧洲概念上，即欧洲是白人的、搞种族歧视且比任何一个战后国家都强大得多"(1989)。各民族认同正被变成"白人大陆主义"。现在人们界定欧洲统一体是相对于"异域"文化并围绕着欧洲优越的自我形象。

斯瓦南丹的论述中也明确指出了同样的危险。他说："我们正从持种族优越论的种族主义走向持欧洲中心论的种族主义，从不同成员国各自不同的种族主义走向共同市场持有的种族主义"。"公民身份"，他写道：

> 或许能打开欧洲对黑人的边界，允许他们自由进入，但是种族主义无法区分每个黑人，无法区分公民与移民——而且把所有第三世界人民都定为移民和难民，把所有移民和难民都定为恐怖分子和毒贩子——它将使自由进入变得举步维艰，甚至是异想天开。
>
> （斯瓦南丹，1988:9）

有一种深切忧虑，担心欧洲统一将建立在移居和移入的工人这些下层阶级的脊梁上。人们通常着眼于高科技革命，即机器人技术、电信网络、电子化房屋、时尚建筑来看待现今的重组进程，这场革命将结束劳作，开启一个闲适社会。强调重点

是传播网络和新的信息流动经济。但是这里有个阴暗面：

> 这项新核心经济除了提供大量高薪职业岗位，还直接并间接地需要大批低收入工作。移民一直是低收入而且典型的无权类工人的来源，这个事实在控制管理世界经济的战略中心不能不算昭彰。
>
> （萨森－库伯，1987：60—61）

还有一种流动经济：人力的流动，指“廉价受奴役的劳动力——这些人没有权力、没有根基、天涯浪迹、暂时落脚、甚至是非法违规——但没有了他们，后工业社会就无法运转”（斯瓦南丹，1989：29）。对这些移民和背井离乡的人们来说，不可能不再劳动。马丁·沃尔克（1988b）认为，我们建立起的是个危险的效率，这种效率运作非常狡猾，它造就遭人唾弃、没人要的固定下层阶级，欧洲的寄生虫。

如果说我们正目睹着后现代地理逐渐形成，那么上述演变就是一个表现。大批迁徙、被迫流落异国者、难民、流亡者都是这种全球－地方关系的一条证据。这也是个关于帝国、关于帝国内部、关于内部殖民化的问题。冈特·沃尔拉夫愤怒地抗议道：“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民主政治里**——存在着相当规模的种族隔离现象”（1988：2）。这些不受管辖的人能够要求拥有什么样的文化认同呢？比库·帕洛克这样写道：由于“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缺乏根基，他们的体内无法感受到移居地最深切的喜与痛，他们同意义和价值观念的社会源泉断了联系，所以他们的生命缺乏深度和多样性，而这两者是神圣体验最惯常的源泉”（1989：30）。这与对根的欲求，即对地域和遗产的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现在似乎成了西欧核心劳动大军老是关注的东西。这些流浪的主体怎样

才能适应“求同存异”的理想呢？欧洲给他们的是种什么样的社会群体呢？将如何把他们接纳、融入到社会意义的欧洲、公民意义的欧洲、文化意义的欧洲中来呢？

这些问题引出了“我们与其他事物——其他文化、其他国家、其他历史、其他体验、传统、人民、命运——的关系这个深刻、极度混乱且令人烦恼之极的问题”（赛义德，1989：216）。引出了我们与诸他者的历史关系是如何被转变成与他者的本体关系的问题。爱德华·赛义德曾根据欧洲的东方主义学说来解释这个问题，东方主义是“把‘我们’欧洲人与所有‘那些’非欧洲人区别开来的一个集合概念……是欧洲同一性比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都优越的观念”。赛义德写道：东方主义“确信弹性位置优势，它把西方人置于与东方可能发生的整个一系列关系之中，且从未让他失去过上风”（1978：7）。赛义德将帝国的这个特性同欧洲的“地理布局”，同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的哲学思想和想像方式，以及同获取空间、划归其隶属并开拓它联系起来（1989：218）。“西方”与“东方”的两极化地理产生的是同一体与变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一者要么属于这一类要么属于那一类；一者要么是自己人要么是外人”——这种关系登峰造极的表现是“令人恐怖地强化爱国主义，维护文化优势、各种控制机制，上述这些的权势和无可避免性又强化了……认同的逻辑”（1988：56）。

欧洲的理想是一块消除了所有壁垒，实行团结一致的原则的经济区。一些人认为，这个理想还包括消除了社会政治壁垒。我们的看法是，还存在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壁垒，而且它们是欧洲统一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最根本的挑战是如何面对体现在构建他性（Otherness）当中的优等同一体与低级同一体的关系。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创造一种能够承认差异（而

不仅仅是多样性)的交际和社会群体;是否有能力把差异当作资源而不是担心它构成威胁(费劳德－罗耶,1987)。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欧洲同一性和连贯性的偏狭与自以为是之处。

或许在结束本章节时该说的一点是流落他乡和移民的经历。如果目标真的是打开(文化的以及地理的)疆界,那么移居的经历可是个重要的办法。爱德华·赛义德这样写道:"流亡者跨越边界,打破了思想和体验的壁垒"。流亡的确是个残酷的并且让人变得残酷的经历,但是从中某些地方可以学习一些东西:

> 把"整个世界看作一片陌生的地方"有可能令人的目光具有独创性。大多数人主要意识到一种文化、一种环境、一个家园;流落他乡的人至少意识到两种,丰富的眼界能使之意识到同时存在的不同特质,(借音乐术语来说)形成**复调**的意识。
>
> (赛义德,1984:170－172)

这种经历的意义在于它能使掌握霸权、充满自信的欧洲文化失去中心地位。建立任何有意义的欧洲认同都不得不承认差异,接受不同种族特性。

第五章

无处似故乡

——家(祖国)的形象

我们要讲述的是历史与家由来已久的冲突。换言之,就是那个似乎将家庭与人类探索分开来的无边无际、无法捉摸的空间。

(珍妮特·温特森,《俄里翁》)

盖国乃我生养之乡。

彼流离之所。

(T·S·艾略特,《致命归非洲的印度人》)

人人需要有个家,这样至少能有个离开的地方,也就是大多数人猜测你来自的地方。

(琼·乔丹,《居所》)

引　言

本章我们关注的是在给欧洲和欧洲文化下定义时的认同问题和记忆问题。我们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探讨故乡这个概念的向心力。我们引作特例的是因埃德加·赖策1984年推出的影片《故乡》(Heimat)(及后来在1990年推出的续集《第二故乡》(Die Zweite Heimat)而在德国引发的围绕着故乡—异域这组对立体的争论。该论辩给关于在战后欧洲文化群落与"他者"文化群落的关系,尤其是关于通过媒体塑造对昔日欧洲的表述这些更大范围的讨论提供了焦点。我们的论点是,我们从这些关于谁最有权表述往昔的论争中看到发出的是对关于谁有权决定德国未来的论争的"回声",这"回声"很能说明问题。这当然不仅仅事关当地生计,而且对整个欧洲未来都至关重要。我们取"德国经历"作为浓缩代表,象征欧洲历史上诸多最令人困惑的主题,也是欧洲当代现实政治的中心议题。正如马格里斯直言不讳所述的:"今天,自忖欧洲之事就要扪心自问,自己与德国是什么关系"(1990:32)。

如果德国不管怎么说冰释前嫌(参照:龙(1971)关于让－玛丽·斯特劳布和达尼埃尔·于伊埃特1965年影片《没有和解》的论述,该片是根据海因里希·伯尔1961年的小说《九点三十分打台球》改编而成),不仅仅在名义上统一了,而且"铁幕"不再把欧洲一分为二,那么问题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即欧洲的尽头到哪里(也就是中欧或东欧的地位是什么?),如果不再针对共产主义,那么相对(除美国的)哪个"他者"来界定欧洲和欧洲文化呢?我们的论点是,如果美国继续作为一条象征着"西方世界"的边界的话,那么最近的论争显然也在修订有些老掉牙的欧洲定义——过去常常把欧洲称

作“基督教世界”——欧洲现在把伊斯兰世界，而不是共产主义，视作“东方”边界。我们关心的是辨明一些正在编织起该模式的线索——但愿能解开它就更好了。

把一切都带回家

彼得·伯杰和他的同事们指出：“现代人遭受了越来越严重的‘无家’之苦”；“与现代人社会阅历和自我体验的迁移性相联的是抽象意义上的丧失‘家园’”（1974：77）。马歇尔·伯曼写道：做现代人

> 就是发现自己身处的环境预示着有冒险、权势、喜悦、发展、自我和这个世界要变革——而与此同时，这种环境威胁要毁掉我们所有、所知、所是的一切。现代环境和现代体验切断了所有地理的和种族特性的界线、阶级和国籍的界线、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线；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统一了全人类；但是这是个矛盾的统一，是个解体的统一；它将我们全抛入无休止的解体和更新、斗争和对立、含混不清和悲痛的大漩涡之中。
>
> （1983：15）

于是，现代性的事业是“让人在这大漩涡中某种程度上感觉跟在家一样”（出处同上：345）。

引起我们兴趣的正是这个“家”的概念。家是个拓展视野、消除边界的世界。安东尼·吉登斯提请人们注意现代性给本体安全、给我们所相信的“（自己）自我认同具延续性和行为周遭的社会、物质环境具持久性”产生的影响（1990：92）。他指出，

在前现代时期里，信任和安全的意识根植于亲缘关系、地方群体、宗教信仰和延续的传统之中。现代性强大动力的效应——吉登斯称是分隔时间和空间，解除各种机构和机制的弹性——一直是"使一些基本的信任关系形式脱离与地方背景的从属关系"（出处同上：108）。地域不再是认同的明显依据了。

恰恰相反，这一变革的进程已经加速，时空组合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这种现代化动力正是在全球化的逻辑下才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它通过不断激增信息传播流，通过人类大规模移民，已逐步侵蚀了疆界和边界，并激化了文化与认同的冲突，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一度是从时间和空间上划分、区别开文化群落，而现在，"文化群落是固定、统一、有限定范围的概念必须让位于文化体具流动性、渗透性的意识"（沃尔夫，1982：387）。随着诸文化的融汇、杂交，认同原有的确定性和基础必然不断遭到削弱。认同的连续性也被打断了。皮埃尔·诺拉（1989：7）写道："现在有的是记忆地点（译者注：原文为法语，lieux de mémoire。），因为不再有真实的记忆环境（译者注：原文为法语，milieux de mémoire。）……我们大谈记忆是因为记忆所剩无几"。的确，我们大谈记忆，大谈地域和社会群体。正如迈克尔·拉斯廷（1987：33－34）指出的，人们越来越感到需要"在表达上同往昔建立某种关系"，需要附属于作为"相关性和延续性的交点、属界线分明的文化群落和社会群体"的特定领地。在这个全新的失去方位的全球空间里，人们渴望"在家的感觉"。

家、祖国、故乡。该意像——这种怀乡情、这种渴望——正是围绕着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欧洲文化和认同的意义问题而在争论中变得活跃起来。让我们来想想米哈伊·戈尔巴乔夫所诉求的"共同的欧洲家园"：

欧洲事实上是个大家庭,其地理和历史与数十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密交织。当然,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问题,都想以自己的方式生活,遵从自己的传统。因此,打个比方,可以说:这个家庭是共有的,这一点确实无误,但是每个小家都有自己的寓所,也有不同的门。

(1987:195)

这个覆盖了大西洋至乌拉尔河的单一欧洲的概念显而易见有其吸引人的地方。但它真正意味着什么?它带来了何种社会群体?或许苏珊·桑塔格是对的。欧洲一度象征着帝国和扩张主义,而这个关于欧洲的新想法却指的是内缩:“不是世界其余地区的欧化,而是……欧洲自身的欧化”(桑塔格,1989:80)。这是个针对(美国、日本、伊斯兰、非洲等等)其他文化群落和同一体的威胁而界定的防御性的认同、堡垒式的认同。这样子重申欧洲文化认同实际上等于拒绝正视人口根本性迁移的现实,这个现实正在削弱19世纪那种“由信奉基督教的白人组成的小欧洲”。正如尼尔·阿谢森指出的:“我们正居住在一个新美洲里,但它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正居住在一个外面世界的穷人开始选作目标的大陆上”(1990:7)。又如霍尔所述:

在这个全球化和移居的时代里,欧洲的“他者”终于自食其果……单程车票和租赁航班已把欧洲带入其“他者”所及范围之内(而长期以来它是隔着一定距离管理其殖民地居民)……这些野蛮人已经在门里了。

(1992a:47)

或者，用伊科更戏剧化的语句来说：

> 我们正面临着当与早期从东方到西方的印欧移居和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的移居……这场新移居将从根本上改变欧洲的面貌。100年后的欧洲可能是个血种混杂的大陆。
>
> (1992:96—97)

故乡欧洲召唤欧洲昔日辉煌，作为对付未来不确定性的要塞。这个欧洲将属于欧共体的人们与那些**超出交际范围的**，实际上是本土以外的人分开来。

然而，有些人不太同意这种欧洲家园观。套用戈尔巴乔夫的比喻来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不同的寓所，而不是共同的家庭。他们觉得，缺乏个性的欧洲主义(Europeanism)不利于民族文化和认同的丰富多样性，他们认为，民族文化和认同是更为真实的归属意识的基础；他们感到，只有在民族主义意识中才能够真正找到"在家"的感觉。现在我们可以在整个欧洲看到，民族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正死灰复燃。这种情况在中欧和东欧更明显，六七十年前强烈的民族愿望目前正在那里以重新宣扬种族、宗教、文化差异的方式再度复活。在西欧也是如此，尤其在德国重新统一(德国，统一的祖国)的情况下，民族忠诚心表现为强有力的归属方式。正如伊恩·戴维森(1990)指出的："西方对德国统一前景的反应表明人们刚刚将欧洲一体化这种文明的进步同旧式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表明虽然历经四十五载的调和，但在表面皮肤浅层之下还藏匿着原发的民族情感"。

除了欧洲大陆主义和国家主权主义，还有一种"家庭般的"归属关系可供选择。这种认同根植于地区和小国这样的

故乡。按尼尔·阿谢森的话说(1989),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的"消逝""或许会允许其他更小但更持久的实体来代替它们"。他唤醒人们想起地区传统、语言、方言、文化的丰富多元性,这乃是真实的认同的真正基础。阿谢森指出,欧洲共同体"将从由单一民族国家构成的西欧一路走来,途经根据布鲁塞尔条约建立的超国家,最后成为由诸故乡组成的欧洲"(出处同上)。这种欧洲由许多地区组成,希望欧洲"小则美"的理想显然似乎是一种更为丰富、也更加激进的归属方式。这种对小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颂扬之中含有浪漫的乌托邦精神,是处于劣势一方的乌托邦精神。约翰·伯杰(1990)写道:"爱尔兰人、巴斯克人、科西嘉人、库尔德人、科索沃人、阿塞拜疆人、波多黎各人、拉脱维亚人在文化和历史方面几乎没有共性,但是他们都希望摆脱在遥远异域的中心的影响,长期艰辛的经历使他们最终明白,那些异域的中心毫无生机"。他们都"坚持要求自己的认同得到承认,坚持自己的延续性——即他们同先逝的人和未降生的人之间的联系"。

然而故乡是个不祥的乌托邦。不论人们把"家"想像成欧洲还是民族国家还是地区,它都沉湎于寻求整体性、大一统、完整性。它是以共享的传统和记忆为核心的社会群体。正如德国电影导演埃德加·赖策所述:

> 这个词常常与强烈的思想感情相联,主要是怀念和渴望。故乡常常唤起我心中某种失去的或是非常飘渺的情感,某种人们不能轻易找到或是找回的情感……我觉得一个人离开故乡越远,他对故乡的感觉就越清晰。
>
> (引自伯奇尔,1986:5)

故乡是根植于逝去的往昔的神话般的纽带，这段往昔已经烟消云散：“我们企盼着抓住它，但它无根无据、难以捉摸；我们回首找寻坚实的事物去依傍，结果却发现自己怀拥虚幻的往事”（伯曼，1983：333）。这指的是保存文化和认同的“基素”。而且，如其话中所指，这还指维系文化群落的边界线和文化群落的界限性。走这条路便要保护独有的、进而具排斥性的认同不受被视为异类和外国人的认同的侵扰。“他者”常常威胁着大家庭成员的安全与完整。恐外症和原教旨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寻求故乡实际上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倡导纯粹主义者”常常担心“与别的文化搀和起来会不可避免地弱化，继而毁灭自己文化”（拉什迪，1990）。当代欧洲文化中对家的渴求并不是纯洁的乌托邦。

传播、记忆、认同

有关认同、记忆、怀乡情的问题与通讯模式和通讯流交错相联，剪不断、理还乱。当代的“记忆银行”有一部分是根据电影电视业提供的素材建起的。我们现在要转而讨论的问题正是电影电视行业在构建记忆和认同中的作用。

我们在前几章已经直接探讨了有关传播新技术超越已确定的国界创建“电子空间”和在欧洲文化群落变革当中的作用的论争。如前所述，主流观点认为文化同一体仅仅受传播技术的控制性刺激的影响并做出反应。需要对这个问题作更详细地阐述，即把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看作是个需要致疑的核心范畴。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民族的”，以及媒介体制在构建民族认同方面扮演何种角色。就电影而言，安德鲁指明，民族电影的概念已经几乎一律被用作“文化（和经

济）反抗的战略：面对……好莱坞在国际上的统治的一种宣扬民族自治的手段”（1989：37）。在那种情况下，尤其是艺术电影“在许多欧洲国家试图迎击美国对其本土电影市场的统治，促进自己的电影业和电影文化的努力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尼尔，1981：11）。于是，“艺术”、“文化”、“品质”这些话语被用来反衬好莱坞并证明各国以各自不同的特有的经济体系来支持、保护本土电影制作业是正确之举。

只要在承认“电影……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形式，一种具备‘民族化’功能的公共机构具有潜在的意识形态效力”（希格森，1989：43）的情况下，政府政策常常决定了各种民族电影的限定范围和可能性，国家在这方面的作用便至关重要。斯蒂芬·希思曾表明，正因为民族性不是指定好的，而“常常是获得来的事物”，所以“需要把电影认作‘获得’民族性的手段之一”（引文出处同上：44）。这必然是桩有争议的难题。定义民族电影常常牵扯到在想像中构建同质的认同和文化，这一点显然与一切关于民族的主题都一样；这牵扯到包含机制与斥异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一种“国民”的定义被置于核心地位而其他的则被排斥到边缘地带——这就是希格森所指的“内部文化殖民主义”进程。

这是个承认我们给自己讲述的往昔对于构建目前同一体的作用的问题。一个关键议题是国家的观念能使人们融入共同的认同观的能量以及它作为一种包含性象征的作用，这个象征构建并借用往昔的一些公众人物和对往昔的诠释“来让不再有幻想的日常生活重新焕发魅力”，从而发挥了整合作用并赋予国家意义（赖特，1985：24）。这时候，“日常生活中衣衫褴褛的人一旦涉及到象征意义就披上了理想国民的光彩。因此不是简单地由‘国家’替代‘社会群体’……相反，是连续不断地……挽救其残余下来的不幸”（出处同上：24），面

对民族往昔的想法总是在特定民族国家历史经验的范围内修订再现。认同是个记忆问题，尤其是对“家”的记忆的问题。

电影电视媒介在构建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正是从这方面着眼，探讨故乡这个观念的核心地位，主要参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因埃德加·赖策同名电影电视系列片而引发的辩论。电影《故乡》当然是公认的德国的体裁。显然，一个问题是人们能否既运用这种传统的极端保守的体裁，却又赋予素材新的不同的意义。必须把赖策的尝试放在西德20世纪70年代乡村地区开展复兴“故乡”传统的政治运动的背景下看待——那是一番由主张生态保护的团体和反核团体组成的联盟试图借助重新发现并重新评价地区传统及民间传统、方言诗歌等等的方法，以反中央集权者（和反城市）的政治运动形式，帮助左派要求“恢复”这些传统的努力。这次转向生态学标志着一项重要转变，而且，在这个背景下，阿道夫·穆施格明确指出，在人们面临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的状况下，“家园”是怎样不再成了个肮脏的字眼了（引自查默斯，1984:91）。让·博德里拉尔的评述或许更悲观：“当现实不再是它过去的模样时，恋旧情怀便臆想出它全部的意义。一大堆关于起源……和真实性的神话冒了出来”（引文出处同上）。故乡是个尚无人抵达、却又人人渴求的地方。赖策指明：“故乡，这个人们诞生的地方，对每个人来说便是全世界的中心”；这种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不仅仅具有领土意义，而且恰恰唤起“关于起源的记忆”，唤起溯祖归根这种“无法回归”的概念（引自凯斯，1989:163）。

1979年，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在西德上映，有2 000多万德国人收看了该剧，他们在自己的起居室里面对这种对自己历史的描述。《故乡》1984年秋天上映时就不仅仅是一

部电视系列片了：它成为引起有关德国认同和历史的大范围辩论的导火索和焦点，最受读者欢迎的报纸宣称："这个秋季德国的主旋律是故乡"（引文出处同上：184）。用托玛斯·埃尔萨塞的话说：

> （赖策、兰茨曼）这些影业人士……搞了些电视业大手笔档次的项目，他们的行动可以说是试图把电影电视用作跨越了娱乐、甚至是艺术的边界的论证活动的发布手段。当一部纪录片使得从刊物的评论版到报纸头条都是关于它的内容，成了深夜访谈节目的话题，这就证明电视具有创造类似大众领域的潜能。
>
> （1988：133）

上述两部系列片都算是电视业大事：如果谁想积极参与到这场在日常对话中进行的公众辩论中去，那他绝对必须收看这两部片子。

这便引发了谁有权构筑"瞬间公众领域"的话语的问题（这个议题因1994年初出笼的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辛德勒名单》而再度被提起）。海因茨·霍恩在《明镜周刊》中指出：

> 一部制作风格不足挂齿，制片初衷更多是出于商业目的而不是道义，更多地是为了娱乐而不是有所启迪的美国电视系列片，却成就了成百上千部的书籍、戏剧、电影……文献和集中营审判本身自二战结束以来30载所没能做到的事：让德国人明白以他们的名义对犹太人所犯下的那些罪行，使得成百万

的人们情感受到触动。

(引自布鲁玛,1989:40)

当然,埃德加·赖策显然认为《故乡》是德国人对这部美国系列片的"回答"。在赖策看来,《大屠杀》是"一个反映国际商业主义美学的典范,(对这种美学来说,)纳粹造成的苦难只是用来拍情感家庭剧时的一个受人欢迎的背景"(引自凯斯,1989:184)。他关注的是德国影业人士应该从美国人那里收回表现自己历史的"权利"。在赖策看来,真正的丑闻是"德国历史——好莱坞制造":因而《故乡》的副标题是"德国制造"。关于《大屠杀》一片,他认为:

美国人偷窃了我们的历史……攫取了我们对往昔的叙述权……我看到国民假惺惺的泪水,意识到这片子的内容全给当真了,所有伟大的德国知识分子们正依据这份曲解的表述讨论德国历史罪行的问题。

(引自汉森,1985:9)

值得注意的是,当《故乡》在美国上映时,许多评论人士做出了负面的反应,认为该系列片美化德国历史,这是很危险的。显然,一场世界大战的历史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些有关表述德国往昔的政治的辩论当中,真正的问题所在是谁有权利决定德国的未来。

从分别围绕着"故乡"的辩论与美国"越南"片的辩论之间可以找到许多有用的相似之处。这里,我们再次注意到这样一个切中要害的论点,即再现往昔目前实际上是主动的进程——正如从象征意义上说,在人们身边的电视、书摊上、电

影院里越南战争仍然在继续一样。历史上的越南战争是特定的一系列战斗、政策和形势，它已经被转变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越南”，正如同在《大屠杀》和《故乡》当中的德国（因而也是欧洲）往昔一样。对于《故乡》和越战片这两个例子，我们的问题不仅是有关失败和哀悼，而且是有关罪恶的问题造成的文化障碍以及如何再现它，后者则更让人费解。对于这两个例子，我们面对的问题还有，是否有可能走“进步的”一招，再次调用爱国情感，同时下一步的问题是暴行的始作俑者有可能攫取受害者的角色。不言而喻，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关于这些影片的话语当中的沉默之处：一种作法是，在《故乡》16小时的片子中大屠杀这件事本身给放到次要位置；另一种作法是，像好莱坞越战片那样，除了以讽刺手法表现越南人外其他一概不谈。

德国为何是这般模样？

> 人人都热爱着户外的世界，热爱他们所谓的大自然，好天气又平添了诱惑力，促使人们穿上吊带花式皮裤，心境平和地在树林里漫步上几个小时。
>
> （沃尔特·阿比什，1983）

托马斯·莱文在评论阿多诺的散文《论什么是德国?》时，着重强调道：“为了仅仅说明什么是德语，人们必须能够明确一条习语的特性、局限和性质”（1985：111）。阿多诺认为，要把习语的性质或特殊性搞得最清楚，办法是参照它那些无法恰到好处地翻译出来的表达方式。他说：“每种语言将它所属的人圈了个圈，我们只有在迈入另一个圈的同时才能逃离这个圈”（出处同上：117）。他的观点是，“什么是德国?”

这种提问方式的先决条件是"'德国'这个自治的集体,其特性根据事实随后确定"。然而事实上,很"难确定是否甚至有德国人或者德国专有品质或者其他民族任何类似的事物"(出处同上:121)。这些想法不可避免地将我们拉回到老套的集体自恋的问题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核心动因是其中"一个人确认自我具备的品质——此人所属集团的要素——不知不觉中成了善者;而外国集团、其他人成了恶者。那么,其他人对德国人的印象反过来亦如此"(出处同上)。就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关键议题是"美国"和"德国"的形象和认同曾经以及继续将怎样互相对比下进行界定。

温·温德斯指明:

> 美国常常意味着两样事物:即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和与之并存的对该国的"看法"。因此,"美国梦"是一个国家梦想在另一个国度实现的梦想……喷气机乐队在《西部故事》专辑当中的一首闻名遐迩的歌曲里唱道:"我想到美国去"。他们现在已经待在美国了,但仍想到那儿去。
>
> (1989:117—118)

与此相似的是,伊恩·布鲁玛强调,有必要将"作为法律政治实体的德国,即国家,与作为浪漫主义理想的'德国',即'故乡',那没有政治,一片有松林、落寞的山尖和焦急地寻求认同的爱幻想的候鸟的土地"区分开来(1989:43)。

来看我们的核心论点,温德斯提请人们注意家在美国文化和德国文化当中含义的重大差异:

> 在美国人们有:"移动家庭"。人们满怀骄傲地

说出"移动"一词,意思是"滞陷"……(或)"窘困"的反义词……。"家"意思是"在家","你所属于的地方"……(然而)在德语中之所以称其为家在于它固定于某个处所的事实。

(1989:144)

在德国的辩论当中,界定"故乡"一词参照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与一切外国的或遥远的事物构成鲜明对照。传统故乡题材的电影的风格特征在于讲述"故乡"这个稳定的词汇同"异域"危险的进攻之间的冲突。尤其是"美国"成了"故乡"的根本对立面。

赖策的电影走的完全是这个模式,影片构思主要围绕着那些待在村里的人(译者注:原文为德语,Die Dableiber。)(主要是妇女)同那些代表着移民文化群落,离开家的人(译者注:原文为德语,Die Weggegangenen。)(指男人)之间的反差。该片的道德世界是围绕着下面这一系列对比来构筑的:传统/无根性;乡村/城市;本地/异域;自然/现代;永恒/不断变化;女性/男性。这当中最后一组或许最重要。正如安东·凯斯指出的,《故乡》里的中心女性角色,玛丽,是安全和永恒的化身。母亲形象和家本身交融于一体,因而凯斯提出"该片隐含的意思是:她在哪儿,哪儿就是故乡"(1989:168)。

凯斯还指明,《故乡》中自开头称美利坚合众国是"有电椅的国家"起便一再出现无处不在的反美主义(出处同上:190)。在赖策本人为该系列片所撰写的创作说明里,主人公之一保罗被描述为已经"变成了个真正的美国人……一个没有家、没有根、伤感地四海漂泊的男人"(盖斯勒,1985:63)。从这个意义上说,赖策似乎落入了像邓肯·韦伯斯特所描述的那样"根据美国恐怖片、异族入侵、替换/改造本地人、(观

众、消费者构成的)社会群体变成没有头脑的呆瓜而得出的……标准美国化形象"(1989:65)。赖策生动刻画着

> 神话般的"美国",终年无家可归者的国家……寂寞、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国土……当德国左翼人士正试图重新协调对"故乡"的传统立场时,斥异机制发现了"美国"这个新靶子。
>
> (盖斯勒,1985:65)

该片对待战前时期持同情态度,加之重点放在战后时期对故乡体验的破坏上,让人觉得赖策暗示德国丧失认同与其搞美国化有关。

邓肯·韦伯斯特(1989:65)的看法与此相反,他指出,温德斯的《大路诸侯》里的一个人物所说的:"美国人已经把我们的潜意识殖民统治化了",应该指明,这里谈到的"我们"具有双重含义——即"我们德国人"和"我们这些战后大众文化的消费者"——而且这些含义标示着出身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交集。这当中处境危险的远不只是其他文化群落遭到美国入侵那么简单。更确切地说,温德斯摆出的是美国文化"对历史反复无常的反应,既要记住法西斯、又要忘却它的双重束缚",而"对付这种情况的一种办法是融入其他文化群落"(出处同上:67),因而对德国战后长大的一代人(温德斯出生于1945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与之同出一辙的是加布里尔·克罗伊策纳指出的,由于这段历史,德国左翼知识分子毅然决然地承袭了敌视德国文化流行现象的传统。与此同时,她指明,德国左翼经常给公众事件配上第三世界(南美、非洲)音乐。克罗伊策纳觉得,这种"颂扬传统音乐的做法不仅仅表现出对'真正'的流行文化

的(浪漫主义)渴求。这还表明，寻求他们可以认同的流行现象引领德国知识分子走出他或她身边的文化背景"(1989:245)。只有其他国土之上的流行现象让人觉得不带有意识形态的瑕疵。

于是，人们只得从德国对自己的流行音乐和影片的极度不信任看美国文化的魅力。正如温德斯所述：

> 在50年代早期，甚至到60年代，一直是美国文化的天下……换句话说，为了要忘掉那20年，就造成了一个空洞，而从两种意义上讲，人们为了努力弥补这个洞，吸收同化美国文化的程度甚过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我收听的惟一一个电台是美军广播网。但是德国人面对自己往昔的困窘大大推动了美帝国主义在这里大行其道。忘掉历史的一种办法，也是一种倒退的办法，就是接受美帝国主义。
>
> (引自韦伯斯特，1989:67)

摇滚乐或许曾是"外国事物"，但至少它跟法西斯无关。

这样对当代的分析与阿多诺对德语当中"外来词"(Fremdwörter)重要性的评述极为相似。他描述了孩提时代他是如何喜爱这些词汇"来自疆界之外和富有侵略性的"个性，这些词成了他逃离那段德国沙文主义岁月的避护所。他说：外来词(Fremdwörter)"构成了赢弱的细胞，抵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民族主义"(引自莱文，1985:115)。并不令人吃惊的是，纳粹尽其所能，将这些外来词从文化中彻底铲除了，目的是为了保护母语的"纯洁性"。与此相似，凯斯(1989:166)指明，"故乡"一词曾是种族(血缘)和领土(国土)的同义词——一个要命的结合，它导致放逐或是毁灭任何一个不

"属于"的人;在纳粹党统治下,"故乡"意味着残忍地排斥任何"非德国的"事物。

赖策曾指出:"在德国,我们的麻烦在于我们的经历遭到……历史的阻碍。1945年,一切从新开始,抹杀了以前所有的事物。它就像人们记忆和情感中的一个豁口"(引自兰沃德,1985:125)。他这样写道:

> 挡在我们路上的正是我们自己的历史。1945年这个国家的"零时"彻底摧毁了人们的记忆并打开一个豁口……全体人民曾经"不能够感到痛心"……不能够讲故事,因为我们的记忆受阻……我们仍旧担心我们个人的经历会唤起我国的纳粹史并提醒我们记起我们都集体参与到德意志帝国之中。
>
> (赖策,引自《城市里》,1985年2月15日:11)

于是,有人指出,在战后,"德国"("Deutschland")变成了一个无法表述的实体:

> 法西斯,那场战争……战败以及之后的情形……在失去祖国"权利"的情感当中……产生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甚至于语言也不再能提供个"家"了。甚至德国战后的形象都是这种被根除的一部分。比如说,美国的象征是白宫,英国的象征是白金汉宫……,法国的象征是凯旋门……然而德国的象征(常常)是它的分裂,尤其是柏林墙标志着家缺少确定性:分隔、驱逐、流放。
>
> (查默斯,1984:93)

可以说，在《故乡》大获成功之前，西德艺术电影的观众（比如，他们对贝托鲁西的《1900 年》或塔维阿尼（Tavianis）的《老板父亲》的热情）以平实的怀旧方式过分认同邻国的艺术电影，已经弥补了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自身历史和农民文化形象的缺憾。事情的另一面是：

> 1945 年之后，好莱坞进入辉煌时期，因为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展现邪恶的纳粹，而在以前他们表现的斗争对象还不得不是整个有限的节目中（老套）的反派角色。但事实上并不存在邪恶的化身。纳粹党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普通：在特殊时刻……他们充当纳粹。
>
> （赖策，引自《城市里》，1985 年 2 月 15 日：11）

在此过程中，“纳粹德国”或者说“德国”随时就成了一个没有定义，仅仅是表面上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罪恶——恶魔似的存在——的密码。那场战争的真正恐怖给回避掉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消除了。正如汉斯·马格努斯·恩策斯贝格尔曾评述的，这“不过是将‘德国’归属玄学存在的又一个变形而已——只是这一次它带有负面含义……它不像以前那样是善，现在是绝对的恶，这是依生物学参数或种族参数来界定的”（引自盖斯勒，1985：32）。

为何欧洲是这般模样?

> 德国的问题在于它太大了并且处在错误的位置。
>
> （汉斯·马格努斯·恩策斯贝格尔，1992）

由《故乡》惹起的围绕着"家"和"祖国"的概念的辩论现在当然也得在变化了的背景下去看待，即戈尔巴乔夫号召构建"共同的欧洲家园"以超越冷战时期欧洲的分裂，这一分裂最具戏剧性的表现是德国的分裂。我们已经谈过，关于谁应该拥有特权讲述德国往昔的辩论跟关于谁应该有权决定德国未来的辩论有许多相似之处。时下涉及该国重新统一的辩论在我们的论述中必然占据中心位置，特别是在**改革**（*译者注：原文为俄语* perestroika。）和**公开性**（*译者注：原文为俄语*，glasnost。）的背景下，现在，"欧洲"这个概念本身在地理意义上变得不再鲜明了。

宗教问题和种族问题也潜藏于对欧洲和欧洲文化的界定之中。随着冷战秩序的崩溃，我们现在看到重申宗教既是文化认同的支柱又是作为"文明"世界成员的标志。在这方面，因土耳其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而引发的辩论为认识这些麻烦问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洞见。

土耳其这个问题从一个层面上说很简单。一方面，由于土尔其是北约成员国，它占据着位于欧洲边缘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一块面积不大却意义非凡的三角地，拥有"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又译凯末尔）遗留下来的现代世俗制度，所以乍一看它非常有理由成为欧共体成员国。另一方面，存在一系列复杂问题，涉及贸易壁垒、廉价土耳其农产品（而且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对现有成员国的潜在冲击，当然，还有常谈的土耳其人权问题。然而，我们的意思是，根子上有样非常本质性的东西面临着危险：即，在当代论辩里所界定的"欧洲"与过去常说的基督教世界是否拥有共同空间范围的问题。或者，换个角度来说，能不能把一个（尽管已世俗化了）伊斯兰国家完全接受为欧洲的一份子？试想在历史上奥斯曼帝国代表着差异和威胁（而且实际上是令人畏惧）的形象，欧洲相对

于它来界定自我。再试想，今天的欧洲共同体是由整个欧洲信奉基督教的官员（实际上是天主教徒）建立的。

的确，近年来许多欧洲人看待伊斯兰世界时的焦虑和怀疑态度显著增强。我们可以看到，对待穆斯林的种族敌视模式正在整个欧洲逐渐形成——以英国的拉什迪事件，在德国对土耳其移民工人和在法国、意大利对北非移民的暴力和敌视这些复杂的方式表现出来，格外引人注目。有人可能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分子和黎巴嫩扣押人质者的形象、整个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形象全都在大众媒体里聚拢起来，造成了自 17 世纪以来人们感到的最强大的“伊斯兰对欧洲的威胁”。法国发行量很大的一份新闻杂志《问题》头版报道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搞“我们门口的圣战”的情况，这篇报道尽是讲穆斯林“危险”及其对法国民族认同的“威胁”。法国民族前线党领导人让－玛丽·勒潘声称贞德是激励他的榜样。位于安卡拉的土耳其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讲得非常直白：“在欧洲，许多人视我们是新版的奥斯曼帝国，这次是由客籍工人和恐怖份子发起进攻”（引自《新闻周刊》，1990 年 5 月 21 日）。可以认为，伊斯兰世界现在是第三世界在欧洲面前的主要表现形态，而且，在欧洲，南北划分一直主要是刻划在先前就存在的基督教－穆斯林分界线上。爱德华·赛义德指出：“西方这个概念……主要根据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对立面构成”，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世界一直处于欧洲的门阶上。……伊斯兰世界是惟一一个从未完全消亡的非欧洲文化。它就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近旁并与它们一样承袭着一神教的传统。所以才有这接连不断的磨擦”（1992：111）。

然而，事情还不仅如此，这两极的关系，或换言之，这种关系的重要意义已经因当前东西方关系的变化而发生了位移。

正如爱德华·莫蒂默(1990)指出的,心底深藏的对欧洲认同(和基督教在定义欧洲认同当中的中心地位)的焦虑之情被冷战驱赶到了地下。那时,斯大林的帝国给欧洲提供了事实上的东部疆界。在此期间,只要不是“共产党的”就是“西方的”(即,欧洲的)。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和当时的战略要地,它的欧洲认证书毫无疑问地被认可了。许多土耳其人的确认为其北约成员身份证明了其西属的地位。但是随着苏维埃集团垮台,所有这些现在都打上了问号。中欧和东欧正重申其认同大部分是基督教的。欧洲顿时感觉需要重建其新的精神边界。而且,当欧洲重新界定自我之时,谁将被排除在外的问题——也就是说,界定“欧洲”认同时跟谁或是什么来对照——又被重新摆到焦点位置上。土耳其突然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同了,这时它的欧洲认证书已经大大贬值。

似乎这里无处似家园——而且显然在那种家园里没有给某些希望定居的人留地方。我们共同的欧洲家园尚待建造:但是我们给自己讲述的我们共同的(和非共同的)往昔已经正在使我们形成关于这个家园应该怎样建的想法,它应有几层(有给仆人的地下室吗?),它该面朝那个方向,谁该有门钥匙。

“边界线正将穿过我的画廊”

鉴于德国在当今欧洲转型当中占据着特殊的战略意义和象征意义,我们的论述已经从各个方面集中关注了这个国家。德国再次成为欧洲的问号。德国曾一分为二,而且这一划分还标示着欧洲东西两半的割裂。现在那座分界墙已经被拆除:过去固若金汤的东西显然已经灰飞烟灭了。“德国正在伸展肢体”,就在11月9日打破柏林墙之前不久廷斯·赖克

这样写道：

> 联邦德国正像蜕去干皮一样摆脱地理的桎梏。民主德国正冲破意识形态上的紧箍咒，大概所做的这一切能令它的存在合法。是重新统一还是组成邦联，是并吞还是构成单一文化国家？——这些都同样令人担忧。邻国都提高了警惕，想方设法让能酿成毒药的这两支配剂保留在各自的容器里。阀门上的压力见涨了。
>
> （1990：122）

现在这两支配剂已经直接接触了。这一过程中将提炼出什么样的混合物呢？如果直到前不久德国一直被视为一种“后民族”社会的话，那么有关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的问题便再度登上政治议事日程。经过40年分裂之后，时至今日，做一名德国人意味着什么？现在什么是“德国的”？过去边界线正好穿过德国认同，而现在这条线已经消失了，德国跨越空间并跨越时间重新遭遇自我。拉尔夫·达伦多夫（1990：23）描述了一种历史“相似”（译者注：原文为德语，doppelg¨nger。）效应：西德人现在必须目睹折射在身上的自己的往昔、自己的历史；而东德人在面对自己未来时感到一片混乱、无所适从。现在谁是“我们人民”呢？

如果重新统一唤起防御性排它主义的民族主义，那将是场悲剧。如果以封闭的社会群体观来重新建立德国认同，并在那些属于和那些不属于的人们之间划定边界线，那便是次挫败。“德国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一个民族”，这些是在卡尔·马克思广场上的柏林歌剧院外人们反复呼喊的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家园。在埃德加·莫林看来，民族主义情感与

幼儿对家庭的依恋同出一辙。他认为,国家既是母亲也是父亲:"子孙们应该珍视并保护的正是祖国(译者注:原文为法语,mère - patrie,祖国母亲。)这位父亲—母亲(maternal - feminine)。号召拿起武器、负起职责的正是正义的支配性权威这种家长式统治和强力"(1990:30)。莫林指出,这种复杂的效忠,这种"母性爱国精神"表现在强烈的根的意识、从属于家和祖国的意识(法语原文:"un sentiment très fort de la patrie - foyer〈故乡、家〉,toit, maison, 对祖国、家、住所格外深厚的感情")。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祖国:共同归属,拥有共同的缘源。"我们人民"相对于不属于我们、有着不同缘源的"他者"而界定。

正如我们已经长篇论述过的,德国家园的问题一直是联邦德国近期文化论争的一个核心主题。在"德国新电影"的核心处,认同问题和对起源的探求集中围绕着家庭主题、同(不谋其位的)父亲破裂了的关系和对母亲形象的强烈依恋之情(埃尔萨塞,1989)。在许多人看来,这样做一直是为了试图找到回家的路;一直是为了变得符合德国文化和认同。故乡这个浪漫的乌托邦,因其内涵着记忆中的所有往事和渴求,一直是为了与民族遗产和历史重新接上轨。然而,另一些人觉得问题复杂得多。民族完整是个虚无的理想;一个民族是个不真实的乌托邦。尤其是温·温德斯的电影一直是表现那种似乎是现代化条件所必然表现出的无家可归的状态。温德斯的作品唤醒了"日益被剥夺了记忆或自我反省的表层世界,这个世界里幻觉和现实交错缠绕,认同的概念淡漠,以致于似乎不再有可能讲述某人的故事了"(卡尼,1988a:324)。他的电影没有轻易地求助于缘源、根性和真实性的保护。正如托马斯·埃尔萨塞曾经指出的,温德斯关注的是旅行、跨越边界、流落他乡、内部同外部的关系。尤其是通过他与"美

国"的关系，他所试图探索的是差异、他性和疏远这样的现实。对温德斯而言，不存在家园和祖国这样的乌托邦：

> 意思是，(我的主人公们)虽然不在家却感觉他们自个儿就是在家了。换言之，不在家意味着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有在家的感觉。……或许说认为当人外出时感觉状态更佳纯属个人看法。……认同意味着无需必须有个家。我认为，意识与不在家有些关系。对任何事物的意识。
>
> (引自埃尔萨塞，1985:48)

外出、不在家，这便是温德斯所追求的。

当然，不在家是现代社会芸芸民众和民族("不自愿的四海为家者")永恒的命运。这便是那些成百万计的所谓的**外国人**(译者注：原文为德语，Ausländer。)或**外籍人**(译者注：原文为德语，Gastarbeiter。)的状况，他们在德意志的祖国内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正如鲁思·曼德尔强调的："德国遭遇显眼的他者的历史很悠久。要将'他者们'吸纳入德国的公民集团(译者注：原文为德语，Volksgemeinschaft。)，长期以来一直困难重重，因为这样做公然抵触了德国人对认同的基本认识"(1989:37)：过份外国化(überfremdung)一直被认为是对民族完整和民族文化的威胁。现在居住在德国的150万土耳其人恰恰成了惹眼扰人的"他者"。如今在德国，"我们人民"是相对"伊斯兰他者"来界定的。问题是，德国是否能与这些"内部的伊斯兰"达成妥协，还是基于排除性种族主义来设想这个新的国家。这个问题也是指德国能否理解它不是一体，永远不能是一体，因为它是多元的，因为它包含了很多民族，即种族渊源不同的各族德国人。

必须承认，如果说德国是某些人的家园，那么它同时也是另外一些人的流落地。必须认识到故乡与异域的关系。如果故乡指的是安全和归属，那么异域唤起的是孤独感和疏远感。异域是"分隔、苦楚、丧失、思乡、失去归属感的同义词"（苏尔，1989：72）。德国——现实中的而不是想像中的德国——同时既是故乡又是异域。它是否有可能服从这条关系真理，而不是逃避到舒适的故乡这个绝对中去？它是否有可能容忍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扎费尔·泽诺卡克（Zafer Senocak）在《双面人》一诗中这样写他的德国：

我身上有两个世界
但哪个都不完整
它们血流不止
边界正好
穿过我的口腔。

（引文出处同上：102）

有关今日德国——以及欧洲——文化和认同的根本问题正是这样的经历。而且我们或许能构建更有意义、更复杂的同一体正是来源于这种（无家可归与家之间的）张力。正如扎费尔·泽诺卡克所述："分裂能够产生双重认同。这种认同依存于张力。人的双足学会同时踩在河两岸行走"（出处同上：103）。

我们已经论述了家和祖国这些形象，最后讲到无家可归的现实。论述重点集中于德国家园这个概念，以阐明故乡在整个变化中的欧洲所享有的巨大魅力。不管是从国家层次的家园、地区层次的家园还是共同的欧洲家园来说，动力都是感到需要一个有根、有范围、完整、真实的同一体。而故乡是幻

景、错觉。正如埃德加·赖策承认："故乡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人们越来越走近它，就会发现就要到达的那一刻它不见了，它已化作虚无"(引自伯奇尔，1986:5)。这是种危险的错觉。家乡根植于不容忍差异和害怕"他者"的情感，这时种族主义和恐外情绪的核心内容。

我们的看法是，现在欧洲文化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议题是，欧洲文化是否能向无家可归的环境和体验敞开大门。温·温德斯提出的那些疑问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能不能在没有家或是说无需非要有家的经验基础之上设想一种同一体、一种意识呢？我们能不能视家为必然暂时性、常常是相对的现实呢？理查德·卡尼在写现代爱尔兰文化和认同时描述了其多元复杂性和明显矛盾：

> 那么多现代爱尔兰作家曾谈到在依对立的效忠关系而划分的两个世界里转换，这一点很引人注目。他们经常以想像中的**移民**的口吻写作，传达出既属于又不属于其文化，脱离了他们归属的根本传统，即便在家时也觉得在流落着的感情。
>
> (1988b:14)

这种转换的体验也正是此文化的本质所在。卡尼指出："当代'无家可归'的意识，即复古主义寻求通过恢复失去的祖国来医治的东西，成为现代主义当中不仅是爱尔兰文化而且是世界文化不可改变的状况"(出处同上)。

不能够恢复真实的文化祖国。在日益以流落、移居、移民社群为特征的世界里，由于动荡和混杂带来的一切后果，不会有哪个地方符合绝对的纯正和真实。在这个世界里，不再有哪个地方似故乡。对于现在欧洲诸文化群落和同一体而言，

更重要的是移位和变迁的体验。萨曼·拉什迪(1982:19)这样写自己的体会:“有时候我们感到骑在两种文化之上,而其他时候觉得两头都落空了”。最重要的是容忍这种断裂和矛盾态度并利用它。同一体必须靠这种张力生存。我们双脚必须学会同时踩在河两岸行走。

第六章

传统与转变

——全球背景下的民族文化

既然我们曾经能够坚信"传统"带来的慰藉和它的延续性,那么今天我们必须面对文化转变的责任。

(霍米·巴巴,1989)

本章谈变化中的地理——尤其是正在塑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全球化势力——及其对当代英国经济文化生活的意义。我们认为,正是在全球背景下才有可能认清过去的十余年里出现的企业文化(enterprise culture)和遗产文化(heritage culture)。同样是在此背景下,帝国问题这个长期以来英国民族文化和认同的核心现在有了新的意义。

传统与转变

近期关于英国文化和社会状况的论辩倾向于集中在传统的影响力上。对英国（或者是英格兰）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所面临的危机的叙述都讲到了帝国崩塌之后出现的文化幸存主义一系列盛衰变化。正如拉裴尔·塞缪尔在描述“传统”的病症时指出的，国籍观念死后灵魂的生命力尽管在走下坡路，但仍旧强壮，而且“那些正在休眠，但当危机出现时便复活的意念——比如，害怕被外来入侵‘击败’——证明它依旧强大”（1989：xxxii）。查尔斯王子论企业与遗产的激情演说的核心正是关注英国传统的历史与未来。他的意思是，能够在新的企业文化之上成就“英国的新一轮复兴”；以责任感和远见为特征的新商业特质能够重建社会群休的历史意识并使英国再度成为世界性角色。依査尔斯王子的“个人看法”，还需要重振我国富饶的民族遗产，让它再展迷人魅力。正如帕特里克·赖特指出的，威尔士王子一直对“本国战后历经的最严重的瓦解和挫败”十分敏感（1989：27），王子祈求所谓的传统的精神价值观念仍是意欲恢复在现代或者该说是后现代时期一塌糊涂的英国社会群体意识和信心。

这样普遍关注历史传统和认同带来的慰藉和它的延续性，折射出对英国落魄的狭隘、自恋式反应。巴里·理查兹在从精神分析角度描述早期人类发展时讲了自恋为全能的心态。这指的是：

> 如果我们对自身环境与生俱来就全然无助，那我们便会产生焦虑情绪，而自恋为全能的心态是能替代这种情绪的保护性错觉。当我们已经确信这是

令自身弱点不会造成灾难的非常有利的东西，并对自身日渐强大的独立运作能力有了一些信心时，我们就能够不带着帝国错觉看待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摒弃它。

(1989:38—39)

我们要指出，保护性错觉也是今后帝国时代迫切构建企业文化和遗产文化的核心。我们想思考的真正疑点是关于面对(幻想中的和实实在在的)帝国错觉。这是指识别从帝国和帝国冲突中派生的排山倒海般的焦虑与洪水猛兽般的恐惧。如果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稳固的幻想破灭”只有“通过与外部现实的他性多次激战”(出处同上)才能达到的话，那么在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领域里，就需要我们认识其他世界，不抱幻想地承认其他文化、其他认同和生活方式。

这便是我们对霍米·巴巴讲文化转变的责任的理解。这指的是认真对待“我们与他者——其他文化、其他国家、其他历史、其他体验、传统、民族、命运——的关系这个深层次、极度混乱且扰人心烦的问题”(赛义德，1989:216)。这种责任要求我们顺应对于爱德华·赛义德所说的“西方世界的文化结构”具有重大意义的地理布局。他指出：“要是在空间的生产以及获取、隶属、定居当中没有重要的哲学和想像工作发挥作用，”我们就不会拥有帝国，“以及诸多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和现代法律体系”(出处同上:218)。帝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文化和想像的灵魂，它透过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偏执以那么点儿恶毒的形式表现出来。英国与其“他者”的关系是思考出现企业文化和遗产文化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内容。问题是，在当今所谓的后帝国时代里，英国是否有可能把这个世界当作不让其弱点造成灾难的非常有利的地

方。拉什迪事件清楚表明，这个疑点并不简单，因为“当试图在不同文化、语言、社会之间调和时，常常有解释错误、混乱、恐惧的危险”（巴巴，1989:35）。甚至更可悲的是，有拒绝转变这种可怕的危险：威胁要退缩回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和无望实现的强化帝国错觉中去。

地理的构成

地理常常很重要。许多人认为，地理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比如，爱德华·索亚（1989:1）就指明，我们现在正目睹着新的后现代地理的形成。他还指出，今天，“或许与其说是时间倒不如说是空间在我们面前掩盖了因果关系，与其说是‘历史的构成’倒不如说是‘地理的构成’提供了最发人深省的战术和理论世界”。在随后几节我们想探讨形成企业文化和遗产文化的空间背景。

地理格局变动显然是当代经济文化转型的核心。然而，如果存在地理后现代化现象的话，那么其组织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将如何理解这些复杂的空间动态呢？需要认清代表着新地理舞台特征的相互对抗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在此基础上，我们便能开始探讨文化和认同的内涵了。特别是，我们能够思考这些新进展对于地理布局的重要意义，爱德华·赛义德认为地理布局完全是西方统治的核心。它们有可能强化、重组、或许甚至是解构帝国的地理布局吗？我们主要关心是否“地理的构成”能指“地理的再构成”。

显然，现在正通过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进行地理转型。这一直与民族国家不断变化的角色相关（尽管仍尚待弄清楚它现在转型的确切意义）。与此同时，超国家集团（如欧共体）和异军突起的次国家领土（指地区和地方）已得到巩固。

国际经济秩序重组也已改变了城市的性质和作用,造成城市管理机构同跨国企业新的直接交锋,令城市间展开紧张激烈的全球性角逐以吸引更多的流动投资者。它创造了新的中心和边缘地带,还有新的领土等级体系;形成新的相关环境和布局。比如,现在地区在"诸地区构成的欧洲"内呈现出全新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全球环境:"地区区分在国际而不是国家的层面上越来越组织有序了;次国家地区越来越让位于全球经济区"(史密斯,1988:150)。

这一国际重组的进程不仅令空间经济,还令想像空间发生变化。领土改变了,认同的空间同样也改变了。(尽管它们的半衰期长且有效力,)但是民族文化和认同已变得更加棘手。许多人认为,纵然这里在铲除殖民主义的遗迹方面确有困难,纵然中欧、东欧近期发生的事情提出了有关欧洲真正意义的问题,但欧洲文化仍提供了另一种更具挑战性和世界性的选择。也要重新评估地方文化和地区文化(这一点在遗产业的发展中十分明显)。并且,现在又重新强调领土位置是认同、社会群体、持续性的支柱。

我们将在随后几节中指出,这些复杂的经济和文化转型背后的组织原则是逐步升级的**全球化**逻辑。也正如我们随后将阐述清楚的,更确切地说,所谓的地理后现代化是指出现一种新的**全球—地方**关系。当然,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总是竭力要形成世界体系。永恒追求最大限度的积累总是驱动着地理扩张以寻求新的市场、原材料、廉价劳动力来源等等。贸易和移民、传教和军事征服、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历史标志着截至20世纪后期令资本主义成为真正全球势力的不同战略和阶段。如果说该进程导致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控制市场,那么它当然也给政治文化带来深刻影响。尽管全球资本主义自我表现的是跨越历史和国界,是杰出的世界性现代化

和现代性势力，但是它实际上一直是指西方化——出口西方的商品、价值观念、优先权、生活方式。在不平等的文化交锋过程中，“外国”人被迫当了西方帝国的属臣，然而，同样十分重要的是，西方世界与其“他者”的“奇异的”“异域”文化面对面了。当全球化消除了距离的障碍，它就令殖民中心与被殖民的边缘地带的交锋一触即发、激烈紧张。

全球积累

必须在已经全球一体的经济体系背景下看待企业文化和遗产文化。全球积累有什么新鲜、独到之处？它与先前的经济国际化形式有什么区别呢？全球化指的是在全球范围组织生产和开拓市场。它当然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至少是自（成立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时起，这便是大企业的核心梦想与渴望。我们现在正目睹的仅仅是大踏步地实现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全球集中这一长期历史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仍旧是国际经济的关键塑造者和引导者，而且全球化进程的首要动力正是因为这些公司的行为更加广泛、深入地一体化：“规模大就是力量”的情况保持不变，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正目睹着继续不断力求战胜国界，夺取、协调资本投入，获取在全球范围的优势地位。

但是，如果说这一进程明显是指巩固企业的指挥和控制的话，那么就这方面来说，事实上我们现在正目睹的仍是企业战略和组织发生重大改革和创新。现在，以国家为中心的跨国公司的局限性日趋明朗，走在世界前沿的公司正寻求根据全球化的哲学和实践将自己重建成“灵活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现在必须在世界舞台上运作并竞争质量、效率、产品花样、精确的市场判断力；必须在所有市场同时而不是相继运

作。全球性公司正越来越卷入以时间为基准的竞争当中：它们必须缩短创新周期；工厂的制作过程要减秒夺分；加速销售和消费时间。全球竞争推进了时空压缩。全球化还指出现无中心或是多中心的企业。正如商业咨询人士凯尼奇·奥梅指出的那样，全球运作要求真正的"视角等距"，以对待本土市场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注意力对待所有战略市场。他认为在日本、欧洲、北美开展业务的本田公司就是个范例："该公司的经理层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不给公司划分日本业务和海外业务。事实上，在本田公司的词汇表里就找不到"海外"这个词，因为该企业从一切重点客户出发等距离地看自己"（奥梅，1989：153）。

整个这一过程都与围绕着"全球产品"的企业哲学联系在一起。通行的消费者主权的观念认为，当人们获得了拥有全球信息的权利，他们便提出全球性需求并要求得到全球性商品，继而成为"全球公民"。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莱维特（1983）在其颇有影响力的《销售想像力》一书中颇具说服力地指出，现实新情况指的是全球市场和世界标准的产品。这当然不仅仅是大规模生产战略的延续，这类战略总是在市场扩张的基础上寻求规模经济。过去的跨国公司做这项努力的方式是在数国内运作和让产品满足不同国家的偏好，然而今天的全球性企业运作时似乎整个世界（或世界的主要地区）是单一、大体同一的实体；它在各地以同种方式生产、销售同样的东西。莱维特写道，全球企业超越了残留的国与国差异，力求将全世界当作少数几个标准市场，而不是许多符合顾客要求的市场来对待。

当然，这其中存在鼓吹和夸张的成分。过分强调产品标准化和品味同质化的趋势一直存在。但把这种走全球化的观点仅仅当作广告业又一时的狂热或时尚而不加认真思考，也

是错误的。事实上,莱维特的立场比通常人们所理解的要更复杂、更细致入微。他认识到全球性企业实际上的确承认各自不同的市场并且按照不同的市场环节度身定作。然而,关键在于这样做是与寻求机会销售到全球相类似的市场相结合的。萨奇公司在泛地区及全世界的营销战略就吸纳了同样的见解。该公司有条著名的座右铭,说曼哈顿市中心与布朗克斯区的社会差异比曼哈顿与巴黎第七区的社会差异更大,这说明根据人口学和习惯而不是根据地理接近性来确定消费对象越来越重要;营销战略由"消费者驱动"取代了"地理驱动"(温拉姆,1984)。这种打世界品牌的经济原理的核心仍是满足规模经济这一压倒一切的需要,或者更精确地说,在全球范围满足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即,结合产量生产和种类生产——的需要。

全球化还要求大大改变企业行为;灵活的跨国公司必须采用跟过去的多国商行截然不同的方式竞争。在永远持续创新的世界里,在这个必须将跨越全球和迅速、甚至是瞬即做出反应结合起来的世界里,全球企业必须精干且善于应变。为了确保竞争地位它必须确保在全球的存在:它必须"同时遍地都有"。这正令企业战略发生重大改变,大量实现的行为主要有兼并、收购、合资企业、联营、公司间协议和各种各样的合作。目标是将移动性和灵活性同在全球范围对行为进行控制和一体化结合起来。全球性企业寻求将自己定位在"既紧又松"的网络上:紧得足以确保与外部合作者交易时具预见性和稳定性;松得足以确保机动性甚至逆转能力,足以在必要时允许重新调整行动方向和重新划定组织界线。

实际上全球运作意味着时空骤然压缩。全球生产和营销依赖大大提高"存在有效性"("presence - availability"),而新的计算机通讯系统使之成为可能。全球性企业在电子传播网

的基础上，围绕着新的信息流动空间组织其行为。通过利用这些新技术，不是以各不相干的职能部门组成的集合体，而是以有系统的连续体来组织企业行为。通过这一控制论的抱负，“网络式公司”力求把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协同运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无中心的非领土化的企业将早先的物理地理和社会地理转变成新的抽象的电子空间。通过创造新的空间层、网络地形、电子地理实现全球化（罗宾斯和赫普沃斯，1988）。这些电子网络的战略中心是纽约、东京、伦敦等“全球性城市”这样的金融中心和摩天堡垒。这些世界性城市是全球经济的指挥控制中心。

全球文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总是深刻影响到文化、认同、生活方式。经济活动全球化现在与新一轮文化转型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结合了起来。这在一个层面上是指制造世界性的文化产品——这一过程当然已经推进了很长时间。新文化业相信——用萨奇公司的话讲——“世界文化趋同”；相信全世界各部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文化、行为趋同。《达拉斯》、《蝙蝠侠》等影片的成功和迪斯尼乐园等旅游胜地似乎证明这样的信念是正确的，即坚信要出现“共享文化”和共同的“世界意识”。欧洲迪斯尼乐园园长称，迪斯尼人物是世界性的。他指责道：“你们试图让意大利孩子确信 Topolino（意大利语里的米老鼠）是美国老鼠”（沙穆恩，1989）。

文化业的全球标准化同在广大的经济领域一样，当然也反映出获取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的干劲。更确切地说，这是指通过在全球范围瞄准习惯和品味相同的那些市场份额，而不是依据地理接近性向不同国家的受众销售，从而达到规模

经济和范围经济。全球性文化业正越来越被迫在最大市场基地、在泛地区和全球市场上弥补其迅速上涨的成本。驱动它们的恰是正在整体上重新塑造经济的那个全球化逻辑。

新的做世界性文化的商人渴求没有边界的世界。英国天空电视网将节目发射到"没有疆界的世界";卫星覆盖面突破了过去完整的国家领土。随着文化全球化,文化同领土的联系明显断裂了。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的一位代表是这样描述该现象的:

> 经济全球化已经造成了文化和社会革命。美国的蓝领工人受到的影响跟莫斯科的党派领袖或是东京的主管人员受到的一样。这意味着我们对美国所做的事在美国以外也有效力。我们的新闻是全球新闻。
>
> (引自弗雷泽,1989)

正在被创造的是新的电子文化空间,是"无地方特性的"图像地理和虚拟地理。这种全球多维空间的构成反映在后现代思想体系里,尤其跟博德里拉尔和维里利奥等作者的思想有关。例如,博德里拉尔提出由流、图像、屏幕构成的世界造成了迷惘、迷失方向、妄想。这个新的全球文化舞台是个瞬时、不分深浅的通讯世界,是空间和时间的领域被压缩、坍塌了的世界。

这一世界性文化空间的缔造者是新的全球性文化企业。在机遇众多、成本渐涨的环境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的便是规模与权力的关系。我们正目睹文化业承认规模的优势,而且同样在这一领域里正大量出现兼并、收购、战略结盟。最具能动性的企业正迅速重组,以确保在整个世界市场对一

系列文化产品实施战略控制。最典型的集团无疑算是鲁珀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了，该公司已经迅速地从以报业为基础转移到视听业。默多克通过收购福克斯广播电视公司，20世纪福克斯公司和天空频道，力争参与到制作销售的一切环节。然而，最有象征意义的全球性媒介集团是索尼公司。索尼已经从起初搞消费电子硬件，通过收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又兼营起文化软件。索尼—哥伦比亚—CBS 联合组成传播巨业，一个"全方位娱乐公司"，其长期战略是利用对硬件业和软件业的双重控制以主宰下一代视听产品市场（阿克索和罗宾斯，1992）。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索尼公司不仅预示了它们将达到的规模和势力范围，还有它们渴求成为无国籍、"群龙无首"、无中心的企业的事实。这些全球性文化企业明白，在视角上与自己的整个受众群和消费者达成真正的等距离，或者说同等存在，这十分重要。

如果说开创世界标准的文化产品是一项关键战略的话，那么全球化进程便更加复杂多样。事实上，不可能消除或超越差异。这时候等距离原则同样占主导地位：资财丰饶的全球性集团利用地方差异和特质。文化产品从世界各地汇聚起来，转化成面向新的"世界性"市场的商品：世界音乐和旅游业；民族传统艺术、时尚、烹饪；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和影片。把地方性和"异域的"东西从时空中剥离出来，重新包装，迎合世界集市。所谓的世界文化或许反映了对差异和特质的新估价，但它也的确是要从中获取利润。西奥多·莱维特（1983：30－31）解释了这种种族特性的全球化。他的意思是，种族市场在全球增加是各市场板块全球标准化的一个例子："到处有中国菜、空心圆面包、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比萨饼、爵士乐。全球到处遍布带种族特征的事物，这标志着特色

品的世界化。再说，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板块的告终。相反，它意味着这些板块扩展到全球范围"。现在该轮到把非洲音乐、泰式菜肴、土著绘画等等吸纳到世界市场并变成世界性的特色品了。

1989年，让－于贝尔·马丁在蓬皮杜中心举办的展览《地球魔术师》曾是文化全球化新气候下高雅艺术领域的一支十分有趣且非常重要的晴雨表。马丁在展览中汇聚了来自全世界100位艺术家的原创作品：不仅有来自欧美这样的主要艺术中心，还有来自海地、尼泊尔、扎伊尔、马达加斯加这些"边缘地区"的艺术家。该展览汇合了高雅艺术学说和人种论学说，于是将欧美先锋派作品与第三世界"原始派艺术家"的作品并接起来。马丁推出这次"真正全世界当代艺术的国际展览"，目的在于探究西方文化同其他文化间的"假性区别"，"展现不同文化的真正差异和特性"，给西方文化群落同其他文化群落"创造对话"。《地球魔术师》使"世界艺术"成为现实。艺术文本和手工艺品被从其原本的背景中提取出来，然后重新插入到新的全球背景中并重新阐释。全球博物馆是个没有中心的空间：马丁采用了"等距离视角"，每样展品与其余所有作品进行平等对话，根据其差异和特性来进行评价。

《地球魔术师》所表明的是否不仅仅是将新产品吸纳到国际艺术市场呢？用科科·富斯特的话说："在我们现在这样的时期，是什么使得种族特性焕发魅力、畅销热卖呢？"(1989:13)。为什么它与时代产生如此强劲的回响？一方面，这项活动的确令人兴奋，富有挑战。这种世界主义比狭隘僵化可取。看到多姿多彩的文化并存，的确马上让人感到愉悦兴奋。但是这个展览拨动了深重的心弦。《地球魔术师》全神关注第三世界艺术的"魔力"和"灵性"，试图揭示西方文

化中必有的空缺，精神的真空。当然，这种西方以理想化方式表现的“原始性”和“纯洁性”，这首歌唱“他者”的浪漫曲当中有些地方很令人生疑、难以捉摸。这个展览压根儿没有正视或是解决这方面的不足。尽管如此，此次展览即使说没有给予解决的办法，但也的确提出了有关文化认同的本质和有关文化认同与“他性”关系的重要问题。我们现在该如何将自己定义为西方人呢？那么这种西方认同如何与世界上的“他者”、非西方的同一体和睦相处呢？

如果说在全球范围收集、流通艺术品造成了文化群落间新型交锋和碰撞的话，那么还有更直接、更瞬即的交流和冲突。长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从第三世界卷来大量的移民和难民来到第一世界国家。过去欧洲是隔着老远谈论非洲文化和亚洲文化，然而现在“他者”已经落户西方宗主国的腹地了。边缘地区以一种逆向入侵，浸透到了殖民统治的心脏。时空的保护性过滤层消失了，现在同“异类”和“外国事物”的交锋一触即发。西方城市成了个世界诸文化直接接触的熔炉。正如尼尔·阿谢森所指出的：

>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移民至欧洲的历史似乎是增加限制、减少配额的历史。然而当将该历史快进加以审视后，发现其实相反：这是从南方不发达国家向欧洲历史性移民的开端，这场移民已经夺取了第一个决定性的桥头堡。
>
> （1990:17）

这场移民正在打乱往昔那“白人‘基督教徒的’小欧洲”。由于这场对帝国的入侵，旧有殖民秩序确定的中心观给搅得混淆不堪了。

时间和距离不再介入同“他者”文化的交锋。这一全球化的戏剧性场面在以拉什迪事件为核心的西方“自由主义”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碰撞中得到活灵活现地体现。我们如何应对冲突带来的震撼？或许这便是“压缩时空”时代里的关键政治议题。一种危险是我们缩回到壁垒森严的认同里。另一种危险是，我们在焦急地找寻安全稳定的认同时，将(宗教、文学、哲学)那些本不是直接政治性的活动政治化了。转变的责任意味着学会倾听他者，学会向他者讲话，而不是替他们讲或是谈论他们。当然，这说起容易，做起却不那么简单。认同的等级制度不会马上消失。事实上，庆贺、承认“差异”和“他性”这种举动本身或许会掩盖更加微妙、隐伏的权力关系。马丁在《地球魔术师》的展览会上将世界艺术公开展示出来，或许这不正是代表了新的更厉害的西方殖民主义侵占和同化吗？

全球—地方关系

全球化指的是压缩时间和空间范围，创造瞬即、深不测底的世界。全球空间是流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边界的空间。在这个全球舞台上，诸经济和文化群落陷入互相直接的极度接触——与每一个“他者”的接触(这个“他者”不再仅仅“在那边”了，而且还在内部)。

我们曾指出，这便是塑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动力。然而许多评论人士认为，正在发生某种截然不同的事情：新地理事实上是指地方和地区的复兴(参照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伦敦市政会和英国其他大城市当局的工作，以及许多美国城市为“复苏”经济而采取的类似战略)。近年来人们对地方经济和地方经济战略的兴趣骤增。将地方或地区经济当作关键的生

产单位这个问题在论"弹性专门化"的主题中已进行有力的阐发。这种观点的论证基础是"第三意大利"的经济成功(参见第二章),着重强调本土化生产综合体的核心意义和预示作用。这种观点认为,本土化生产综合体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拥有强大的地方机构和基础设施:建立在面对面接触基础上的信任关系;历史上扎根于特定地方的"生产群体";强烈的地方骄傲感和忠诚心。

地方主义在文化领域也发挥了重要角色。"争夺地盘"是当代投向城市复兴和已有环境的大多数关注的核心目标。查尔斯王子为社会建筑风格和经典复古主义所作的奋斗便是最突出、最有影响的例子。认为现代规划同搞世界化和抽象的趋势有关,而后现代主义指的是利用地域意识,指让本土的和特有的事物重新生效、焕发活力,这种看法很盛行。新浪漫主义痴迷于传统的乡土气息的主旨被看作是要重施城市魅力。反过来,这种文化地方主义反映出对在空间和时间上铭刻人类生活与认同的深切情义。人们对于生命史深深嵌刻于地域边界之内,认同和社会群体借地方记忆和遗产延续的兴趣与日俱增。凯瑟琳·库克森式传统拖裙在南泰恩赛德郡非常流行,达勒姆郡在毕米什搞的"怀旧日"活动和威根皮尔市召唤"我们过去的方式"大受欢迎便是佐证。如果说现代性创造了抽象的普遍性的自我意识的话,那么后现代性将指根植于地方特性的认同观:"它包含着有可能出现失而再兴、富于创新的人类地理,该地理是根据人地综合新情况构建的"(利,1989:60)。

虽然全球化可算是当今主导力量,但是并不意味着地方主义就不重要了。即便我们曾强调非本土化(delocalisation)进程,但该进程尤其与发展新的信息传播网有关,不应该把它看作是绝对的趋势。地域和文化的特性永远不能消除,永远

不能绝对超越。全球化事实上也跟重新本土化的新动态相联。它是指形成新的全球—地方关系，指全球空间与地方空间错综复杂的新关系。全球化就像是拼凑七巧板：将多种多样的地方插到新的全球体系这幅大图画之中。

然而，我们不应该将地方理想化了。我们不应该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地方经济、地方文化、地方认同的回报性上。把地方看成是个相关的、相对的概念，这很重要。即便它曾经同国家范畴的关系重大，但现在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赋予它意义。对全球性企业而言，全球—地方关系具有核心战略意义。用奥梨维蒂的卡洛·德·本尼德蒂的话说："面对发展成本不断上涨，全球化是惟一可能的出路"。他继续说道："商家必须在各地同时出售最新产品——因而这就意味着要在当地生产"（引自斯科比，1988）。同样，势力超群的索尼公司称其经营战略是"全球本土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副总裁J·B·霍尔斯顿三世也是坚决"支持地方主义"，并承认全球化"不光指把工厂设到各国去，还指成为该文化群落的一部分"（引自布朗，1989）。

现在人们承认，全球化需要企业置身于"地方"舞台，并了解这个舞台。但是这里的"地方"并不与任何特定的领土布局匹配。全球—地方关系指全球性企业的战略中全球化动因同特质化动因的关系，而"地方"应被视为一个流动的、相关的空间，仅仅在其与全球的关系当中且通过这种关系才构成。对全球性企业来说，地方事实上可以与地区、国家、甚至是泛地区范围的行为相匹配。

就是说，不应把"地方"（"local"）错当作"地点"（"locality"）。应该强调，全球—地方关系并没有为地点在世界经济舞台创造得天独厚的新角色。当然地方经济依然要紧。但那不是要讨论的问题。然而，我们应该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所谓

的地方自由权和"前摄性"("proactivity")(译者注:心理学术语,指回忆时先知资料较后知资料占优势。)的新能量。即便说现在地方确实越来越绕过民族国家直接跟全球性企业、世界性机构、外国政府打交道,那它们也不是在同等条件下去做的。不管是要吸引一家新的汽车制造厂还是申办奥运会,它们都以恳求者的身份出现。而且,即便是当恳求者,它们还要互相竞争:现在各个城市和地方正互相残酷搏斗,吸引四处游动、意在掠夺的投资商到自己那块地盘来。当然,一些地方有能力成功地将自己"调转"到全球网络上,但是其他的仍旧"没调转上",甚至给"拔掉了插头"。在以资本日益流动、空间迅速回收为特征的世界里,即便那些勉强搭上全球体系的地方也常常容易因投资突然撤回、与全球体系断接而被挫伤。

另外,全球一地方关系并不是直接意味着地方文化复兴。有人指出,民族文化陈旧、刻板的统治现在正遭到欣欣向荣的地方文化和地区文化发自基底的侵蚀。意思是,现代这种时期的特征表现为文化无中心化的进程和顿然复苏与地域密切相关的传统、语言、生活方式。重要的是不要贬低人们看到和感觉到的地方文化与认同的生命力。但是,又只有放在更广泛、包含了它们的进程的背景下才能认清它们的重要性。正在崛起的"世界文化"(当然还有富于活力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义文化)令地方文化黯然失色。

在某些情况里,或许恰恰是新的全球背景正以非常积极的方式重新创造地域意识和社会群体意识,从而在某些地方形成充满朝气的世界主义。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里,地方分散化或许激起对地方情感与地方认同的一种怀旧、内向、狭隘的意识。即便说全球化把文化地方主义融人新的背景下并重新加以阐释,但它采用的作法是含糊不清、难以确定的。

我们正是在这个全球一地方关系的背景下才能开始认识

过去10年左右在英国一直成长的企业文化和遗产文化的本质与重要性。下面,我们想探索当代文化转型中的两方面特征(每方面都以各自不同的角度集中到传统与转变的关系上)。

[illegible]

为什么把企业与遗产放在一起讨论呢?具有现代化宏图大志的企业文化同追溯怀旧的遗产文化真有什么联系吗?本节提出的论点是,它们之间事实上存在密切的必然联系。我们的意思是,当我们把它们单个的生长都看作是对全球化力量的回应时,这组关系的本质便很明了。接着,对这组关系的内在逻辑的洞察又有助于我们认清依我们之见是处于当代文化转型核心的矛盾心态。

企业文化是对新的全球积累环境的回应。英国资本必须适应新形式的全球竞争,学会在世界市场上运营。英国资本必须跟欧洲、北美、日本的杰出商家搞战略联盟和合资企业。在(从制药到电信、从汽车业到金融服务业)所有核心行业里,"国家冠军"正在被新的灵活的跨国企业所取代。为了提高全球效率,有必要否定过去那种"地理驱动"、以本国为中心的精粹制度,服从无地域性和等距离视角这样的新逻辑。广播电视业便是个好例子。在新形势下,单为英国受众制作节目不再可行。要认清围绕着"为了公共服务还是为了市场"的辩论,一个角度是从新一代在欧洲及全球市场上经营的视听企业替代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广播电视服务业出发。英国1988年关于广播电视事业的白皮书明晰道来:电视"将成为"以"进行国际思想、文化、体验的贸易"为重心的"日益国际化的媒介"(英国内政部,1988:42)。所有行业走这类发展

的后果都是不强调英国认同的特质。在一个需要在到处都当“本地”——具“多重本国性的”——世界里，某些旧有的民族认同真的能成为不利条件。企业文化的逻辑从本质上推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实际上，推动企业文化的常常是对英国的某些文化与传统明显心怀的恶意鄙视。鄙视的矛头直指自封的“企业部”所称的“英国文化过去反企业的偏见”。企业精神在于铲除所谓的“英国病”：据称是贬低了企业家的技能和技术的卓越本领，从而常常削弱了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的“假贵族派头的”势利行为（参见：罗宾斯和韦伯斯特，1989，第5章）。

如果说企业文化目的在于翻新、完善文化和认同的话，那么仍存在一些反作用力。全球化也得到来自截然相反的发展逻辑的支持。正如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指出的，跨国企业在全世界的流动性增强，实际上跟对特定地点的天然条件——即便是极细微的差别——更加敏感有关。他们的意思是：“空间越发无关紧要产生的效应对某些地域具有深刻影响……当代发展或许恰恰突出了地方特色”（拉什和厄里，1987：101－102）。全球性企业扫视全世界寻找有利位置，同样，某些地方被迫加入吸引对内投资的赛跑当中。城市和地方必须积极增强自身魅力并广而告之。所谓的“新城市主义”（豪泽曼和西贝尔，1987）就指的是美化地方在新的全球环境中的仪容、形象。有必要强调一个地方的国家特色或地区特色。正如马吉特·迈耶（1989：12－13）指出的，到开发“内生潜能”的时候了：“城市已经到了强调、开发、甚至制造地方（文化和物质上的）特性和优势的时候了。……在此过程中，地方特有的差异成为竞争优势位置的手段”。在此过程中将开拓当地、地区或国家的文化与遗产，以增强城市或地区的独特品质。传统和遗产是提高某些地方“生活质量”，使

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地的因素。强调传统和遗产当然对于开发充当支柱工业的旅游业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也要重视差异和特质。在正在抹杀差异的世界里，地域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place)指在全球旅游者的眼前创造鲜明的地域特色。即便是最不占优势的地域，也可以调动遗产，或是假遗产，在地域之间的竞争中夺取有利地位。比如说，当布雷福德的旅游业官员谈“创造产品”时——指围绕着“工业遗产”和“追随勃朗特一家的足迹”的主题的周末假日活动——他强调的是在无地域特性的时代里创造地域的重要性，在差异正被冲淡的世界里特色具有的更加突出的重要性(参见：佩奇，1986)。

在新的全球舞台上，有必要同时既小看又充分利用传统文化形式。英格兰东北部地区便是企业和遗产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动因如何生长的有力佐证。这两条逻辑在这一地区争夺的目标是安迪·卡普这个象征性人物。“安迪·卡普死了——纽卡斯尔还活着”(惠兰，1989)——这便是企业派的观点。此地不再有安迪或是其他像已故泰恩河畔喜剧作家博比·汤普森那样的当地工人阶级英雄的位置了。当地名人布伦丹·福斯特告诉我们：“真正的北方人跟博比和安迪都不搭界”。宣传“大北方”的运动大力强调“企业”和“机遇”，试图低调处理该地区过去的工业历史和随后工业生产能力消减的历史遗迹。20世纪80年代末，纽卡斯尔市政会雇请广告公司“J·沃尔特·汤普森公司”来改变该市形象，一劳永逸地摆脱过去那种劳工形象。该地区感到，要在新的全球背景下给自己定位，必须“重新塑造”自我形象，最终重新规划自我。日本人越来越多地占领该地区，这一状况对于此次战略认同调整发挥了关键作用。日本恰是企业文化的象征；日本是塑造新形象的泰恩河畔人的关键因素。现在人们正重新评

价该地区的历史，强调日本同英格兰东北部地区间的特殊关系。人们被告知，东北部地区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曾帮助日本迈向现代化，而今天日本人的投资将促进在战后历经了一条极不相同的道路的地区迈向复兴（康特－赫尔姆，1989）。着重强调的是，我们必须适应时代变化。

如果说企业精神是想要灭掉安迪·卡普，然而，另一个对立精神却要保持其生命力。该地区的工业历史既是其负担又是其继承的财产。显然，历史是能够做出回报的。毕米什、兼任主教的公国君主的领地和凯瑟琳·库克森乡村都是能够开发出来吸引游客和投资者等等的历史遗产。但是如果遗产走上了市场，那么就很难避免东北部地区曾经是个重工业、造船业、采矿业地区的现实。以及围绕着这些工业在这里形成的浓重的工人阶级文化。该地区很多人认为，保留当地文化和传统极其重要。纽卡斯尔河边美术馆里的摄影作品以及安伯和特雷德等制片厂的影片都十分关注工人阶级遗产。杰克·康芒、锡德·查普林、汤姆·哈德韦等作家的作品也为塑造该地区独具特色的认同作出贡献（皮克林和罗宾斯，1984；1989）。足球运动员杰基·米尔本是另一个有说服力的工人阶级遗产的代表。“小饭桶”博比·汤普森也是一样，布伦丹·福斯特认为他简直就是安迪·卡普神话的化身。这是个奇怪地无法抑制的形象，而在很多方面这也是个积极的形象。安迪和博比坚毅、无政府主义的幽默感令该地区卓尔不群，给那里赋予了积极的差异性。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详细描述英格兰东北部地区的企业文化和遗产文化，而在于强调该地区新的全球定位是怎样从截然相反的方向影响其文化认同的：同时既低估又评价传统和遗产的价值。对往昔的态度特别矛盾。工人阶级传统就像“假贵族派价值观念”一样，被看作是“英国病”的症候，看作

是不利于“后工业”企业精粹。但是传统和遗产又是大企业家们能够开发的东西：它们是“产品”。它们还具有无法轻易抹杀的人类意义和重要性。当代英国文化的核心是承接起民族往昔同全球未来的问题。

认同的重塑

最后，我们想转入后现代地理会对帝国问题有何影响的问题上来。托德·吉特林指出，应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大方向，视为领会或是体验这个世界及我们于其中的地位或是无位置性的方法”（1989：101）。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它正引发新的定位与迷失方向的体验，新的有地域性的与无地域性的认同观。全球－地方关系同空间与地域、固定性与流动性、中心与边缘地带、“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内部”与“外部”、疆界与领土这些组关系紧密相关。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个体特性和集体同一性，影响到社会群体的意义与凝聚力。彼得·恩伯利描述了世界从具有稳定的一贯参照点到“空间意味着包围、时间意味着持续这个概念不再确定，而被重新改为无止尽地尝试改变时空的领域”的重大转移。他提出，在这个新的“超现实”当中，“过去地域是约定俗成、斥异性的，时间延续具有一定含义，这样的旧秩序正在瓦解”，我们随之面临着要阐释“新的自我解释”的任务（恩伯利，1989：755—756，748）。

企业文化和遗产文化正是在此背景下才有意义。过去确定的、分有等级制度的英国认同在边界瓦解、延续性中断的世界里遭到质疑。在这个现在包含有非洲文化和亚洲文化的国家里，做个英国人的意识永远不会再有过去的那份自信与保证。其他类的认同竟也是脆弱易碎。在不仅受到其过去殖民

地文化的影响，还受到美国文化、现今又加上日本文化影响的欧洲大陆上，做欧洲人意味着什么？不正是认同这项内容本身令人困惑吗？在全球时代，究竟有没有可能恢复连贯、完整的认同观呢？认同的延续性和历史真实性遇到瞬间即发、激烈的全球文化冲突的挑战。因为必须在肩负起文化转变的责任的基础上重新对自我进行诠释，所以令人舒适的传统面临着本质挑战。

企业文化和遗产文化都没有真正面对这些责任。这两者都是回应全球化势力的保护性战略，核心在于保留认同而不是重新解读它。推动它们的任务是挽救有中心、有界限、内在一致的认同——无地域时代里有地域特征的认同。为此，可以采取小英格兰主义复苏那样的方式重新点燃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也可以用我们曾建议的，采用开拓当地和地区的认同，或是规划构建欧洲大陆的认同这些较进步的方式。然而，两种情况都是要维持保护性错觉，要借延续力求完整、一致。这种浪漫主义愿望的灵魂是理查德·森内特在谈另一种状况时所称的寻求纯洁、纯正的认同。他认为："这种防御模式的效应是在人们中间形成一种强烈愿望，希望净化他们眼中自己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企业是试图塑造起凝聚作用、统一的、滤除了社会体验中的威胁的形象或认同"（森内特，1971：15）。纯正的认同是通过净化空间，通过维持领土边界和疆界来构建的。我们可以考虑搞"斥异地理，它似乎符合敌对社会群体的纯洁性"（西布利，1988：410）。纯正的认同也是帝国的灵魂。净化的目标在于确保既保护自己不受外部他者的侵犯又保持自己的地位优于他者。焦虑和权势相辅相成。正如威廉·康诺利指出的：

> 当你待在原有的认同和差异圈子里时，你便成

> 为借贬低他者而保护认同的战略的履行者；但是如果你超越了构成他者的认同领域，那你便失去了同那些你试图给予讯息的人们进行交流所需的认同和地位。认同和差异紧密相联。在不扰乱前者的体验的情况下重塑同后者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
>
> （1989：329）

因此，质疑帝国就是要对认同这条根本逻辑本身提出异议。在此，并不难理解人们现在为了巩固、扶持"传统"文化认同所做出的充满焦虑、意在防御的努力。

那么有没有可能打破这种认同逻辑呢？我们该怎样着手迎接后现代地理和文化转变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的挑战呢？英国的企业文化和遗产文化铭刻在伊恩·布鲁玛所称的"寻找故乡的反政治世界"当中（1989：43）。然而，应把当今世界另一个强有力的主题与这种关于故乡的理想相对照。我们或许正是从大迁徙的经历中开始认清帝国之外的方式。人们在移居的经历中遇到差异：跨过边界；文化交融；认同淡化不清。斯图尔特·霍尔指出，大迁徙的经历意味着"不稳定、重新组合、杂交、'断绝后再混合'"，并且同传统的关系随之改变了，在这种关系里"不存在纯粹'回归'或'恢复'祖先历史，那种历史人们在目前各个层面的生活中都没有再经历过"（1988：30）。爱德华·赛义德曾令人信服地指出，大迁徙以及流落他乡的经历使得我们能以新方式认识诸文化间的关系。跨越疆界使得人们的视野纷繁多样，并意识到文化具有渗透性和偶然性。跨越疆界使得我们"不把他者视为本体既定的，而是看作历史构成的"，从而能够"慢慢磨去我们常常认为诸文化，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所带有的排外主义偏见"（赛义德，1989：225）。

大迁徙和流落他乡是极端的经历，但是在文化日益全球化的情形下却具有预示作用，反而追寻故乡现在成了倒退和阻碍。文化是特色鲜明、各自不同、“真实的”，这种概念越来越值得质疑。正如艾里克·沃尔夫指出的，“最好应把”文化“视为一系列构建、重新构建、拆散文化原料的过程”；“固定、统一、有界限的文化概念必须让位于文化元件具流动性和渗透性的意识”（1982:387）。这种背景中正蕴育出新型全球文化。仅举一例说明，在文学领域便出现了新的世界主义。伊莎贝尔·艾伦德、萨曼·拉什迪、马里奥·瓦加斯·劳萨等作家正在记载“已经开始强行甚至进入个人经历的全球并置状况”，“捕捉在移民和国际传播中拥有明确社会基础的新的世界现实”（布伦南，1989:4,9）。在拉什迪看来，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流放者、移民、侨民“在同一时间内既是内部人又是外部人”，给人以“立体视野”而非“全景视野”（1982:19）。

意义绝不在于把这种新的世界主义理想化（拉什迪事件便充分证明其局限性和文化转变面临的现实存在的艰巨困难）。相反，关键要强调企业文化和遗产文化的极度偏狭之处，质疑它们各自的战略对重新焕发国家魅力的实际效用。正如迪克·赫布迪杰所强调的，每个人现在“都多多少少是世界性的”；“‘平凡的’世界主义是‘普通’经历的一部分”（1990:20）。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紧抓住过去的认同观与延续观不放便没什么意义了。哈尼夫·库里什写道，在这飞速变化的时代里，英国人必须改变：“恰恰是英国人，白种英国人，必须学会懂得做个英国人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了。现在做英国人是个更复杂的事情，包含有新的成分”（1989:29）。

本章的论点是，企业文化和遗产文化的出现并不是英国文化的单纯内在演变，相反，是对全球化势力的回应。然而，即便说在过去的10年左右里文化的这两向发展是因那些势

力而引起并成型的，但是这两种文化都没有敞开胸怀迎接全球化势力。问题是，我们是继续用保护性、自恋式的错觉孤立自己，还是在新的全球舞台上真正找到"当英国人的新方法"。

第七章

在西方的注目下
——媒介、帝国、他性

直升飞机载着装殓在金属灵柩里的尸体着陆了，革命卫兵肩扛着灵柩走了不远来到墓冢。然而这时人群又涌上来，都是些缠着血红头带、哀恸哭泣的男人，他们爬上栅栏，拥塞了整个墓地。（画外音，恸哭吟唱的送葬者们。画外音，他们疯狂地冲向墓穴。）

卡伦想不出还有谁也正在注视着这一切。如果其他人也在注视着，这就不会是真实的了。如果其他的国民在注视着，如果成百万的人在注视着，如果这成百万的人跟伊朗平原上的人数差不多，那这不就意味着我们和这些哀悼者分享着某些情愫，觉得悲痛，感到我们之间在交流着什么，听见某件历史灾难的哀叹了吗？……如果其他人看到这些画面，那

为何什么也没有改变，哪里是当地的人群，为什么我们还有名字、地址、汽车钥匙呢？

（唐·德利洛，《毛二世》）

我们已经用行为维系了与真实客体活生生的关系；我们抓住它，我们理解它。图像中和淡化了这种真实的关系，这种借行为孕育的原生的认识。

（伊曼纽尔·莱维纳斯，1983）

媒介帝国主义

现阶段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改良后的物理传输体系和形形色色的符号通信方式对于将世界各地联系起来所发挥的作用。人们已经注意到，地理距离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大大减弱了（迈耶罗维茨，1985），“压缩时空”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后现代环境（詹姆森，1985；哈维，1989）。我们可以认为上述这些看法无外乎是延续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大众媒介有益于构建“地球村”那套老掉牙的格言。然而，正如许多批评麦克卢汉理论的人士所强调的，这不仅仅是个技术现象，至少就现在所说的媒介技术而言不是，这些技术有非常特定的来源（西方或是欧美），受控于可确定的利益集团（沃特·迪斯尼、新闻集团、贝鲁斯考尼、时代华纳、贝塔斯曼等等），从而形成西方世界讲而其他世界听的这种基本上是单向的“交谈”。

这一切显然都表明需要密切关注媒介在这种文化冲突过程中的作用。我们该怎样认识媒介在这方面的影响呢？长期以来，媒介研究的传统是从“媒介帝国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该议题。比如，阿曼德·马特拉特等人（1984）、赫伯特·希

勒(1969)、杰里米·滕斯托尔(1977)的著作就大量分析了西方世界长期控制全球媒介体系给文化造成的后果。不过,这些作品的缺陷是依赖过分简单化的媒介效应“皮下注射”(“hypodermic”)模式——这个模式假定媒介产品对其消费者有直接、必然的文化“效应”,长期以来,它遭到媒介研究主流学派的怀疑。这样看不是受了所有声称媒介不对文化造成深刻影响的假说的蒙蔽,而是要强调媒介影响其受众的方式比任何皮下注射模式能涵盖的要复杂得多(莫利,1992),我们在分析媒介对跨文化冲突的影响时必须充分论及上述复杂性。

我们在前面(参见第三章)提到了整个80年代就美国电视连续剧《达拉斯》享誉全球而展开的争论。我们已经指明,到80年代中期,《达拉斯》已经成为一些人眼中不同寻常的憎恶象征,这些人都认为该剧在全世界流行的事实暗示着美国主宰全球媒介业给世界文化多样性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这种论点,或是说主张的问题在于,随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所有《达拉斯》剧受众收视情况调查不但没有证明任何必然的“媒介效应”,反而结果是证明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依据各自的文化背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解读”这部电视剧。伊恩·昂(1985)以实例说明有多少荷兰妇女透过自己追求男女平等的议事日程的坐标,以讽刺的态度解读该剧。埃里克·迈克尔斯(1988)显示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怎样以其独有的亲缘概念重新解读《达拉斯》,从而形成远离该剧制作者初衷的新读本。塔马拉·利布斯和伊莱休·卡茨(1991)的论证最详尽,他们证明了来自美、俄、北非、日本的观众是怎样从该剧中看出截然不同的内涵并从自己与《达拉斯》的冲突中领受到截然不同的“启示”。然而,格里普斯拉

德(即将出版)的观点却与此相反,他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虽然这些人的有关在不同背景下接受的讯息也多种多样这一人种志调查结果相当值得关注(可用作媒介效应"皮下注射论"这类头脑简单的理论的反证),但是我们要是得出结论说因此好莱坞电影电视制作基地持续主宰全球就没什么影响,那可就蠢了。

诚然,不应过高估计媒介消费者个人随意评说传送来的节目的自由。即使他们有这个自由,他们选择重新解读的节目也局限于势力强大的媒介机构建立的"菜单"之内。再说,这些节目通常制作成"更倾向于"某种解读的样子(霍尔,1981),从而即便人们永远也不会同意这种"解读",也诱使观众以某种特定方式"领受"该启示。显然,我们对待媒介效应皮下注射模式的缺陷不应该是把消费过程浪漫化了,然后欢呼"积极的"观众是符号学的游击队员,一直为文本权力的结构而战(柯伦,1990)。我们必须把承认受众选择、消费、解读媒介文本时某些方面是能动的,与认知这种行为在不同的模态和样式下由文化强势动力构筑并限制的事实平衡起来。

同样,我们不应该陷入任何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即便媒介技术过去一直为西方强国开发并操控,但很多时候仍然可以超出设计本意,将它们用作他途。例如,埃利于特·弗洛里斯(1988)描述了流亡到纽约的波多黎各家族在收视率低的晚间和周末时分,把(设计为商业用途的)电视会议设备用作空中回"家"旅途。与此类似,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描述了现代视频技术在巴厘岛的某些用途,该项技术在那里实际上与传统礼仪活动融为一体了,以致于在村民们逐步将代表着国际资本主义的尖端机器融人自己行为模式的过程中,已经分不清楚是谁在同化谁。他指出,我们应该抵制意识形态先有决定论,承认文化具有"惊人强大的同化机制……像酶一样

改变外国人的意识形态成分”。在这个例子里，视频技术决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明明白白、不可变更的载体，这种意识形态曾是……创造（它）的决定性条件”（格林布拉特，1992:4）。丹尼尔·米勒（1992）是少数几个曾直接分析媒介消费过程的人类学者之一，他做得工作与此相似，他分析了特立尼达岛上收视美国电视连续剧《年轻人与永不停歇的人》的情况，建设性地提出了（消化、融合、同化的模式）“本土化”的概念，从而认识如何用最初产自其他地方的元素不断重新塑造“本土”文化。米勒批评了那种认为真实的本土文化受到“外来的”和“腐朽”势力的人侵的传统模式，意在表明我们应该接受另一种方法，它将“真实性”定义为后有的，指在当地造成的后果，而不是指来自本地（或“异域”）。

迄今我们一直主要关注的是有关西方媒介对其他文化影响的争论。在探讨这一议题时我们一直遵循着相当传统的传播模式，事实上许多作者（如：博德里拉尔，1988b；哈维，1989）可能会说该模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后现代”环境的实际特征表现为新秩序的体验和创造新的地域观念，在这个复杂过程当中媒介发挥了极为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地理、媒介

本节中心议题是现代媒介对构筑新地理的效应。我们曾举出的一些例子中明摆着这样的事实，即媒介对于我们想像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具有影响。多林·梅西（1991a）曾指出，不应该再把地域本身看作是内在同质、有界限的地块，而应看作是“互动的空间”，其中地方同一性由（物质的和象征性的）资源构成，这些资源或许压根不是出自本地，但不管怎样对所

有人来说都是"真实的"。

詹姆斯·克利福德(1992)在一篇人类学文章中论述了同样的问题,指明用来比喻整个文化的"村落",即那种由"本地人"居住,被认为是有边界的居住地,长期以来都是人类学领域的重点课题。然而,他与这个人类学背道而驰,他强调文化在任何简单意义上都不是"处于"地域之中。专注于"有根的"、"真实的"或是"本土的"文化和体验无法解释清"各种文化间大范围的进出交流,而此中常已卷人人种学的纠葛了"。克利福德赞同阿朱·阿帕都莱的论点,认为"或许从来就不存在本地人,即囿于自己所属的地域并受其限制的人们,没有因同广阔世界接触而受到沾染的集团"(阿帕都莱,1988:39)。克利福德指出,我们不仅应该运用根据人们多重对外联系而构想的不同圆心的本地人模式,还应该把地域既当作居住地又当作游动遭遇的地点。克利福德意指,我们应该注意"文化群落最远的游历范围,同时还要注视其中心地带;要注意集团在对外对内关系中自我协调的方式;要注意文化群落也是他者游历的地方,一个集团的中心乃是另一个集团的边缘地带这样的事实"。这是针对那些"总是漂泊在两地之间的"人们,那些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自己从哪里来,不如说自己在哪里的人们,主张既"在定居中游历"("travelling-in-dwelling")又"在游历中定居"("dwelling-in-travelling")的多地点人种论(克利福德,1992:107—109)。克利福德的论点得到格普塔和弗格森(1992)的论点的有力支持,后者认为:"无疑,人们总是比传统人类学静态、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所说的要移动性更强、认同也没那么固定",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使得"地形的权力成功地掩盖住权力的地形"(出处同上:8—9)。

埃里克·沃尔夫的批评击中要害。他指出,整体来说,

"认为社会和文化是独立自主、自我调控、自我解脱的概念令人类学陷入了自身定义的束缚"(1982:18)。他的意思是,在研究"社会"或"文化"的基本构成模式方面,人类学一心搞"实地调查"的方法这条尾巴过多地摆动该学科理论这只狗。随着"实地调查"成为人类学方法的标志,探索式思考常常已给并不恰当地转用到有关"社会"、"文化"的理论假设中去了。正如沃尔夫指出的:"由于在实地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迫使有可能进行观察访问的数量和地点也有限,因而要求集中力量在一个可以观察到的地域和一组能具体指明的资料提供者"(出处同上:13—14)——而这于是就相对无可质疑地成了被研究的大范围"社会"或"文化"的代名词了。在他看来,关于对"清楚界定当地的生存地"里特定人口的"现实文化"的研究,其问题在于该模式在设想研究单位时错误地假设了一个先有的闭合环境。面对数世纪的帝国主义和跨文化交往的背景下,我们最好把人类社会看成开放的体系,"在蹼状、网状联系中无法摆脱地卷入其他或远或近的集体"(亚历山大·莱塞,引文现处同上:19)。

传统的文化交流模式就是假定存在纯粹、内在同质、真实的本土文化,该文化遭到外来势力的破坏腐蚀。然而,事实是每个文化群落实际上都吸收了来自外源的外来元素,而这不同的元素逐渐在其中"被吸收"了。正如赛义德指出的:"认为存在这样的地理空间,其居民土生土长、却截然'不同',界定其居民可以根据适合该地理空间的某种宗教、文化或种族要素,这种看法很值得争议"(引自克利福德,1988:274)。前面指出过(参照:阿帕都莱,1990;巴巴,1987;霍尔,1987),文化杂交在全世界越来越成为正常事了,而在此情形下,任何企图捍卫本土文化或现实文化完整性的努力都很容易变成以保守态度捍卫对往昔充满眷恋之情的看法。

让我们来进一步细致地思考媒介是怎样参与到现实地理和虚拟地理的这一转型当中的。就这一点最简单的意义,大约60年前艺术史学家鲁道夫·安海姆便曾详尽阐述过了。他推断电视对社会的主要影响是因它"与摩托车和飞机一样——是一种思想的运输工具";就其本身而言,它"提供展示的客体不受来源地的影响,因而观众无需簇拥到实物面前"(引自拉思,1985:199)。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里,探险者和人类学家长途跋涉到达未知领地,给我们带回来书面记录的遥远异域他者们奇特的风俗,那么今天,所有他者在我们自家客厅里以电视屏幕上(每晚定点电视新闻节目和CNN每小时节目中)电子画面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的凝神注目之中,如此说来,我们都是人种志学者了。如今,我们只需坐在沙发上,按下开关,就能看见他者或是异域风情。

早在1946年,马克斯·里德就认识到媒介技术能够影响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感知:

> 广播不仅仅报道发生的事情,它似乎还创造历史。世界似乎是由广播创造的。人们仍旧目睹物与事,但是这些物与事只有在广播报道了该事件、报纸刊发了事件图片之后才成为事实。广播替人们知觉、记录、判断。我们的灵魂直接连到广播上而不再是连到自己的感官上。人们不再有内在历史、内在延续性,今天的广播是我们的历史,它证实我们的存在。
>
> (引自凯斯,1989:197)

唐纳德·霍顿和理查德·沃尔在一篇具经典价值的文章中指出,相距遥远的人们借助新的大众媒介相遇了,"好似他们属

于同类人群”，保持“似乎面对面的关系”，这是“一种可称作超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的平等交谈的假象”（1956：215）。近期，德国心理分析学家克劳斯-迪特尔·拉恩（1985：203）对此看法做了发展延伸。他指出，我们大家日益生活在“电视地理”当中，这里重要的是常常横越国界的电子辐射空间，因为我们是待在自己舒适的客厅里独自观看电视图像展现的“全球事务”（拉恩，1989：88）。有时候，这些以电视形式进行的超社会接触是值得庆贺的——有时候的确如此，比如当现任教皇任期届满时，对那些不能去教堂的病弱人士来说，通过电视“现场”举行弥撒效果也是一样（然而如果是录下来换个时间在电视上放的，由于失去了“即时性”，那就不算了）。而其他时候，这种接触让人感到烦，就像美国电视连续剧《茱莉娅》遇到的情况一样，这是一部首批在美国黄金档电视节目时间播出的以黑人为主人公的电视连续剧，该剧制片人收到许多白人观众寄来的信件，火气十足地报怨说他们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把黑人挡在了社区之外，所以不想回到家发现黑人从电视屏幕“侵袭”到他们的客厅（鲍德罗夫考奇，1992）。

有时候，甚至心灵创伤也能通过这种超社会互动传播。1990年，针对在经电视转播的希尔斯巴勒足球场惨案中死者亲属的索赔案，利物浦高等法院裁定，在收看现场电视播报有关近亲的惨事后患精神病症的人跟那些在事发现场目睹惨事的人一样有资格索赔（《卫报》，1990年8月1日）。实际上，法官指出电视观众或许受的精神创伤更重，因为摄像机能够紧紧聚焦事件，而对于现场事件目击者来说或许并不那么清楚。关键在于电视

使得我们能与在其他地方的人们分享一模一样

> 的时间。它赋予我们……瞬时的客观现实。从电视上观看月球登陆的人们成了感受其境的宇航员，同宇航员们一样在同一时刻……探索月面景象。实际上，在某些方面看现场转播的观众比那些当时置身现场的人看得更好。
>
> （斯塔姆，1983:24）

从这方面看，电视“把我们变成了‘沙发上的帝国主义者’；借助其全方位视角，我们成为‘世界的视听主人’”（出处同上：25）。

这种情形充满对自我的嘲讽意味。《卫报》南非通讯员戴维·贝雷斯福德口述了自己在1990年4月报道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演讲时，有关在当今媒介环境下新闻事件中“在那里”一词地理意义的转变。在贝雷斯福德看来，虽然本人“在现场”，但你仅仅是成百上千争夺着位置的记者中的一个，所以不幸地必然既不能看见曼德拉先生也不能听到他的演讲。贝雷斯福德把这描绘成一种“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的经历，“在现场的人士”反而结果无法亲眼目睹和听到正由占据最佳位置的电视摄像机清清楚楚地转播给在家的全球观众的图像和话语。

与此相似，乔舒亚·迈耶罗维茨分析了电子媒介通过改变“人类生活的环境地理”对社会行为造成的冲击，他的分析引人入胜。迈耶罗维茨关注媒介是怎样弱化了物质背景同社会环境之间的传统关系，以致于我们“不再”以我们曾经或是认为我们曾经“拥有的那种方式‘处于’地域之中”（1989:333）。他指出，媒介使我们成为“在其他地域上演的节目的观众，并给予我们接近本人并不在这里的观众的途径”（1985:7）。迈耶罗维茨的中心论点是，这些新媒介重新界定

了社会“位置”和“地域”的概念，将体验同物质地点分离开来。因此，“《直播辅导》这种事只有电视上才会有”（1989：329），这是传播摆脱了社会物质束缚的最典型事例。电子媒介改变了经现场直播相遇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将“各地的信息和经历带到各地”，如国葬、战争、太空战成了“可以在几乎任何人家客厅上演的戏剧”（1985：118）。

就此而言，媒介创造了跨越其覆盖空间的新“社会群体”，从而把在其他方面各不相干的集团聚集到电视这一共同体验上，并把此处与彼处的文化混合。继而电视成为共同体验和相互影响的基础：“看电视是观察共同体验，看其他人正在看什么”（出处同上：145—147）。因此，成百万看到刺杀肯尼迪的人们

> 当时正在一个根本不是地方的“地方”……成百万每晚看电视的美国人……待在一个不是由墙壁、街道、社区界定而是由转瞬即逝的“体验”界定的“地点”……人们越来越多地居住在国家（或国际）信息体系当中，而不是当地的城镇。
>
> （出处同上：146）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媒介正在改变我们对方位的认识，并根据远处“普遍意义上的其他地方”和“非本地”人来重新确定我们的位置。正如利迪亚·柯蒂所述：

> 媒介给每个国家都造成了迁移国内与国外、他性与同性、重复与差异的界线的问题。意大利电视台鲜明地展现了不同国家是怎样以大量故事片的形式……在其国家电视台屏幕上交融混杂的，它突出

> 表现了《达拉斯》一剧是怎样被同化到……那不勒斯王国,加利福尼亚风情是怎样成为意大利南部家庭主妇幻想中的一部分,罗马的贫民窟由于同里约热内卢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科罗拉罗州丹佛市的豪宅紧接着出现在同一户人家同一个荧屏平面上,因而说它们毗邻,这种想法是怎样让人们接受并且觉得真实。
>
> (1988:16—17)

我们已经目睹了通过电子媒介构建虚拟时空和虚拟社会群体的新体验。我们现在恰恰不得不服从虚拟现实。克里斯托弗·科克尔曾表明:“电视带来的冲击不在于观点和观念方面,而在于认知的‘感知率’和模式。全世界人类关系的规模、模式、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结构变化”(1992:197)。

生活在传播世界里

现在媒介令我们都俨然一幅人类学者的样子,坐在自家客厅里,审视着荧屏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全世界一切“他者”。爱德华·赛义德(1978)曾提出反对任何认为传媒技术的提高将必然改善文化群落间的关系这种令人欣慰的看法,他宣称媒介如果说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刺激了后退趋势。他继续指出,事实上电子后现代世界的一个特征是更强化了对东方的成见:“就东方而言,标准化和文化刻板化使19世纪学术界和人们想像中‘神秘的东方’这种魔鬼信仰的力量更强大了”(出处同上:26)。

借助媒介进行观察或许甚至给认清事物设下了障碍。保罗·哈特曼和查尔斯·赫斯本德(1972)多年前就举出有效

例证，说明主要是由于媒介中黑人形象造成的后果，英国种族歧视最猖獗的地区是那些白人跟黑人日常较少交往，因而更依靠媒介中的形象来认识黑人的地方（事实上，主要是由于媒介在辩论种族问题时总是一心想到“数量”，结果普通白人把在英国的黑人人数高估了十倍）。

我们都主要依据媒介形成对非本地的人、地、事的认识，而且“事件”离我们自己的直接经验越远，我们就越依赖媒介形象来得到全部认识。正是在这一点上说，媒介表现他性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学界关于人类学描述他者的伦理标准的讨论，这方面的辩论正愈演愈烈。从克利福德和马克斯（1986）、马克斯和费希尔（1986）、赛义德（1978）的文稿中可以看出，许多人类学者已经开始探讨福柯对表述问题的看法——即常常涉及表述者与被表述者（不管涉及的他者是否身着“充满异国情调的”本族服装）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认识关系。粗略地讲，这个问题当然便是“表述他们的我们是谁?”（拉比诺，1986）。正如詹姆斯·克利福德（1986：13）所坚称的，我们必须经常别忘了问：“谁讲的？什么时候？在哪里？跟谁讲或是讲给谁？受到什么样的制度约束和历史约束?”最激进的提法是已故的鲍勃·斯科尔特等作者提出的，意指人类学从整体上说或许仅仅是“欧洲人发明出来谈论比他们肤色深的兄弟姐妹的方法”（1987：35—36）。“人种论”本身是个负有沉重意识形态包袱的词，只要是说可以把其本义单纯界定为“对各民族的描述”，那么其内涵的转义就常把“各民族”描述成他者——非白人、非欧洲人、非基督徒：“他们”（“Them”）（费比恩，1990：758）。特林·明-哈探讨道，可以把人类学试图“抓住本土生活的精髓”本身比喻作自相残杀的圣餐式，从而指出今天“惟一可能的人种学是研究白种男人的食人（自相残杀的比喻说法）行为”（1989：73）。

这个类比的意思是，正如在历史上恰恰是西方人类学自称拥有表述“本土人”的权利；同样今天，鉴于国际传播大体上是单向流动的本质，所以恰恰是西方媒介自称拥有表述一切非西方的他者的权利，从而给予“我们”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的定义。为了扩展我们的核心比喻并使之复杂化，向(并且为)我们表述他者的电视荧屏担负着许多不同层面的功能。从一种意义上说，如果播映意味着将“他们”以图像的方式展示给“我们”，那么事实上，从另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形象是经过筛选才播映的，只有某些挑选出来的图像才通过了。与此同时，从精神意义上说，荧屏不仅仅是用来给我们放映图像的媒介，而且是我们投射我们自己对他者的恐惧、幻想、渴望的荧屏，而我们的认同是相对于他者们界定并构建的。如果说这属于常规运作状况，那么在某些危机时刻，其操作便会突现出来，在全球媒介聚光灯的强光之下很一般的困境给投人了不一般的求助。

于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正在播映他们的我们是谁?”这个反问极其重要：

> 观众不是以第一手体验而是通过感知来经历事件。他所感知的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个人对认同本质的反应。世界所强加的同人的思想所需求、接收、塑造的事物之间存在至关重要的联系。荧屏上所见的一切都部分地表达了自我。它促使我们反应，把我们所目睹的同我们的情形联系起来。它迫使我们确证我们自己的认同。
>
> (科克尔，1992：197)

我们不得不正确对待自己的收视技术以及收视技术许可

条件下的收视行为。我们应该关注自己是通过荧屏怎样热切地注视着他者的形象。荧屏参与到构建“我们自己好”跟“他们他者坏”这样的根本对立状态中。科比纳·默塞尔(1990:69)曾谈到“与差异共存极端困难”,保罗·霍加特(1992:352)曾谈到固有的心理困境,认为“无差异的统一体”是忧虑的心灵惟一能容忍的一体形态。我们不是说这当中有什么新事物。彻维坦·托多罗夫在精妙地分析西班牙人在征服“新世界”并在那里开拓殖民地的进程中对他者的表述时,探讨了同样的根本困境。一方面,西班牙人能够认为印第安人是人类,因而他们与自己是“一样的”,享有平等权利,在此情形下他们就适合“同化”西班牙人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他们能够承认差异,但是立刻就转变成优势和劣势之辞,变成认为印第安人是次人类的信念,继而变成奴役他们的借口。正如托多罗夫所述:“被否认的是存在真正他样的人类主体,这些人可以不仅仅是我们不完美的状态”;成问题的是“没能够承认印第安人,拒绝承认他们是与自己享有同样权利的另外一种主体。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但没发现美洲人”(托多罗夫,1984:42,49)。

在西方的注目下

现今,我们历经危险重重的长途跋涉,穿洋过海“发现”他性的次数不如利用遥控器的时候多,我们轻击按键从不同电视频道提供的形形色色的异族风情中变换选择。然而,我们发现电视相遇中进行着很多同样的根本进程,同样的强制力以某种专制的手段将善与恶分开,同样要么不是将差异者划归次人类或非人类的“怪物”范畴便就是无法容忍差异。这一点我们从在西方注目下发动的海湾战争中看得清清楚

楚。在媒介描述的这场战争中，萨达姆·侯赛因被刻画成一切非理性的野蛮势力的代表，必须被理性和明智的势力遏制、控制。消灭该邪恶势力、征服这个异类是欧洲及其文明的后嗣，美洲，义不容辞的职责；联合国远征军的斗士们必须同这头"巴格达野兽"及其"恐怖的帝国"较量。必须让理性，据称是普世的理性，占上风。当然，问题是人们极易将所有邪恶都说成是外部的特性，然后认为一切好的都属于我们自己的社会群体。将敌人搞成魔鬼，谴责邪恶的他者的罪行兽性，这都与想净化自我文化和文明的愿望有关。将邪恶的他者看作非理性的化身就是肯定自我理性的事业和动机。用象征手法诅咒萨达姆-希特勒揭示了西方现代性和理性核心之处的大量恐惧、焦虑和罪恶感。

认真关注媒介对这类事件的反映十分重要。尤其是因为这是经 CNN 传播的体验，使大多数伊拉克之外的人与实际发生的事件牵上某种联系并对其产生某些认识。对这个问题我们主要关注各种媒介对于构建其他地域的人们对一个地域事件现实（或反之）的认识的作用。朱迪思·威廉森在海湾战争期间访问美国时注意到：

> 必令任何外国人感到震惊的恰恰是在美国公民眼中，该国之外任何地方都不真实。这个文化群落就像一个还没搞明白还有其他自我中心的婴孩，把其他文化群落仅仅当成美梦和恶梦的素材……并不是美国人不**关心**（天知道，他们关心），而是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无法将其他国土和其他民族想像成真实的。
>
> （1991：21）

我们在前面已经从社会或文化层面批评了媒介效应"皮下注射"理论，所以不打算从心理层面再重述它（参见：莫利，1992，第2章，评文化理论中的此类倾向）。然而，我们要指出，为了充分探讨在接收媒介内容时发挥作用的潜意识动因，我们的确需要借助透过心理分析得出的概念（参照：罗宾斯，1993，关于这方面的详细阐述）。

帝国主义扩张造成的与其他文化的激烈交锋常常是界定现代西方的一个驱动力。历史学家艾伯特·霍拉尼指出，历史中的新事物是"欧洲思想和想像为了霸占所有现存事物而大面积延伸才编造出来的"（1980：13）。西方世界在寻求霸占全世界时懂得了相对他者、相对"非欧洲"来界定自己的独特性。如果说政治现实一直是充满冲突和不统一，那么构建想像中的东方有助于给西方的概念中注入统一性和凝聚力。此外，这个东方是欧洲（及随后是美国）能够看到自己至尊影像的一面镜子。它在懂得阐释其与非欧洲的区别时，还不得不阐释这种霸权地位，阐释它在向"劣等"文化群落强施霸权方面已经取得的无可置疑的胜利。

似乎其与众不同和具备固有优势的根本原因都是理性的原则。欧洲正是基于体现为现代科技的理性在全世界大获全胜，使自己成为世界性的参照点。它结果视这种理性为普世文化的基石；视为它声称界定普世价值观念、界定其价值观念为普世性的借口。相对前现代性来界定现代性，相对非理性和迷信来界定理性；而且，正如我们所知，这种划分后来被绘制在将西方与它的东方相对照的象征性地图上。称"**它的东方**"，是因为如果不存在"西方"，那么也就不会存在东方。正是"西方"赋予了"东方"的存在与同一性。而它所给予的存在与同一性在本质上呈劣势并存在缺陷。东方文化被界定为低等文化，这种看法恰是由其屈从、附属于普世文化的思路一

脉得来的。这种文化是根据其所缺乏的东西（现代性、理性、普世性）而界定的；其“他性”是根据其价值观念的落后、非理性、独特性而界定的。正如爱德华·赛义德（1973）曾非常充分有力地证明的，这种对抗在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中呈现出最激烈的对抗状态。

霍拉尼描述了同西方世界的交锋是如何给现代阿拉伯和伊斯兰的认同造成次等意识：“它不再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不会创造却只是模仿；而且甚至不能准确地模仿，因为那同样需要一定的独创性”（1946：70—71）。面对自封的西方普世主义，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的根基动摇了。此外，在这种自封的普世文化的观念中根本无法逃脱这类贬低。伊斯兰的根本本质是劣等的。在西方的注目下，（尽管同史实相反），它形成的是一种保守文化、一种教条主义和狂热的文化。历史和进步只可能在西方有。对照之下，伊斯兰是一种静态文化，永远是原始的封建文化：它是不可能现代化的文化。而且它不能是其他样子，因为西方世界的本质差异与至尊地位就是围绕着这种阿拉伯和伊斯兰的他性形象而构建的。“我们的”文明是相对于“他们的”野蛮而界定；“我们的”美好是相对于“他们的”兽性而界定的。如果那种非理性的文化能享有我们的理性和科学的话，那么对于西方的差异意识和独特意识将意味着什么呢？如果那种落后的文化自己现代化了的话，那么我们该去哪儿找映照我们优势的镜子呢？

这个有关东方现代性的尴尬事简直不可思议，而它便是海湾战争期间西方所陷入的困境。在那场战争中，萨达姆·侯赛因攻击了那些界定西方独特性和优势的准则；他侵犯了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西方现代化与前现代化东方的界线。他自己装备了现代军火，不仅有传统武器，还有核、生、化武器库。但是，根据西方的神话，他在本质上——根据其属阿拉伯

和东方的本质——是非理性的。当萨达姆配备了科学的作战手段，他固有的非理性只会迅速膨胀；有了现代技术，他成了患精神病的恐怖势力。于是，理性之军不得不压制这个疯狂的、恐怖的非理性家伙。

媒介从与我们的文明和文化截然相反的角度出发，将萨达姆表现成邪恶的化身，表现成所有和"我们"不同的东西。他被"想像"成完完全全的而且是恐怖的"他样"。这样看待他便可以——符合逻辑和理性地——向伊拉克的夜空开火。但是，萨达姆用我们的武器，我们卖给他的武器，而且他跟我们一样理性审慎地运用它们。萨达姆体现了现代化的愿望和逻辑；他是现代事物，因为现代化现在就存在于世界的那一方领土。萨达姆是一面镜子——或许是面哈哈镜，但仍然是面镜子——映照出我们的样子。西方不喜欢它在那面镜子中看到的样子。但是让我们弄清楚究竟西方正目睹的是什么：那是西方自身现代性令人恐怖的一面；那是它势不可挡地蔓延自己的规划，这项规划同时打上了理性和暴力的标记。萨达姆不是异类怪物，不是反现代化的怪物，而是现代化造就的怪物，是现代化内部的怪物。

许多评论人士都描述过伊拉克造出了个弗兰肯斯泰因的怪物（译者注：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夫人（1797—1851）于1818年撰写的恐怖小说《弗兰肯斯泰因》中的主人公，系一个创造怪物而自己被它毁灭的医学研究者。）。跟玛丽·雪莱笔下造出的东西一样，萨达姆是现代化在全球蔓延当中创造的怪物。对于他，我们同样将对现代性令人恐怖的一面的畏惧也投人到对"他者"自然而然的憎恶之中。不得不将萨达姆看作独特人种中的一员。就算认为伊拉克正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话，那么也一定得是种文明世界永远无法接受的异类的现代性。跟对待弗兰肯斯泰因的怪物一样，必须将萨达姆

·候赛因逐出文明。只有将他排除在外，才能以普世进步和人性的名义重振理性。

因此西方理性的"机敏"技术被调用去摧毁"他者"。于是承蒙最新媒介技术提供节目，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地待在家里，坐在电视荧屏前，观看炸弹自动搜寻到目标，跟电子游戏中的情形一样。这样媒介使得我们能以一种超社会性、令人震颤的方式参与到消灭恐怖的他者中去。

西方的荧屏、西方的心理

保罗·霍加特从心理分析的视角出发，描述了为什么一切人类心怀原生的恐惧、挥之不去的畏惧、大难将临的感觉：

> 那么这种恐惧是什么，这种像只疯狗一样悄悄逼近我们的大难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说出来，因为我们说不出它的名字。但它在那里，就在我们内部，而且我们一旦找到方法我们就试图表述它，尽管事实上它是不能表述的。我们构建了一连串无休止的错误表述，它们都具有一个根本特质，即他性、非我的特质。
>
> （1992：345—346）

不管政治现实如何，海湾战争本身提供了时机和宝贵的机遇让我们至少在短时间内通过把我们的恐惧外化来摆脱这只"疯狗"。这一次，我们用来体现灾难性危险意识的"非我"是被贬低成猥亵儿童者、强奸犯、杀人犯、怪物的萨达姆·候赛因。乔治·布什向西方世界保证，萨达姆那狂风骤雨般的恶行再次证实了我们是开化、文明的价值观念的卫士。只要

萨达姆象征着非理性的势力，我们就有可能把自己想像成全然理性的。为了保护我们新建立的思想和平，我们进攻“新希特勒”似乎是既合理又不可避免的。既然我们所恐惧的“疯狗”有了名字，那我们就该“重创它”、“杀了它”。

当然，对于像海湾战争这样具历史意义的世界大事，其重大意义在于是怎样将个人的幻想形成集体心理防御战略。集体排除恐惧成为重中集团团结的基础。一个社会集团、一个社会的成员身份从来不是件容易或不复杂的事儿：从属于它就与从漠不关心到怨恨和焦虑的不舒适感觉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特定历史时刻，由于集体性通过，按迪迪埃·安奇厄（1984）的讲法是，我们可能所谓的“集团错觉”的作用而再显威风，所以这种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集团在其个体成员能够公开承认他们的恐惧全部一样，然后他们同感到出于防御目的的暴力和仇恨直指“非我们”造成的威胁的同时，就发现了其共同的认同。这是个体能与集团融合的时刻：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捍卫个体身份能被移至集体身上。而且只要它中间出现危险和威胁，那么集团便从它重新建立的整体和完整中体验到狂喜之情。正是这种狂喜在海湾战争中给盟国注入了团队精神。它所反映的是体验和谐的社会群体和参与正义斗争（正义圣战）的快乐。然而，像以前很多次一样，它是根据错误的同感表述而预计的：根据错觉中的信念，认为诸多危险和威胁就都在“那里”，疯狗真真切切地就是萨达姆。

美国心理历史学家劳埃德·德莫斯（1990）在一篇论海湾战争的文章——这篇文章既可看作是讲症状也可看作是在做诊断的——中指出，在那场冲突之前，美国民族文化的特征一直是感到罪恶、抑郁、可耻——部分原因是“越南综合症”。他称这种情形是“共同的情感失调”。在这种背景下，可以将海湾战争看作清洗涤化的经历，用乔治·布什的话说，通过

它,美国能够最终"踢开越南综合症"。这场战争所提供的是可能再生和复兴:美国能够重新发现其道德目标和情感完整性。当然,这样将海湾战争描述成一场道义行动是简单化了。但是这其中也包含有说服力的真理。一时间,短短的一时间里,这波澜壮阔的场景鼓起了民族完整和道德复兴的思想意识。海湾战争当时是准备借驱除——被想像成在外部("在荒无人烟的中东沙漠")的——"邪恶"来涤化美国。

电视对于该进程至关重要。我们已经请大家注意起作用的集团过程,而不是提出有关作为大众领域的媒介的较为传统的议题,因为我们目前更关心集体行为煽情和里比多(译者注:libido,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用语,指性本能背后的一种潜在力量。)的特点,而不是它理性的特点。大多数关于海湾战争电视节目的论述存在这样的倾向,即赋予电视提供信息角色的特权,而忽略荧屏和筛选过程对心理战的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冲突的发展,电视荧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起初是表现出我们的恐惧,制造有外部威胁的情形,然后调动防御性暴力抗击该威胁。或许正是在电视观众(观众群)这类人群当中,"集团错觉"这个用于防御扰人心绪的焦虑情绪的机制显现得异常强大。荧屏在我们想像中的外部危险和我们感觉内部的恐惧、愤怒、挑衅之间进行传递(罗宾斯,1993)。

荧屏的性质和功用至关重要。荧屏能使我们见证世界大事,而与此同时,(把我们隔离孤立起来)防止我们接触正在目睹的事件的真相。它能让观众接触战争中的暴力和灾难,而他们却仍旧安安全全地待在自家客厅里。但是我们是怎样学会忍受这种暴力的呢?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思考我们设法将自己与邪恶隔开的机制。我们接触海湾战争的暴力是通过荧屏把它作为"媒介事件"传播来的。荧屏是我们这个时代

很有说服力的比喻:它象征着我们现在是怎样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既参战又脱离战斗的矛盾地位。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荧屏面对道德问题,而荧屏也把越来越多有关道德的进退两难的事情摆到我们面前。然而与此同时,它将我们与这些进退两难的事情隔离开。我们正是通过荧屏拒绝或否认自己的人性与道德真相的关联。

苏珊·桑塔格写道:"遭难是一件事,另一件事是容忍摄像机中遭难的情景,而后者不会必然增强良知和同情心"(1979:20)。然而,在固化记录下远方灾难的图像的疏远力量下,我们学会了操控自己同遭难的关系。胶片图像令我们同时既接触现实的灾难又免受其影响。它本身没有,也不能说明我们牵扯进为维持道义和同情心所必需的现实关系和相互关系中。电影也让观众与暴力行为的后果保持一定距离。通常,荧屏暴力被表现为"远处例行的经历,就像收听有关你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发生的惨案的新闻一样"(利思,1993)。这种道德鸿沟在视屏和电子图像的作用下变得更大了。我们接触暴力图像并受其袭扰的程度前所未闻,同样,我们也与现实更加隔绝了。问题不再是有关这种情况是否增强了良心和同情心,而是有关是否该情况正真真切切地削弱、侵蚀良心和同情心。如果我们要顺从这种道德状况,那么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支持荧屏文化的性质。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荧屏提供了途径去体验那些不熟悉和极端事物、奇闻怪事、反常的恐怖事件。荧屏在这方面具有拓展人类意识和感性的潜能。而且,当然,这样做可以起到释放作用。但也可能疑团重重。荧屏还激发了病态的窥淫癖。因此说,荧屏提供了体验非寻常事物的途径。但是我们或许要问,是对什么的体验和意识呢?"迷恋于"透过导弹眼(missile-eye)看死亡,这意味着什么呢?很快便"厌烦了"屠杀和

灾难的场景,这意味着什么呢?寻求恐怖片以满足"被惊吓的需要",这意味着什么呢?观众自己几乎能任意从一个视觉刺激游移到另一个;游弋的窥淫癖者。荧屏让普通观众接触残酷的现实,但是它也往往会消除这些现实的残酷性。它在道义上有一定程度的失重。它给予刺激而不要求责任。它能将我们卷入到一个场景之中而不让我们参与到复杂的现实中去。这显然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我们可以说,荧屏由于有能力表现骇人的、险恶的经历,从而形成了一个空间来掌握焦虑并允许我们演练自以为全能的幻觉来克服此焦虑。

播映波斯尼亚

再后来发生了海湾大屠杀的可怕续集,我们目睹了另一场充斥于荧屏的战争。这次是在欧洲内部,我们目睹了集中营、大屠杀、强奸、恐怖活动这些让人心惊胆颤的事情。正如布兰卡·马加思所述:"原定为欧洲统一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的 1992 年,萨拉热窝等波斯尼亚城市在全世界电视机前的目光下被慢慢地炸得支离破碎,居民忍饥挨饿"(1992:102)。这是一场更接近我们这些欧洲西部生灵的战争。正如阿卡巴·阿迈德所说:"波斯尼亚危机是欧洲自己的危机",而且"如果救不出波斯尼亚的话,那么显然欧洲现在也救不出自己"(1992a:14)。这场战争更接近、更危险地接近家园。

斯莱文卡·德拉库里克在克罗地亚感人肺腑地描述了她在这场战争中的亲身经历:这场战争是怎样由远方的现实、外部事件而进入她的心扉并改变了她的生活。"整个去年",她写道:

战争是远方的谣传，人们设法遮掩、忽视的事情——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发生在共和国边缘地带肯宁或斯洛文尼亚人民身上的事，但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些位于中心，在萨格勒布的人身上。我们忙于自己的私生活，忙于恋爱、事业、新轿车。战争正一步步逼近我们，但不是直接地，我们好像受到忽明忽暗的电视荧屏的保护——我们就跟在巴黎或布达佩斯一样。

(1993a:18)

有些时候是不可能把战争拒于千里之外，不可能仅视其为“熟悉的媒介图像”：

一方面它似乎仍旧如此之飘渺，带着一股神话般的气质。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但是不是很多人都目睹过它，而且我们听说的故事似乎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以致于难以置信。每个人都看报道、听新闻、看电视节目，但是距离保存了它神话般的特质——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直接体验过。

(德拉库里克，1993b：xiv)

但是不可能继续筛掉冲突的现实：“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有能力避开战争幽灵；现在它又回来纠缠我们，遍布于我们生活的帷幕，不留任何空间给私事、给未来、给任何一切，除了它自己”(德拉库里克，1993a：18)。住在战区里意味着最终容忍战争，因战争而发生深刻变化。

战区之外，我们仍旧受到忽明忽暗的荧屏的保护；战争神话般的特质仍旧通过荧屏图像的疏远作用而存留下来。在那

个区域之外,有一种令人慰藉的感觉,知道战争不仅仅是正降临在其他人身上而且是正降临于另一类人身上。这场战争在西欧被视为原始部落人进行的过时的事情。阿朱·阿帕都莱描述了在人类学理论里地域同他所谓的"看门思想"的联系,后者也就是指"似乎限制人类学从理论上空谈所探讨的地域,并且界定该地区内具有重要意义的精要、主导性问题的思想……关键在于地域有可能逐渐变成一段时间内安放一些具体事宜的橱窗"(1986:357—358)。这种思想当然不局限于人类学理论。此外,关于巴尔干半岛的情况,限制我们认识的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设想出这个不幸之地同种族仇恨情绪和原生的暴力之间的联系。当我们见证了对我们而言是非理性、不可理喻的野蛮行径后,我们所珍视的理性或许会退缩了。我们说,这是个疯狂的地方,这是些疯狂的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人们担心这种疯狂或许会传染。《卫报》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宣称:"新部落主义有把我们都感染上的危险"(赫顿,1993)。保拉·富兰克林·莱特尔(1992:304)评述道:"在邪恶帝国之地里是各种复兴的民族主义,过去用来描绘它们的词语常常是传染和疾病之辞"。这种想像的意义在于它将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讲成是病理性的,讲成是某种灾难性本质力量的结果。巴尔干半岛诸国被视为"传染上民族主义的肌体,而不是一场可能因哪种形式介入或干涉导致的战争"(出处同上:316)。这个病毒的比喻成了西方无所作为或是说没有起作用的借口。除此之外,它最终证明不参战和撤退的政策是合理的:"在缺少有效疫苗的情况下,对病毒传染的另一种对策是隔离"(出处同上:306)。我们必须跟感染了的肌体隔开。

电视荧屏或许正好是达到这种疏远作用的关键途径。报

纸报道也让人们集中注意种族清洗的“骇人情景”：“现在残酷的结局最终将展现在电视荧屏和报纸头版。事态让全世界的心都变冷酷了”。然而尽管如此，这样情形仍在继续，“迄今为止外部世界的反应——给了萨拉热窝这座被围攻的城市诸多深感焦虑的关切，而救援物资却颇少——看起来不足地令人可悲”（《新闻周刊》，1993年8月17日：8）。电视节目没有必要将我们带入那些远方他者们的困境中去：他们或许宁愿让我们更接近一些，像窥淫癖者那样，或者甚至为了认识的目的，而又在情感上保持距离和超脱。于是荧屏成了分隔板、盾牌、保护层。

理查德·卡尼在思索他所谓的“其他人通过传播来的形象向我们发出的后现代的呼声”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中间目睹了这些图像的人们（以及那些记录下并将通过传播网传输这些图像的人们）难道不正是被迫不仅要对荧屏上的表面影像作出回应并且要对他们所传达的人们的呼声作出回应吗？”（1988a：387—388）。我们中的大多数知道自己个人想要回答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集体回应最终是什么。我们将如何解释荧屏这个似乎杜绝了道义上的回应和参与的东西的用处呢？

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电视新闻的变幻沉浮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电视新闻在描述世界时越来越多地染上“分析瘫痪”（费罗，1993）。按照保罗·卡比加诺及其同事的著述，我们已经看到新闻权威灭亡了，事态是制造出来的，这当中“信息创造了一个事件丰富但毫无共同体验的世界”（1990：36）。

但是争论点不仅仅是媒介技术和新闻技巧的变革。荧屏传播过程中有某种更根本的事物，某种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事物在发挥作用。新闻业将“世界”组成“节目的样子”，顺应了个体和集体的心理需求。就此而言，可以说“媒介被潜意识

思维用作辅助系统(隔板),稳固个人亲身关系并满足其需要,这样的关系太痛苦了,它介于梦幻与现实之间"(迪富尔和迪富尔-贡佩尔,1985:320)。观众在注视电视荧屏时可以对他/她自己说:

> 我认为这些焦虑、仇恨、杀戮、破坏不是我……我可以认为这些争权夺势、这些延绵不断的冲突不是我……我认为这些受到抑制、扭曲了的性欲不是我……一句话,所有这些疯事不是我。
>
> (出处同上:321)

于是,从心理防御和阻隔的角度来说,电视荧屏发挥功用了。我们必须考虑到电视这种想像体制是怎样能够成为集体防御机制的。

除了要认清巴尔干半岛上确实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还要认清正在远方安全地带观看战争的电视观众中正在发生什么情况。由于电视报道的性质,我们应邀当上了"坐在沙发上的人类学者",在客厅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屏上的"他者"。我们必须承认,只要这场战争被当作某种发生在"他者"人民身上(神话般的)的事情来"观看",那么就会使观众不在乎对收看内容作心理投入。因此,我们必须不仅留意日常刻画中的道德标准,而且留意我们对这种刻画所作的心理投入。我们围绕着"巴尔干半岛诸国是西方的他者"这一概念构起我们的集体幻觉,但由于这种行为我们没能认识到为什么"前南斯拉夫不但不是欧洲的他者,反而其他性本身是非常欧洲的东西,这是欧洲将自己被抑制的反面投影上去的一个荧屏"(齐策克,1992)。我们应该关注荧屏为了我们自己的心理幻觉和心理防御是如何帮助我们构筑现实的。

所有这些当中，同"传播情形"和"现实情形"的关系十分复杂。肯定有人会指出，1993年8月从萨拉热窝空运受伤儿童是一件几乎完全由媒介构造出来的现实事件。设计这个策略似乎主要是想借随后政客们有机会摆出样子同"获救"儿童一起拍照而造成"好名声"，从而提高西方实权人物在本国选民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严格意义上说的医疗优先意味着第一架飞机运出的疏散人员中应该不仅有患病儿童，还有一些受重伤的成年人，当这一点明摆着的时候，英国大众媒介被激怒了，在头版头条上报怨穆斯林派搞两面派，"欺骗"西方慈善机构和医生。疏散人员中出现的穆斯林成年伤员肯定被认为是一种对西方拯救无辜儿童的远征的"玷污"。似乎受伤的穆斯林儿童主要被视为全世界儿童"族"的成员，因此值得帮助，而受伤的成年人主要被视为穆斯林，因此是与西方的运动"不相干的事"。联合国代表西尔瓦纳·福的话或许最精当地概括了英国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的无情，想利用这场悲剧赚取政治名声的企图(《卫报》，1993年8月14日)："难道这件事说明英国只想帮助儿童吗？大概英国只想要六岁以下、或是白肤金发碧眼的、或是蓝眼睛的儿童吧？"我们自己分析了她的问题后认为，即便那是一个修辞问句，但仍然切中了要害。

斯莱文卡·德拉库里克(1993b：viii)在给她在伦敦的出版商的信中问到："下面会发生什么，这是惨状的终结吗？""不，恐怕我们还有许多年要不得不忍受这场战争。但是你们也要不得不忍受这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会改变你们，不是即刻，而是历经年月后才改变。"现在，我们仍旧看着忽明忽暗的荧屏。现在，我们还有姓名、地址、轿车钥匙。但是据报道(《卫报》，1993年8月26日)，在萨拉热窝，一辆几乎全新的大众高尔夫车已经跌倒了150美元左右，因为几乎没有人能搞到开车的汽油：在这种情况下，车钥匙值啥价码呢？

第八章

技术东方主义
——对日本的恐慌

西方每位政客都要么亲身体验要么从电影上看到过日本对待战犯的残暴。不论是在亚洲还是其他地方,没人对日本的扩张主义有好印象。这便是当日本经济实力再次壮大之时,日本人最好应该勇敢正视自己历史阴暗面的原因。

(《经济学家》社论,1991 年 8 月 24 日)

今天,现代期走到终结阶段。美国人意识到自己行将灭亡,这些二战以来最强大的白种人因此对日本的情绪越来越激昂,几乎歇斯底里。

(石原信太郎,1991)

本章我们关注的是一直以来所谓的“日本问题”,也就是

说日本是西方世界面临的难题。这里我们注意追踪过去和现在一直在西方推论出的一系列“日本”、“东方”和“他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具体的说，我们想探讨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历史时刻，单单这个他者会在西方想像中占据如此具威胁力的地位。法国前总理埃迪特·克雷松公开宣称，她坚信“日本人有计划征服世界”。她说，日本人是“小个子的黄种人”，他们“整宿不睡想主意勒索欧美人。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最显露克雷松夫人心迹的是她将日本人比作“蚂蚁”。她担心那些“蚂蚁”将把全世界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并支配未来。日本给西方人的心理造成的这些恐惧和焦虑是什么呢？

日本现在进行

迄今近五个世纪里，日本一直是西方的他者之一。日本曾被视为拥有美好的**日本艺术**（禅教、歌舞伎、茶道、艺妓）的异域文化群落。日本也曾被视为让人恐惧的异类文化群落，失去人性的军国主义文化群落（神风突击队、隐身术、武士）。它与西方的差异在于某种神秘的模糊不清的概念当中。日本既是“菊花又是利剑”：

> 日本人既具侵略性又不具侵略性，既搞军国主义又有审美情趣，既傲慢无礼又举止高雅，既苛严又灵活应变，既惟命是从又忿恨被人摆布，既忠诚又不牢靠，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愿意接受新事物，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
> （本尼迪克特，1974：2）

正是日本这种复杂、模糊的形象令其在西方的幻想中引

起特殊反响。但是，即便它复杂，可象征性地控制这个形象的日本总是可以的。正如马克·霍尔本所写：

> 人们频频从日本吸纳西方的角度来描述日本与西方的对话。模仿、吸收、直至最终重新阐释西方思想的模式历历再现。……相反，对于西方吸纳日本却没有定论，甚至鲜有描述。爱好**日本艺术**是模仿日本美学的第一步。主要是为了装点门面而借用日本的主题和设计元素。东方视线让西方开了眼界。
>
> （1991：18）

日本吸纳西方文化，因为这是其“命运所归”。这是历史、发展、进步的逻辑和本质。对于西方吸纳日本文化“鲜有描述”，要么也只是在论述异族事物和艺术品时换个位置，以理想化的方式来描述。日本同西方的对话是不平等的，西方世界的完整性从未受到日本文化的挑战。

但是事过境迁。西方的完整性现在正遭到日本的攻击，后者不再满足于仅仅开阔西方的眼界。自民党官员、前运输省长官石原信太郎（1991）所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令这一点昭然若揭。石原坦率地指责美国对日本采取种族主义态度，甚至暗指美国飞机向日本人而不是向德国人投原子弹是“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出处同上：28）。他还指出，西方经济文化霸权的基石正遭到削弱。即便说确实是“白种人为创造现代文明立下汗马功劳”（出处同上：107），可是他们的创造力正消失殆尽也是真真切切的。日本在新技术领域日益处于领先地位，甚至美国的核武器制造业也要依赖日本供应商。技术是未来的关键：

> 技术带来文明，文化迟早将在文明的基础上抽枝发芽。当民族放任自己的生活方式凌驾于技艺之上，忽视其工业技术基础，这样的民族便衰败了。这是历史的教训。
>
> （出处同上：57）

石原认为，现在日本的技术优势令其"濒于新生"（出处同上：29）。相反，欧美濒于衰败。过去由西方塑造的现代期现在走到了终结阶段：

> 美国人应该意识到现代期已经过去。他们所珍视的物质主义、科学、进步的信念结出了恶果。尽管在越南乡村如雨注般投散凝固汽油弹和橙剂武器达10年之久仍战败了，说明军事力量是徒劳无用的。美国利用科技并花大量财力登上月球，却只发现荒芜的岩石堆。花了那么多钱和力，而这个国家要干什么呢？
>
> （出处同上：123）

日本被当作未来的样板，这个未来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性。石原称："坚称现代日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西方的种子里长大开花的，这多么荒谬！"（出处同上：107） 他呼吁以"我们民族的天赋来完善、精炼从佛教艺术到半导体的一切事物"，并颂扬日本的"东方方式和价值观念"（出处同上：124）。按石原所述，日本是属于未来的；它正站在伟大历史浪潮的波峰上，并将塑造下一个时代，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更有人性的时代。

日本正对西方的现代性提出质疑，要求拥有管理未来的特权。这激起了西方的抵御。正如索尼公司前董事长森田昭男所指出的：“他们感到陌生人，或是说外国的东西，已经进入他们中间。这给他们造成强烈的恐惧感和焦虑感”(《星期天泰晤士报》，1989 年 10 月 29 日)。由于日本似乎侵犯了西方的象征性要塞，所以反日情绪激增。日本电视网花了约 300 万美元修葺西斯廷教堂(*译者注：位于罗马梵蒂冈，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和画家米开朗其罗及其他艺术家的天顶画和壁画著称。*)的天花板，使它成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东西方均势的新标志”(贾纳斯泽克扎卡，1990a：194)。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已经被日本房地产集团收购。而且，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好莱坞现在已经被日本企业资本“入侵”了。索尼公司 1988 年以 20 亿美元收购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唱片公司，1989 年又继续以 34 亿美元购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然后 1990 年，松下公司紧接着“仿效”，斥资 60 亿美元巨额购买了美国音乐家俱乐部-环球公司(MCA-Universal)。尽管还有其他来自日本的渗透——日本投资 6 亿美元给沃尔特·迪斯尼公司；日本胜利股份有限公司(JVC)给拉戈娱乐公司投资 1 亿美元；先锋电器收购了卡罗尔科电影公司 10% 的股份——但是索尼和松下的行动“最具影响力和象征意义”(阿克索和罗宾斯，1992)。

索尼和松下都采用了通过控制硬件市场和软件市场来达到在全球主导新图像业的战略。两公司用“协同”(“synergy”)一词来描述其跨不同销售渠道控制不同媒介产品(书籍、唱片、电影、电视节目)的目标。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言：

> 现在索尼能够控制整个链条。其生产广播电视设备的子公司制造拍电影用的摄影机和胶片；它的哥伦比亚公司拥有电影制片厂拍电影，而且要命的是，它决定了转换这些电影的制式。这就意味着它能在高清晰度的电视上播放电影并且用索尼录像机录制。它能将哥伦比亚公司2700胶片的唱片资料翻拍到8毫米胶片上以在其视频“随身听”上播放。
>
> （科普，1990：56）

索尼和松下都认识到，一个成功的企业依靠适宜的软件来支持硬件。他们还都认识到，该行业正发展成全球性行业，因此规模经济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兼并是控制世界市场所必需的。索尼称其现在的战略是“全球性的本土化”战略，意思是一方面它是遍布全球运营，另一方面它旨在从地区的和地方的市场里获取“内部人”的地位。他们开始大干起来、征服全世界。

欧洲和美国被推上了守方。赫伯特·希勒指明这种情形的反讽意义：

> 日本超级电子企业松下公司买断（好莱坞“大腕”之一）美国音乐家俱乐部/环球公司已经产生了一个有益的效果。它唤起美国新闻媒介以及政府外交事务决策者们认识到一个问题，而在过去的25年间他们坚定不移地否认存在这个问题——外部势力主宰文化。
>
> （1990：828）

顷刻间人们为面临日本文化并遭其渗透而忧心重重。人们担

心日本投资者正“出钱进入到美国的灵魂中去”。有人担心，日本与开放的西方截然相反，其特征是自我审查的文化：“不是进行什么公开的审查，相反却是一个很习惯于用微妙信号的社会的准则制定出不必要的苛刻规章，指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话语”（桑格，1990）。索尼或松下会不会准备拍一部诸如有关已故裕仁天皇二战时的作用这种禁忌主题的电影呢？还有人担心，日本或许会将“可口可乐殖民化”变成“日本清酒帝国主义”。

而且显然，日本文化与好莱坞精神特质没有可比原则。一边美国的特征是“种族民主”和多元化，而另一边日本被视为“种族单纯”和同质的文化群落。日本被视为意见一致、墨守成规的社会，恰与令好莱坞成为世界文化的个人主义和创新精神特质相左。最直言不讳的要算迪斯尼电影制片厂董事长杰弗里·卡曾伯格。他坚称：“拍电影的本质是表达情感”。而日本人显然是缺乏情感。日本人

> 就抑制情感方面来说犯了文化错误。我这样讲不仅仅是提出美国人的看法。是日本人最早告诉人们他们的这个特点的。
>
> 纪律意识和自控意识无疑一直是日本取得经济奇迹的关键因素，使它从一个小岛国变成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
>
> 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坚信，近期日本硬件制造商同美国影业商的连姻或许不会在娱乐领域再现。
>
> 对电影业的根本认识将出现分歧，这个行业有可能将证明对日本人和美国人是同样地令人丧气之极。
>
> （引自《多样化》，1991 年 2 月 4 日：26）

如果日本人现在投资西方大众文化,按迪斯尼一位副董事长的话来说,那是因为“他们敬重我们创造魔力的本领——我认为他们钦佩美国人的某些创造精神——近乎野性或是鲁莽,一种取乐意识——这是较为保守的文化所不能做到的”(引自休伊,1990:54)。敬重——来自低等文化的敬重——是一回事。“入侵好莱坞”和失去“民族遗产”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

一方面,日本的反应很显而易见,石原就作出了响亮的回答:“说情感上依恋像哥伦比亚电影制片厂这样的好莱坞机构和像广播城音乐大厦这样的纽约标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公众……应该懂得,作生意要有双方:美国人将这些财产推上了市场”(1991:89)。这段话说明日本不是在作拍电影的生意,而是在作赚钱的生意。美国内部也一直有人批评文化经济保护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说:“布鲁斯·斯普林斯廷没有因为他从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拉里·蒂施打工改为索尼公司董事长森田昭男打工就失去了他的价值”(引自特兰,1990)。按赖克的话说,这种防御性文化沙文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不再适合一个疆界、国界正被侵蚀的时代。在迅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是谁?”这个问题越来越值得争议,或许甚至是没有意义的(赖克,1987;1990)。

这样说在一个层面上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说,美国仍然相信自己有“灵魂”,国家灵魂,而现在视日本为敌是重新明确该灵魂这一认同的一种方式。尽管石原和赖克论证的逻辑显而易见,但是似乎清楚的事情是,西方既需要又想要这个日本问题。“同日本作战”的想法似乎满足了某种渴求。

日本崛起了吗?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人们的心理上搅起了千层浪。日本人不可能绑架布鲁斯·斯普林斯廷或迈克尔·杰克逊，这是题外话。极度令人不安的是，日本的利益集团好象躲在幕后运用像变色龙一样的全球本土化战略来遥控西方人的事务的做法。日本的经济战略看起来不公平且充满敌对性。他们不是购买美国或欧洲的产品，而是倾向于购买原材料甚至是全部企业。而且他们以令人胆怯的精神投身于这项事业。詹姆斯·法洛斯(1989a)从“日本缺乏同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感联系”，从一种几乎非人性的禁欲主义和献身精神中得出这种看法(参照:范·沃尔夫伦,1988;1989)。在《你只活两次》一片中，詹姆士·邦德的警方联络人田中虎(此人在二战中曾希望当一名神风突击队员)描述了隐身术(ninjutsu)的行武之道：

> 我的特工人员训练过日本最可怕的一项技艺——隐身术，确切地说是偷摸或隐身的技艺。你将见到的所有人都已经至少学完了武士道(bushi-do)十八般武艺中的十样，他们现在正在学习成为忍者(译者注:ninja，受过偷窃技术专门训练，被雇作间谍或刺客的日本武士。)，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直是间谍、刺客、蓄意破坏者基础训练的一部分。
>
> (引自约翰逊,1988:108)

《青少年突变忍者神龟》中的恶棍施里德躲在阴暗的下水道里，以忍者那样的信条侵蚀、削弱美国文明。这些大众文

化表现形式反映了对日本企业"偷摸行径"的焦虑之情。日本忍者被看作是以机器人那样的献身精神致力于夺取世界霸权,削弱西方现代化信条。

必须将这些焦虑情绪放在人们对欧美现代性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的背景下看待。现代性一直是"个神秘、神奇的词,它在欧洲(及美国)的自我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设下了一道屏障"(科尔姆,1989:14)。如果说是西方创造了现代性,那么也正是现代性创造了那个叫作"西方的"想像空间和认同。然而,正如艾格尼丝·赫勒和费伦科·费尔(1988)所指出的,现代性的根本推动力也动摇了其属西方的根基。现代性事业是累积而成,面向未来,基于技术发展进步的逻辑之上的。其各种要素也是为了向外输出和超越其欧洲的渊源和独有性。现代化和现代性主张普世主义,因此可以换位到其他宗主文化。这项事业在日本找到了发育的环境。技术和未来学的想像现在已经集中到这里;现代化抽象、普世化的力量已经从欧洲走到美国又走到了日本。"未来",让·博德里拉尔写道:

> 权力将属于那些没有渊源、没有真实性的民族,他们知道怎样彻底利用该条件:看看日本,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比美国更成功地掌握了诀窍,设法将讲求领土权和封建制度的强国转变成无领土权和没有份量的强国,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无法理解的悖论。
>
> (1988a:76)

日本现在已经实现现代化,似乎到了后现代的程度,而且恰恰是它的未来似乎成了当前一切文化群落的度量衡。因此,西方认同的基石引起了人们的质疑。

从1848年到1914年，大不列颠帝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债权国。美国在接着的70年里扮演起这一角色。1985年轮到了日本。日本是全世界头号债权国和头号最终投资者，其往来账户和资本账户的超净资产创下最高记录。现在世界上一半的商品和服务及一半的人口出自环太平洋的50个国家——世界经济重心已经开始从大西洋转至太平洋地区——从格林威治子午线移至国际日期变更线（威尔金森，1983；涩泽、阿马德和布里奇斯，1991）。

其他领域的角色也已调换了。在19世纪，欧美人视日本为异域的渡假地，而日本人视欧美为掌握着高效率工业生产秘密的守纪律、重视集体的社会。今天，成了日本人蜂拥来到美国和欧洲做异域旅行，成了美国人和欧洲人视日本为严格守纪、工业惊人高效的社会。与日本美好的传统形象相反，现在日本人越来越被看成工作狂，看作某"日本有限公司"统治下的"经济动物"，以其他一切为代价追求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制造污染，迅速形成威胁未来的人口稠密区。

就算"太平洋时代"将最终形成，那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焦急期待。罗斯福总统1903年便宣布这个时代就在眼前："地中海时代随着发现美洲而告终；大西洋时代现在正处于发展的巅峰，必定很快就黔驴技穷了；太平洋时代这个注定是最伟大的时代就要来临了"（引自奈特力，1991）。日本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这种优势常常似乎是个令人畏惧的前景。日本（有可能）的崛起常常威胁要置"我们"于危险境地。自19世纪后期以来，关于"黄种人威胁论"的担忧时不时地浮出大众的想像。最异想天开的场景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部落遍布整个欧洲，他们的脚辗碎了我们重要城市的遗迹，毁掉了我们的文明，他们纵情享乐以至于面无血色、精神空虚而腐化堕落"（勒内·皮农，引自威尔金森，1983：59）。

20世纪初叶,傅满楚(译者注:英国侦探故事里的中国恶棍,面部特征为从嘴角垂直挂下的胡须。)和黄祸(译者注:指黄种人发展对世界尤其是西方形成的所谓威胁。)之类的文学作品在欧美愈发受欢迎。长期以来我们主要的担忧都是针对要么以军事手段要么在近期以贸易战(廉价、"以次充好"的日本货一直是愤怒和焦虑取之不竭的源头)与西方无情地作斗争的日本。很容易就可以把"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的形象看作西方长久以来所担心的"东方专制"的回声——"东方专制"一词起先是古希腊人用来描述波斯人的,但是这个词仍为西方现在想像(后)现代的日本提供了祖传佐证。

闪米特人"和东方人

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的前提是

> (且不论历史实体)就地理实体和文化实体而言,诸如"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地区、地理区划都是人为形成的……因此,东方同西方一样,是一个拥有历史和传统思想、意像、词汇的概念,从而它是对西方而言的现实和存在。
>
> (1978:4—5)

酒井尚纪进一步论述了这一点:

> 东方的名称中并不含有任何内在共性,它跨越

① 译者注:闪米特人,近代主要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古代包括希伯来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亚述人等。

了中东地区到远东地区。人们在这些不同的地区里几乎找不到任何文化、宗教、语言方面的共性。东方不是文化、宗教或语言的统一体。其同一性的原则在其自身之外；能赋予其某种模模糊糊的统一性的是，东方是西方为了服务于自身历史进步所排斥和具体化的。东方一开始便是西方的阴影。如果不存在西方，那么也不存在东方。

（酒井，1988：499）

存在“东方”是因为西方需要它；因为它明确了西方这个构想。

欧洲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都属于包括了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区域支流体系”。在那之前，西欧国家只占据西北边缘的一块地理区域，中心位于地中海流域东端。然而，随后，“沿地中海的南北划分——该划分后来仅仅替代了东西分界——被错误地向后推移”而且被“当作永远不言而喻地铭刻在地理上（因此——根据明显错误的演绎法——也铭刻在历史上）”（阿民，1989：93；参照：科尔姆，1989）。在此转换中，北欧被重新界定为该体系的中心，所有其他地区被降至其边缘地区的地位。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历史被重写了：基督教被人随心所欲地附加到欧洲身上，成了欧洲认识自我的一项核心内容（尽管事实上基督教起源于中东地区）。下一个关键步骤是将希腊文化武断地附加到欧洲身上。正如萨米尔·阿民所强调的，“西方思想”史传统上是回溯到古希腊，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它是随着文艺复兴再度启用希腊文化和哲学才发育成熟的（阿民，1989：90，94）。这样“捏造古希腊”的问题在于古希腊人自己很清楚他们的根在东方，声称具有深远影响的腓尼基和埃及文化祖先们与19世纪“希腊狂”所构建的定义为“雅利安人”的希腊文化牛头不

对马嘴(参见:伯纳尔,1987)。关于这一点,卡尼提醒我们注意,"欧洲"这个名称本身"出自介于非洲和中东之间某地的传说"(1992:10),传说中,欧罗巴的父亲带着她跨过地中海来到希腊,却从未摒弃过她非欧洲的血缘(译者注:希腊神话欧罗巴是腓尼基王 Agenor 的女儿,被宙斯化作白牛劫到克里特,后嫁给克里特王 Asterius。)。

普遍观点是,自十字军东征时期,特别是后来在 1683 年奥斯曼军队兵临维也纳城池之下的那刻起便更加突显地是,促成欧洲努力统一的恰恰是"来自东方的威胁",这既是一种防御性反应,又对扩张、强化白色人种基督徒"开化的"欧洲侵略其他者的政策起到文饰作用。的确,人们都知道研究后古时期的史学家们声称,试图统一我们现在所知的"欧洲"的努力都是针对自己心目中的外部威胁,就此而言,如果没有穆罕默德(译者注:指穆罕默德二世(1430?—1481),土耳其苏丹(1451—1481),号称"征服者",攻克君士坦丁堡(1453),定该地为奥斯曼帝国首都,改名伊斯坦布尔,征服小亚细亚及巴尔干半岛广大地区。)就不会有查理大帝(译者注:指查理曼(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14)、查理帝国皇帝(800—814),称查理一世,扩展疆土,建成庞大帝国,加强集权统治,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学术的中心。)。然而,"东方"并不总是或者必然是"外部"。它也可以指"内部的他者"。德国的作者们直到本世纪还称犹太人是"亚洲人"或"东方人",萨米尔·阿民和爱德华·赛义德都强调了至少自勒南(译者注: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历史观点研究宗教,主要著作有《基督教起源史》等、尤以该书第一卷《耶稣的一生》最为著名。)时起就是借与"闪米特人"这个(包括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范畴相对照来界定(来源于"雅利安人"范畴的)"欧洲"范畴的方式。正如罗伯

特·扬所指出的，我们非得思考反伊斯兰和反阿拉伯情绪同其“黑暗阴影”，反犹太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可：“就这方面而言，犹太人等于是代表着内部的东方，当他们本应该继续隐藏起来，待在欧洲之外的时候却又神秘可怕地出现在内部了：于是驱逐或是铲除他们的逻辑便同东方主义自身无法分离了”(1990：139)。在欧洲种族主义理念当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给一起归入了东方的形象之中，西方世界竭力要将自己与他们区分开来。

所有上述似乎还不充分，尚有更复杂的情况。讲“犹太人”不仅仅是在具体指明某种族或人种。这种说法还催生了西方文化群落内部的怀疑对象。事实上，它确立了一个可以由不同集团在不同时间占据的象征性空间。近来许多评论人士已经指明，现在将占据西方想像中那块空间的是日本人。伊恩·布鲁玛(1991a)在简短论述欧洲新民族主义时引述了近期种族主义分子所宣传的一篇令人不安的文章：“犹太人全盘挪用了西方的方式，披着借来的羽毛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就跟头号的日本在世界上的行径一样”。斯拉福伊·齐策克(Slavoj Zizek)提请人们注意下述危险：

> 我们对“真正”犹太人的感知常常经过象征性意识形态结构的中介，这种结构试图解决社会对抗：犹太人的真正“秘密”是我们自己的对抗态度。比如，在今日美国，类似犹太人的角色正越来越多地由日本人来扮演。美国媒介沉湎于日本人不懂得怎样自我享受的观念就是见证。日本经济越来越比美国的强，原因在于某种神秘的事实，那就是日本人消费不足，他们积累了太多的财富。
>
> (1990：156)

与此类似，朱迪思·威廉森(1990)曾指出反犹太主义同反日本人的种族主义的相似之处：

> 反犹太主义来源于“富有的犹太银行家”的看法；因为拥有石油的酋长们大量买进英国的历史纪念物，反阿拉伯人的神话大量涌现。而现在我们担心被日本接管，同时大家都醉心于不可思议的习俗、醋栗色眼珠的罪犯、开着铃木车的坏蛋。

本-达桑(1972)写了“掮客或是说中间人的身份何以招致迫害”。他指出，日本人“在非白色人种的芸芸世界中以其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著称，他们的地位跟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差不多。正如犹太人曾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亚历山大城的名誉希腊人一样，日本人是名誉白种人”(出处同上：164—165)。他继续指出，日本人“或许有一天会发觉自己面临着普遍的仇视，这种情绪同曾在许多国家引发残害犹太人的仇视几无差别”(出处同上：166)。希洛尼(1991)从犹太人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人和犹太人同西方基督教世界互动的经历的类似之处。

就美国人对日本人接管好莱坞的焦虑之情而言，这个类比非常贴切。正如加布勒(1988)所指明的，在历史上正是犹太人为“建造”好莱坞发挥了关键作用：阿道夫·科尔(派拉蒙影业公司创建人)、威廉·福克斯(福克斯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人)、路易斯·B·迈耶(梅特罗-戈尔德温-迈耶公司创建人)、本杰明·华纳(华纳兄弟公司的创建人)都出生于东欧犹太人家庭。正如加布勒所述：“美国电影业……即我们说‘美国’的精髓所在，是由东欧犹太人建立并经营了30多个春秋，这些犹太人自身似乎就正是美国的精髓所在”(出处

同上:1)。加布勒的分析的要点在于,正是反犹太主义禁止他们进入更健全的行业,这种状况实际上便指引这些大企业家们走向像新兴的电影业这样的新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对他们的排斥稍弱一些。加布勒的论点是,因为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企业,

> 所以在摄影棚里和荧屏上……(他们)可以完全创建一个新国度——可以说,是一个他们自己的帝国……他们可以用美国的形象构筑他们的帝国,同样他们可以用成功的美国人形象构筑他们自己……这是**他们**的美国,他们所虚构出来的东西或许是他们留传最久远的传奇……最终,美国的价值观念主要得由犹太人拍的影片来**界定**。最终,借在荧屏上创造他们理想化的美国……(他们)在他们的故事情节中重新虚构了这个国度。
>
> (出处同上:6—7)

我们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不主要在于是否"犹太人"范畴和"日本人"范畴实质上有某些相同之处,或是说显示出任何本质上的相似性;相反,问题在于他们在西方的仇敌黑名单上占据越来越类似的不利地位。

1989年,日本人在民意测验中超过俄国人成为美国人最害怕的民族。"官方"的解释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正如麦肯齐·沃克(1991)所言,该情景反映出美国的大势已去:在此情景中,"显而易见的命运"原来是"从福特主义走向索尼主义",从而让美国世纪提前落幕。然而,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霸权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当人们认为日本人在大量买进——好莱坞制片厂、唱片公司、洛克菲勒中心等等——不知

怎么地让人觉得是完全或是典型的"美国货"时所迸发的种族主义和偏执狂情。这是个陌生人"偷窃"美国梦的问题。正如沃尔德马·贾纳斯泽克扎卡(1990b)所言,日本人现在是"20世纪头号陌生人"(参照:克雷松夫人,引自本书原稿147页)。他这样评述道:

> 如果是加拿大人(而不是日本人)买下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或是米老鼠或是洛克菲勒中心的话,那么强烈抗议就没有意义了。毕竟加拿大人就跟美国人一样,只不过欠缺了点儿什么。按照西方大众的想像,日本人是来自东方的异族,他们或许正试图接管西方。
>
> (出处同上)

贾纳斯泽克扎卡继续指出,这是

> 迄今,共济会、外国势力、玫瑰十字会(译者注:始于17—18世纪的秘密会社,自称有古传秘术。)会员、来自外层空间狡猾地装扮成人类的小绿人在白种人的想像中占据过的地位;而且,当然还有犹太人。整个大和民族像犹太人一样,似乎就是一个庞大的秘密社团,一门心思赚基督徒的钱。
>
> (出处同上)

当代表现出的反日情绪融汇了长期传统的种族主义蛊惑和恐惧,按照当代政治文化修辞重新锻造其语言和意像。正如朱迪思·威廉森(1990)用实例所指明的,里德利·斯科特那部获得巨大成功的影片《黑雨》的核心是美国文化帝国主

义同日本“经济”扩张的相互对抗。迈克尔·道格拉斯抱怨道:“你们日本人把东西坐得紧紧的,我甚至没法从你们屁股下拖出来”。他的日方搭挡高仓健不假思索就反唇相讥:“音乐和电影是你们文化的所有用武之地。……我们制造机器”。当然,美日关系存在特殊性。1991年,《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的英文译本正式出版,当时一个最具争议(因此也是被引用最多的)段落是石原声称美国决定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是“恶毒的种族主义”。在此背景下,《黑雨》中的大恶棍用假美元击溃美国的动机是报复洒落在广岛上空的“黑雨”,就很难说是偶然的了。

现代性和种族特性

我们必须承认,被主宰者的历史和地理因遭遇西方而产生了何其突兀、明显的裂缝。这种接触瓦解了国家地理和地区地理,不得不以新观点重述往昔的历史和故事:

> 似乎恰是用一种人们不熟悉的时间体系歪曲、替代了在接触之前的时光,能有效地消除残余旧事物。诸民族也被从他们各自不同的地理中心置换到由西方宗主国指定的边缘位置:于是有了像中东、远东这样的称呼……新历史连同新地理造就了原始的神秘边缘地带。
>
> (三好和津丹暗八郎,1988:388)

酒井尚纪(1988)强调了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性不是出于自愿的性质:“东方”的现代性原本是指屈从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控制。现代东方仅是它遭受西方入侵、击败、剥削

之后才得以降生；仅是在东方成了西方的目标后才进入“现代期”。对非西方世界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被剥夺了其自身主观性的状态”；于是，有可能“将东方界定为从来就不是个主体的事物”（出处同上：498—499）。有一点很清楚，“西方”不仅仅直接是个地理范畴：“显然，这个名称常常同那些政治或经济上看起来优于其他地区、社会群体、民族的那些地区、社会群体、民族相联系”（出处同上：476—477）。“东方”和“西方”的地理上直白地刻画着“前现代”与“现代”的差别。“西方”这个范畴常常意味着欧洲还有美国相对于“东方”的优势地位。

我们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始认识当代针对日本的歇斯底里和恐慌情绪。日本已经成为驻扎在西方政治文化潜意识中的危险形象，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破坏了西方/东方和现代/前现代之间单一的稳定关系。如果西方是现代的，那日本应该是前现代，或者至少是非现代的。若要符合拟定好的模式条件，“我们”依该模式决定自己的时空观念并将这种观念中他们的地域指派给“他们”，那么情况就应如前所述。这时，日本不再符合了，这就足以令已建立起来的历史-地理模式陷入一片混乱，造成迷失方向的恐慌（即便不是，也绝对是无东方主义的恐慌）。

西方社会科学一直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经济社会直线变革的过程，跨越了从17世纪欧洲那有文化讲理性的社会直至1945年之后的美国。它觉得日本展露经济超级大国的头角难于符合该模式（因为该模式是基于欧美对现代性的界定）。西方社会科学提出的可能性纯属造谣中伤、令人不可思议，说什么西方现在或许不得不“向日本学习”——即，让自己“东方化”，从而到21世纪在经济上同崛起的“儒学区”经济相匹敌。令人难受的事实是，日本这个最具东方性的东

方文化群落，随着它越来越超过西方经济，现在或许已经成为所有社会中最(后)现代的了。

日本已经做的事是使人怀疑所谓的西方是否仍是现代性构想的文化和地理中心。它还混淆了这样的假定，即只能以西方构建起的形态来表述现代性。这实际上摆明了西方现代性的基础是种族主义。如果现代性有可能在东方安家落户的话，那么东西方之间任何实质性，而且导致实质性的差别便值得人们怀疑了。不能再老套地视日本为“东方”；不可能把日本的现代性当作某种反常现象而忽视或者不加考虑。其特殊性坚决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它。而且，与此同时，它坚决要求我们认真思考这种状况对于西方自己的特权和安全意识的影响。

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

罗伯特·扬在《白人神话》一书中强调了“启蒙运动，其宏伟规划和普世的真理假说，同欧洲殖民主义历史的关系”(1990:9)。他指出：“因此，将其他人当作整个体系内的一种知识加以盗占可以同欧洲帝国主义(如果不算其构想的话)历史相提并论，将其他人命名为‘他者’可以同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相提并论”(出处同上:4)。他汲取了德里达的理论，指明随着西方文化的发展，“白人误认为自己的神话、印欧神话、自己的**逻各斯**，即其语言的**神话**，是他一定仍旧希望称为理性的普世事物”(出处同上:7)。爱德华·赛义德的著作在解构这种文化和知识的欧洲化方面显然独具重要意义。《东方主义》一书颇具说服力地分析了铭刻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和制度当中，将“东方”不仅展示为认识客体而且是权力客体的过程。

赛义德关于“中东”的论述显然对于思考西方所构建的“远东”具借鉴意义，但是理查德·迈尼尔的强调很对，他说：“‘西方’同日本的历史联系跟‘西方’同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之间达成的关系大相径庭”(1980:508)。例如，虽然日本的确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叶屈从于西方势力，但是“日本没有当过殖民地”。迈尼尔补充道：“长久以来连接东西方的文化纽带在日本和西方之间也不存在。日本过去不具有特殊意义”。这就意味着对中东而言非常重要的关系，即东方主义专家的认识与帝国主义势力和军事势力间的特定关系，对日本而言并不存在：日本人的书斋“从未遇到赤裸裸地‘凌驾于东方之上的权威’，而赛义德认为这种权威是东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迈尼尔继续指出：“日本也没有等着让西方去发掘它自己的往昔、历史、认同”。日本一直是个深奥微妙、富于文化修养的文化群落，而且事实上，一些最广为流传的用西方语言所写的论日本的书籍都是由日本人著作的。显然，“关于日本，西方几乎没什么可教给日本的”(出处同上：514—515)。日本文化明摆着封闭起来的完整性对于其在东方主义研究者的想像(*译者注：原文为法文* imaginaire)中是如何运作的一直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其不可缩小的差异源源不断地散发出诱惑力又引起焦虑情绪。(从拉夫卡迪奥·赫恩的《解读日本初探》一直到罗兰·巴思的《符号帝国》)远东主义一直受日本文化那微妙神秘的礼仪所吸引；在这种东方主义当中，日本是自我隔离和文化超凡的中心。厄尔·迈因纳在《英美文学中的日本传统》一书中意指：“日本同西方一样是高度精雅的文明，除了它新鲜、理想化的行为方式和艺术形态对厌世的西方人格外具有魅力，其便利的现代化设备都是西方人所熟悉的并且跟他们的一样”(迈因纳，1958：270；参照：梅洛特，1987/8)。与这种

精雅的异族文化截然相反的是,厌世的西方人沉湎于不知羞耻二字的惟美主义、色情、理想化。日本"恰是东西方的汇聚地",西方惟理主义在这里或许能借与东方神秘主义"联姻"而梦想成真(迈因纳,1958:271)。

然而日本文化这个令其格外有诱惑力的独特性也可以激起人们的恐惧和焦虑。有人担心日本惟美主义和惟灵论那神秘莫测的面纱背后的东西。有人担心日本不可缩小的差异仍将漠然置身在西方理性和普世主义之外,使人捉摸不透。还有人担心西方文化自身或许会被这个东方的他者征服。这是现在关于"日本问题"论述中的一个根本议题。《金融时报》(1991 年 9 月 19 日)一篇社论根据表现出的症候指出:"英国,当然不单是英国,担心某种阉割。"布鲁斯·卡明斯披露了一份未公开的报告,系中情局(CIA)委托罗彻斯特技术研究所所做,该报告试图探讨日本人同"我们"有多大差异的问题:

> 该报告认为日本人"是长生不老、不讲道德、操控型文化的生物……只适宜这个地域的这个人种。"或许你要问,他们最像哪种"生物"。噢,日本人"就像靠其他人的力气生存的八目鳗一样"过活。这份"论著"暗示,这条八目鳗在吞食了整个世界之前不会停止吸吮我们剩下人的生命之血。
>
> (卡明斯,1991:365)

这代表了对石原《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的一种反应。正如卡明斯所述,我们现在在搞"美国可以说唷!"(译者注:"唷!"指水手开始拉缆等时的叫喊声。)这或许荒唐可笑,甚至滑稽之至,但是这是种族歧视。这或许属极端现象,但是反映出对日

本这个"他者"的普遍态度。

根据詹姆斯·法洛斯(1991a:7)所说:"日本引起人们注意力最久的是那些关于其差异性的问题"。纵然差异可以诱惑人,但是它也常常搅乱人心、充满危险、最终让人无法忍受。必须同化或是排斥"他者":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那样子差异的位置。科尔内伊·卡斯托里亚迪(1992:4)写道:"人们争议的问题是,明显没有能力在不排斥他者的情况下树立自我——而且明显无法在不贬低然后最终憎恨他者的情况下排斥他们"。卡斯托里亚迪指出,文化冲突往往将他者封为低等:

> 主体评价其制度最简单的方式显然是以——无须详尽的——确认的形式指出这些制度是惟一"真实的"——从而指出他者的商品、信仰、习俗等等是假的。从这个意义说,他者的劣势仅仅是个对应物,来证实自我社会制度系真正的真理。
>
> (出处同上:6)

("我们的")社会制度独有的基石"在于对本制度的信念,更具体地说,在于其有权给予世界和生命以凝聚力,因而一旦有证据表明存在其他方式给予生命和世界以凝聚力和合理存在,它便觉得自己处于致命危险之中"(出处同上)。容忍差异不容易。但是如果另一种文化要是似乎,而且自称"等同于"甚或是优于"我们的文化",那该怎么办呢?如果不能排斥或是皈依那种文化,那该怎么办呢?如果它像日本那样夸耀其差异性,那该怎么办呢?

从一种意义上说,"日本问题"是指日本不可缩小的差异的问题。日本的差异性是西方面临的一个尤为特殊的问题。

日本这个他者将计就计对付西方。西方的东方主义看起来已经在似乎是"逆向东方主义"中找到了对手。萨迪克·扎拉尔·阿尔-阿兹姆(Sadik Jalal al-'Azm)在论述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时探讨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原教旨主义的问题。他指出,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原教旨主义关于伊斯兰文化生来优越的论说"仅仅是复制了传统东方主义学说有关东西方、伊斯兰世界同欧洲的差异那一整套无法让人置信的构架而已。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面上都出现了这种反向重复,仅仅是在或明确或含蓄的价值评判中掉转方向而倾向于伊斯兰世界和东方"(1981:22)。东方主义"一分为二的"手法决不单独是西方思想的标志,"逆向东方主义"最终"同东方主义本身一样的反动、具欺骗性、无视历史、反人性":近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化病变"("Occidentiosis")(指用"腐朽的"西方价值观念"玷污"伊斯兰文化)的批评充分证实了这种趋势。

然而,这里是抽象地提出此论点,而且同权力问题——这里指西方在制度上的权力,它确保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权威——割裂开来。正如莱塔·马尼和鲁思·弗兰肯伯格所指出的:

> 西方的描绘恰恰是在特定的一系列东西方不平等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正是上述关系赋予他们力量和耐力。直到这种世界历史环境改变了再谈"逆向东方主义"才有意义。
>
> (1985:187)

失去了权力,谈"逆向东方主义"也就没有实在意义了。但是日本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至于日本,考察近期搞得轰轰烈烈的那种或许实际上该

被认作是一种"逆向东方主义"的现象，这是有一些意义的。我们现在指的是出现了"日本性"、"日本独特性"、"日本优等"、"日本是头号大国"这些日本人论(nihonjinron)学说。日本人论学说是指关注日本显而易见的独特的文化民族主义。他们摆出若干假设，主要围绕的观点是日本人构成了文化与社会同质的种族实体，其精华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与其他所有种族大不一样。日本人论学说决不是新事物：这些"对日本人的论述"(日本人论的字面义)一直搞了至少100年(戴尔，1987)。理查德·迈尼尔评论道：

> 日本不管得不得势，其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的行为的传统都很悠远；又有哪个民族不是呢？或许欧美关于"非西方"世界的看法与众不同仅因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欧美动用军事实力将这些看法付诸实施。
>
> (1980：516)

然而，现在危险在于，这些学说在日、欧、美均势不断变化的新背景下功用发生了转变。随着日本将在技术、制造业、金融领域夺取霸权地位，随着关于日本军事实力的问题逐步登上政治议事日程，人们越来越担心，是否日本现在掌握优势并且会想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在这些权力关系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日本人论学说呈现出新的重要意义，欧美对这些学说的反应亦然。

西方在历史上是普世参照点，他者们据此而被界定为特殊体。因此，日本的存在"是一个特例，其认同观总是取决于一个他者。不用说，这个他者是个普世的他者，两相对照，日本的单一特性显得更加耀眼"(酒井，1988：484)。如果说日

本人论学说强调了日本与西方数不清的差异,从而通过偏离西方来界定日本的认同,那么"这只不过是从西方的角度来定位日本的认同,这反过来又确立了西方作为普世参照点的中心地位"(出处同上:487)。尽管如此,日本依然一直渴望改变这种情形,目的是想占据中心主体地位,以自己的普世思想方法来决定其他特殊体。从最近日本人论学说的发展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系列"将第一世界和日本共同作为主讲者来重写世界历史和地理的试验"(三好和津丹暗八郎,1988:390)。西方对日本的焦虑是面对冒出来威胁着一直被视为西方必然合理拥有的普世主义权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忿恨之情。

日本文化已经衍生出一种逆向东方主义,即罗兰·罗伯逊(1991:192)所称的"西方主义",它的基石是声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乃自私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颓废、傲慢,还有明显为日本种族纯正而感到骄傲,这一点与美国人种和种族混杂据说结果造成其走向衰弱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人这种自我设想、自我断言会以极具挑动性和对抗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当在海湾战争期间一位日本评论人士将美国人说成是"我们的白人雇佣军"(布鲁玛,1991b:26)时,对此西方势力很难接受。当石原向"白种人"发出警告,说他们现在是智竭才尽,他们的文明走上穷途末路时,这无疑令人胆战心惊、不知所措。被警告说未来属于那些"在东方且属于东方"的人们,岂能不触动白种人的神经。

面对这些"西方主义的"挑战,西方世界的回声有两类。第一类是防御性的,反映出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方向且丧失了自信。或许日本已经成了头号大国? 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非常显著的转变,这种状况在埃兹拉·沃格尔那本广为流传的《头号大国日本》(1979)一书出

版,以及美国能"向日本学习"什么的问题出现之后尤为突出。这种情况也转化成试图借恢复美国的精髓差异而重振民族自我形象和自尊心的努力。人们实际上见到的是"类似日本人论的美国人学说,其中主要争论以什么办法能巩固美国民族文化,保护其不受全球相对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美国例外论等同于日本独特性的观点"(罗伯逊,1991:189)。因此,詹姆斯·法洛斯(1989b)曾指出,可以通过利用在动乱和开放方面的"美国天赋",通过摒弃他所谓的已经以依赖于教育考评等等文凭主义的方式控制了美国社会的"儒教"让美国再振雄风。这不是说美国例外论的论点是新事物。它显然不是。新鲜之处在于日本作为参照点的中心地位,根据(或在相对于)它来界定"美国性"。

但是如果说曾出现这种调整型的反应的话,那么也曾出现更激进的报复行为,攻击人们所认为的日本的挑衅。"收拾日本"的呐喊声在1987年前后突然甚嚣尘上,这是西方世界同苏联阵营关系缓和的一个直接后果。正是走向所谓的世界新秩序的变革在改变美欧对日本的态度。现在人们对眼中的日本残酷执着的经济扩张主义的敌视,对日本这样漠视全球关注的(环境、饥饿)问题的态度的愤怒,对日本在政治上(海湾战争)缺乏团结心的不忿之情都愈演愈烈。石原(1991:77—78)记述了一段对话,其中一位美国众议员说:"美苏关系突飞猛进,而华盛顿与东京的伙伴关系却很有可能会解体"。石原反问道:"您的意思是说美国人和俄国人已经重新发现他们皆为白种人的共性吗?"这位议员点头称是。

近年来抨击日本的两个人迈克尔·西尔瓦和伯蒂·施耶伦指出,我们如果想洞察"日本人的思想倾向"就不得不回顾战争年代(1990:156)。这两位作者为了能认清日本的经济战略,明确地用珍珠港作为参照点,"当今经济冲突不只是模

糊地类似"于它。此外,詹姆斯·法洛斯在他的一篇经常被他人引述的文章中点明:"日本始终心怀恐惧,担心世界其他地方将要联合起来对付它、排挤它"(1989a:40)。法洛斯继续指出,日本最近一次有此感是在珍珠港之战期间,当时该国的军方头目"确信,西方已下定决心联合起来致日本于死地,因此日本还不如进攻呢"(出处同上)。日本人有"自恋癖"、"整体原则薄弱"、"同世界其他地方缺乏情感联络",所有这些令日本显得像个强大的危险分子。日本是不同的:一个必然的敌人。西方的情绪是忿恨和好斗。人们谈论的中心是"即将爆发的对日战争"(弗里德曼和勒巴德,1991)。

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针尖对麦芒:相互竞争的文化。谁将是"未被注意到的"(必然的)普世参照点呢?谁将占据"中心地位","他者"必须根据它来界定自己的特殊性和边缘性呢?"西方"对"东方"。我们可以说,不应该也不需要搞成这个样子。用伊阿卜-哈桑的话说,西方和东方"已经互相'传染'了,而这在总体上是有利的"(1990:74)。我们可以说,这些互动"预示着人类有可能达到的认识,这种认识既不是世界性的也不拘泥于本地"(出处同上:83)。然而我们现在是互相多疑:"认为他者压根儿就是他者的看法说起来如此简单如此真切,它是逆社会制度'自发'趋势的历史产物"(卡斯托里亚迪,1992:6)。人们投入了大量精力,渴求排除他者。

技术东方主义和未来的现代性

因此从一种意义上说,西方的"日本问题"指的是诸文化自恋癖之间的冲突。但是仅仅这样说也过于简单了。有可能把日本经济技术的惊人成功归因于"日本人的头脑",这一点甚至有那么些令人宽心。指证东方人顺从、偷偷摸摸、赤胆忠

心是在意指日本没按规矩竞争。于是欧洲和北美经济相对不那么成功就一定是遵守普世原则和道德准则的结果了。照此推理，即便是竞争失败，也有可能重申西方文化在本质上（即文明程度上）的优势。

差异性用途广泛：不能主动轻易放弃它。疯狂地维护差异可以维系西方文化和认同的同一性。尽管遭遇差异是令人痛苦的，但是它所避免的——它所抑制、否认、或拒绝接受的——是某种更加令人痛苦的东西。它推迟了遭遇西方的自我认同和自身利益，也推迟了承认日本和西方所体验的现代性中的共同之处。

技术在西方认同里的功用和重要性对于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西方失去了它自吹的技术优势会是什么样子呢？技术一直是其神威现代性的核心。而现在，西方担心失去自己的技术霸权会影响到"阉割"自己的文化。技术被看作是通向未来的钥匙，而现在日本在技术发展的关键领域越来越处于领先地位。具象征意味的是，美国的军事生产力日益依赖日本的高科技零部件。日本振兴这方面的实力一直是绝对有意识的战略。自19世纪起，"日本的领导人便清楚地知道，如果它不把自己拽入现代期的话，国家就会像马来西亚和中国一样沦为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溃败的日本战后领导层懂得，技术和工业是恢复任何形式独立的惟一途径"（法洛斯，1991b：34）。森田昭男曾讲述了自己是怎样专门竭力使索尼的形象成为"技术品质"的同义词。签于战后初期反日情绪甚浓，为了避免人们想到"日本"产品的负面含义，这样做十分必要。森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次采访中回忆了他曾面临的任务：

我1953年头次访问欧洲时发现日本由于二战

在欧洲的形象很差……因此我想："除非我们造出技术品质真正高的产品，否则我们在这儿就卖不掉任何东西。"因此我们一直试图改变我们的形象，集中精力在技术品质水平上。

日本通过技术创新战略，不仅仅恢复了独立，而且现在已将自己拉入甚至超越了现代期。

拉米斯（1984）曾指出，这是一个完美融合了技术和合理化改革的社会。杰出的技术已和日本企业（索尼、尼桑、松下、日立、东芝、丰田……）联系在了一起。在唐·德利洛的《白色噪音》当中，杰克·格拉德尼的女儿在睡梦中清清楚楚地发出两个萦绕心头的词，"丰田赛力昂"：

一个孩子在没睡安稳时呢喃的几近胡话的词为何令我感到一种蕴意、一种存在呢？她只是重复电视里的话。丰田火霸王、丰田赛力昂、丰田海狮。超国家的名称、电脑发音、几乎在全世界都可读出来。每个孩子大脑里的一些噪音，仅次于静态的区域，由于太深了所以无法探测。

（德利洛，1985：155）

高技术已经和日本性结合了起来。从中正被编织出新的技术神话。日本可以被设计成"全世界最伟大的'热爱机器的'国家"，在这个文化里"机器是最珍贵的朋友"（凯托，1991）。日本已经成了未来技术——荧屏、网络、控制论、机器人、人工智能、仿真——的同义词。这些日本技术将为我们做什么？技术神话主要围绕着对某种后现代人类体验突变的看法。查利·利德比特（1991）写道："日本人不是在改变我

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他们在做的事情更为彻底”，他们将带着我们走很远很远，进入另一番电子图像和声像的天地……未来，现实和电子世界的分界线或许会更加模糊不清，甚至到了无法完全辨认的地步”。日本人正在开创模拟现实的新领域。卡拉 OK、弹球盘、电子游戏、虚拟现实。日本技术正在“模糊现实同模拟之间的界线……造成现实仅仅是模拟世界的一部分的感觉”（矶崎，1991）。

如果未来靠技术革新塑造，如果技术“日本化”了，那么这个三段论演绎就意味着未来现在也是日本的了。后现代时期将是太平洋时期。日本是未来，而且这个未来似乎正超越并替代西方的现代性。当一个民族的认同观已经与其技术实力融汇到一起了，这些进展当然给欧洲和美国带来剧烈的不安和不稳定。西方世界已经不得不尝试顺从这一技术“阉割”所带来的一切必然后果。正如技术创新的动力看起来已经东移，同样，这些后现代技术也已经构筑到东方主义的学说中去了。由于有了这些新技术，自相矛盾的两套日本性呈现出新的形态；新技术已经同对日本认同和种族特性的认识结合起来了。

一种反应是认为弹球盘和电子游戏仅仅等于禅教和歌舞伎在后现代的产物。它们跟日本“传统”文化一样，也体现着日本独特性那富于异域情调、捉摸不定、神秘莫测的本质。这一点在后现代浪漫主义手法将日本幻化成某个介于现实与想像的空间中清晰可鉴。东京是“后现代旅游”这个新现象的中心：“现代分散式大都市的范式。（它）并不完全是让人迷失方向——相反，原本就没给你定出过方位”（撒克雷，1989：35）。在计算机高手的虚拟创造中显而易见这种惟美主义和异国情调。正如光广吉本（1989：18）所评述的，威廉·吉布森的《神经瘤癌》融合了“当代日本作为未来高科技的象征和

仍旧在美国大众的想像中盛行的封建时期的日本那与时代落伍的形象"。里德利·斯科特的《刀械走私者》可以说也是这样。斯蒂芬·比尔德称这是"将日本重新塑造成拥有高科技魔法的国家"：

> 泡菜、技术色情制品、城市高密集化、移动时尚、充斥暴力的电影、可视电话、传真摄像机、手提电视、电视游戏、活动房屋、甚至有"钻劲极强的"的十几岁的信息迷，即"你们"(otaku)，这些新人类避开身体接触，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花在收集媒介上细枝末梢的资料上。
>
> (1991:25)

借想像这种高科技的妄想是异域(和色情)的狂想，就可以暂时打消我们对西方文化"重要地位"的焦虑之情。高科技东方主义使得有可能"遗忘文化、着迷于感情疏远、在一系列的情形中消除自我"(出处同上)。

但是这种技术东方主义还有更加充满忿恨、更具攻击性的种族主义的一面。将技术和日本性结合起来现在用来强化一个文化群落冷漠、非人性、机器般的形象，这是个同世界其他地方缺乏感情联系的专制文化。"你们"这代人——由于沉湎于电脑现实而"在日常生活中消失了"的孩子们——便是这种文化的一个典型。这些媒介儿童"普遍蔑视物质接触，却热爱媒介、技术交际、复制模拟的王国"(格拉斯马克，1991:201)；他们的特征表现为一种"漫无目的"和"在超现实中自我分裂"(出处同上:207)：

> 在强调模拟的电脑媒介主义时代里，高科技的

> 媒介成为生存的条件……待在电子子宫里的媒介电子人也被称作**异类**……驱动他们的是技术带来的空无实体、没有内容的欢愉。
>
> （出处同上:213）

这些孩子被想像成正在突变成机器的人；他们代表了未来控制论下的一种存在模式。这样做把日本人搞成了非人的模样。日本在西方的政治文化潜意识里已经成了空无实体、非人性化的技术强国。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后情感疏远和反乌托邦的形象代表。这同时激起人们的忿恨和忌妒之情。日本人是没有感情的异类；他们是电子人和复制人。但是人们也认识到现在这些突变人更适合在未来生存。"你们"是后现代人。用博德里拉尔的话说，未来似乎已经移向人造卫星了。

这种技术东方主义中有某种非常令人不安的东西。我们已经按照卡斯托里亚迪的理论指出，产生西方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动机是文化群落显然在不排斥、贬低、随后憎恨他者的情况下无力塑造自我。必须把他者定为劣等的，卡斯托里亚迪(1992)称这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倾向"。这是一种自恋的逻辑，从陶醉于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角度出发来塑造自我。但是这种技术东方主义的逻辑还包含些东西，一些更深层次、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非本质的"东西。正如卡斯托里亚迪继续指出的那样，也可以把对他者的憎恨视为"潜意识中憎恨自我的另一面"；这种憎恨"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通常其公开形式是人无法容忍的，它酝酿了对他者最强烈的憎恨之情"（出处同上:9）。通过从纯理论角度、或许仅仅是从比喻意义上来探索这种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说人们表现出的对日本技术（合理性、发展、进步）的忿恨之情反映了潜意识中原发的对西方这方面成熟的憎恨之情。对我们自身文化已经

转变成的现代性;对威胁西方社会中某些深层面(或文化单元)的现代性(极权)元素或许(发狂地)拒绝、摈弃、厌恶。

或许日本只是映照我们自身现代性及其不满者的一面镜子。说不定日本仅仅给我们映照出我们自身文化中的“畸态”。鉴于日本坚持拥有现代性的权利,鉴于其拒绝接受西方幻想中的东方主义,或许真是有可能要“向日本学习”了。我们要愈发认真对待这个说不的日本。或许我们应该少点关心我们认为它所揭示了“他们”的东西,而多留意它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自我和自身文化的东西。日本人说不的意义重大,因为它在眼下向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和对日本直到目前所存在的文化和种族状况的认识发出了强烈挑战。日本因其复杂性而值得注意:因为它是非西方的,却又拒绝再当我们所说的东方;因为它坚持要现代化,却又质疑我们这种现代性。因此,日本提供了很多可能性。它潜在地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超越了区分现代与传统,然后将其叠加到东西方的差别之上的简单二元逻辑。只要日本令这种干涸的划分法复杂了、混淆了,那么它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白人的现代性。

这种理性和想像方面的挑战虽然不能够、也不会避免欧美日之间的冲突,但是它使得有可能以更加复杂的方式处理现实利益上的差异。日本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走出用西方现代性同其(前现代的)他者对照的世界观。同石原的论点相反,现代期并没有随着替代“白种人的”现代性而进入尾声。如今,现代性比以前任何时候更算是这个世界所有文化群落所处的情形。问题是,它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被塞进该现代性的,它们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共处。日本的成就在于从现代性的角度说,它现在同欧洲或美国没有区别。日本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其种族特征,以及它是头一个非白人国家按照

自己的主张挤身现代之中的。这样一来便暴露出迄今为止所构建的现代性的种族主义基础。

对日本的恐慌

西方对它所见到的日本文化那神秘莫测、遥不可及、难以确定的本质憎恶不已。最令西方感到不安的是，这个异族文化现在成了“头号大国”，经济技术进步的典范。在美国和欧洲，人们强烈地意识到日本的**他性**，并越来越担心这个“他者”的威力。

我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定位1991年在英国举办的被称为“举国颂扬日本文化和社会”的“日本节”。正如马克·霍尔本在为巴比坎的《走出日本》展览会所写的目录中说的：“人们频频从日本吸纳西方的角度来描述日本同西方的对话……相反，对于西方吸纳日本却没有定论，甚至鲜有描述”。或许通过这项活动我们被迫面对并吸纳那个文化。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走出日本”，走出幻想中神秘、邪恶的东方，这种幻想大谈当代西方文化的排外和自恋状态，从而阻碍了更加充分地认识日本这个他者以及与之协调的一切可能。

日本人在西方人心中的刻板印象是次人类，他们似乎没有感觉、没有情感、没有人性。人们认为日本人显露这种个性的一种方式是残忍的兽性行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星报》描绘了一场“血宴”，这次“日本要人参加的令人作呕的盛宴的菜肴中有生鲸鱼肉”。文中继续讲道：“在东京举办的这场宴会上，他们大口朵颐着大块的动物舌头和没有煮的动物皮切成的丝”。日本人被看作是冷漠、麻木不仁、杀气腾腾，那是因为他们同世界其他地方“缺乏”某种情感联系。卡

雷尔·范沃尔弗伦(1989)在《日本力量之谜》一书中描写了日本人通过塑造性格主动压抑个性倾向,从而有助于使其做出预定的有组织的行为。日本在我们文化的潜意识中成为野蛮形象的象征。

即便日本人被看作异类和野蛮人,但是西方人还承认他们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要更现代更先进,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日本被视为技术和合理化完美融合的社会。它现在实际上是未来技术——荧屏、网络、机器人、人工智能、仿真——的同义词。然而,这里的任何自相矛盾之处仅仅是表面现象。日本人的"成就"没有令他们显得些许不那么异样。正如技术创新的动力已经东进,同样,这些新技术已经纳人种族主义的学说中。随着这些技术和日本人的同一性和种族特征结合起来,技术强化了日本冷漠、非人性、机器般的文化形象。野蛮人现在已成了机器人。

似乎西方永远不会直接看日本。好像日本人常常命中注定要被透过欧美人的恐惧和幻想来看待。日本是东方,它拥有西方世界所有最缺少的东西和最担心的一切。西方针对日本人的差异,加固、捍卫了它眼中的自我优等文化和认同。因此,西方想像中的日本发挥了巩固玄虚事物和成见的作用:"他们"是野蛮的而"我们"是文明的;"他们"是机器人而"我们"还是人;等等。

生存攸关的竟然是西方现代性的身份。正是西方创造了现代性,而且现代性一直同那个称作"西方的"想像空间和认同相联。基于此,我们可以说现代性天生具有种族性(尽管是西方自己看不见的种族性)。现代性本是一方面由于欧美之间的障碍,另一方面由于欧美与世界其他地方间的障碍而孕育出来的。然而,这个障碍常常是脆弱的。支撑现代化事业的技术进展和进步的逻辑常常是动态的,常常是扩张性的,

常常威胁要超越并背叛其西方渊源和排他性。

现在它似乎已经在日本找到了理想的新宗主文化。似乎未来已从欧洲落入美国又落入日本，从“我们”落入“他们”。这种状况已搅乱人心，引起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不安全感。如果日本人能成为现代的，那么西方还有什么是独具一格的呢？现在西方在哪里，又是什么呢？我们是谁？这便是对日本的恐慌所指的内容。如果现代性有可能在东方安家落户，那么东西方之间任何本质的且显示出本质的区别便令人质疑了。不能再将日本仅仅当作西方现代性的模仿者来对待。不可能将日本的现代性当作某种反常现象而不予理睬。其鲜明特色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它。

随着我们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近年来关于日本“经济奇迹”的一些偏执狂想似乎正逐渐消褪。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参见：拉费蒂，1994）和一些学术论文指出，日本经济自己现在四面楚歌。具体说来，关于本章中心议题，也有报道显示，迄今日本人在好莱坞的投资总体上并不赚钱（参见：里德和拉费蒂，1994），因为收购的好莱坞公司大部分一直是消耗日本母公司的钱。1994年11月索尼公司的力量源泉，董事长盛田昭夫辞职，许多人解释说导火索是自索尼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制片厂之后该厂一连串失败给公司造成的财政负担。然而，即便人们认为日本这个星就要陨落，但是在西方想像中的东方苍穹又升起了其他的星星：现在所有的话题主要不是日本给西方造成的威胁，而是象征意义上日本的后继者——东南亚“四小龙”——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发展速度。

第九章

缄默政治
——社会群体的意义和媒介的用途

> 集团是决意对同一件事保持缄默的人的集合：一件于是成为秘密的事。这个"缄默的事实"将这个集团聚合起来，维系它，甚至搭构它。违反它便是冒犯了一个禁忌，揭开了一个大伤疤。这便有使该集团陷入绝望的危险，因为它已经吸收、消化了这种缄默，以确保其真正生存下来。
>
> （丹尼尔·希博奈，1993）

媒介业在欧洲文化共同体中被赋予了领导地位：它们应该清晰地传达出我们"紧密团结"的集体意识和共同文化；与此同时，要求它们反映出欧洲各国各地区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人们相信，或是说希望，这项文化事业会有助于树立欧洲面临世界新秩序时所必需的社会群体意识。但是就欧洲可

以把自己想像成一个社会群体而言，似乎人们正在想像的是个难以想像的社会群体。

在过去的十来年间，整个欧洲协同首创了一系列行动，旨在改革广播电视业和媒介业。媒介新秩序正在形成，作为设计师的那些政治家和官员们期望媒介业和媒介技术支持并支撑起欧洲一体化和统一的事业。随着 1991 年 10 月《欧共体电视规程》的实施，他们在细化法规，让广播电视业的组织和管理冲出国界限制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无疆界的电视节目”指的是创造一个满足欧洲共同体在 21 世纪需求的广播电视业和文化。

人们争论的议题是关于媒介和社会群体的问题。人们常常注意到，大众媒介在民族文化和认同的历史演进中发挥了根本作用。印刷媒介及随后的广播电视媒介形成了大众，而大众开始设想国家这种社会群体和民族主义。基于这种历史经历，所以现在人们普遍假定媒介注定在推进欧洲文化和认同当中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人们的推论是，跨国媒介将形成跨国民众，这些人于是将开始设想新的欧洲社会群体。政治家们和官员们相信，他们在创建拥有单一市场的经济共同体的同时也为未来覆盖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打下了基础。

关于这些推论和假定我们想问的是，媒介能为该项欧洲规划做些什么？如果我们审视当今，尤其是 1989 年的现实情况引爆了“1992 年”的理想以来这段时期的发展，那么建立跨国共同体的前景便显得黯淡无望。尽管在经济上存在一体化的趋势，但是我们从欧洲大陆的政治文化生活中看到的是分散割裂的动态。欧洲“陷入两股对立势力的冲突之中：即促成共同体的经济因素和相互依存的逻辑，和要求分裂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逻辑”（乔菲，1993：43）。更危险的是，当欧洲陷入这两条针锋相对的逻辑当中之时，它缺乏政治对策

解决所面临的问题。阿兰·图雷纳评述道:“我们现在所持的是本质上为经济视角的国家观和本质上为文化视角的社会观,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恰当的政治范畴来调和经济世界和文化世界”(蒂博和图雷纳,1993:28—29)。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缄默,这种政治意愿的危机阻碍了形成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新欧洲后国家社会群体观。

这便是欧洲正在孕育的媒介新秩序以及人们期望它促进一体化和聚合的背景。我们要指出,不管是政治家们、官员们还是其他任何人提出的这些期望都无法实现:媒介不会成为创建想像中的欧洲社会群体的手段。我们倾向于同意菲利普·施莱辛格的观点,他指出,欧洲的情况实际上“阐明了我们对传播政策期望值的局限,从而让我们三思社会层面的欧洲和传播层面的欧洲的关系”(1993:7)。我们现在目睹的是没有能力让大市场的经济空间与欧洲社会群体的诸政治文化空间达成任何一致。特别烦人的是,建立跨国界的政治性大众领域很困难。

建设欧洲媒介文化中的这些局限反映了这项欧洲规划中大范围的紧张关系和矛盾,但是也有些局限源于广播电视媒介自身不断变化的性质。弗朗索瓦·布律纳(1993a:4)曾指出,当代媒介已经造成一种现实贬值、“剥夺现实”,使得观众迷失方向并抑制他们形成政治意识。它们的行为是“让我们单纯当观众,也就是说没有权力……当面对被表现为事物规律的东西时,我们只能听、看并保持沉默”。我们想从这方面进行探讨。媒介的什么本质在阻碍建立跨国社会群体呢?

媒介与社会群体

从如今的欧洲媒介业身上我们看到新的超国家调控环境

初具规模，其重点已经大踏步地从在原来的公共服务体系下典型的切中政治转移到经济、产业、竞争政策方面的问题。现在的重点在于创建欧洲视听大市场，它将在欧共体内消除节目购销和传输接收中的壁垒。新的媒介技术和市场似乎嘲弄边界和疆界；竞赛规则是媒介产品和服务"自由流通"。人们感到，广播电视业里"继续存在国界障碍和因此造成的分散化阻碍了欧洲生产商同外部竞争者较量。它们是欧洲工业和文化认同的主要障碍"（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6：6）。欧洲媒介必须迅速从过去的分散状态转变为形成一体化和凝聚力的新状态。

这关系到从管理模式过渡到下一种模式，前者要求广播电视业者为城市观众提供多种多样且搭配平衡的节目（教育、信息、娱乐），而后者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欧洲媒介业的竞争力，旨在满足全球市场消费者的需求。这便要对我们正目睹到的欧洲广播电视业的变化作一个直白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简约的描述，因此我们将对此简要地加以描述。然而、直白的描述具有突出经济主义逻辑的优点，该逻辑在欧洲转型中是支非常强大的生力军。J·G·A·波科克称欧洲新秩序是"市场帝国"。他指出，人们正在构建的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其基础是

> 一系列保证各国放弃控制经济力量运动的权力的协议，而经济力量在人类事务当中享有无上权威。因此，由成员国共同运作、而且/或者遵从的机构不会是再分配主权的政治机构，而是行政机构或企业性质的机构，意在确保没有哪个主权当局能妨碍市场行使"主权"的无限权力，这个"主权"因为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所以是个比喻。
>
> （1991：9）

这或许意味着欧洲只能指望成为经济—行政联盟，致力于阻止、遏制那些永远威胁着要令其分裂或解体的政治势力。尽管迷雾重重，但无疑再走下去是有可能的，并坚持经济技术霸权在眼前对创造凝聚力和一体化至关重要，而该凝聚力和一体化在远期会支撑起大大超越经济范畴的超国家社会群体。无论如何，现在的实际状况是政治体系服从于经济体系。广播电视领域现在的实际状况是私有媒介和广告商的利益占了上风，超过了对公共服务和媒介民主的关注。

当然，这些都要困难得多，而且构建市场帝国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事。文化和政治坚持要将欧洲媒介业复杂化；创建欧洲媒介市场不可避免地会撞上文化偏好、口味、愿望的问题。大约20年前，托马斯·古巴克发现了一条在这项欧洲规划中努力体现出来的经济逻辑。他指出，创建经济一体的欧洲"有利于商行扩大至国际水平，随之而来的是趋向标准化，而代价是牺牲小企业和大部分多样性"。他继续指出，如果情况如此，

> 那么显然，强调的重点不在于保存多种多样的文化遗产，而在于拟定与超国家经济动机和谐的新文化遗产。那样的话，我们最好忘记往昔，集中精力关注创建——或是说构造——新的欧洲经济消费者，其需求将由或许用美国的管理方法和广告手段运营的国际化公司来满足——即便不是由它们形成的话。
>
> （古巴克，1974：10—11）

这个逻辑仍旧有效。人们仍旧相信，或者说也许是希望，有可能构造消费新式欧洲节目的新型欧洲消费者。

如果说驱动这项规划的是条经济逻辑，那么同样，期望单一的广播电视市场促进重新设想欧洲的社会群体和认同，这也是有一定“远见”的。人们指出，正如在整个欧共体自由流通节目增强了欧洲的生产和传播能力，同样，这将最终促成实现“文化的欧洲”和“公民的欧洲”的理想。要是“无疆界的电视节目”梦想成真，那么欧共体的经济空间必须同其文化空间一致起来。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认为：“从一开始便为整个欧洲制作的节目也许可以依靠在国家层次上永远无法拥有的受众和资源；它们将有助于强化对过去各自为政，而现在紧密团结的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情感”（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6：9）。泛欧电视将有助于增进欧洲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增强他们对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命运的意识。虽然这种看法非常值得质疑，但是其存在似乎也有某种必要性。它是未来欧洲文化的一种理想，或许是市场技术治国能够实现的惟一理想。

事实上，欧共体正努力创建的是国家广播电视模式的扩展版；即试图在较高层次上让广播电视的经济空间与文化空间保持一致。它旨在说服我们相信，欧洲受众或许最终会对想像出来的社会群体和团结具有某种超国家的身份乐在其中。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时代里，面对来自地区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压力，一致性和完整性以国家这个折中方案得以存留了数十年。或许现在继而代之的是个类似一致的办法，不过是以欧洲为折中方案，即便这个想法尚处计划阶段也似乎不大可能。正是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相符合才给予了国家广播电视业共鸣和活力。这种情形在更大的大陆范围上很难重演。但是，全球化进程毕竟已经激发起一些力量，它们使得现在似乎在任何层次都难以维持那种协调一致。

这项欧洲媒介规划的另一个疑点是作为其基础的环境是非常单薄、抽象的统一体。它冒着轻视现实的危险，而复杂的

现实却对上述想像漠不关心并拒不顺从。该欧洲文化区的完整性遭到来自外部和内部势力的威胁。外部对欧洲脆弱的完整性的挑战来自于那些非常看重"自由流通"的人们——他们对此观念看得如此之重，以致于相信应该在全球范围自由流通产品和节目。在他们看来，由于构建欧洲文化区的想法必须建立在文化保护主义和防御的基础之上，所以是件过时、荒诞的事情。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质问到："难道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文化都那么不牢靠，以致于必须把欧洲消费者圈起来、蒙蔽住，否则他们与自己往昔的联系就会像爆炸的恒星一样消散了吗？"（引自卡特，1990：4）这些利益集团旨在利用他们视为"关贸总协定"所赋予的权利来确保"无疆界的电视节目"意味着比欧洲共同体意欲搞得小范围欧洲事物多得多的内容。

在欧洲内部，这种统一的理想受到坚持相反理念的人们的辩驳，后者颂扬欧洲内诸主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欧洲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激进分子们反对文化熔炉的信条，竭力维护真正的在本质上是文化七彩板的大陆形象。他们强调的恰恰是保护国家和地区纷繁多彩的文化遗产。受众行为证明，电视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国家的媒体，国家电视文化仍旧是值得考虑的力量。目前，难以看出还有哪种认同方式与之抗衡，难以看出为什么国家电视文化未来不会继续成为基本参照点。与此同时，他们为广播电视在次国家及小国家范围有可能开拓的事业而感到兴奋。在倡导该事业的人们看来，这些可能性是指不顾那些被视为推进集中化和同质化的势力而复兴认同和社会群体。地区媒介和地方媒介被视为民主和认同的基本源泉。我们从中看到诉求的是有具体定位的意义和情感归属，这两者似乎已经遭到国际化和全球化努力的侵蚀。丰富多彩的"由诸地区和小国构成的欧洲"所唤起的是当代

的新单一主义。

在欧共体广播电视政策演变过程中，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和排他主义的战略都曾发挥作用。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战略是创建庞大的视听市场，该市场能撑起同样庞大的视听业，在全球范围同美、日集团竞争。正如理查德·柯林斯指出的，那时候"人们主张通过共同的欧洲电视频道和共同的欧洲节目制作来形成统一……是因为这样保证能对欧洲文化和意识产生整合效应"（1992:10—14）。然而，最近已经出现明显相左的重点，强调多样性甚于统一，例如欧共体的"媒介计划"。这项计划的重点放在需要承认并细心体察文化差异。一位欧共体的决策者近期这样说道："我们没有兴趣搞熔炉，我们想保护欧洲特性"。而且，当然，多样性和差异这个问题同国家广播电视业和广播电视政策这个依旧重要且突出的问题混在了一起。一位法国观察家认为："装扮起欧洲各国丰富性的审美差异和文化差异无法与文化一统化协调起来……文化，尤其是视听文化，触摸着民族主义的心脏"（克卢泽尔，1992:46）。

似乎必须让渴求共同欧洲文化的愿望同更令人舒服的确定的国家或地区归属感达成某种调和。欧共体视听传播政策的条款正在塑造，或是更应该讲是重新塑造一个"文化的欧洲"（"Cultural Europe"），以便让我们来归属并认同：

> 欧洲的文化特性在欧洲人民的集体意识里：他们的价值观念是座共同的文化宝库，其特征为建立在民主、公正、自由基础之上的多元人文主义……它既包含有可能进行新的交流与合作，充实我们的本土文化、地区文化、国家文化的多样性，还包含了建立在从属于欧洲文化以及欧洲人民更多地参与到文

化生活这样的基础上的新型团结关系。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1988b：3）

人们现在维护的是继续具有现实意义并焕发生命力的欧洲概念。正是历史上的大陆这个概念最适合它，而又包含了大量不同的从属源及认同源；如今做个欧洲人拥有复杂多元的效忠对象。

关于在新欧洲里媒介与社会群体的这种关系的看法，这里有两点要提。第一，最好从诸同一体的紧张关系和压力的角度来看待根据丰富性、复杂性、选择而展现的内容。处于一体化的欧洲之内似乎是可取的，然而这种从属方式也相当抽象，并使人担心我们原先的同一性在该进程中多少逐渐被丢失或毁损。而且尽管文化民族主义的替代物是一种新的主张那样看法的方式，但是人们也充分意识到了狭隘的限制性归依关系的局限性。事实上，我们所目睹的是诸同一体之间暂时悬而未决的状况，其中没有哪种选择方案似乎完全令人满意。正如朱莉娅·克雷斯特娃指出的，这种状况很容易便会演变成认同危机，“人们不再知道什么是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并拒绝所有他们认为有威胁的社会群体方案”（1992a：1）。在欧洲广播电视业的指令或是致力于“为繁荣成员国文化作贡献”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当中对这种复杂性谈到了什么呢？

第二条看法是，欧共体广播电视政策的重点放在以牺牲政治群体问题为代价而强调文化群体问题上。在欧洲旧有的公共服务体制下，广播电视肩负了双重政治责任，既是国家或民族主义文化的焦点，又是民族国家公众政治领域和民主政治的基石。它的任务完成得有多么成功还是多么不成功有待各方发表意见和辩论：关键是，在国家这个折中方案中，至少

在原则上这两项功能在同样的领土范围内结合起来。在欧洲新型媒介的情况下,这种调和看起来疑点非常多。欧洲共同体迄今没能为欧洲公民身份打造下充足的政治文化或基础(巴雷特-克里格儿,1992)。强调欧洲的文化群体于是弥补了这种政治上的缺憾,并转移了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危险是,在欧洲视听空间内,文化同一化的补偿将超越公众辩论和公民权利的政治目标而占了上风。

新欧洲的社会群体

在历史上,大众媒介在现代欧洲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根本作用。媒介不仅仅同资本主义民主与生俱来,而且与之密不可分,一同演进。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基石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和民族文化的政治空间。尤其战后,正是广播电视发挥了最强有力的整合作用,成为社会集体得以形成且自视为民族集体的首要机构之一。广播电视充当了空间,反映并塑造了国家社群这个想像物(译者注:原文为法语,imaginaire。),还充当了首屈一指的论坛,再现民族国家的民主生活。

然而,在欧洲加速一体化的背景下,人们提出有关媒介在未来构建政治文化群体中的作用这些重要议题。尽管人们已经提出新媒介将有助于在欧洲范围内构建民主的公众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几乎不清楚建立在这个跨国基础上的政治群体可能意味着什么。欧洲共同体的"官方"政策实际上表示国家概念的广播电视向超国家层次位移。正如菲利普·施莱辛格评述的:"在电视没有遇到一个政治文化群体,相反,电视面对文化、语言、政治多样性的状况下,有关其合理性的问题马上应运而生"(1993:10)。要认清广播电视对重

新构建欧洲认同的贡献，要思考是否欧洲广播电视能与这种多样性协调，我们必须首先认清正在构建的社会群体的某些性质。

人们过去正是通过某种社会群体意识来感受到他们从属于并认同于某领土。社会群体一直指的是社会一体化，指在社会集团内取得一致性和凝聚力；应该视其为一种折中方案，一种约束关系紧张的冲突势力的方式。当然在现代社会里，社会进程的规模和复杂性注定了社会群体的含义不是简单直白的。艾琳·约和斯蒂芬·约（1988）曾区分了社会群体具有的相互对抗的含义。他们认为，一方面社会群体是积极关系的特性，“是拥有共同事物的特征，是共同认同的情感，而且最积极的一点是，它是相互关怀的人类关系的特性”（出处同上：230—231）。它是“**由人们为**自己建造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社会群体同国家和民族相联。在这个范畴里，“社会群体**已经**存在，或许在有记忆之前便存在了。它肯定在日期上早于居民的活动，也不取决于居民的活动，它自上而下地来为居民服务；它是为人们而不是由人们建造的”（出处同上）。这时候，它是一种正式的、抽象的关系，一种社会契约，最民主状态的社会群体反映舆论，关注公共利益（但是它当然并不总是民主的）。

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人们围绕着上述相互对抗的含义辩驳社会群体的性质和范围。这一直是“自下而上的社会群体”与“自上而下的社会群体”间的较量：两种意义的斗争，前者是更特殊、更本土化的社会群体观，主要以种族和人际的关系自内部形成的社会群体观，后者是更抽象和超验的社会群体观，它与现代社会扩大了的领土上的体系一体化相关联。然而，重要意义在于国家社会群体在约束这些关系紧张的对立动力方面已经取得成功。正如约夫妇所述，人们的目的一

直是"融合或混淆这两个对立体，将感情共鸣和伙伴关系的温情附加到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上，这些社会关系是自上而构成并常常涉及到国家"（出处同上） 现代社会里，当感情共鸣的魅力和扩大了的政治群体那更为正式、契约性更强的关系达成了互补性、或许是补偿性均势时，社会一体化和凝聚力才最有效。

当然，正是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社会群体的互助共生意义和契约意义之间的这种妥协关系很紧张。国家社群凭借其主权国家，至少在原则上消除了在涉及利益的冲突事件中既代表公民集体利益又充当仲裁者或调停人的政治根源。凭借民族国家的机制，内部冲突得到控制，外部冲突和威胁被吸收或转移。但是，除此之外，国家一直是公民感觉有自己根的"地方"。它显示了直接和甚至是发自肺腑的归属体验。用斯拉福伊·齐策克的心理分理学词汇来说，国家充当着"我们的东西"（"our Thing"）：

> 充当了只有我们可以得到的事物，充当了"他们"，指他者们，不能抓住，但是仍然不断受到"他们"威吓的事物。它似乎是给予我们生活富足和活力的东西……。如果有人问我们，我们怎样能认出这个东西的存在，那么惟一不变的答案便是，这个东西在被称作"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个难以表述的实体当中。
>
> （齐策克，1990：52）

国家这个"东西"指的是社会群体"安排其乐事"的独一无二的方式。或者，用埃德加·莫林的话说，民族主义表示"将人们曾经对家庭怀有的孩子般情感投入到国家身上"；国

家是"家园"、"祖国母亲"或"祖国父亲"(1990:30)。国家社群在这个意义上指的是社会群体安排其对承认和安全的集体需求的方式。

然而,现在国家社群成员的乐事和安全似乎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什么事。人们感觉到,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期,即民族国家的权威正遭到削弱,国家不再能够保证经济政治的整合,"命定的国家社群"的看法值得质疑。艾里克·霍布斯鲍恩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民族国家在撤退,世界的任何未来历史

> 将无可避免地不得不被写成这样一个世界的历史,这个世界不管是政治方面,还是从经济或文化或甚至语言方面都不再能包含于如过去所界定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内。这个世界将目睹"民族国家"和"民族"或种族/语言集团主要是从新的全球超国家构体面前撤退,或者抵抗它,适应它,或者被它吸收或被它扰乱。
>
> (1990:182)

可以把这个变化进程看作全球化势力的一个反映,这些势力正跨越国界,削弱民族国家,而且据说正在创造新型全球公民社会。龙尼·利普舒茨指出:"到20世纪末,我们将看到主权自两个方向从国家渗漏出去,向上进入到超国家组织,向下进入次国家组织"(1992:399),在此过程当中,我们将看到"全球公民社会这个正在规划的公民社会越来越多地重构、重新设想或重新筹划世界政治"(出处同上:391)。利普舒茨意指,这个全球公民社会反映了17世纪之前存在的那类超国家社会,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国家体系出现之前,

有一种相对生机勃勃的跨欧洲公民社会，它与领土有关系但不囿于领土"（出处同上：400）。

难道这个变革时期就标志着"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力开始终结了吗？难道欧洲和欧洲社群的概念标志着这个大陆上政治文化生活的下一个、而且是更加世界化的阶段吗？我们很可能会将信将疑地审视政治家们和官员们的愿望和灵感。事实上，我们从构建欧洲共同体的规划中似乎看到更多的是试图在更高的等级上重新创造国家社群的形态——构建一种欧洲民族国家。欧洲被用作整合、统一相互矛盾的冲突势力的新基地。人们期望感情共鸣和政治群体之间的关系或许能在这个更高的层面上重新协调起来并达成妥协。因此，我们认为一种对民族主义的转移或替代将形成新的扩大的社会群体，该社群与国家社群同样拥有要达成政权、人民、领土一致的目标和愿望。

但是如果欧洲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市场和一个势力集团，那么就更难看出来类似历史上民族国家所实现的构建共同统一的政治文化。不管我们就此或许还会发表什么看法，民族国家过去有能力平衡社会群体的互惠共生意义同政治意义，从而在文化归属同政治生活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对于欧洲范围，值得质疑的问题是将作为感情共鸣的社会群体同作为民主国家的社会群体结合起来，将"文化的社会群体"的理念与"政治的社会群体"的理念调合起来。结果，似乎将发生的事情是公民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一步步分离。

根据正发生在一些民族国家身上的情况可知，最关键的是在欧洲层面上的政治文化和公民身份问题。斯蒂格·夏瓦德（Stig Hjarvard）在论述从国家的政治空间和公众领域进入到大陆的政治空间和公众领域可能会意味着什么时，承认"在欧洲层面上，没有哪些公众有能力发挥至关重要的功用

或对政治议事日程作出另一种解读或定义"(1993:90)。他继续指出,欧洲公众领域的缺陷是"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其中资本国际化和超国家行政机关形成的步伐飞速,但没有伴随着公众认识的平行发展" 夏瓦德似乎暗示,可以纠正欧洲的"民主赤字"。他认为,迄今为止,"欧洲公众领域只处于初级阶段",我们仍要走一些路来细化在整个欧洲有效宣传和辩论的恰当机制。

但是这仅仅是恰当机制的问题吗?或者,有没有阻碍形成一个欧洲政治文化的更深层的障碍?艾蒂安·巴里巴尔认为,我们必须关注"现在国家正趋于变成什么样子,它现在怎样运转,在欧洲空间内它正完成什么功能……尤其不能将欧洲这个空间简单地简化成一片'领土'的形象"(1991:16)。他确指的问题是,我们明显没有能力形成适合跨国社群时代的政治文化和公民身份。欧洲陷入了民族国家有局限,却又不存在超国家的替代形式的两难境地。尽管欧洲共同体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行政(和约束)机构——即一种特定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它还没有设法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法治国家,欧洲人在这个国家里相当于公民。巴里巴尔指出,在这个"没有真实国家的中央集权制"统治里,所有的条件都适合"产生并保持集体认同恐慌感。个人害怕国家,但是他们更害怕国家消失并解体"(出处同上:17)。这指的是当代欧洲的政治生活危机和政治危机。

如果说欧洲共同体从一方面看是试图在更高层面上创造国家社群环境的话,那么它或许结果也是在一个日益由全球化势力塑造的世界当中支撑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机制了。我们可以认为欧共体为成员国提供了一条集中他们某些方面主权的途径,目的是牢牢抓住对他们——在现实中或象征意义上——具有更大意义的其他那些方面的主权。例如,我们或

许可以将附属原则视为把因欧共体的存在而取得的事物"重新国家化"("renationalisation")的机制。但是这不仅仅是保留欧洲民族国家的问题。我们还正看到整个一系列的新民族主义的、地区主义的、种族的愿望在激增。这反映了在世界新秩序下正被重新塑造的欧洲里,民族主义情绪和感情具有恒久的吸引力。托姆·奈恩问到:"为什么《历史的终结》将我们向前带入一个民族主义更强的世界?"(1993:6)。即便霍布斯鲍恩(1990)在指出民族主义的历史重要性在衰退时也不得不承认,它仍是世界上一支突出的力量,现在世界上的民族主义仍和以前一样多。(另请参见霍布斯鲍恩(1994)对共产主义后时期欧洲民族主义复兴所做的更加悲观的评估。)民族主义情绪和感情被用来在未来欧洲生活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将用于一个变更了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我们同国家社群的关系是不同的。

这次民族主义精神的复兴是个复杂而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可以认为这体现了重振公民社会,主张更有意义的集体认同,以抗衡源于布鲁塞尔的官员们和技术治国论者的欧洲观。朱莉娅·克雷斯特娃指向寻求新的民主参与方式,意指这些新式的单一主义感情是"试图填补政府同街上行人、政治主张同亲身履行的责任之间的沟壑"(1992a:1)。但是上述感情当中也会带有危险的狭隘地方观念的特征。它们调动起感情共鸣的温情和从内部创造并维系熟知的或亲缘关系的社会群体理念。这种新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认同问题凌驾于公民身份和民主的问题之上。乔纳森·弗里德曼注意到:

> 过去的国家认同削弱了,新的认同浮出水面,尤其是一种称作"公民身份"的成员身份解体了,该"公民身份"是在按领土划分、由国家管理的社会中

抽象意义的成员身份，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原生的忠诚"、种族特性、"人种"、地方群体、语言及其他具体文化形态的认同。

(1989:61—62)

尽管人们曾求助于国家来代表其利益并保证其权利，但是危险在于现在他们将求助于集团团结的保护。地方层次上政治生活的弱化为文化认同开辟了既当避难所又当慰藉品的道路。而且，在这个层次上，社会群体的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之间的妥协失衡了。

人们争议的是现在欧洲的社会群体问题。我们曾表明，欧洲大陆上有相互矛盾的战略在运作：一边是创建欧洲共同体这个超国家实体的规划；另一边是重申欧洲诸国和诸地区专一的诉诸感情联系的社会群体。看来是决定——这实际是个永远推迟的决定或准决定——接受在一体化状态与分散化状况之间的某种反复无常的妥协方案。麻烦在于两者自身似乎都不能是可以让人接受或是有意义的选择。雅克·德里达明确指出了这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欧洲文化实体"不能而且一定不能接受集权政府的首府"，然而另一面，它"不能而且一定不能分散成无数个省份"(1992:39)。德里达评述道："因此，既不能垄断也不能分散。这当然是个疑难。"(出处同上:41)这正是令社会群体的体验让人既沮丧又不安的地方。

从一个角度上说，这个议题指的是欧洲可能怎样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权模式。该模式"描绘了由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社会群体的发展，这些主权国家是在私下里并常常以强迫手段解决它们的分歧；它们搞外交关系，但除此之外表现出最低限度的合作；它们寻求将自己的国家利益置于其他一切国家之上"(赫尔德，1993:17)。在这种看法当中，公民身份的政治文

化几乎完全是指国内问题——“我们的”群体——而且公民不关心，或者说不参与到发生在其主权国家边界之外的外国事务之中。国家社群包括“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有权管辖他们，与此同时，它排除了陌生人和异类，我们将自己同这些人区分开来，对他们我们负有最低限度的责任和义务。现在所要求的，而且实际上在更加雄心勃勃的欧洲主义之说中所承认的，是需要同其他文化、社会群体、国家协调起来。在世界秩序变幻的背景下，需要承认一个社会群体有义务延伸出自身的范围；一个社会群体不再能仅仅为自己成员的自我利益而奋斗，而是必须认识到诸文化群体间日趋上升的相互依赖性和随之带来的对边界内外的“外国”公民的义务（布朗和舒，1981）。如果该欧洲规划要有所成就，如果要用更开放、更普遍的政治文化替代“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话，那么上述义务必须在创建政治文化体制当中且通过此行为表现出来。

然而，时下欧洲正发生的事情却与这种愿望大相径庭。从民族主义情绪的复兴，从明显无力将欧洲设想成不同于显然只是扩大了的国家社群的事物，我们看到“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欧洲文化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欧洲自发的政治文化群落——欧洲共同体和诸国家社群——是一种封闭和内向的群体。现在在欧洲，“不论是在地方、地区、国家、还是大陆层次上，不论在经济、政治、宗教、还是种族方面，巨大的诱惑都是撤退”。最普遍的问题是关于“寻求经济发展与担心不安全，开放边界与留恋封闭稳定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反差”（哈斯纳，1991：20）。我们所正目睹的与其说是替代了“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不如说是对其进行了修正、改造，以适应新秩序的要求。勒内·加利索评述道：“出现了将国民对立于外国人的法律不平等之后，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边界是闭合的，所以现在我们中‘欧

洲血统'的人同非欧洲的人有了本质区别"。他指出："这不是个回归的问题，而是个排外歧视和种族歧视扩展或是位移的问题，这种歧视先前——当然现在仍是——以国家的形态出现"（加利索，1992：12）。

争议点是在出现全球化、世界新秩序以及对旧有确定事物的这种挑战激起所有这些焦虑的新背景之下有关社会群体的问题。这种情形下的窘境是，何种社会群体能提供最大程度的稳定和安全。能够维持国家社群吗？地方社群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可能更切实可行，这是真的吗？或是说通过创建欧洲范围的社会群体，其赢数会更多？然而，人们没有提出怀疑社会群体和归属公有社会的价值。在艾里斯·扬看来，社会群体的理念"表达了渴求社会完整、对称、安全、固定认同的愿望，其中认同由于得到他人的确认而客观化了"（1990：232）。还有："社会群体的驱动力常常同保留身份的愿望重合，而且在实践中该驱动力排斥了威胁该认同观的他者"（出处同上：12）。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对外人将经常有一定程度的不容忍。外人由于其存在而威胁着会揭露我们想像中的认同基础：陌生人没有跟我们同样的意向，他们不会终止对我们借以宣称拥有本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想像契约表示不信任。现在在欧洲，支撑社会群体原则的努力包含努力让国家社群的原则——这些原则已经大体满足了人们对完整和安全的渴求——适应新的秩序。展开这场斗争的背景是这样一个世界，这里，越来越不可能避开陌生人；这里，虚构的"我们的"社会群体因而常常将被暴露而且很脆弱。

社会群体和抑制

在构成国家社群当中起作用的原则，或是说强烈的愿望，

是(种族、宗教、语言文化、领土)同质的原则。统一的民族国家由于坚如磐石且倾向于闭关自守,所以似乎实现了人们渴求凝聚力和完整性的愿望(尽管我们或许会认为,与其说是实现了该愿望,不如说是建设国家的现实政治为这个愿望创造了可能条件,或是说创造了设想这种愿望的可能)。而且,只要它曾寻求消除差异和复杂性,那么在构成国家社群和文化时便要将那些似乎损害国家存在纯洁性的元素排除出去或是置于边缘地位。正如齐格芝·鲍曼(1992:678—679)指出的:"推进同质化必须辅以标示、隔离、逐出'异类'的努力"。这种民族主义认同就其本身而言"永远呆在被围攻的堡垒里……。认同随其边界的安全而存亡,而边界除非有所防守否则是不起作用的"(出处同上)。不管得到什么样的凝聚力和完整性,代价都是要永远提高警惕,维持本地人和陌生人之间的界线。正是这种认同逻辑以其焦虑、自闭的存在方式和归属方式似乎像是现代必然和无可避免的认同模式。

现在正是这种认同思想在更高等级上决定了目前试图构建欧洲社会群体观的努力。正是在这个更高等级上的推进同质化似乎实现了我们对社会群体、文化、认同的期望。于是,通过转移或聚合民族主义情绪,人们正创建起整个大陆的统一体。欧洲文化的官方语言意义重大:它是凝聚、一体化、统一、社会群体、安全的语言。人们正根据理想中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来构建欧洲新秩序,从界限和遏制的角度来设想欧洲认同。在这个更高层次上似乎仍旧需要明确区分开本地人和异类。从这个意义去想,它当然有可能同鲍曼描绘的国家社群一样岌岌可危、令人担心。常常不得不对付世界上产生分化、解体作用的势力来支撑、捍卫它所渴求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在新的欧洲共同体里,领土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头等大事。由于欧共体内部为创造单一市场已经取消经济疆界,所以

欧洲对外边界的安全成了格外要害的问题。如果说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共产主义阵营"界定了东边的"自然"界线的话，那么冷战的结束也让这种方便荡然无存了。东部问题再度登上议事日程;欧洲现在正试图重新商定其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实体东部和东南部边缘的领土界限。再回想本书176—177页(指原文)引述的J·G·A·波科克(1991)的评论。

然而这不是个简单的关于包含和排斥的经济标准、甚至政治标准的问题。沿着上述东部和南部边境的争议点还恰恰事关欧洲的文化和认同。可以从欧文勋爵在接受《新闻周刊》(1990年8月6日:54)采访时的评述推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不得不弄清楚欧洲的边界在哪里，而且欧洲的边界不在土耳其和伊朗的国界线上"。这样渴求清楚、这样要求确定欧洲的尽头，是要构建一个象征地理，将内部人与外部人、那些属于欧共体的人与威胁要扰乱欧共体的统一和一致性的陌生人分开。于是，在树立自我的同一过程当中，这个小范围、白人的、属西方的欧洲社会群体也塑造着那些似乎总在纠缠其希望和理想的异类。我们已经看到恐惧是怎样转变成对移民、难民、恐怖分子、毒品贩子、寻求避难者——所有那些象征着不尊重欧洲疆界的人——的忿恨之情。我们也看到了人们正怎样使出越来越多的阴谋诡计对付这些侵入者和边缘人物。正如乔纳森·艾尔(1993)评述的，西欧正在逐步建起"一系列防御工事，这些工事常常不易觉察，但却比柏林墙更有效。从航空公司办事员到匈牙利边境卫兵，每个人都正努力防止外人进入西方世界"。

然而，整个欧洲大陆转型的性质和规模已经到了那些被认为是异类和陌生人的人们——"新蛮族"——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共同体的中间的地步。欧洲人将无法回避他们。因此，根本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有办法来和他们共处下去。

正如阿兰·图雷纳指出的，现在社会面临的重大议题是"教会人们共处、在寻求统一因素的同时尊重差异"（蒂博和图雷纳，1993：32）。如果欧洲人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努力采用某种更佳的方式，调和自身对归属的需要和渴求与他们当然不得不向他者的需求开放的义务。他们将不得不找出某种途径，连接起国家的价值观念和世界的价值观念。

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新秩序浮出水面的背景下，不管欧洲是什么样了，它都将面临着洪水猛兽般的问题。否认由于苏联解体或随着东部和南部的移民潮而涌到欧洲面前的大规模困难，这会是愚蠢之举。我们现在指出的是，这些不得不从这个或那个角度面对的困难由于欧洲共同体自身的心态而加剧了。我们应该不得不与之协调的正是作为一个想像机构的欧洲。正是其特定的欧洲概念和欧洲理念现在挡在路上，阻碍通向人们所呼吁的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变革和地缘文化变革。

有关欧洲社会群体的想法和理念，有关超越疆界，有关本质上仍旧统一的文化群落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我们听到了很多。冈特·格拉斯在著述欧洲的吉卜赛民族时嘲讽了这些高不可攀的理念："他们能教我们懂得疆界是多么地没有意义：罗曼人和辛蒂人（译者注：罗曼人（Romanies）和辛蒂人（Sinti）都是散布欧洲、居无定所的吉普赛人。）才不介意什么边界，他们在整个欧洲四处为家。他们是我们所宣称的：天生的欧洲人！"（1992：108）。然而，欧洲似乎害怕吉卜赛人。欧洲共同体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因为他们不一样。因为他们偷窃、躁动、流浪、目光邪恶、艳丽惊人得让我们自惭形秽。因为仅仅他们的存在便令我们的价值观念值得怀疑"（出处同上：107）。他们所展示的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欧洲统一规划所缺乏的。这应该有充足理由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将如何理

解欧洲共同体的理念同现实欧洲结果将成为的样子之间的悬殊呢？我们将如何解释自己似乎无力——我们拒绝或抵制——解决该悬殊和它带来的一切不可思议的后果呢？

我们需要服从自己渴望认同的本性。朱莉娅·克雷斯特娃(1992b)曾描绘了现代认同模式当中发挥作用的"精神暴力"。她指出："因为我们受这种暴力的诱惑，所以与认同问题作斗争的伟大道德工作还与当代死亡、暴力、仇恨的体验作斗争"(出处同上：106)。这种暴力根植于现在令欧洲大陆地抖山摇的狂澜巨变所激起的恐惧和焦虑之情。恐惧与他者有关——即恐惧是投射到他者身上的——而人们感觉来自那个他者的威胁于是激发了仇恨和暴力情绪。雅克·朗西埃曾指出，我们必须面对的根本议题是"他者当作恐惧对象的识别体的问题……我想说，认同首先是指恐惧：对他者的恐惧，对不存在的事物的恐惧，在他者的躯体上找到了目标"(1992：63—64)。正是这种恐惧挡住了欧洲的理想之路。朗西埃关心的是欧洲是否有办法，而且有决心"教化"那种恐惧。

恐惧和焦虑常常出现，而且常常有可能造成暴力和侵略行为。需要某种会包容、平息这类情感的机制。正如保罗·霍加特指出的，这种机制"构起某种有界的空间，其中可以承载意义和焦虑，从而影响它们"。他意指，这样的空间对于"形成能面对自身的恐惧而不怪罪到他者之上的主体"至关重要(霍加特，1992：349)。集体联合和社会群体的形式恰恰能构起这样的遏制空间。就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时光来说，至少公开暴力得到了控制和遏制，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假定，恰当的机制适合去化解我们的恐惧和焦虑。

然而，我们想指出，情况并非如此。假如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本应有望看到我们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行为有所修正，能更多地接纳他者。可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形是，暴

力受到抑制但我们的恐惧从未得到解决和减轻。社会群体能发挥的功用是克制一部分恐惧，但束缚了我们恰到好处地解决恐惧的能力。伊莎贝尔·孟席斯曾描述了另一类社会群体是怎样发挥作为对付焦虑的社会防御手段的作用的：

> 社会防御体系的特征……在于它的定位有利于个体避免体验焦虑、罪恶感、疑虑、不确定性。人们通过消除那些引起焦虑，或者更准确地说，唤起与个性中原生的心理残余相关的焦虑情绪的情形、事件、任务、行为、关系来尽可能地做到这一点
>
> （1960：109）

只要它完成了上述预期，那么该机体便往往会理想化了。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常常担心其遏制焦虑的功能会失效，因而人们常有种危机在即的感觉。按孟席斯的话说："社会防御体系表示将完全原生的心理防御机制体制化了，原生心理防御机制的主要特点是它们有助于规避焦虑，但是几乎无法真正改变焦虑"（出处同上：117）。这种应对战略与在国家及欧洲层次上组建的社会群体所运用的战略惊人地相似。

我们以一定的方式将自己组织成社会群体，目的是适应恐惧和焦虑情绪，却无须与之妥协，从而减轻这类情绪。社会群体于是成为变革和进步的阻力。人们担心变革，担心遭到变革，担心无力变革。社会群体便围绕着抑制机制组建起来。丹尼尔·西博奈写道，为了保留其"存在"方式的某些特色，

> 人们有时候确实被迫牺牲某些思想途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分裂，对此他们自认为没法解决。光阴荏苒，他们变得真的没有办法了。于是他们把

> 自己的软弱无力渲染成不是任何人造成的**客观**事实、特定现实。
>
> （1993）

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受到抑制。为了逃避焦虑而组建的社会群体也是为了逃避思想和知识而组建的。

政治缄默

> 大众缄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憎的。因为大众也由这种宣称能启迪他们的无用的超信息构成，而这种信息所做的一切只是塞满可以表现的空间并让自己消失在无声的相应空间里。
>
> （让·博德里拉尔，1985a）

现在我们想根据这些涉及较大范围的欧洲社会群体和认同的论述，最后提出一些有关媒介的问题。可以涉及的议题很多，比如媒介关系到恐惧、焦虑、暴力情绪的方式。这里我们想专注思考媒介是如何参与到我们刚刚一直讨论的防御、规避焦虑情绪的机制的。本章研究的中心是媒介和社会群体的问题，通常人们探讨这个问题是从社会群体的积极意义出发，即约夫妇（1988）提出的：想像的中社会群体指的是对共享文化和共同特性的情感。但是社会群体还有另一面，即将它聚合起来的不是它所坦言承认的集体价值观念，而是它所集体否认的东西。社会群体可以发挥社会防御体系的作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回避恐惧和焦虑，而且还抑制现实去克服或是减轻上述情绪。社会群体这个机体于是充当了闭合机制，驱动它的是想避免变革和演变那种痛苦体验的强烈

冲动。至关重要的是抑制过程，它们不利于思考，不利于根据清晰思维去行为。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指出的，现在媒介至少在政治家和官员们的眼中对创建欧洲联盟和想像中的欧洲社会群体有根本作用。他们预期，借助媒介便有可能构建一个欧洲文化政治的公众领域。我们已经谈过斯蒂格·夏瓦德的评述，他认为迄今为止在欧洲层次上不存在有意义的公众或公众领域；夏瓦德相信，这是因为欧洲化进程尚处于初级阶段。然而，他也的确认识到必定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个是欧洲政治体制"尚未明确的合法地位"。还有欧洲政治空间范围庞大的问题，以及具体有多少利益集团在欧洲层次上寻求代表权的问题。这些困难还要加上由于欧洲共同体不断变化的规模与特性所引起的分界问题。"欧洲政治领域不会同国家政治领域的特性一样"，这是清楚的（夏瓦德，1993：89—90）。需要新型媒介体系，而创建这样的体系既要付出努力还要发挥想像力。

当然，我们必定都希望媒介能用于促进形成欧洲公众领域和政治文化。媒介显然可以在形成跨国公民社会和在该公民社会与欧洲共同体这个超国家机体之间调停方面发挥突出的作用。但是如果情况会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到除夏瓦德提到的困难之外的一些问题；这是另一类的困难，跟实施问题无关，而与当今媒介和媒介文化的性质有关。这里我们只讲两点。第一，我们想请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即媒介实际上可以有助于我们前面谈过的规避和抑制方法；媒体有可能起到支持共同谋划好的互动和协议机制的作用，该机制影响到社会防御和闭合。第二，我们想指出，媒介体系和实践最近有一些发展，它与创建一个成熟、关键性的政治文化相左，或许甚至还有利于非政治化和隐遁主义（privatism）。

大多数关于公众领域的论述都假定媒介受众渴求知识和信息，而知识和信息于是成为政治反思和辩论的基础。但是如果还有其他进程在发挥作用，那该怎么办呢？心理分析家威尔弗雷德·拜昂非常关注不想知晓的愿望。他指出，思考令人不适、搅人不安。思考时"你不得不冒着发现你不想知道的事情的危险"，结果，"大多数人想终止思辩他们不想看到或听到的事物"（拜昂，1978：8—9）。人们害怕知道真相，因为真相会令人希望限制思想和思考自由。

让·博德里拉尔（1985a）曾在恰恰谈媒介和政治文化时发表过令人不可思议的相似意见。我们认为应该认真对待他的话。他意指："最深层的渴望或许是想把自己渴望的责任给予其他人……。不去知道所求，解除了选择并避开自己的客观意愿……对另一个意识（或是无意识？）最有诱惑力"。他指出，现在大众已经最终认识到"他们不是非得对自己和世界做出决断，他们不是非得祈愿，他们不是非得知道，他们不是非得渴求"（出处同上：585）。在此，尽管不是博德里拉尔自己阐释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们能看到对知识和行为的抑制以社会病症的集体形式显现出来。

博德里拉尔认为这是大众发出的某种挑战，即便有人不情愿同意此观点，但是他必定承认博德里拉尔明辨出了政治交际和文化的重大转移。他所确认的是"早期那种扮演着既具戏剧性又具代表性角色的舆论从大众空间、从政治舞台消失了"（出处同上，579）。还有些人提请人们注意政治生活的这一退化，注意媒介作为大众领域的功能。有时候人们感到现在政治已经仅仅成了电视景象，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政治常常充当景象。正如保罗·卡比加诺和他的同事们强调的那样，关键

> 不是说政治已经成了个景象，而是**景象形态本身现在陷入危机**。换言之，可以将表象政治的危机解释为基于宣传和劝服原则的传播模式的危机。
>
> （卡比加诺等人，1990：35，黑体重点为本书所加）

被削弱的恰恰是舆论的理念，是认为大众知晓能够、而且应该报道并塑造政治生活的信念。

舆论时代的告终跟大众媒介体系和实践的功用发生重大变革有关。卡比加诺等人从"新闻报道作为社会机制其传播、解释事件的合法地位的危机"的角度，并从新型社会交际关系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此进行了描述，他们指出，后者已经令谈话节目成为电视新时代里突出的"大众思想之声"（出处同上）。伊尼亚西奥·拉蒙内（1991）也曾让大家注意媒介作为权威知识源的地位正逐渐削弱。他也把新闻报道的滑坡看作认识正在发生的核心变化，因此他认为，由于新闻记者和节目主持人的作用已经削弱，"所以现在占上风的正是图像这支力量"："其目标不是让我们认清局势，而是让我们参与到事件当中"。在拉蒙内看来，这样放弃图像的即时性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他指出："由别人告知情况让人觉得很累，但这是民主的代价"（出处同上：12）。现在信息模式与根据知晓情况认识和作为政治行动的原则南辕北辙。

这种市民政治文化的衰败当中有待解决的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认识媒介体系的变革是怎样影响这一演变的？我们没有说给上述问题作出全面的回答，而是想表明，必须考虑社会防御体系的机制。至少，政治危机的一项因素或许正是渴望不知晓、不行动。而电视或许尤其起到支持抑制、规避焦虑的过程的作用。媒介新体系宣称将给我们带来更多信息，让我们更直接地接触事件，然而，正如前面曾指出的（参见第七

章），与此同时，它们似乎也使得我们超脱、隔离于所目睹的现实。或许实际上谈话节目的兴起是对当代个人（和个人主义）紧张关系和压力的回应；或许谈话节目和“现实节目”是那些感到遭社会排斥的人的“治疗法”（埃伦伯格，1993）。通过这种形式的电视节目，被排斥的人和软弱无力的人因感到他们至少是和他人一块儿经历这种体验而得到补偿。

在大众生活似乎愈发受抑制的文化群落里，或许这就足够了。正如博德里拉尔所言，在这种文化群落里，“人们同时被告知要让自己成为自主的臣民，负责任、自由、有意识，还要让自己成为顺从的臣民，了无生气、服从、墨守成规”。他们陷入双重束缚，“恰如孩子与成人世界的命令的关系”（博德里拉尔，1985a：588）。该文化群落内的观众和消费者当中产成了矛盾情绪。弗朗索瓦·布律纳评述道：“不能把你同时既当作市场目标对待又尊崇为积极的政治主体”。发生的事情是，这个孩子退缩到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这个孩子形成了“内心沉默”，即布律纳所谓的“对象缄默”（1993b：157）。

我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
今夜我只是待在家里，
沉醉于那令人无望的小屏幕。
（伦纳德·科恩，《民主》）

媒介在历史上对于想像国家社群发挥了核心作用；或许事实上，要是没有印刷媒介及随后的广播电视媒介的贡献，也不可能创建共同的文化群落和认同。正如斯图尔特·霍尔谈英国广播公司和不列颠民族的情况时所讲的：

英国广播公司远非仅仅“反映”在其之前存在

的民族的复杂构成，它是一种工具、机构、“机器”，由它构成了民族。它**生产**它所针对的民族：它以表现其受众的方式构建他们。

(1993:32)

许多领域的人士预期，构建欧洲媒介体系将使得现在有可能用欧洲大陆上各不相同而且常常相互冲突的文化群落构建想像中的全欧洲社会群体。政治家们和官员们的目标似乎是“通过允许公共服务性广播电视业充当一支一体化、同质化的势力，来造就一个意识到共享历史和传统的知晓社会群体，从而将其推入欧洲层次上”（戴维斯和莱维，1992:476）。人们期望媒介业成为构建欧洲社会群体的推动者。

对于这种可能性人们一定颇为怀疑。尽管曾有一刻似乎媒介有可能对重新设想社会群体作出贡献，但是欧洲最近的进展已经足以明鉴挡在这项规划路上的严峻困难。困挠欧洲共同体这项事业的矛盾已经愈发清晰可见。尽管人们在创建拥有大面积市场的经济空间方面已经大获成功，但是在大陆层次上发展政治体制和大众领域仍旧令人困惑。而且尽管泛欧主义的理想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另外我们已经看到可能会威胁要解体和分散化的排他主义情感又死灰复燃。很难看出哪个传播政策或文化政策能怎样真正跟上述复杂矛盾的逻辑相协调。菲利普·施莱辛格（1993）指出，欧洲媒介政策这个例子有可能揭示出以理性主义方法在跨国范围进行文化管理的局限性，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有关政治文化和有关欧洲大众领域的问题似乎尤其困难缠身，认为可以把过去的公共服务模式聚合成欧洲范围模式的信念似乎至多是可望不可求的。

因此，媒介对公之于众的欧洲共同体的理想的贡献便值

得怀疑了。但是也必须考虑到它们在社会群体较无意识的过程中的影响。为了寻求从心理地理的角度出发来认识这一点，我们曾描述过某种封闭状态，其特征为既从属于国家又从属于欧洲。任何大小的社会群体都可能充当社会防御和规避焦虑、恐惧的机制。这是其凝聚一致的一面，对此，集团协力保持沉默。于是，社会群体有可能发挥抑制知晓、认知、修正行为的过程的功能。我们假定正为大众知晓和认知事业努力工作的媒介或许最终发挥的功能与上述抑制机制一样。媒介体系和实践的新近进展似乎印证了这一功能。由于知晓而生的恐惧或许是我们在思考媒介文化非政治化时必须考虑到的一点。因此问题在于新欧洲中恐惧和焦虑心理分布的地理，以及媒介与此心理地理的密切关系。

第十章

什么的终结？
——后现代主义、历史、西方世界

旅行者们可能把留声机称作新的改进型、可便携的神，并要求当地的君主听命于它。在云集的听众面前能够讲话，甚至能够进行对话的神在中非可是个全新的事物，而中非当地诸神是由木棒造的，而且令人失望的是个哑巴。没有哪个中非人敢拒不服从这个留声机之神。

（《纽约时报》，1885 年 1 月 19 日）

没有人讲英语，因而一切都破碎了……

（托姆·韦茨，《托姆·特兰伯特的布鲁斯》）

科内尔·韦斯特针对当代一些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某种概念上的“后现代”时期的论点指出，需要“将后现代

主义辩论多元化，并融入到背景中研究”(1991:3)，特别要“注意后现代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个美国现象”(出处同上:5)。然而，当他说“美国的”时，包含了在“欧洲的”、“美国的”和“西方的”几个词之间的一定滑动。韦斯特继续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系列……对取消欧洲的中心地位——对生活的世界不再依靠在发轫于1492年的欧洲霸权上——的回应”(出处同上:6)。当然，尽管欧洲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但是500年后，随着20世纪两次大战中欧洲列强殚精竭力之后，世界首强的宝座已经毫无疑问地从欧洲转入美国之手。而且还可以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之际亨利·卢斯预期的“美国世纪”实际上仅仅持续到1973年。那年发生了石油危机，紧接着，从象征意义上说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给罢了官。因此可以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的特征尤其表现为美国的信心衰落和来自欣欣向荣的太平洋地区的强国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竞争日益激烈。

问题是，1973年的时候倒底是什么终结了？一种可能的答案是，起始于欧洲，然后移至大西洋彼岸的经典“西方文明”的传统那无人触动过的霸权告终了。正如韦斯特所评，(在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的不断影响下)人们过去常常认为该传统中“欧洲最优秀部分的典范是伯里克利统治期的雅典，伊莉莎白时期的英国和……早期罗马帝国”(韦斯特，1991:8)。麻烦总是来自四面包围着它的“野蛮人”给该“文明”造成的威胁。

菲利普·里夫将洛杉矶描述成《第三世界的首都》，文中最后他讲述了同内森·加德斯的一番令自己烦恼的对话，加德斯是设在洛杉矶的一份政治杂志《新视角季刊》的编辑，交谈当中加德斯指出，洛杉矶的(并且暗指整个美国西部的)

"欧洲时代"正在落幕：

> "我确实不知道……形成这种状况或许是越战失败之后，或者更早些，在1965年移民改革之后。很难讲，但我的确知道，现在我每次去欧洲，总有那么一刻我自个儿几乎压根儿想不起我在这儿现在看到的情形跟未来南加州有多大关系……。"
>
> （里夫，1993：258）

克里斯托弗·道森1956年的著作中表明，阿克顿勋爵在筹划《牛津现代史》时就把它想像成一部全球史——研究全球的历史推动力，然而简单地认为这部历史理所当然的是部欧洲史，认为"仅仅是，或者说主要是，在欧洲及其殖民地才会发现世界历史的运动"（道森，1956：606，并参照：麦金德，1904）。当代当然也有类似阿克顿勋爵的历史观中不言而喻的假定。由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爵士制作并主持，在日本播出时名为《西方文明诸面观》的电视系列片，起初在欧洲（及美洲）播出时的片名更简约、却也更放肆，叫《文明》。

正如艾里克·沃尔夫指明的，"历史"一词常被用作某一种根据回忆构建的西方宗谱的同义词，

> 据此，古希腊产生罗马，罗马产生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产生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工业交织着民主反过来铸就了美利坚合众国，它体现着生命权和对幸福的追求。
>
> （沃尔夫，1982：5）

正如沃尔夫指出的，这种认为后发生者必然是前者结果的目的论式叙述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将历史变成道德胜利的传奇故事，其中胜利者以胜利证明他们是正直善良的，比如，古希腊不是以其自身实力呈现辉煌的历史现实，却成了“史前的自由女神，在蛮夷的夜空中高举道义的火炬”（出处同上）。

这里成问题的是“欧洲”（“既包含又不包含‘北美’，加了‘北美’就将‘欧洲’变成‘西方文明’”（波科克，1991:10））这个概念过于自信，被认为是由“诸国家的群体……构成的，这些国家的主体特征表现为继承了的文明其最主要的源泉是犹太、基督教兼有的宗教，希腊的政府、哲学、艺术、科学观念，罗马法律方面的观点”（皮特斯，1991:3）。换个角度说，这当然意味着可以认为例如欧洲共同体这样的当代实体拥有渊远的历史根源——像是“新建立的卡洛林王朝：在9世纪《凡尔登条约》划定的区域里重新规划诺斯特里亚、弗朗科尼亚、勃艮第、伦巴第……如启蒙运动所更改的那样重新规划西方拉丁文化的领土”（波科克，1991:7）。

然而问题是，一方面，以这条道路追寻当代欧洲演变的内在历史根源很有启迪意义，而另一方面，这仍是个过于关注自身的传奇，其中少了某些关键的线索。因此，皮特斯指明，虽然欧共体官方的措辞中谈超越了一切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时代，但该文化，

> 再现在教课书、宣言、媒介节目中时仍然是欧洲帝国的文化……其自我形象、其主导文化仍是旧世界的样子……某些重要的体验正从该欧洲文化里消失：非殖民、移民、后帝国主义（“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你们在那里”）等等的体验，全球化的体验。
>
> （1991:4）

历史的终结?

在谈了上述论点的背景下，值得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评述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起初是1989年发表在《国家利益》上的一篇论文，1992年扩充之后重新发表，题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第一个关于认知相对主义的问题和历史上任何事物"可决定性"的问题；第二个关于福山试图提出的历史类型的问题；而第三个关于福山用来解释他所关注的演变的某些有关历史的论点恰当(与否)。他为时下并不合潮流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者的原教旨主张辩护，称历史是内在一致或是说清晰可辨的过程，还称人类生活从哲学上说是纯概念性的(参照：福山，1992：xiii)。

这种态度悍然不顾时下对所有元叙述(meta-narrative)持怀疑态度的学术走向(莱昂塔德(1987)称之为界定我们"后现代状态"的特征)，悍然不顾盛行的认知相对主义，盖尔纳(1992：29)称认知相对主义的特征为"一种歇斯底里的主观主义"，这种观点越来越认为"世界上万物皆破碎的和多种多样的，没有哪物跟另一物真正相似，没有谁能懂得另一个人"(出处同上：45)，而吉尔兹(1988)称这是一种怀疑认识论(和道德)的病症。就此为至，我们宁愿支持福山的介入，宁愿同意菲什(1989)的观点，比如说他在《新历史决定论者》(参照：维塞，1989)中指出，承认历史的文本身份不仅其本身开辟了有趣的探索思路，而且没给提出有关历史的主张设下学术障碍。(普遍知识理论的演进和历史的实践)这两项活动的逻辑相互依存(参照：菲什，1989：305—308，并参照：诺里斯(1991)对德里达理论作出的相似分析，其中将承认哲学具有修辞特性与假定哲学因此只不

过是一种修辞明显区别开来)。

科马罗夫和科马罗夫不顾诸多后现代假说所谓的当今世界"无一致性之谈",提倡埃德蒙·利奇等作者的人类学传统。他们指出,这些作者

> 一定会摈斥所有后现代派的说法,即由于人们体验到世界混沌不清、无一致性,因此它就一定完全没有系统性;由于社会生活似乎昙花一现、反复无常,因此它就没有规律性;由于我们没有看到社会形态,所以它是无定形的;认为在其破碎、多棱面的表层背后什么也没有。(利奇)一定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幸没能发挥想像分析……我们要求如果主张不存在一个体系或一种结构要有可靠的根据——我们打眼一看无法识别的事实难以证明事物不存在……空缺和断接,无一致性和无序,都必须得到实践验证。对它们既不能推测也不能用反向归纳法假设。
>
> (1992:23—24)

这种对于世界上是否真正有可能存在任何有机一体的知识的"新怀疑论"策略给某些总是感到被剥夺了知识的主体地位而不是客体地位的人们留有发表尖刻评论的说头。因此,马希亚-利斯等人(1989:15;引自梅西,1991b:33)评述道:"当(传统上一直控制着知识生产的)西方白种男人们不再能够界定真理时……他们回答结论是找不到真理了"。正如南希·哈索克(1989)系统阐述地那样,问题是

> 在这个历史时刻,当那么多集团忙于搞包括要重新定义处于边缘地位的他者们的"民族主义"之

> 时，学术界对是否可能存在能描述全世界的普遍理论，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怀疑，这似乎非常可疑。为什么恰恰在我们这些一直保持缄默的人中有那么多人开始要求自我命名权，要求有权作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之时，主体特征的概念又有争议了……正当我们形成自己关于世界的理论时，是否能用理论充分描述世界的不确定性又冒出来。
>
> （哈克索，引自梅西，1991b：33）

与此类似，林达·尼科尔森（1990：6）提出后现代主义有可能是"对男人来说它的时机已到，而对女人来说尚不成气候的理论"，继而指明迪·斯蒂法诺（1990）提出有可能

> 鉴于男人们已经经历自己的启蒙运动，所以他们能够对其主张的一致性和真实性持非自我中心意识和谦逊态度。另一方面，让妇女采取这种立场便会削弱尚未壮大的一方。
>
> （尼科尔森，1990：6）

整体统一世界的前景

历史在孔多塞和蒂尔戈等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看来是在理性原则基础上人性趋向完美境界的线性发展，最终包含了全人类。正如惠顿评述的，此等理性主义者的历史观念使得启蒙运动的评论人士们能"贬低或是嘲弄古今那些缺乏文明理性（Enlightened Reason）原则意识的文化群落。这样的文化群落往往被看作是迈向这个文明的完美结局的低级发展阶

段"(1988:15),因此他们如能直接从那些"……惟有……经过长期谬见之后才"获取了这种"简明的真理和千真万确的方法论"的社会获取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那是他们的好福气(孔多塞,引文出处同上:150)。

18世纪末社会思想倡导者戈特弗里德·冯·赫德尔正是针对上述观点的武断假定而对下述作法展开批评,即抽象的启蒙运动哲学或许证明了扼杀全世界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是合理的,进而主张推行外部强加的欧洲理想。赫德尔于是嘲讽道,这种理想化的开明社会的概念,以其

> 笼统地、哲学家乐善好施的口吻……希望将我们自己的美德观和幸福观延伸至每一个遥远的国度,甚至到最久远的历史年代……(它)把更加老于世故当作美德,把开明当作幸福,以此编造了整体改良世界的臆想。
>
> (赫德尔,引文出处同上:154)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福山自己的论点是否结果编造了类似的臆想。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误解了他的论点,它遭到的某些批评是因为得到了非常不准确的信息。正如他在自己论文的扩充篇前言中所表明的:"我的意思是,已经到达终点的不是事件、演化过程的发生"(福山,1992:xiii)。就这点,他从康德1784年的论文《关于全球史的一点看法》中得到启示。康德在该文中指出,历史的确有最终的目标,即实现人类自由,这是人类潜能必定使然的,实现它是前进的目标,这便是令整个历史显得清晰的东西。黑格尔在《历史哲学》(1956)一书中将康德的论点转换成更具体的命题,称创建自由政府(确切地讲)实际是实现了人类自由。从一种意义上说,福山

的贡献仅仅是把宣告自由政府在全球胜利的日期——从(黑格尔选定的日期)1806年和拿破仑一世征服普鲁士移到1989年——共产主义崩溃和美国"胜利地"走出冷战。

福山承认,这种历史如当演进模式看很像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它根植于基督教历史观——指地球上在按上帝意愿逐步运作,直至世界末日,而那天地球上将迎来天国——如同人的最后死亡,死亡回溯往昔,令以前的所有事件清晰可辨。然而,福山似乎还没有领会到,只要他自己的演进模式重复了"兼有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模式,"(这种模式中)时间老人被看作《圣经》中记载的历史的媒介"(费比恩,1983:2),那么他的论点便在本质上是个倒退,其中信仰超度仅仅被"信仰进步和工业"替代,来作为历史的意义和动力。正如费比恩指明的,这种演进历史与中世纪基督教"宗教时间"的概念有极为相像之处——时间是超度的媒介,是连续不断、有意义的传说的载体。这便正是人们最初为启蒙运动思想定下调子所反对的时间概念,试图摒弃从(可能存在的)超度史的角度出发的时间概念,并试图引入世俗化的时间概念——指自然史,记录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概念空间,潜在"平凡的"资料的概念空间,而不是逐步"取得"某些预定的演进意图的媒介(出处同上:17)。

福山的分析最终是试图翻新二次大战后美国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参见:罗斯托,1960;勒纳,1964),它们假设工业发展必然沿着(由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经济打造下的)全球性模式,这个进程会"必然使得""所有人类社会,不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遗产怎样,都趋向同质化"(福山,1992:xiv)。该模式里,正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即假设的经济发展动力)替代了上帝的意志(或是人类精神,或是阶级斗争)成为演进的动力,而且,按照福山的话说,"似乎支配全球朝资本

主义演进"(出处同上:xv)。只要人们认为仅有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组合状态是有能力全面发挥科技创造的发展潜力的适当构架,那么就可以说情况如此——至少福山这样认为。因此,他主张,

> 所有搞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必定会越来越相像:他们必定会在集权政府的基础上将国家统一起来,搞城市化,根据功能和效益以从经济角度看合理的社会组织替代传统社会组织(像部落、宗派、家庭),给公民提供世界性教育。
>
> (出处同上:xv)

尽管下述言论有轻率之嫌,但是可以说,福山在这段分析中所抓住的因果关系跟其他任何热诚的货物崇拜者们的因果关系同出一辙,后者建造了简易跑道,便期待高级玩意儿从天而降(译者注:南太平洋一些岛屿上土著的迷信,认为祖先或神会带着大量现代西方货物重返当地。)。正如沃尔夫在批评现代化理论时指明的,该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把社会看成"内在同质、外在特色鲜明、界限分明的事物的性质"(1982:6),却没有从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去认识。这种模式中有"现代化的"西方,仅仅近来才从共产主义("现代化的弊病"——罗斯托,引文出处同上:7)解脱出来的东方,和由"不发达的"社会构成的第三世界,只有找出办法帮助第三世界挣脱"传统"的束缚,它们才能实现现代化(参见:勒纳,1964)。

福山的分析当中漏了的一条是帝国主义的概念。如果我们想,比如说英国和印度的相对地位仅仅是指英国曾经在世界经济中"更成功",并展示出印度要想"迎头赶上"就必须效仿的特性的话,那么我们永远也不会搞明白。帝国主义的理

论会指出，与其说英国"发达"和印度"不发达"的事实对它们互相来说都是免不了的，不如说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后者的结果，反之亦然。这便是罗德尼（1972）在《欧洲怎样造成非洲不发达》及普雷比希（1950）和冈特·弗兰克（1969）在研究拉丁美洲"发展不发达"当中的要点。正如沃勒斯坦（即将出版:5）所言："不发达不是未发展，不是原始的、或资本主义之前、或现代化之前存在的状况，而是通过连接核心与边缘来全球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结果"。在此动态中，处于边缘的殖民地为在"核心"的工业国提供原材料，总的来说，它们给牢牢地套入低生产力和贸易长期滑坡的恶性循环当中，这种情况不断地有助于强化已"发达"国家的优势。

跟福山的"进化论"模式相反，布劳德（1988）指出我们太容易就认为"生产方式"在连续的历史时期里像列队一样互相追随。相反，他指出："不同的生产方式全都互相附联。最先进的依靠最落后的，反之亦然：发达是不发达的背面"（出处同上:70）。

莫里斯·戈德里埃在《西方是人类的典范吗?》一文中总结论点时，尖刻地反驳了福山所颂扬的"历史的终结"，这种终结表现在西方理性的最终具体化、美国政府及其冷战"胜利"。正如戈德里埃所言，在这种情形里，我们该做出何种反应？我们该干什么呢?

> 我们必须加入到喝彩当中还是悄无声息地走下舞台？撇开第三世界人民，为什么要求西方那些继续相信基督教不是惟一可靠的宗教，相信实际上不存在可靠的宗教的人们；那些认为政治民主确实存在，并愉快地接受它，但知道推进社会民主还有很多事要做，并认为仍要做几乎每件事以确保资本主义

造就或占为已有的经济和财富能在西方和其他地方较公平地分配的人们保持缄默？为什么我们要拒绝看到这些就此存在并的确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不好方面呢？有什么理由可以容忍它们呢？真的是因为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我们最终生活在一切可能时代的最佳期吗？

(1991:339)

从历史的终结到种族中心主义的终结

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不同的作者曾谈及表述的危机（甚至于终结）；前些时候，莱昂塔德宣布我们进入了“后现代状态”。对这些都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即这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是以深重的种族中心主义观看待任何处于危机的变革。“后现代主义”决没有清楚地表现为全球（而不是特指西方的，或者甚至是美国的）“状态”。斯图尔特·霍尔认为，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指全世界如何梦想做‘美国人’”（1986:46），另一方面，仅仅是“历史遗忘症的再版，其特征为美国文化——新的专制”（出处同上:47）。他继续指出，很容易就可以把许多关于“全球后现代主义”的宏伟宣言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主张：

它所讲的是，这是世界末日。历史在我们这里住步。但是不论何时有人称这是历史上会发生的最后事情，狭义上说那都是意识形态功能的迹象——即马克思所称的“意识形态”影响。

（出处同上）

正如霍尔指明的，根本问题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既然世界大部分地区尚未完全进入现代期，那么确切地说是谁‘没有剩下未来’了呢？而且这种“没有未来”会持续到未来多久呢？”（出处同上），或者又是关于博德里拉尔的“现实世界的内爆”的主张，按霍尔的话讲，当“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尚未进入到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现实’时代”（出处同上：46），那所有这些又有何意义呢？

与此类似，保罗·吉尔罗伊（1989）曾坚称“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尽管其主张过于浮夸，但是可以认为它们起源于一种更本土化而不是范围较小的危机，并且是这种危机的症兆——这是自 1973 年石油危机起长时间的低靡期内，在这些经济制度的国家那衰败的大众部门里工作的西欧白种人的智慧下挫的危机——这样看十分有用。克雷格·欧文斯（1985：57）谈及“专门是西欧文化及其体制身负的权威的”危机。科内尔·韦斯特公开嘲笑莱昂塔德不加批判地将本土认识普遍化的倾向：

> 当你真正审视莱昂塔德“对主叙述（“master narrative”）与日俱增的怀疑态度”（的看法）并目睹东欧及苏联的宗教、意识形态、民族复苏时……你说……他在讲谁呢？他和朋友们是在左岸地区（译者注：指巴黎的塞纳河左岸，即南岸，是大学生、作家和艺术家等的汇集地。）厮混吧？他脑子里装的是谁呢？
>
> （1991：5）

正如朱利恩和默塞尔（1989）表明的，最值得评述的是围绕着后现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进行的诸多争辩中的种族

中心主义。当然，所有这些当中，福山、莱昂塔德等作者仅仅是承袭了一种长期传统，罗伯特·扬（1990：2—3）评述说，该传统起源于黑格尔并由马克思延承——是对展示世界史“理性体系”的普世性叙述的发展，而该世界史完全等于欧洲帝国主义的反面——这种知识在概念上模仿西方世界从地理和经济上同化非欧洲世界，不断地侵占、并吞它的“他者们”。

正如福柯（1980）指出的，就这方面而言，恰当地说，有关西方文化和理性具普世有效性的主张至多是由经济统治和政治霸权而来的幻想而已。当然，正如赛义德（1978）曾经指出的那样，西方版的东方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常常造就出一种本质主义（译者注：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认为存在先于本质，科学和哲学的任务就是发现事物的真实本质，它与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相对。）的普世主义，莱维纳斯（1983）称之为一种“本体论帝国主义”，它是从欧洲及西方世界的视角（和/或以之为最高点）来看待人类历史——从而形成自恋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识——用莱维纳斯的话讲是“自我主义”的哲学（引自 R·扬，1990：17）。

德里达诸多批评的对象正是如所指的那样将“知识”等同于其西方形式；正是这种将世界文化“欧洲化”（现在或许是“西化”）。正如德里达指明的，我们仍旧生存在“白种男人把他自己的印欧神话，他自己的逻各斯……他自己习语的神话当作普世事物，对此他一定仍旧期冀称为理性”的环境里（1971：213）。正如罗伯特·扬（1990）点明的，德里达将其批评的对象，理性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描述成“只不过是强迫全世界接受自己的过程中最本源、最猛烈的种族中心主义”（德里达，1974：3），而且就此范畴来讲，正如扬指明的，可以认为德里达的解构工作——主要本着托因比反对“近期现代西方惯于将新近突然显贵的偏狭的西方社会历史等同于显

然大范围的'历史'"的精神(出处同上:19)——是解构"'西方'范畴的概念、权威、假定的支配地位"(R·扬,1990:19)。评述这种频仍下滑也就是坚持阐述"白色"观念的中心地位——这便是启蒙运动文明通常未明言的种族/神话层面(参照:阿民,1989:89-91和马尔科姆逊,1991,他们精彩地概括分析了"西方"历史……,又将其所谓的惟一理性的源泉放到神话中的希腊"传统文明"身上,而否认了希腊"传统文明"真正的非洲源及东方源。亦参照:伯纳尔,1987)。

时代划分和空间划分的问题:现代主义和帝国主义

我们前面指出过,除了批评"西方历史"的种族中心主义之外,尚需要把当代有关后现代主义或"历史的终结"的争论作为史实记录下来。实际上,探讨该争论的一个方法是根据如何确定(人们假定后现代要替代的)"现代"时段的日期来探问"后现代"的重要意义是如何改变的。(不言而喻,福山的论点似乎根据的)一种可能性是将"历史的终结"等同于共产主义的终结,并强调共产主义的"现代主义"是一些西方世界在1917年错误闯入的一条"死胡同":在这里,后现代主义代表了自由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另一个对策是解释说现代期回溯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这里,后现代实际上就是启蒙思想的终结(这似乎是莱昂塔德/博德里拉尔的立场),及其对人类事务理性和进步的看法的终结。然而,这两种情况中都有些叙述将西方的发展视为独树一帜的(特征表现为理性从希腊人,经过中世纪愚昧黑暗时代,直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自由国家这样的征程)。这里,西方的经历被说成是其自身内在力量的动态——即便人们有时候也承认"西方"是

个历史概念而不是个地理概念,包含了一些显而易见属于东方的社会(如日本),并排除了在西边的他者们(如墨西哥、智利)

与上述所有论点相反,可以认为(参照:霍尔,1992),实际上应将西方的崛起看成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其中常常不得不将西方的发展置于西方与他者关系的背景下,这些他者各自以不同方式被西方发现、剥削并沦为其殖民地。在这里,或许更有用的方法是将"现代"时段的开端定在15世纪葡萄牙人第一次航行发现,或者为方便起见,定在1492年"发现""新大陆"。

尽管马歇尔·麦克卢汉(1964)在20世纪60年代设想"地球村"是个新事物,然而,值得我们记住的是,正如布劳德(1988)和沃勒斯坦(1974)的著作充分证明的,即便不更早的话,至少自15世纪起就存在某种事实上的"世界体系"或是说全球经济,其最初的基地是欧洲西北部。即便那种时代划分自身也让人怀疑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有大量证据表明,确实在该时期之前中国就相当有计划、有步骤地与印度和东非通商。然而,也有必要指明,任何试图认清历史与地理的交点的努力都必须仔细解决时代划分的问题。布劳德(1988:39)要求搞"差别对待地理学",承认由于地理空间中社会发展分布不平均,所以常常有"一些世界历史没有触及的地域、缄默的地带和未受惊扰的愚昧"(出处同上:18),它们仍旧"在世界时间之外"(出处同上:42)。我们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臆断遍地都属同一个"时间"(即我们所谓的"他们知道现在是圣诞节吗?"的错误),并且当然不能犯关于任何固定的演进模式的错误。

讲述历史：西方的说法吗？

首先的问题必然是“谁讲出对谁的看法?”;“谁有权讲述其他谁的什么样的故事?”;“谁讲述,而谁又被讲述了但又缄默不抗议?”米歇尔·德·塞尔多(1988)在《历史的著作》一书的序言中分析指出,简·范·德·斯特拉那幅著名的寓言蚀刻画表现了探险者阿美利哥·韦斯普奇(译者注:Amerigo Vespucci,1454—1512,意大利商人和航海家,确认新发现的大西洋以西的陆地不是亚洲部分而是一个新大陆,后以其命名为 America。)刚刚登陆,偶遇由海滩上一名侧卧在吊床上的裸体女人所代表的“美洲”。德·塞尔多的论点概言之就是,所有史学都是源自于欧洲与未知他者的偶遇。如他所述:

> 征服者将写下他者这个躯体并从这里找寻自己的历史。从她那里,他将制出“有历史记载的”躯体……她将是“拉丁”美洲……她是个地图上尚不存在的新领地——一个未知的躯体,命中注定用其创造者阿美利哥的名字。但是这里真正开创的是权力的话语把这具躯体殖民化了。这是征服的文字。它将改变他者的空间……这种文字虚构了西方历史。
>
> (出处同上:xxv—xxvi)

正如德·塞尔多所述,“往昔是现今虚构出来的”(出处同上:10),而且,正如赖特(1985)指出的,塑造往昔的经历常常对于决定历史现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确,我们曾在其他地方指出,控制表述往昔的特许权常常是构建同一体

及调集力量为未来走向而斗争当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对策。人们争议的问题当然是关于权力的。正如德·塞尔多指明的："史学站在行为主体的位置上——即权贵的位置上，其目标是'制造历史'"（出处同上：17）。波科克更全面地阐发了该主题，集中关注主权和史学之间的关联："当一个社会群体拥有要掌握自己的现今所必需的政治自治体系时，它写下自己的历史，而且通常它所塑造的历史是该体系的历史"（1991：8）。波科克质疑道，鉴于控制现今的发言权和控制描述往昔的发言权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那史学是否在同国家和权力之间不具备上述关联的情况下也能存在。如他所指出的，没有主权就没有史学；没有史学就没有认同。

这些关于讲述历史的权力的问题当然在本质上与当代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的核心问题一样——后者同样集中于谁有权利（或是权力——常常指的是另一码事）（以源源不断的世界新闻的形式）讲述当今事件，或是有权力控制当今时代占主导的虚构之说。鉴于上述相似性，我们认为，格林布拉特（1992）和托多罗夫（1984）等学者关于西方表述他者的历史进程的分析（见后）对媒介研究中有关当代文化帝国主义这些较狭隘范畴的争辩教益颇多。不过，在尝试阐述该论点之前我们想先绕过这个问题，而去研讨人们相对研究不多（但可能甚至更有启迪）的问题，即那些"他者"是如何看待西方的，即便他们尚没有权力（或者甚至有时没有欲望）像西方已经有系统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们一样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西方。

作为异族的欧洲人

从当代假定西方优越于其他民族的角度来看，注意阿拉

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译者注:Ibn Khaldun,1332－1406,阿拉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阿拉伯历史哲学”奠基人,认为历史的对象是社会生活,写有穆斯林北部非洲史巨著《历史导论》。)在(写于14世纪的突尼斯(译者注:指巴巴里诸国(Barbary States)之一。)的)《历史导论》一书中在对比“我们西方人”与其他地方的“东方人”时,实际上指的是阿拉伯世界西部(马格里布)与东部之间的差别(赫勒敦,1987:5),这是十分有意思的。一方面他饶有趣味地评述重要集团的文化——诸如犹太人和波斯人的文化(出处同上:第2章)——另一方面他没觉得有任何欧洲人值得评价。考虑到当时阿拉伯世界显然优越于我们所谓的“西方”,所以实际上这不应该太令人吃惊。这不仅仅是个阿拉伯种族中心主义的事。当然,罗伯茨(1990:326)指明,当时的阿拉伯人“认为‘北方寒冷国度’的文明是贫乏、未发展的东西”,并轻蔑地称欧洲是西边海域遥远那方的“法兰克人的国度”——其中“法兰克人”大概可翻译成“野蛮人”,而从通向东方及其宝藏之路的角度来考虑,西边海域对阿拉伯人来说不言而喻不如红海和印度洋重要。此外,其他人也和阿拉伯人一样有这种看法。罗伯茨还指明,对于卡利卡特(译者注:印度西南部港市科泽科德(Kozhikode)的旧称。)的居民来说,阿拉伯货显然比欧洲货高级,以至于当达·伽马(译者注:Vasco da Gama(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首辟由欧洲绕非洲好望角到印度的航道(1497—1499),使葡萄牙得以在印度洋上建立霸权,1524年出任葡属印度总督。)给他们看他从葡萄牙带来晋献给他们国王的东西时,他们都嘲笑他——因为他拿不出什么能与阿拉伯商人已经从亚洲其他地方带到印度的相媲美的东西(出处同上:588)。

沃塔纳比(1991)讲述了三个葡萄牙男人1543年在日本

沿岸船舶失事的经历，他们仅仅被日本人称作是"来自西南方的蛮族之人"。"南方的野蛮人"这个说法当时被一股脑地用来将其他西方国家的外国人与东南亚其他地方的人们混为一谈。这时候，葡萄牙人与荷兰人、或是印度人、印尼人的差别对于日本人来说无关紧要：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些人野蛮仅仅因为他们不是日本人。

克雷默(1993)对非洲人对首批欧洲殖民者的看法做了类似的分析(亦参照：德利斯，1991)。克雷默指出，非洲人决没把首批到非洲的欧洲人看成像后者想要自认为的那种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人。克雷默指明：

> 不知道新事物所属范畴的思维方式，由于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仅仅认出一直存在的事物的复归，所以不可避免地把令人好奇的欧洲人比作已经熟知的人，将其置于自开天辟地之时便形成的与自我的关系之中。欧洲人被看成是熟知人的一种变体，这种熟知的人与文明人正相反，因此欧洲文化便纯粹仅仅是这里所讲的本土文化的"他者"。尽管"他者"的象征是荒芜、不见人烟，但是欧洲人似乎是一种我们所谓的"原始状态"；尽管"他者"的象征是邻近民族，但是欧洲人似乎是某个其他民族、陌生人或是野蛮人。换言之，欧洲人在非洲人看来就跟非洲人在欧洲人看来的一样：根本说来，是其他野人当中一类尤甚的野人。
>
> (克雷默，1993：x)

将此分析与下文将谈到的托多罗夫和格林布拉特关于美洲土著人难于承认入侵的西班牙人是人类的论述进行比较。

然而，除了这些概念上的麻烦，“白种人”给诸多土著民族主要提出了更实际的问题。正如一位阿帕切族（译者注：Apache，美国西南部印第安部族。）印第安人所言：

> 印第安人的所有难题中最麻烦的就是白人。谁能认清白人？是什么使他这样？他怎么思考，为什么他这样思考？为什么他讲那么多话？为什么他说一套做一套？最重要的是，你怎么能对付他？显然，他将在这儿待下去。有时这似乎是个没指望的困难事。
>
> （引自德利斯，1991：7；巴索，1979）

西方的看法：显而易见的命运？

霍布斯鲍恩（1992）指明，1492年不仅仅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年份——还是西班牙“再度征服”格林纳达的年份。这象征着最终击退长期对我们现在所说的西班牙实施殖民统治的摩尔人。此外，这一年——击败异教徒的年份——还是最终把犹太人逐出西班牙的年份。的确可以认为后两件事完成了一种“内部净化，是对外征服的前提准备”（斯图尔特·霍尔的演讲，“描绘未来”会议，伦敦泰特美术馆，1992年11月20日）。哥伦布认为自己到新大陆的航行当然是通向忽必烈王朝的途径，目的是为再度征服耶路撒冷筹措资金。因此，托多罗夫指明，1492年象征着“双重运动”，即西班牙驱逐其“内部他者”（摩尔人、犹太人）和发现“外部他者——整个将成为拉丁美洲的美洲”（托多罗夫，1984：50）。

正如霍布斯鲍恩所言：“1492年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

世界历史的开端，确信少数西欧和中欧国家注定要征服并统治全球的开端，一种欧洲妄自尊大的开端”(1992:15)。这当然不仅仅事关作为侵略和征服基础的物质实力，而且事关权力和统治的象征，在欧洲语言所表述的语汇里，“新大陆”给附属并纳入到该权力和统治的象征的手下。这种“绝妙的殖民行为”(参照:格林布拉特,1992:25)当中，正是殖民者以自己的词汇纳入且表述他者，打下了实施(无先例证明的)殖民权力的基石。

为了认清“发现新大陆”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借用托多罗夫和格林布拉特与此类似的研究。托多罗夫指出，正是

> 征服美洲宣告并确立了我们目前的认同；即便每一个允许我们分割任何两个时段的日期都是人为的，但是再没有哪一个比1492年更合适来标示现代的开端。正如拉斯·卡萨斯(译者注：Las Casas (1474—1566)，西班牙神学家、天主教传教士，在西印度群岛向印第安人传教，任教义启蒙老师，受神职为司铎，率先呼吁停止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压迫。)曾说过的，我们自1492年起进入如此全新，与哪个都不相像的时代。
>
> (1992:5)

托多罗夫指出，除了是战胜摩尔人、驱逐犹太人、发现美洲几件事“巧合”的同时，1492年的重大意义还在于这一年出版了首部现代欧洲语言语法——安东尼亚·德·内布里亚写的西班牙语语法——托多罗夫指明，此君“在其引言中写下了如下具有关键意义的话：‘语言一直都是帝国的良伴’”(出处同上:123)。格林布拉特也关注帝国语言方面的权力的重要

性，他指明

> 建立基督教的帝国主义的行为就是施洗礼。这种施洗礼（诸如哥伦布第一次将格为哈比（重新）命名为圣·萨尔瓦多的行为）需要废除本土的名字——消除异类的、或许是恶魔的身份——从而产生一种“新事物”；这同时是驱除邪魔、占用、赠予……在纯语言正式定型的一刻里，获取领地（和）赐予身份融合了起来。
>
> （1992：83）

尽管格林布拉特多多少少轻描淡写了托多罗夫所强调的一点，后者认为西班牙征服者（因为拥有高级的表述技术——文字——任其使用）相对印第安人的“文字优势”是阿兹特克人（译者注：Aztec，墨西哥印第安人，有高度文化，约自公元1200年起在墨西哥中部建立帝国，1521年为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没能有力抵抗西班牙人侵的关键原因，这是他的分析与后者的区别，但是他也认识到托多罗夫分析的力度。托多罗夫的论点是，欧、美民族之间的关键文化差异在于后者没有实际能用的文字，他认为，这造成的最重要的后果是他们在对付西班牙人时命中注定要“失去控制权”。正如格林布拉特在总结托多罗夫的论点时所言：

> 没有文字决定了仪式比即兴创作要占优势，周期性时间比线性时间占优势，这样的特征反过来导致在面对西班牙征服者时灾难性的误解和错误估计（阿兹特克人把西班牙人错误地当成是神，他们的降临表示实现了一个阿兹特克迟迟未灵验的宗教预

> 言:既然已经预言他们将无可避免地降临并征服我们,那么抵抗便是毫无意义的了)。新大陆目不识丁的人们不能够搞清楚陌生人:概念上的缺陷首先阻碍了准确认识他者。拥有文字的文化群落能给自己精确地描述出(从而在战略上操控)没有文字的文化群落,但是反之并不亦然。由于掌握了写作的能力,所以欧洲人掌握了毫无疑问高级的表述技术。
>
> (出处同上:11)

正如格林布拉特指明的,当时的欧洲人觉得比他们遇到的几乎一切民族都要优秀得多。他们不仅有发达的可移动的军事技术,还对自己文化的中心地位满怀自信:

> 这种对文化的自信心已到了想叫完全的陌生人——比如说,加勒比的阿拉瓦克人(译者注:Arawak,南美印第安人,主要分布在加勒比海各岛和巴西。)——最好马上放弃自己的信仰,然后信奉明明白白、不言而喻就是真理的欧洲的信仰。对方不这样做便激起他们的不耐烦、蔑视、甚至是穷凶极恶的怒气。
>
> (出处同上:9)

格林布拉特指出,西班牙人致力于的一种"基督教普世主义"——"坚信(他们的)主要标志和叙述适合世界上全人类"——使得他们一定要强制"不受限制地流通(他们自己的)模拟资本"(出处同上:186,注释2)。托多罗夫直白地指明,更无聊的是,哥伦布是个极度虔诚的人,"正是鉴于此,他视自己……身负神圣使命",激励他的主要仍是渴求取得"基

督教的全球胜利"(1992:10)。

然而，事实证明这项任务令人沮丧，因为印第安人没有马上做出反应，这令西班牙征服者们既迷惑又恼怒："当教给他们我们那神奇的宗教时，他们说这些玩意儿可能适合卡斯蒂利亚人，但不适合他们，而且他们不想改变习俗"（奥蒂兹，引文出处同上：151）。印第安人这样似乎执拗地"视而不见"，于是成了以武力给他们施以基督教"超度"的正当理由，因为

> 尽管这些野蛮人没有全都疯狂……但是他们离此也不远了。他们跟疯子、甚至是野兽、动物一样没有能力、或者说不再有能力管理自我。他们比其他国家里的孩童和疯子还要愚蠢得多。
>
> （维托里亚，引文出处同上：15）

这些西班牙人对自己抱有的文化莫大的绝对自信（与印第安人含蓄的相对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拒绝基督教——即便它或许"适合卡斯蒂利亚人"——如此令奥蒂兹失望，引自上文）或许在哥伦布描述他意欲将捕获的一些印第安人带回西班牙的话中最残忍地展现出来："愿上帝乐意，出发时我将带六个这里的人给陛下，好让他们能学会说话"（引自格林布拉特，1992:171，注释46）。不会讲西班牙语被认为是不会"说话"。而且这种概念上的谬误在有物质力量支持的情况下带来了深重的后果。托多罗夫记述到，当西班牙人首次登陆我们今天说的尤卡坦半岛时，他们用西班牙语问这个地方的名字。玛雅人回答到："Ma c'ubah than"，意思是："我们不懂你们什么意思"。西班牙人把他们听到的音节翻译成"尤卡坦"，并臆测这就是该地的名称。自那时些，这个地方当然就给当成了尤卡坦(1992:98—99)。

托多罗夫在其他地方指明过，对“陌生人”首先的本能反应是想像他与我们自己“正常状态”的差别必然是劣等的——他不是真正的人，或者即便是人，也是原始人、野蛮人。如果他不讲我们的语言，或许是因为他根本什么也不说，或者是不会“说话”（参照：哥伦布的信件，引自上文）。托多罗夫指出，恰恰是

> 因为这样，欧洲的斯拉夫人称邻近的德国人是 nemec，即“哑巴”，玛雅人……称托尔特克人（译者注：Toltec，10—12 世纪在墨西哥占统治地位的印第安人。）是 nunob，即“哑巴”……阿兹特克人……称那些不讲纳瓦特尔语（译者注：属犹他－阿兹特克语群。）的人是 tenime，即“野蛮人”或是 popoloca，即“原始人”，因为他们同所有民族一样蔑视近邻。
>
> （出处同上：76）

“野蛮”这个概念当然与生俱来是相对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者眼中的野蛮人（出处同上：190）。一个人只需讲他者不知道的语言——在他听来全是“胡言乱语”——就可成为这样的东西。因此，蒙田（译者注：Montaigne（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作家，用怀疑论从研究自己扩大到对人的研究，反对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的原罪说，主要著作为《随笔集》。）指明：“我们称任何与我们自己习惯相左的事物是野蛮的。实际上我们似乎除了我们自己生活的领地上流行的那种选择和习俗外，再没有其他真理和理性的标准了”（1990：108—109）。拉斯·卡萨斯晚年对他起先参与的帝国事业不再抱有幻想，最终承认

> 因为一个人说话的方式陌生，因为他讲其他人的语言时发音很糟，所以他和另一个人比较起来就被称作野蛮人。根据斯特拉博（译者注：Strabo（64?BC－23AD），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地理学》（17卷）、《历史概览》（47卷，已失散），对区域地理和希腊文化传统的研究有突出贡献。）著作的第14卷，这是希腊人称其他民族为野蛮人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发希腊语的音不准确。但是依此观点，没有哪个人或哪个种族相对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个民族不是野蛮人的。正如圣保罗所言……“全世界有那么多种声音”（但就这一点，参照：麦克布赖德，1980），没有哪一种声音是没有意义的。盖吾弗晓一种声音之意义，吾乃发此声者之野蛮人，而发此声者乃吾之野蛮人也……所以，正如我们认为印度群岛的人们是野蛮人，他们给我们定下同样的判断，因为他们不理解我们。
>
> （拉斯·卡萨斯，引自托多罗夫，1992：191）

事实上，如上所指，印度群岛的人们犯了个逻辑上互补但在实践中致命的错误，他们将那些西班牙人当作神而不是当作野蛮人。

然而，不是所有希腊人都如斯特拉博所推断的那样做——我们仍能学习希罗多德（译者注：Herodotus（484？—430/420BC），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所著《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主要叙述希波战争及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埃及等国历史，系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在这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希罗多德“不否认存在外国人的神。纵然外国人对自己神的概念可能是粗野、荒唐的，但是（希罗多德）

似乎从未想过要怀疑他们的客观存在。此外，他从未贬低或是诽谤过他们。他一次也没有表露出认为除了希腊的神就没有神了，或是认为希腊的神比其他民族的神要高级的信念。他遵循自己的原则，即只有傻瓜才会嘲笑陌生人的习俗"（林福斯，1926，引自格林布拉特，1992：187，注释6）。

而且，如前面所指明的，关于"误"命名尤卡坦之事，傻瓜们常常由于自己的愚蠢而强大。正如托多罗夫所言，西欧自1492年就试图"同化他者，消除外部变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遍及全世界；如哥伦布所愿，殖民地人民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习俗，并穿上了衣服"（1992：248）。或许人们可以补充道，今天，他们能全都一边喝着可口可乐一边收看CNN的电视节目。因此，我们借昂伯托·伊科别出心裁设想出来的"发现美洲"节目从1492年过渡到1992年：

> 丹：朋友们，晚上好。现在是1492年10月11日晚上7点，我们现在直接接到哥伦布远征队旗舰上。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从现在起所有电视网将25小时连播。我们现在接到安装在"圣马利亚"号旗舰上的摄像机……先听吉姆讲讲，吉姆？
>
> 吉姆：噢，丹……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有些评论人士已经建议称之为"现代时期"……不过我想听听阿拉斯太尔·库克的讲话，他刚刚从伦敦来到这里专程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播。阿拉斯太尔？你能听到我吗？……
>
> 阿拉斯太尔：我听得不太清楚……一位工程师说一定有干扰。显然这种事在新大陆经常发生……但是……现在好了！哥伦布船长准备发言了！

哥伦布：船员的一小步，便是天主教陛下的一大步。

（伊科,1993:135—145）

彻罗基(译者注:北美印第安人。)(或,按他自己更喜欢用的 Ani Yunh Wiya)艺术家吉米·德拉姆认为

殖民化不仅仅是过去数十年里的某种政治辞藻。欧洲或许正在经历后殖民时期,但我们在美洲仍生活在殖民时代。我们的国家被侵略,过去和现在都对我们进行种族灭绝,土地和生灵被夺走让殖民者获利。

（德拉姆,1993:172）

或者,如他在一首诗中更直截了当地阐发的

哎,朋友,你们拐错弯了……
这不是新泽西,这也不是新大陆。
你们得弄准方向。
我们住在这里,而你们惊着鱼儿了。

（出处同上:141）

后现代主义:你觉得生疏吗?

正如多林·梅西(1992)曾指明的,当代论述后现代问题的著作用大量事实说明该时期涉及到某种所谓的混乱、混杂、取代的新意识。梅西提出的问题是,上述看法中的意识事实

上根本就是第一世界的看法。她指明,大多数关于后现代的文献中贯穿的假定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不同凡响的状态。

梅西的基本论点是,全世界一切受西方世界殖民统治的国家的居民与其他异域文化群落发生瞬即、不稳定接触的经历有很长的历史了。新近出现的情况仅仅是这种混乱的体验现在通过各式各样的移民从边缘地带回到了中心。乌夫·汉纳兹用了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评说道:"或许正是因为第一世界在许多第三世界人民意识中存在的时间比第三世界在大多数第一世界人们头脑中要久远得多"(1991:110)。与此类似,安东尼·金评说道:

> 12世纪早期的加尔各答或新加坡的文化、社会、空间对未来的预示比伦敦、纽约的文化、社会、空间所预示的要精确得多。"现代性"不是产于巴黎而是源自里约热内卢。根据这种解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欧美范式走出它的发育地,即欧美那块狭窄的地理范围,便既没有多少意义也不突出了。
>
> (1991:8)

而且,如伊恩·昂所言:

> 世界边缘地区,即那些接受全球化势力的一方,在那里,资本主义现代化一直是强加的推动力,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是种内在发展,这些地区比西方自身有可能更真正地属于后现代,因为在那里,"全球"文化影响和"本土"文化影响必然兼容并蓄,因此形成一体的生存模式、而不是个讲求美学的问题。
>
> (1991:7)

或者，用萨曼·拉什迪(1982)的话说："我们中那些由于文化被取代而被迫接受一切真理、一切确定事物的暂时性质的人们或许已经被强加上了现代性"。

如梅西指明的，鉴于上述原因，只要如她所言，"由于全世界受殖民统治的人民看过进口或许甚至是用过舶来品，……即欧洲(和后来美国)殖民化……的产品，所以他们一定已经体会了这种混乱意识达数世纪，尽管他们是从绝然不同的视角，那么描述"压缩时空"及随之而来的混乱意识(尚无定论它们是否就是全新的巨大发展的特征)就根本是个西方的、殖民者的观点"(1991a:24)。

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讨一系列问题，它们涉及到后现代理论落人一种形式主义、后结构主义论述的走向，这种论说将所描述的"这种"后现代体验过份普遍化了，从而剔除了背景影响并抹平了不同环境中的人们的体验之间的所有重大差异，其中不同环境中的人们是不同社会、文化集团的成员，享有不同形态、数量的经济、文化资本。关键仅仅在于"我们"**不是**生活在同样的"后现代"宇宙中的所有飘零的或是分散的主体。对某些(同按阶级划分一样的按性别、人种、种族划分的)范畴的人们来说，符号和物理传播及(从飞机到传真的)运输新技术为互相联络创造了巨大的机遇。对于那些人来讲，或许真正有了一种"更广阔"、后现代机遇的新意识。然而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无法享用这些传播运输技术的其他范畴的人们来说，或许视野同时正在变狭窄了。许多作者已经指出当今同时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动态。然而，有些人认为，该动态的全球化层面占主导地位，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恰恰是本土化层面正日益发挥操纵作用，因为他们的生活机遇逐步减少，所以他们日益陷人出生所在的那小块领土上。只举一个例子，约翰·辛格尔顿的影片《伯伊兹·恩街区》(1991)戏

剧化地表现了这种意识,对于许多最穷困潦倒的黑人和拉美人来说,本土实际就是命运,在那里,视野远非延伸到全球,而仅仅走到"街区"的边界。的确,以打斗取得"伙计"地位很容易被看作是在别无选择情况下的防御反应。

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在运用任何抽象的后现代性概念时必须非常谨慎,必须抵制诱惑将我们的理论普遍化了,以致于忽视在这个时代里处于不同社会、地理位置的人们的体验一直存在显著差异。然而,仍存在一个根本主张,认为这个时期绝对有某种全新的事物。虽然不想否认已经且正在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但是我们似乎应当十分小心不要太轻易就接受任何认为我们当今的体验是全新的、不同于以往所有体验的主张。近期一些讲后现代独特性的主张事实上并不是很新的东西。我们尤其指的是那些讲后现代时期的显著特征是越来越多地"中介"和"全球互联"社会体验的主张。

第一个主张,是有关"中介"的,主要跟让·博德里拉尔(1988)的著作有关。然而,事实上很轻易就能论证指出,博德里拉尔的著作依赖并凭借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相当古老的传统,只是作者未承认这个作法罢了。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1956)就指出,我们的社会体验正日益纳入到泛社会类关系之中,而且实际上是为后者所取代了,泛社会类关系是媒介观众与他们在荧屏上看到的人物建立起来的。实际上,正是霍顿和沃尔,而不是博德里拉尔,始创了"假像"的概念并确立了其在当代社会关系领域内的关键地位。

第二个主张,指后现代性的特征是越来越强的全球互联意识,同样可以看到这个主张的历史源远流长。如前所述,30年前马歇尔·麦克卢汉就已经宣称现代传播技术的作用是类似引领我们进入实际上都生活在一个"地球村"的状态(麦克

卢汉，1964）。这里主要关注的正是这第二个主张。我们将集中注意的议题是关于这个“地球村”实际上（而且尽管日本向美国文化业的统治地位发出了越来越强大的挑战）在多大程度上是座美国村。我们要坚持指出，如果脱离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悠久历史，实际上就无法认清后现代理论家们强调的全球化趋势。在第一个例子里也非常值得提醒我们记住的是，即便不是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那么也至少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文化帝国主义的战略实际上便一直甚至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完全有意识、显而易见的举措了。

媒介（帝国主义）是美国的

正如杰里米·滕斯托尔（1977）以前曾指明的，我们这个后现代时期的一个根本事实当然是，媒介是美国的。某地的某人白天黑夜每一分钟都在看好莱坞影片。如今，美国的媒介不仅仅统治了电影业，而且还统治了电视和电信业。当代的这一统治也是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商会主席赫伯特·胡佛敏锐地注意到美国电影业具有对外输出宣传美国消费品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潜能。鉴于此，美国政府很早就开始资助、鼓励出口美国电影，于是，按照美国电影协会所宣称的，美国电影随之成了“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商品”（古巴克，1979）。当代美国对国际媒介的统治不仅从统治生产而言，而且从控制财政和分配体系而言，都是沿着多年前美国早期统治国际电影业的路线。然而，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欧洲列强财穷力竭之时，美国政府终于看到媒介出口政策作为在整个世界推进美国外交利益的方式的全部潜力。

曾任美国《生活》杂志编辑的亨利·卢斯在《美国世纪》

一书中指出：

>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活力的国家，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接受自己的义务和机遇，为了我们认为恰当的目的，以我们认为恰当的方式，向全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部影响……现在轮到我们成为向整个世界散布思想的源泉了。
>
> （1941：3）

赫伯特·希勒说，控制着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传播集团（《时代》、《生活》、《幸福》杂志企业集团）之一的卢斯比许多人都更早就认识到“将经济实力和信息控制、塑造形象和形成舆论融合起来，无论在国内外都是权力的新精髓”（希勒，1969：1）。这就是说，卢斯认识到美国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际具备的发达的国际通讯系统的真正效力是独一无二的权力工具，而这是过往时代中意欲扩张的国家所不具备的。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战略发展迅速。该战略建立的基础是经济与传播的综合实力，以促动所谓的“美国世纪”的规划。于是我们看到1947年杜鲁门总统宣告“我们是经济世界的新巨人。不论我们乐意与否，未来经济关系的模式取决于我们。世界期待着看到我们的行动。选择权在我们手中”（引文出处同上：6）。

美国战略依靠捍卫和扩张“自由”——至关重要的是贸易自由和言论自由。当然问题是，当强者与弱者自由或是不规则地交流时，强者往往会做得更好，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因此，在希勒看来，言论自由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大众媒介有机会在整个世界舞台上散布他们的信息。如他所述，如果说自由贸易是强大经济国家借以渗透、统治经济弱小国家的机制的

话，那么信息自由流通是借以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加给贫穷、羸弱的社会的渠道。希勒非常简明地证明了在战后关键时刻上述这些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有意识的政策。他于是引述了成立于1967年，目的是研究现代传播和外交政策的国会委员会的文件。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打赢冷战：美国意识形态攻势》的报告，指出

> 美国的作为在极大程度上将塑造渐渐形成的国际传播体系……其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将效仿我们的经验并附属到我们创建的体制和体系当中……鉴于我们拥有强大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美国显然能成为世界通讯体系的中枢。
>
> （出处同上:9）

坦率地说，这也关系到军事。美国已经接过"世界警察"这个重要职责，因而美国军事力量急需有效的国际传播来配合其行动。

从这种结合当中逐渐形成了希勒所指出的美国军事力量同美国大传播企业之间坚固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仍旧保持着）。然而，该委员会除了关注其自身对国际传播的需求（以配合海外军事力量）之外，还非常清楚地看到国际传播具有潜能，可以作为影响外国人民的一种手段：

> 某些外交政策目的最好可以通过直接对付外国的人民，而不是对付其政府来实现。通过运用现代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是有可能触及大部分有影响的国民——给他们提供信息、影响他们的态度……促动他们走上特定的行动方向。这些集团反过来又

> 能够向其政府施加显著、甚至是决定性的压力。
>
> （外交事务委员会，1964：6—7）

这里关键问题是要有能力绕过国家政府的控制。关于这一点，该委员会认识到传播的根本地位已经改变，这样电信已经从国际活动必不可少的“支柱”发展到自己成了外交政策的直接工具。

希勒指出，当今形势表现出两大特色。他指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向信息本身成了供销售的商品的态势，并向传播和信息业成了当代经济发展的动力的阵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此背景下，通讯不再单纯是辅助商业的二级附件，通讯本身成了“大买卖”。关于这一点，他引述了五角大楼“信息处理和技术办公室”主任的话，这位主任宣称“主宰信息处理这个领域的国家将掌握开启21世纪世界领导权的钥匙”（希勒，1985：18）。希勒提请大家注意的第二项新状况是通讯和信息技术这块新的“心脏地带”现在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正日益由很少数势力强大的跨国公司掌控，这些公司的基地或许（实际上他们大部分是）在美国，但在全球范围遍布世界诸多国家里同时运营。希勒的观点是，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些跨国公司的活动恰恰取决于在整个世界市场上跨越国界、开创信息“自由流通”。国家政府所关注的是调控本国内的传播，因而给跨国公司设下了障碍，所以这些跨国公司就愈来愈想要（而且愈来愈能够）凌驾于国家政府的政策之上，或许以至于给个体国家的根本主权造成威胁。希勒指出，因此我们同时看到“文化控制和统治大范围扩张……信息控制基础上的全球权力新体系……在该体系下跨国传播公司现在甩开了传统的国家政治权力机构”（出处同上）。

媒介帝国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包括诸多层面。就

世界国际电视流的模式而言,美国当仁不让地是世界头号电视出口商。美国一方面一直向世界其余地区输出的电视节目量比其他所有国家合起来努力输出的要多得多,与此同时,美国只进口了自己电视播出节目量的一至二个百分点。此外,美国这种统治在黄金时段的故事片和新闻节目等重头电视节目段中更盛。举其中的第二项为例,时至今日,“世界新闻”大部分由非常少数的报业和通讯社提供,而它们全部是英美的(参照:史密斯,1980)。这些机构显然通过界定价值观念而决定了国际政治议事日程。在此程度上,几乎所有情况下,世界新闻的流动主要是单向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英美的电视新闻机构提供核心的广播电视新闻。鉴于此,事实上再怎样说英美电视新闻的内容和风格在全世界的直接存在或是间接影响都不算夸大其辞。

然而,这不仅仅是出口美国节目本身的问题。美国媒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尤其可以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媒介要么取得美国电视样式的特销权要么照抄美国电视样式的程度看出其影响力。比如,世界上许多国家有本国“版”的电视片《初次约会》。不仅仅是美国出口了大量电视节目——除此之外,美国还撰写了国际电视“语法”——美国制订的电视样式准确地说已经给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电视制作“定下框架”。

下[illegible]在[illegible]哪

近年来,文化帝国主义(或是媒介帝国主义)的命题事实上已经遭到有力的批判,已经有人建议对该基本命题做许多修订。批评五花八门,但其中尤其有一点是说,起先提出媒介帝国主义的命题是在美国文化霸权的高峰,即 20 世纪 60 年

代末期。那是其统治的顶盛时期，自此美国确定无疑已经走下坡路。就这方面讲，最初的命题往往会惟独盯着美国电视出口模式，而不对非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给予足够重视，这包括，比如，英法机构不断向非洲的前殖民地出口文化产品，或者在另一个环境里，墨西哥作为面向其他拉美国家的电视出口商的实力，或者是巴西的地位及其将中篇电视剧反销到南欧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的状况。任何恰当的媒介帝国主义的命题当然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参照：马特拉特，戴顾尔和马特拉特，1984）。

最根本的是，批评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人士指出，该命题假定媒介效应的皮下注射模式。这就是说，它臆断可以自动预言整个世界观众收看美国电视节目的效应。这里的问题在于，该领域已经完成的这类经验研究与其说证实了美国媒介品的直接效应，不如说证实了不同环境中的观众以受其当地环境影响的方式重新解读美国节目的能力。马特拉特及其同事们（出处同上）举了个例子，讲以“雅利安人”为主人公的美国连续剧当被在片中常给定位为“坏家伙”的第三世界人们收看时，频频出现“反向认同”的过程。这不是想告诉我们说不存在文化强权，也不是说美国主宰的国际媒介无论如何没有影响——相反，这些应该警示我们注意诸模式的复杂性，其中既有人运用文化强权就有人对其加以抵制（有关该论点的详述参见：莫利，1992，和格里普斯拉德，即将出版）。

回到文化帝国主义

希勒（1991）在《后帝国主义时代尚未到来》一文中指出，自他的《大众传播与美帝国》（1969）一书首版之时起发生的关键变化是，今天“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媒介—文化权力大

部分已经隶属到跨国公司的权限之下”(1991:13),以至于就算“美国国家权力不再是文化统治的惟一决定因素”,就算“跨国公司文化统治”正是现在的关键议题,不过,它与那些庆贺我们所谓的后现代多元社会的所谓的“符号民主”的人们相左,统治仍旧存在,仍旧打着“明显的美国进口”标记(出处同上:15)。

希勒在其他文章中指出,由美国大公司主宰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仅仅是让位于一种跨国公司文化统治——在大型、“无国籍”的跨国公司的支配之下。他写道,就此而言,今天世界市场经济“已从起初的美国模式演变出来,但保留了其核心特征”,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由在诸多国家建立基地的跨国公司所组成的全球体系,运用起源于美国、且仍在那里盛行的传播和文化的经验和方法”(希勒,1992:39)。因此,希勒指出:

> 25 年前,美国的媒介产品涌入世界。今天,美国大众文化出口没有减少。变化在于生产商变成巨型、一体化的文化联合企业……(它们)……给全球……市场……提供了……整个文化氛围……(但是)现在文化集团不是完全由美国拥有。美国的文化风格和技术……已经……跨越了国界。
>
> (出处同上:12—13)

希勒的论点是,一方面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没有灭亡,“另一方面它不再能充分说明全球文化状态。今天视跨国企业文化为中心力量才更有用”(出处同上:14—15)。

尽管如此,第三世界早先就梦想的“世界信息新秩序”能少受些来自西方世界的单向信息流的支配,这种可能性似乎

比25前更加渺茫了。情况仍旧是

> 绝大多数世界新闻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且由四大跨国通讯社出品——美联社（AP）、合众国际社（UPI）、法新社（AFD）、路透社（Reuters）。此外，西方世界主宰了卫星、电磁波谱的使用，控制了无线电波、电信、微电子、遥感技能、卫星直播、电脑传输的运用。
>
> （韦特，1988:139）

卫星电视：全球时间和偷窃历史

安娜贝尔·斯里伯尼－莫汗麦迪（1992）指出，关于媒介效应的论述在着重媒介"内容"时常常疏漏了考虑一下卡维尔（1982）所称的"电视的事实"（"fact of television"）本身——根据它对文化方向、社交模式、认知方式的冲击——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参照：斯里伯尼－莫汗麦迪，1992）。威尔克对该论点做了有益的扩充。威尔克主要关注作为"'全球时间'工具"的跨国媒介（即将出版：1）。他的论点是，第三世界批评媒介帝国主义的人士过去太过于注重"单个节目的内容和发达国家对该内容的控制"，因而没能意识到"电视最巨大的影响力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媒介即时性带来的时间和距离的概念上"（出处同上）。

威尔克的论点将我们带回本章前部提出的有关文化构建时间和历史的问题上。威尔克依据查克拉巴蒂（1992）的理论提醒我们，因为可以认为西方的历史线性模式与殖民世界体系的发展同步成长，所以说"将世界其余地方变成'没有历

史的民族'这种扩张行径(参照:沃尔夫,1982)给予了殖民地对进步的主叙述,该叙述留给殖民主体的是只能记数文化差异的历史钟表"(威尔克,即将出版:7)。

他指出,在电视来到殖民地之前,

> 时间、距离、文化在解释并证明殖民地同宗主国之间差异的合理性时是几乎可以互换的概念,……殖民地被看成是原始、落后、不发达的……最终效果……是使传统的概念,一种根植于遥远时空的文化的概念客体化。殖民地落后是因为它们受一成不变的传统主宰着——无始无终、孤立的、普遍的。在此背景下,时间流是殖民者的产物……他们共同将自己描绘成"进步"的使者——这个词同"传统"对立,还融合了时间、距离和文化。进步意味着时间从一成不变的往昔运动到动态的未来;空间从孤立的穷乡僻壤运动到繁华都市;文化从死气沉沉的传统运动到时尚的现代化。
>
> (出处同上:3)

当然,如威尔克指明的,这里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以进步的思想为前提,而另一方面却永远不可能真正"迎头赶上"(参照:桑格里,1987),在于一方而时间滞后(或文化滞后:比如,由殖民地目前落后于宗主国潮流"季节"的数量而测定)可长可短,而另一方而这只"钟表总是定在宗主国……殖民地永远也无法赶上"(威尔克,即将出版:3)。

威尔克指明,在此情形下,许多第三世界制作的节目(廉价的本土节目,其中点缀着大都市过时了不要的东西)似乎

> 给设计成殖民地时间的客观教程。观众被强迫指出是否他们自己的经历和《父亲最懂》(一部进口的美国情景喜剧)中描绘的经历的差异是他们国家和美国的时间推移、地理距离的结果,或是他们自己同美国人之间的真正文化差异的结果。
>
> (出处同上:4)

按照威尔克的观点,卫星电视的降临所扰乱的正是这种社会经历的时间分离,因为节目(特别是新闻和体育节目)的播出非常及时:

> 没有滞后。住在伯利兹市(译者注:中美洲北部国家伯利兹的东部港市。)郊沼泽地中摇摇欲坠的房屋里的一家伯利兹人不仅仅正同北美市区的人看着一样的节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同时收看这些节目。伯利兹这家人正收看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卫星电视已经消除了殖民地时间差中的一个要素。不再能从时间角度来判断宗主国同殖民地间的距离……电视时间现在是只单一的钟表,在每一个它所及的地方以单一的节律嘀答走过……直接体验一系列的事件,这种体验曾经是遥远的、经过绝对可靠的过滤、因而只能朦朦胧胧地间接观察。
>
> (出处同上:5)

结果,当然如威尔克所指明的:

> 我们不能闲坐着,期望等伯利兹"赶上来"了问题便会得到解决。伯利兹同美国之间的时间滞后不

见了，距离正在拉近；剩下的是文化、经济和政治差异，它们需要新的解释。

（出处同上：6）

CNN总裁特德·特纳曾宣称（参照：道芒特，1993：1）他的公司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多年前预言的"地球村"的"公告传报员"。当然，在国际危机之时CNN能最终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昂指出的："海湾战争之所以被冠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称，主要由于特德·特纳的CNN的表述方式——原因是卫星电信技术用电子瓦解了时空，所以这场战争整个世界……都参与了"（1991：4）。在希勒（1992）看来，这里的中心问题是控制信息源。因此，他指出："全世界对海湾地区正发生的事情及其意义的认识大部分实际上来自单独的一个美国源——CNN……反过来（它）基本上从五角大楼和白宫获取素材"（出处同上：1）。

然而，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层面，它将我们带出控制信息传播的问题。于是，考尔多罗拉（1992）指出，海湾战争时，卫星电视这个媒介在视觉上的即时性本身也有令人好奇的效应，即拒绝给予观众对事件的任何历史透视，在虚构的叙述中湮没"现实情况"，从而有效地强化了全球其他观众与受到盟军轰炸的人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稍微更仔细地思考"谁处于历史的终点，他们又是怎样到达那里？"这个问题了（克拉克，1991：39）。

参考文献

Abercombie, N., Hill, S. and Turner, B. (1984),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London: Allen & Unwin.

Abish, W. (1983), *How German is it?*, London, Faber & Faber.

Adorno, T. W. (1985), 'On the question: what is German?', *New German Critique*, 36: 121—133.

Aglietta, M.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Ahmed, A. (1992a), *Postmodernism and Islam*, London: Routledge.

Ahmed, A. (1992b), 'Palestine revisited',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20 November.

Ajzenberg, A. (1988), 'Fonder une nouvelle citoyenneté', *Terminal*, 39/40/41: 71—74.

Aksoy, A. and Robins, K. (1992), 'Hollywood for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ritical mass in image market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6(1): 1—22.

Al-'Azm, S. J. (1981), 'Orientalism and orientalism in reverse', *Khamsin*, 8: 5—26.

Albertsen, N. (1986), 'Towards post-Fordist localities? An essay on the socio-spatial restructuring process in Denmark'. Paper presented to the XI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New Delhi, August.

Alger, C. F. (1988), 'Perceiving, analysing and coping with the local-

global nexu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17:321—340.

Alibhai, Y. (1989), 'Community whitewash', *The Guardian*, 23 January.

Althusser, L. (1972), *For Marx*, Harmondsworth: Penguin.

Amin, S. (1989), *Eurocentrism*, London: Zed Books.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Ang, I. (1985), *Watching Dallas*, London: Methuen.

Ang, I. (1991), 'Global media/local meaning', *Media Information Australia* (62), November: 4—8.

Ang, I. (1992), 'Hegemony-in-trouble', in D. Petrie (ed.) *Screening Europ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Ang, I. and Morley, D. (1989), 'Mayonnaise culture and other European follies', *Cultural Studies*, 3: 133—144.

Anzieu, D. (1984), *The Group and the Unconscio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Appadurai, A. (1986), 'Theory in anthropology: center and periphe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8(2): 356—361.

Appadurai, A. (1988), 'Putting hierarchy in its pla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 36—49.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Arts Council (1988), *An Urban Renaissance*, London: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Ascherson, N. (1988), 'Below stairs in Europe's house', *The Observer*, 11 December.

Ascherson, N. (1989), 'Little nations hang out their flags', *The Observer*, 1 October.

Ascherson, N. (1990), 'Europe 2000', *Marxism Today*, January.

Atkinson, P. (1992), *Understanding Ethnographic Texts*, London: Sage.

Auletta, K. (1993a), 'Raiding the global village', *The New Yorker*, 2 August: 25—30.

Auletta, K. (1993b), 'The last studio in play', *The New Yorker*, 4 October:77—81.

Balibar, E. (1991), 'Es gibt keinen Staat in Europa: racism and politics in Europe today', *New Left Review*, 186.

Banks, M. and Collins, R. (1989), 'Tradeable inform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market', Research paper, CCIS,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Barraclough, G. (1963), *European Unity in Thought and Ac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Barret-Kriegel, B. (1992), 'La Citoyenneté en Europe', *Raison Présente*, 103.

Barthes, R. (1982), *The Empire of Signs*, New York: Hill and Wong.

Bassand, M. (1988), 'Communication in cultur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M. Ernste and C. Jaeger (eds),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Spatial Structure*, London: Belhaven.

Bassand, M., Hainard, F., Pedrazzani, Y. and Perrinjaquet, R. (1986), *Innovation et changement social: actions culturelles pour un développement local*, Lausanne: Presses Polytechniques Romandes.

Basso, K. (1979), *Portraits of 'The White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udrillard, J. (1985a), 'The masses: the implosion of the social in the media', *New Literary History*, 16(3).

Baudrillard, J. (1985b),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in H. Foster (ed.)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Baudrillard, J. (1988a), *America*, London: Verso.

Baudrillard, J. (1988b),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M. Post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auman, Z. (1992), 'Soil, blood and identity', *Sociological Review*, 40(2).

Bausinger, H. (1984), 'Media, technology and everyday lif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6(4):343—352.

Beard, S. (1991), 'Blade runner boys', *The Modern Review*, Autumn.

Ben-Dasan, I. (1972), *The Japanese and the Jews*, New York: Wetherhill.

Benedict, R. (1974)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New York: Meridian.

Benton, S. (1989), 'Greys and greens', *New Statesmen and Society*, 2 June.

Berger, J. (1990), 'Keeping a rendezvous', *The Guardian*, 22 March.

Berger, P., Berger, B. and Kellner, H. (1974), *The Homeless Mind: Modernism and Consciousne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erman, M. (1983),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Bernal, M. (1987), *Black Athena*,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Bhabha, H. (1987), 'Interrogating identity', in L. Appignanesi (ed.) *Postmoder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Bhabha, H. (1989), 'Beyond fundamentalism and liberalism',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3 March: 34—35.

Bigsby, C. (ed.) (1975), *Superculture: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and Europe*, London: Paul Elek Books.

Billaudot, B. and Gauron, A. (1985), *Croissance et crise: vers une nouvelle croissance*, 2nd edition, Paris: La Découverte.

Bion, W. R. (1978), *Four Discussions with W. R. Bion*, Strath Tay, Perthshire: Clunie Press.

Birgel, F. A. (1986), 'You can go home again: an interview with Edgar Reitz', *Film Quarterly*, Summer.

Bodroghkozy, A. (1992), 'Is this what you mean by color TV?', in L. Spigel and D. Mann (eds) *Private Screening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öll, H. (1961), *Billiards at Half Past Nine*, London: Calder and Boyars.

Booz-Allen, H. (1993),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for UK Broadcasters and its Economic Implications*, Landon: ITV Network Association.

Boyer, R. (1986a), *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 une analyse cri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Boyer, R. (1986b), *Capitalismes fin d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Braudel, F. (1988),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vol. 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London: Collins/Fontana.

Brennan, T. (1989), 'Cosmopolitans and celebrities', *Race and Class*, 31(1): 1—19.

Breton, P. and Proulx, S. (1989), *L'Explosion de la communication*, Paris/Montreal: La Découverte/Boréal.

Brown, C. (1989), 'Holston exports', *Broadcast*, 13 October.

Brown, P. G. and Shue, H. (eds) (1981), *Boundaries: National Autonomy and Its Limits*, Totowa, New Jersey: Rowman & Littlefield.

Brune, F. (1993a), 'Néfastes effets de l'idéologie politico-médiatique', *Le Monde diplomatique*, May.

Brune, F. (1993b), '*Les Médias pensent comme moi!*': *Fragments du discours anonyme*, Paris: L'Harmattan.

Brunsdon, C. (1986), 'Women watching TV', *Medie Kulture*, 4.

Brunsdon, C. and Morley, D. (1978), *Everyday Television: Nationwid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uruma, I. (1989), 'From Hirohito to Heima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6 October.

Buruma, I. (1991a), 'A Euro-flag of many colours', *The Guardian*, 28 September.

Buruma, I. (1991b), 'The pax axi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5 April.

Cable Authority (1987), *Cable and the Inner Cities*, London: Cable Authority.

Caldorola, V. (1992), 'Time and the television war', *Public Culture*, 4(2).

Calhoun, C. (1988),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 public spher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Meaning of Spa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Research Committee 24, Frankfurt, 15—19 May.

Cardiff, D. and Scannell, P. (1987), 'Broadcasting and national unity', in J. Curran, A. Smith and P. Wingate (eds) *Impacts and Influences: Essays on Media and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Carey, J. (1977),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an American view', in J. Curran, M. Gurevitch and J. Wo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Carpignano, P., Andersen, R., Aronowitz, S. and Difazio, W. (1990), 'Chatter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reproduction: talk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mind"', *Social Text*, 25/26: 33—55.

Castells, M. (1983), 'Crisis, planning,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managing the new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ace and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1).

Castoriadis, C. (1990), *Le Monde morcelé*, Paris: Seuil.

Castoriadis, C. (1992), 'Reflections on racism', *Thesis Eleven*, 32.

Cate, F. H. (1990), *The European Broadcasting Directive*, Washington, D. C.: America Bar Association, Communications Committee Monograph Series 1990/1.

Cavell, S. (1982), 'The fact of television', *Daedalus*, 3(4).

Certeau, M. de (1988), *The Writ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krabarty, D. (1992), 'The death of histor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culture of late capitalism', *Public Culture*, 4(2).

Chalmers, M. (1984), 'Heimat: approaches to a word and a film', *Framework*, 26—27: 90—101.

Chow, R. (1993), *Writing Diaspor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hristopherson, S. and Storper, M. (1986), 'The city as studio; the world as back lot: the impact of vertical disintegration on the location of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4(3):305—320.

Clarke, J. (1991), *New Times and Old Enemies*, London: HarperCollins.

Clemens, J. (1987), 'What will Europe watch?', *Journal of the Royal Television Society*, 24(6).

Clifford, J.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in J. Clifford and G.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 (1992). 'Travelling cultures', in L. Grossberg *et al.* (eds)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Clifford, J. and Marcus, G.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uzel, J. (1992), L'audiovisuel-la veille du marché unique',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959.

Coker, C. (1992), 'Post-Modernit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as war been disinven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8 (3): 189—198.

Collins, R. (1988), 'National cultur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ce, London, 20—22 July.

Collins, R. (1989) 'The peculiarities of English satellite TV in W. Europe',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C. C. I. S.

Collins, R. (1992). 'Unity in diversity: the European single market in broadcasting and the audiovisual, 1982—1992'. Paper presented to the PICT National Conference.

Collins, R., Garnham, N. and Locksley, G. (1988). *The Economics of Television: UK Case*, London: Sage.

Comaroff, J. and Comaroff, J. (1992),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EC) (1983), 'The Community of culture', *European File*, 5/8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4),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Brussel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6), 'Television and the audiovisual sector: towards a European policy', *European File*, 14/86, August-September.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7), *A Fresh Boost for Cultur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Brussel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8a), 'Towards a large European audiovisual market', *European File*, 4/88, February.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8b),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culture', *European File*, 10/88, May.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1964), 'Winning the Cold War: the US ideological offensive', 88th USA *Congress House Report*, No. 1352, April 27: 6—7.

Connell, I. (1983),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and the British Left', *Screen*, 24(6).

Connolly, W. (1989),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global politics', in J. Derian and M.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Conte-Helm, M. (1989), *Japan and the North East of England: From 1862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Athlone Press.

Cope, N. (1990), 'Walkman's global stride', *Business*, March.

Corm, G. C. (1989), *L'Europe et L'Orient: de la Balkanisation à la Libanisation-histoire d'une modernité inaccomplie*, Paris: La Découverte.

Cornford, J. and Robins. K. (1995), 'Beyond the last bastion?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labour force in the British television industry', in G. Sussman and J. Lent (eds) *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the Worl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Courlet, C. and Judet, P. (1986), 'Nouveaux éspaces de production en France et en Italie', *Annales de la recherche urbaine*, 29.

Crookes, P. and Vittet-Philippe, P. (1986), *Local Radio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Manchester: European Institute for the Media.

Cumings, B. (1991), 'CIA's Japan 2000 caper', *The Nation*, 30 September.

Curran, J. (1990), '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 3):135 164.

Curti, L. (1988), 'Imported Utopias', unpublished paper, Instituto Orientale, Naples.

Dahrendorf, R. (1990), 'Europe's vale of tears', *Marxism Today*, May.

Dale, P. N. (1987), *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 London: Routledge.

Davidson, I. (1990), 'Old European ghosts return to haunt Germany', *Financial Times*, 22 March.

Davis, H. and Levy, C. (1992), 'The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of television: a British/West European comparison', *Economy and Society*, 21(4).

Dawson, C. (1956), 'The relevance of European history', *History Today*, 6(9).

DeLillo, D. (1985), *White Noise*, London: Picador.

DeLiss, C. (1991), *Exotic Europeans*, London: South Bank Centre Publications. deMause, L. (1990), 'The Gulf War as mental disorder', *The Nation*, 11 March: 301—308.

Derrida, J. (1971), 'White mythology', reprinted (1982) in J.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 (1974),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

ty Press.

Derrida, J. (1992), *The Other H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Dickson, M. (1993), 'Tremors on the television', *Financial Times*, 15 October.

Donald, J. (1988), 'How English is it? Popular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ulture'. *New Formations*, (6): 31—47.

Donzelot. J. (1979),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London: Hutchinson.

Dowmunt, T. (ed.) (1993), *Channels of Resista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Drakulić. S. (1993a), *Balkan Express: Fragments from the Other Side of War*, London: Hutchinson.

Drakulić. S. (1993b), *How We Survived Communism and Even Laughed*, London: Vintage.

Dufour, Y. R. and Dufour-Gompers, N. (1985), 'Journalists, anxiety and media as an intra-psychic screen', *Israel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Related Sciences*, 22(4): 315—324.

Duncan, S., and Goodwin, M. (1988), *The Local State and Uneven Development: Behind the Local Government Cri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Dupuy, G. (1988), 'L'Eurovision ou le conflit de réseau et des territoires', in H. Bakis (ed.) *Information et organisation spatiale*, Caen: Paradigme.

Durham, J. (1993), *A Certain Lack of Coherence: Writings on Art and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Kala Press.

Eco. U. (1985), 'Innovation and repetition: between modern and post-modern aesthetics', *Daedalus*, 114(4): 161—184.

Eco. U. (1992), 'Chaosmos: the return of the Middle Ages', in R. Kearney (ed.) *Visions of Europe*, Dublin: Wolfhound Press.

Eco. U. (1993),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original, 1968], in *Misreadings*, London: Jonathan Cape.

Ehrenberg, A. (1993), 'La vie en direct ou les shows de l'authenticité', *Esprit*, January.

Eliot, T. S. (1948),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ber & Faber.

Ellis, J. (1982), *Visible Fictions*, London: Routledge.

Elsaesser, T. (1985), 'Germany's imaginary America: Wim Wenders and Peter Handke', in S. Haywood (ed.) *European Cinema*, Birmingham: Aston University, Modern Languages Department.

Elsaesser, T. (1988), 'National cinema and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in C. Schneider and B. Wallis (eds) *Global Television*, New York: Wedge Press.

Elsaesser, T. (1989), *New German Cinema: A Histor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Macmillan.

Emberley, P. (1989), 'Places and stories: the challenge of technology', *Social Research*, 56(3).

Enzensberger, H. M. (1992), quoted in B. Ruys, 'Crossborder', *The Guardian*, 24 November.

Eyal, J. (1993), 'All subterfuge, no refuge', *The Guardian*, 15 February.

Fabian, J.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abian, J. (1990), 'Presence and representation: the other and anthropological writing', *Critical Inquiry*, 16:753—772.

Fallows, J. (1989a), 'Containing Japan', *Atlantic Monthly*, May.

Fallows, J. (1989b), *More Like U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Fallows, J. (1991a), 'The crucial differenc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7 September.

Fallows, J. (1991b), 'Is Japan the enem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0 May.

Feraud-Royer, R. M. (1987), 'Conversations publiques', *Annales de la recherche urbaine*, 34:15—22.

Ferro, M. (1993), 'Médias et intelligence du monde',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uary:32.

Fish, S. (1989), 'Commentary: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 in H. Vee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London:Routledge.

Flores, E. (1988), 'Mass media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Puerto Rican peopl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Barcelona, July.

Fontaine, J. (1988), 'Public or privat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amil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ral and Social Studies*, 33.

Foster, H. (ed.) (1985),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Pluto Press.

Foucault, M. (1980), 'Georges Canguilhem:philosopher of erro',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7.

Frampton, K. (1985), '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six 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in H. Foster (ed.)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Pluto.

Franklin Lytle, P. (1992), 'US policy toward the demise of Yugoslavia: the "virus of nationalis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6 (3):303—318.

Fraser, N. (1989), 'Keeping the world covered', *The Observer*, 12 November.

Frèches, José (1986), *La Guerre des images*, Paris:Denoël.

Friedman, G. and LeBard, M. (1991),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New York:St Martin's.

Friedman, J. (1989), 'Culture, identity and world process', *Review*, 12(1).

Frith, S. (1983), 'The pleasures of the hearth', in V. Burgin, J. Donald and C. Kaplan (eds) *Formations of Pleasure*, London:Routledge.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Harmondsworth:Penguin.

Fusco, C. (1989), 'About locating ourselves and our representations',

Framework, 36.

Gabler, N. (1988), *An Empire of their Own: How the Jews invented Hollywood*, London: W. H. Allen.

Galleano, E. (1993), Interview with Miguel Bonasso, in *The Last Café*, transmitted Channel 4, London, 12 April.

Gallissot, R. (1992), 'Dépasser le nationalisme sinon les nationalismes nous dépassent', *L'Homme et la société*, 103.

Caritaonandia, C. (1993), 'Regional television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3):277—294.

Garnham, N. (1983), 'Public service versus the market', *Screen*, 24 (3):6—27.

Garnham, N. (1986), 'Concepts of culture: public policy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Cultural Studies*, 1(1):23—38.

Garnier, J.-P. (1987), 'L'éspace médiatique ou l'utopie localisée', *Espaces et sociétés*, 50.

Geertz, C.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eisler, M. (1985), 'Heimat and the German Left', *New German Critique*, 36:25—67.

Gellner, E. (1992), *Postmodernism, Reason and Religion*, London: Routledge.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freu, J. (1986), 'From communication policy to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Cultural Studies*, 1(1).

Gilroy, P. (1986),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London: Hutchinson.

Gilroy, P. (1989), Remarks on postmodernism, in discussion at National Film Theatre, London, quoted in I. Ang and D. Morley 'Mayonnaise culture and other European follies', *Cultural Studies*, 3(2): 133—144.

Gitlin, T. (1989), 'Postmodernism: roots and politics', *Dissent*, Winter.

Glenny, M. (1988), 'The rise in spirit: cultural identities in E. Europe', *The Guardian*, 15 December.

Godelier, M. (1991), 'Is the West the model for humankin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28.

Gorbachev, M. (1987),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London: Collins.

Gordon, R. (1989), 'Les entrepreneurs, l'entreprise et les fondements sociaux de l'innovation', *Sociologie du travail*, 30(1): 107—124.

Gramsci, A. (1971),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Grass, G. (1992), 'Losses', *Granta*, 42.

Grassmuck, V. (1991), 'Otaku: Japanese kids colonise the realm of information and media', *Mediamatic*, 5(4).

Greenblatt, S. (1992), *Marvellous Possessions: The Wonder of the New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ipsrud, J. (forthcoming), *The 'Dynasty' Years*, London: Routledge.

Grotstein, J. (1981), *Splitting and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New York: Jason Aronson.

Guback, T. H. (1974), 'Cultural identity and film i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Cinema Journal*, 14(1).

Guback, T. H. (1979), 'Film a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A. Mattelart and S. Siegelaub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1, Paris/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Gunder Frank, A. (1969),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Gupta, A. and Ferguson, J. (1992), 'Beyond culture: spac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7: 6—23.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sa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gerstrand, T. (1986), 'Decentralisation and radio broadcasting: on the "possibility space" of 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Hall, S. (1981), 'Encoding/decoding in TV discourse',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and P.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Hall, S. (1986),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2): 45—60.

Hall, S. (1987), 'Minimal selves', in L. Appignanesi (ed.) *Postmoder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Hall, S. (1988), 'New ethnicities', in K. Mercer (ed.) *Black Film, British cinema*, ICA Document No. 7, 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Hall, S. (1992a), 'The West and the Rest', in S. Hall and B. Gie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Gambridge: Polity Press.

Hall, S. (1992b), 'European cinema on the verge of a nervous breakdown', in D. Petrie (ed.) *Screening Europ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Hall, S. (1993), 'Which public, whose service?', in W. Stevenson (ed.) *All Our Futures: The Changing Role and Purpose of the BBC*,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Hannerz, U. (1991), 'Cosmopolitans and locals in world culture',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Hansen, M. (1985), 'Dossier on Heimat', *New German Critique*, 36: 3—25.

Hartley, J. (1978), 'Invisible fictions', *Textual Practice*, 1(2): 121—138.

Hartmann, C. and Husband, P. (1972), 'Race and the British media', in D. McQuail (ed.) *The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Hartsock, N. (1989), 'Rethinking modernism', *Cultural Critique*, 7: 187—206.

Harvey, D. (1985), '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in D. Gregory and J. Urry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s*, London: Macmillan.

Harvey, D. (1987), 'Flexible accumulation through urbanisation: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in the American city', *Antipode*, 19(3): 260—286.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ssan, I. (1990), 'The burden of mutual perception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almagundi*, 85—86.

Hassner, P. (1991), 'L'Europe et le spectre des nationalismes', *Esprit*, October.

H¨ussermann, H. and Siebel, W. (1987), *Neue Urbanit¨t*, Frankfurt: Suhrkamp.

Hearn, L. (1959), *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Tuttle Books.

Hebdige, D. (1988a), *Hiding in the Light*, London: Routledge.

Hebdige, D. (1988b), 'Towards a cartography of taste', in D. Hebdige, *Hiding in the Light*, London: Comedia/Routledge.

Hebdige, D. (1990), 'Fax to the future', *Marxism Today*, January.

Hegel, G. W. F. (1956),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original, 1837], New York: Dover.

Held, D. (1988), 'Farewell nation state', *Marxism Today*, December.

Held, D. (1993),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22 January.

Heller, A. and Feher, F. (1988), *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igson, A. (1989),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inema', *Screen*, 30(4).

Hjarvard, S. (1993), 'Pan-European television news: towards a European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in P. Drummond, R. Paterson and J. Willis (eds) *National Identity and Europ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Hobsbawm, E.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 (1992), 'Goodbye Columbu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9 July.

Hobsbawm, E. (1994),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ichael Joseph.

Hobsbawm, E. and Ranger, T.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ggart, R. (1958),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Hoggett, P. (1992), 'A place for experience: a psychoanalytical perspective on boundary, identity and cultu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345—356.

Holborn, M. (1991), *Beyond Japan*, London: Jonathan Cape.

Home Office (1988), *Broadcasting in the '90s: Competition, Choice and Quality*, Cm 517, London: HMSO.

Hondius, F. W. (1985), 'Freedom of commercial speech in Europe', *Transnational Data Report*, 8(6).

Hood, S. (1988), 'The couthy feeling',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12 August: 30—31.

Horton, D. and Wohl, R. R. (1956),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bservations on intimacy at a distance', *Psychiatry*, 19:215—229.

Hoskins, C. and R. Mirus (1988), 'Reasons for the U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levision programme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0(4):499—515.

Hourani, A. (1946), *Syria and Lebanon: A Political Essa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urani, A. (1980),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Macmillan.

Hudson, R. (1988), 'Uneven development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changing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forms of spatial organisation of production and service provision, and their impacts on localiti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13:484—496.

Huey, J. (1990), 'America's hottest export: pop culture', *Fortune*, 31 December.

Hutton, W. (1993), 'New tribalism threatens to infect us all', *The Guardian*, 1 February.

Huyssen, A. (1988), 'Mass culture as woman: modernism's other', in T. Modleski (ed.) *Studies in Entertain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nnis, H. A. (1950),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Ishihara, S. (1991), *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Why Japan Will Be First Among Equal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sozaki, A. (1991), 'Wayo style: the Japanisation mechanism', *Visions of Japan*,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Jameson, F. (1985),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H. Foster (ed.)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Januszczak, W. (1990a), *Sayonara Michelangelo: The Sistine Chapel Restored and Repackaged*,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Januszczak, W. (1990b), 'The new Jews', *The Guardian*, 29 December.

Joffe, J. (1993), 'The new Europe: yesterday's ghosts', *Foreign Affairs*, 72(1).

Johnson, S. (1988), *The Japanese through American Ey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uanny, Robert (1988), 'Espaces et identités francophones', *Acta geographica*, 73.

Julien, I. and K. Mercer (1989), 'De margin and De centre', *Screen*, 30 (1):2—11.

Kaes, A. (1989), *From Hitler to Heima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nt, I. (1968), 'An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original, 1784], in I. Kant, *On Histor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Kaplan, C. (1986), 'The culture crossover', *New Socialist*, 41(9).

Kato, H. (1991), 'The machine cult', *Visions of Japan*,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Keane, J. (1989), 'Identikit Europe', *Marxism Today*, April.

Kearney, R. (1988a), *The Wake of Imagi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Kearney, R. (1988b), *Transitions: Narratives in Modern Irish Culture*, Dublin: Wolfhound Press.

Kearney, R. (ed.) (1992), *Visions of Europe*, Dublin: Wolfhound Press.

Khaldun, I. (1987), *An Arab Philosophy of History: Selections from the Prologomena of Ibn Khaldun* (1332—1406), trans. and arranged by C. Issawi, Princeton, New Jersey: Darwin Press.

King, A. (1991), 'Introduction', in A. King (ed.) *Culture, Globalis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London: Macmillan.

Knightley, P. (1991), 'Spider's web across the ocean', *The Guardian Weekly*, 17 March.

Kramer, F. (1993), *The Red Fez: Art and Spirit Possession in Africa*, London: Verso.

Kreutzner, G. (1989), 'On doing cultural studies in Western Germany', *Cultural Studies*, 3(2): 240—249.

Kristeva, J. (1991), *Strangers to Ourselves*,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Kristeva, J. (1992a), 'Le temps de la dépression', *Le Monde des débats*, October.

Kristeva, J. (1992b), 'Strangers to ourselves: the hope of the singular', in R. Kearney (ed.) *Visions of Europe*, Dublin: Wolfhound Press.

Kundera, M. (1984), 'A kidnapped west or culture bows out', *Granta*, 11: 93—118.

Kureishi, H. (1989), 'England, your England',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21 July.

Lash, S. and Urry, J. (1987), *The End of Organis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eadbeater, C. (1991), 'Masters of the interior universe', *Financial Times*, *3 September*.

Leith, W. (1993), 'The kind of violence lovers hate', *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3 January.

Lerner, D. (1964),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Levin, T. (1985), 'Nationalities of language', *New German critique*, 36: 111—121.

Levinas, E. (1983), 'Beyond intentionality', in A. Montefiore (ed.) *Philosophy in France Tod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vitt, T. (1983), *The Marketing Imagination*,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Ley, D. (1989),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place', in J. A. Agnew and J. S. Duncan (eds) *The Power of Place*, Boston: Unwin Hyman.

Liebes, T. and Katz, E. (1989), 'On the critical ability of TV viewers', in E. Seiter, H. borchers, G. Kreutzner and E.-M. Warth (eds) *Remote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Liebes, T. and Katz, E. (1991), *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ncoln, E. J. (1994), '*Japan's New Global Role*,'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Linforth, I. (1926), 'Greek gods and foreign gods in Herodot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Classical Philosophy.

Lipietz, Alain (1987),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 London: Verso.

Lipschutz, R. (1992), 'Reconstructing world politics: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Mille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1 (3).

Lockwood, D. (1954),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in G. K. Zollschan and W. Hirsch (ed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gica (1987),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in Europe: Towards the 1990s*, London: Logica Consultancy Ltd.

Luce, H. (1941),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 Rhinehart Inc.

Lummis, C. (1984), 'Japanese critiques of technological societ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8(3).

Lyotard, H. A. (ed.) (1987),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cBride, S. (1980), *Many Voices One World*, Paris: UNESCO.

MacCabe, Colin (1988), 'Those golden years', *Marxism Today*, 32(4).

McGrane, B. (1989), *Beyond Anthropology: Society and the Oth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ckinder, H. J. (1904), 'Europe: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3(4): 434—437.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agas, B. (1992), 'The destruction of Bosnia-Herzegovina', *New Left Review*, 196: 102—112.

Magris, C. (1990), *Danube*, London: Collins—Harvill.

Malcolm, D. (1990), 'Hollywood is the enemy', *The Guardian*, 29 November.

Malcomson, S. (1991), 'Heart of whiteness: Europe goes for the glob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1991.

Mandel, R. (1989), 'Turkish headscarves and the "foreigner problem": constructing difference through emblems of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46.

Mani, L. and Frankenburg, R. (1985), 'The challenge of orientalism', *Economy and Society*, 14(2).

Marcus, G. and Fischer, M.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tin-Barbero, J. (1988), 'Communication from culture: the crisis of the na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opular',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0: 447—465.

Mascia-Lees, F. E., Sharpe, P. and Cohen, C. B. (1989), 'The post-modernist turn in anthropology: caut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Signs*, 15(1): 7—33.

Massey, D. (1984),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Massey, D. (1991a),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Marxism Today*, June 1991.

Massey, D. (1991b), 'Flexible sex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9(1): 31—57.

Massey, D. (1992), 'A place called home', *New Formations*, 17: 3—15.

Mattelart, A. (1979), 'For a class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s', in A. Mattelart and S. Sieglaub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attelart, A. and Piemme, J.-M. (1983), 'New technologies, decentralis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in A. Mattelart and S. Siegelaub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Mattelart, A., Delcourt, X. and Mattelart, M. (1984), *International Image Markets*, London: Comedia.

Mayer, M. (1989), 'Local politics: from administration to managemen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Regulation, Innovation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Cardiff, 13—15 September.

Melot, M. (1987/8), 'Questioning Japanism', *Block*, 13.

Melucci, A.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Menzies, I. E. P. (1960), 'A case-study in the functioning of social systems as a defence against anxiety', *Human Relations*, 13(2).

Mercer, K. (1990), 'Welcome to the jungle',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yrowitz, J. (1989), 'The generalised elsewher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6(3): 326—334.

Michaels, E. (1988), 'Hollywood iconography: a Warlpiri reading',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and its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Miller, D. (1992), '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 in Trinidad: a case of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mass consumption', in R. Silverstone and E. Hirsch (eds), *Consuming Techn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Mills, P. (1985),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7.

Minear, R. H. (1980), 'Orientalism and the study of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9(3).

Miner, E. (1958), *The Japanese Tradition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nh-Ha, Trinh T. (1989), *Woman, Native, Oth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itsuhiro, Y. (1989), 'The postmodern and mass images in Japan', *Public Culture*, 1(2).

Miyoshi, M. and Harootunian, H. D. (1988), 'Introductio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87(3): 387—401.

Montaigne, M. (1990), 'On cannibals' [original, 1578], in M. Montaigne, *Essays*, Harmondsworth: Penguin.

Moragas Spa, M. de (1988), 'Cultural identity, communication spaces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XV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Barcelona, 24 28 July.

Morin, E. (1990), 'Formation et composantes du sentiment national',

Cosmopolitiques, 16.

Morley, 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orris, M. (1987), 'Asleep at the wheel?', *New Statesman*, 26 June.

Mortimer, E. (1990), 'Is this our frontier', *Financial Times*, 3 April.

Mulgan, G. (1989), 'A thousand beams of light', *Marxism Today*, April.

Mulgan, G. and Worpole, K. (1985), *Saturday Night or Sunday Morning*, London: Comedia.

Nairn, T. (1993), 'Demonising nationalism',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5 February.

Neale, S. (1981), 'Art cinema as institution', *Screen*, 22(1).

Nicholson, L. (ed.) (1990),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Norris, C. (1991),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revise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Ohmae, K. (1989), 'Managing in a borderless worl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7(3).

Owens, C. (1985), 'The discourse of others: feminists and postmodernism', in H. Foster (ed.)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Page, I. (1986), 'Tourism promotion in Bradford', *The Planner*, February.

Parekh, B. (1989), 'Between holy text and moral void',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24 March.

Paterson, R. (1980), 'The art of the TV schedule', *Screen Education*, 35: 79—86.

Peet, R. (1982), 'Internation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culture', in M. J. Taylor and N. J. Thrift (eds) *The Geography of the Multinationals*, London: Croom Helm.

Peet, R. (1986), 'The de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s', in R. J. Johns-

ton and P. J. Taylor (eds) *A World in Crisis?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ickering, M. and Robins, K. (1984). '"A revolutionary materialist with a leg free": the autobiographical novels of Jack Common', in J. Hawthorn (ed.)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Nove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Edward Arnold.

Pickering, M. and Robins, K. (1989), 'Dangerous desires: youth, class and sexuality in the work of Sid Chaplin', *Ideas and Production*, 9—10.

Pieterse, P. (1991), 'Fictions of Europe', *Race and Class*, 32.

Pietz, W. (1987), 'The phonograph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phonocentrism from Stanley to Sarnoff', in D. Attridge et al. (eds)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ore, M. and Sabel, C.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Pocock, J. G. A. (1991), 'Deconstructing Europ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9 December.

Poole, T. (1993), 'Star in the east heralds TV revolution', *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18 April.

Powell, E. (1989), 'Sovereignty we won't surrender', *The Guardian*, 17 April.

Powell, N. (1993), 'French redskins take on the cowboys', *The Observer*, 19 September.

Prebisch, R. (1950),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Rabinow, P. (1986),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in J. Clifford and G.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fferty, K. (1994), 'Sun sets on Japanese miracle', *The Guardian*, 15 January.

Ramonet, I. (1991), 'L'ère du soupçon', *Le Monde diplomatique*, May.

Rancière, J. (1992), 'Politics, identification and subjectivisation', *October*, 62:58—64.

Ranvaud, D. (1985), 'Edgar Reitz at Venice', *Sight and Sound*, 54(2):124—128.

Rath, C.-D. (1985), 'The invisible network',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Rath, C.-D. (1988), 'Live/life: TV as generator of events in everyday life',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and its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Rath, C.-D. (1989), 'Live television and its audiences', in E. Seiter, H. Borchers, G. Kreutzner and E.-M. Warth (eds) *Remote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Ravlich, R. (1989), 'City limits', *Meanjin*, 47(3):468—482.

Reed, C. and Rafferty, K. (1994), 'Dangerous yen for Hollywood', *The Guardian*, 1 December.

Reich, J. (1990), 'Germany-a binary poison', *New Left Review*, 179.

Reich, R. (1987), 'The rise of techno-nationalism', *Atlantic Monthly*, May:63—69.

Reich, R. (1990), 'Who is u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uary-February:53—65.

Richards, B. (1989), *Images of Freud: Cultural Responses to Psychoanalysis*, London: Dent.

Ricoeur, P. (1965), 'Civilis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s', in *History and Truth*,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 (1992), 'Universality and the power of difference', in R. Kearney (ed.) *Visions of Europe*, Dublin: Wolfhound Press.

Rieff, D. (1993), *Los Angeles: Capital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Phoenix/Orion Books.

Roberts, J. (1990),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

Robertson, R. (1991), 'Japan and the USA: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debate about orientalism', in N. Abercombie *et al.* (eds) *Dominant Ideologies*, London: Unwin Hyman.

Robins, K. (1993), 'The war, the screen, the crazy dog and poor mankind',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5(2): 321—327.

Robins, K. and Cornford, J. (1994), 'Local and regional broadcasting in the new media order', in A. Amin and N. Thrift (eds) *Globalis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bins, K. and Gillespie, A. (1988), 'Beyond Fordism?' Paper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Meaning of Space, Frankfurt, May 1988.

Robins, K. and Hepworth, M. (1988), 'Electronic spaces: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cities', *Futures*, 20(2).

Robins, K. and Webster, F. (1989), *The Technical Fix*, London: Macmillan.

Robins, K. and Webster, F. (1990), 'Broadcasting politics: communications and consumption', in M. Alvarado and J. O. Thompson (eds) *The Media Reader*,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Rodney, W. (1972),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London: Bogle L'Ouverture Publications.

Roud, R. (1971), *Straub*, London: Secker & Warburg.

Rorty, Richard (1985), 'Solidarity or objectivity?', in J. Rajchman and C. West (eds)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oss, S. (1990), 'Worldview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Festival, 26 August.

Rosto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ushdie, S. (1982), 'Imaginary homeland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7—20 October.

Rushdie, S. (1990), 'In good faith', *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4 Feb-

ruary.

Rustin, M. (1987), 'Place and time in socialist theory', *Radical Philosophy*, 147.

Rustin, M. (1989), 'Post-Kleinian psychoanalysis and the post-modern', *New Left Review*, 173:109—128.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Said, E. (1984), 'Reflections on exile', *Granta*, 13:157—172.

Said, E. (1988), 'Identity, negation and violence', *New Left Review*, 171:46—60.

Said, E. (1989), 'Representing the colonised: anthropology's interlocutors', *Critical Inquiry*, 15(2):205—225.

Said, E. (1992), 'Europe and its others: an Arab perspective', in R. Kearney (ed.) *Visions of Europe*, Dublin: Wolfhound Press.

Sakai, N. (1988), 'Modernity and its critiqu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87(3):475—505.

Samuel, R. (1988), 'Little Englandism today',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21 October.

Samuel, R. (1989), 'Introduction: exciting to be English', in R. Samuel (ed.) *Patriotism: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Sangari, K. (1987), 'The politics of the possible', *Cultural Critique*, Fall.

Sanger, D. E. (1990), 'Politics and multi-national movies', *New York times*, 27 November.

Sassen-Koob, S. (1987), 'Issues of core and periphery: labour migration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in J. Henderson and M. Castells (eds)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London: Sage.

Saussure, F. de (1974),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Fontana.

Scannell, P. (1988), 'Radio times',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and its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Scannell, P. (1989),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and modern public

lif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1(2):135—166.

Schiller, H. I. (1969),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Beacon Press.

Schiller, H. I. (1985),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lows: new basis for global domination', in P. Drummond and R. Paterson (eds)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Schiller, H. I. (1990), 'Sayonara MCA', *The Nation*, 31 December.

Schiller, H. (1991),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13—28.

Schiller, H. (1992),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2nd edition, updated,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Schlesinger, P. (1986), 'Any chance of fabricating Eurofic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8.

Schlesinger, P. (1987), 'On national identity: some conceptions and misconceptions criticised',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6(2):219—264.

Schlesinger, P. (1989), 'Cold sore for minimalists and maximalists',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13 January.

Schlesinger, P. (1993), 'Wishful thinking: cultural politics, media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in Europ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2).

Scholte, R. (1987), 'The literary turn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7(1):33—47.

Schudson, M. (1994), 'Cultur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39.

Scobie, W. (1988), 'Carlo, suitor to La Grande Dame', *The Observer*, 14 February.

Sennett, R. (1971), *The Uses of Disord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Shamoon, S. (1989), 'Mickey the Euro mouse', *The Observer*, 17 September.

Shibusawa, M., Ahmad, Z. H. and Bridges, B. (1991), *Pacific Asia in the 1990s*, London: Routledge.

Shillony, B.-A. (1991), *The Jews and the Japanese: The Successful Outsid-*

ers, Rutland, Vermont, and Tokyo: Tuttle & Co.

Sibley, D. (1988), 'Purification of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6(4).

Sibony, D. (1993), 'Bosnie: le point de silence', *Libération*, 7 June.

Silva, M. and Sjögren, B. (1990), *Europe 1992 and the New World Power Game*, New York: John Wiley.

Sivanandan, A. (1988), 'The new racism',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4 November.

Sivanandan, A. (1989), 'Rules of engagement', *New tatesman and Society*, 28 April.

Smith, A. (1980), *The 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 How Western Culture Dominates the World*, London: Faber & Faber.

Smith, N. (1988), 'The region is dead! Long live the region!',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7(2).

Snoddy, R. (1993), 'The film that can erase itself', *Financial Times*, supplement on 'Cable TV and satellite broadcasting', 6 October.

Soja, E. J. (1985), 'Regions in context: spatiality, periodicity an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regional ques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2): 175—190.

Soja, E.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Sontag, S. (1979), *On Photography*, Harmondsworth: Penguin.

Sontag, S. (1989), 'L'idée d'Europe (une élégie de plus)', *Les Temps modernes*, 510.

Sreberny-Mohammadi, A. (1992),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Stam, R. (1983), 'Television news and its spectator', in E. Kaplan (ed.) *Regarding Television*, vol. 2, New York: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Stefano, C. di (1990), 'Dilemmas of difference: feminism,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L.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Stephanson, A. (1987), 'Regarding postmodernism-a conversation with Fredric Jameson', *Social Text*, 17.

Stiegler, B. (1987), 'Réseaux et communauté,' *Annales de la recherche urbaine*, 34:5—14.

Storper, M. and Christopherson, S. (1987), 'Flexible specialisation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 the case of the U.S.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7(1): 104—117.

Suhr, H. (1989), 'Ausl˝nderliteratur: minority literatur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ew German Critique*, 46.

Taguieff, P.-A. (1992), 'Nationalisme, réactions identitaires et communauté imaginée', *Hommes et Migrations*, 1154.

Thackara, J. (1989), 'Seeing is disbelieving', *The Listener*, 23 March.

Thibaud, P. and Touraine, A. (1993), 'Républicans ou démocrates? Débat entre Paul Thibaud et Alain Touraine', *Projet*, 233.

Thrift, N. (1987), 'The geography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lass formation', in N. Thrift and P. Williams (eds) *Class and Space: The Making of Urba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Todorov, T. (1984),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 'New York: Harper & Row.

Tracey, M. (1988),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elevision', *Intermedia*, 16(2):9—25.

Tran, M. (1990), 'Hollywood rides into the rising sun', *The Guardian*, 30 November.

Tunstall, J. (1977), *The Media are American*, London: Constable.

Tydeman, J. and Kelm, E. J. (1986), *New Media in Europe: Satellites, Cable, VCRs and Videotex*, London: McGraw—Hill.

Veeser, H. (ed.) (1989), *The New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Virilio, P. (1987), 'The overexposed city', *Zone*, 1/2:14—31.

Walker, M. (1988a), 'Fortress vision of market future', *The Guardian*, 14 November.

Walker, M. (1988b), 'A pigsty without frontiers', *The Guardian*, 15 November.

Walker, M. (1988c). 'The boom across borders', *The Guardian*, 17 November.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Wallerstein, I. (forthcoming), 'Periphery', i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 Theory and Doctrine*, New York: Macmillan.

Wallraff, G. (1988), *Lowest of the Low*, London: Pluto.

Wark, M. (1988), 'On technological time: Virilio's overexposed city', *Arena*, 83.

Wark, M. (1991). 'The tyranny of difference: from Fordism to Sonysim', *New Formations*, 15:43—54.

Watanabe, T. (1991), 'Southern barbarians or the red haired people: the Japanese view of exotic Europeans', in C. DeLiss (ed.) *Exotic Europeans*, London: South Bank Centre Publications.

Waterman, D. (1988), 'World television trade: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privatis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12(2):141—151.

Webster, D. (1988), *Looka Yonder! The Imaginary America of Populist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Webster, D. (1989), 'Coca-colonis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s', *Overhere*, 9(2):64—75.

Wendelbo, H. A. (1986), 'What audience for European televis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ce, London, 10—12 July.

Wenders, W. (1989), *Emotion Pictures*, London: Faber & Faber.

West, C. (1991), 'Decentring Europe', *Critical Quarterly*, 33(1).

Wete, F. (1988), '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in C. Schneider

and B. Wallis (eds) *Global Television*, New York: Wedge Press.

Whelan, J. (1989), 'Destination Newcastle', *Intercity*, November.

Whitton, B. (1988), 'Herder's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 cultural community versus cosmopolitan ration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27.

Wilk, R. (forthcoming), 'Colonial time and TV time: television and temporality in Belize',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Wilkinson, E. (1983), *Japan Versus the West: A History of Misunderstand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Williams, R. (1983), *Towards* 2000, London: Chatto & Windus/Hogarth Press.

Williams, R. (1989),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London: Verso.

Williamson, J. (1990), 'Butch ridley and the sunrise kids', *The Guardian*, 1 March.

Williamson, J. (1991), 'Mad bad Saddam', *The Guardian*, 31 January.

Winram, S. (1984), 'The opportunity for world bra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1): 17—26.

Wolf, E.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lferen, K. van (1988), 'The Japan problem revisited', *Foreign Affairs*, 69(4).

Wolferen, K. van (1989),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London: Macmillan.

Worpole, K. (1983), *Dockers and Detectives*, London: Verso.

Wright, P. (1985), *On Living in an Old Country*, London: Verso.

Wright, P. (1989), 'Re-enchanting the nation: Prince Charles and architecture', *Modern Painters*, 2(3).

Yeo, E. and S. Yeo (1988), 'On the uses of "community": from Owenism to the present', in S. Yeo (ed.) *New Views of Co-op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Young, I. M.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ec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Young, R. (1990),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Young, R. M. (1989), 'Postmodernism and the subject: pessimism of the will', *Free Associations*, 16.

Zaretsky, E. (1976),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London: Pluto Press.

Žižek, S. (1990), 'Eastern Europe's republics of Gilead', *New Left Review*, 183: 50—62.

Žižek, S. (1992), 'Ethnic dance macabre', *The Guardian*, 28 August.

索引

ABC 美国广播公司 10,14(图一)
Abercombie, N. 阿伯科比 47
Abish, W. 阿比什 93
Acton, Lord 阿克顿勋爵 199
Adorno, T. W. 阿多诺 93—94,96
Africa 非洲: culture 文化 113,114,122,208; cultural imports 文化进口 224; European colonists 欧洲殖民者 211
AGB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AGB 国际电视台 61
Aglietta 阿格里艾塔 27
Ahamad, Z. H. 阿马德 153
Ahamed, A. 阿迈德 142
Ajzenberg, A. 阿曾伯格 74
Aksoy, A. 阿克索 13,33,113,150
Albertsen, N. 艾伯森 31
Alger, C. F. 阿尔杰 59,74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99
Alibhai, Y. 艾利巴 49—50,82
Allende, I. 艾伦德 123
Althusser. L. 奥尔萨瑟 57
Americanisation, 美国化 18,50—57,81 *see also* United States 亦参见美利坚合众国

Amin, S. 阿民 155,156,208
Anderson, B. 安德森 67—68
Ang. I. 昂 53,57,58,64,126,218
anthropology 人类学 128—129,134,143
Anzieu, D. 安奇厄 139
Appadurai, A. 阿帕都莱 7,128,130,143
Arnheim, R. 安海姆 130
Arnold, M. 阿诺德 81,199
art 艺术 113—114
Arts Council 艺术委员会 37,50
Ascherson, N. 阿谢森 48,60—61,88,89,114
Asian culture 亚洲文化 114,122
AT&T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38
Atatürk, K. "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又译凯末尔) 98
Atkinson, P. 阿特金森 6
Auletta, K. 奥来塔 13,16
Australian Aboriginals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 126
al-'Azm, S. J. 阿尔-阿兹姆 163
Aztecs 阿兹特克人 212—213

Bali, use of video 巴厘岛,视频技术的用途 127
Balibar, E. 巴里巴尔 185
Banks, M. 班克斯 44,58
barbarians 野蛮人 88,199,211,214-216
Barraclough, G. 巴勒克拉夫 21
Barret-Kriegel, B. 巴雷特-克雷格儿 181
Barthes, R. 巴思 161
Basque nationalism 巴思克民族主义 3,20,48
Bassand, M. 巴桑 35,41
Basso, K. 巴索 212
Batman 影片《蝙蝠侠》 111

Baudrillard, J. 博德里拉尔 91,112,170,206,208;(1985a)193,194—195,196;(1985b)38—39;(1988a) 50—51,153;(1988b) 128,219;(1991) 136
Bauman, Z. 鲍曼 189
Bausinger, H. 鲍辛格 68
BBC 英国广播公司 10,14(图一),16,34,53,66,196
Beamish 毕米什 116,120
Beard, S. 比尔德 169
Belgium, television 比利时,电视情况 61
Bell 贝尔公司 14
Ben-Dasan, I. 本-达桑 157
Benedetti, Carlo de 卡洛·德·本尼德蒂 117
Benedict, R. 本尼迪克特 148
Bérégovoy, P. 贝雷戈沃 60
Beresford, D. 贝雷斯福德 131—132
Berger, J. 伯杰 89
Berger, P. 伯杰 86
Berlin Wall 柏林墙 100
Berlusconi, S. 贝鲁斯考尼 32,39,58,70,126
Berman, M. 伯曼 86,89
Bernal, M. 伯纳尔 155,208
Bertelsmann 贝塔斯曼 14(图一),32,58,126
Bertolucci, B. 贝托鲁西 97
Beyond Japan《走出日本》171
Bhabha, H. 巴巴 105,106—107,130
Bigsby, C. 比格斯比 52,55—56
Billaudot, B. 比约多 27
Bion, W.R. 拜昂 194
Birgel, F.A. 伯奇尔 89,103
Black Rain 影片《黑雨》6,159
Blade Runner 影片《刀械走私者》6,169

Blind Date《初次约会》223
Bodroghkozy, A. 鲍德罗夫考奇 131
Boll, H. 伯尔 86
Booz-Allen, H. 布兹－艾伦·汉密尔顿 13
Bosnia 波斯尼亚 7,142—146
Boyer, R. 博耶 27
Boyz N the Hood 影片《伯伊兹·恩街区》219
Braudel, F. 布劳德 205,209
Brennan, T. 布伦南 124
Breton, P. 布雷顿 81
Breton nationalism 布列塔尼民族主义 3,20,48
Bridges, B. 布里奇斯 153
Britain: 英国 American culture 美国文化 53—57; attitudes to Japan 对日本的态度 162,171—172; broadcasting 广播电视业 10,33—34,66; CNN 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18; cultural identity 文化特性 48—49, 5124,122—124; cultural nationalism 文化民族主义 48—49; cultural exports 文化出口 224; economy 经济 153; heritage industry 遗产文化 8,118—121;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205; Japan Festival "日本节" 171; language 语言 60; Little Englandism 小英格兰主义 8,122; local cultural initiatives 地方文化创新运动 36,120—121; North East of England 英格兰东北部地区 120—121; racism 种族主义 49,133; Rushdie affair 拉什迪事件 99,107; Sarajevo airlift 萨拉热窝空运事件 145; television 电视 13,53－54,60,67; tradition 传统 105—107
Brown, C. 布朗 117
Brown, P. G. 布朗 187
Brune, F. 布律纳 176,196
Brunsdon, C. 布伦斯登 55,66
BskyB 英国天空电视网 13,112, *see also* Sky 亦参见天空网
Buruma, I. 布鲁玛 92,94,123,156,165
Bush, G. 布什 139,140

Cable Authority 有线传播管理局 37
cable technology 有线技术 2,15,37,68
Caldorola, V. 考尔多罗拉 228
Calhoun, C. 卡尔霍恩 39,41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牛津现代史》199
Canade, television 加拿大,有关电视的情况 43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29,108,204
Capp, A. 卡普 120,121
Cardiff, D. 卡迪夫 10,66
Carey, J. 凯里 71
Caroleo Pictures 卡罗尔科电影公司 150
Carpignano, P. 卡比加诺 144,195
Cartoon Network 卡通电视网 13
Castells, M. 卡斯特尔斯 29,31,38,59
Castoriadis, C. 卡斯托里亚迪 22,162,166,170
Cate, F. H. 卡特 179
Cavell, S. 卡维尔 226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10,13,14(图一),113,149
Certeau, M. de 塞尔多 7, 209—210
Chakrabarty, D. 查克拉巴蒂 226
Chalmers, M. 查默斯 91,97
Channel 4 第四频道 33
Chaplin, S. 查普林 121
Charlemagne 查理大帝 156
Charles, Prince 查尔斯王子 105—106, 116
China 中国: Star TV 卫星电视 16; trade with India 中国与印度通商 209
Chow, R. 赵 7
Christendom 基督教世界 86,99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9,23,99,155—156,214—215
Christopherson, S. 克里斯托弗森 33
CIA (美国)中情局 162

cinema 电影 18,90—91,101,141

citizenship 公民身份 19,74,82,184—185

Civilisation 电视系列片《文明》51,199

Clark, K. 克拉克 51,199

Clarke, J. 克拉克 228

Clemens, J. 克莱门斯 61,63

Clifford, J. 克利福德 7,128,129,130,134

Cluzel, J. 克卢泽尔 180

CNN 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European influence 欧洲的影响 216; global presence 在全球的势力 15 - 16,112,227; Gulf War 海湾战争 136, 228; new media order 媒介新秩序 13; political role 政治作用 12; *view of the exotic* 观看异域风情 130

Cohen, L. 科恩 196

Coker, C. 科克尔 133,135

Cold War 冷战 22,60,98,99,203,205,221

Collins, R. 柯林斯: (1988) 4,52,58,62,63,79; (1989) 61,62,63; (1992) 179; with Garnham and Locksley 与加纳姆和洛克斯利 (1988)32; Banks and 班克斯和 (1989)44,58

Columbia/TriStar 哥伦比亚/三星公司 13,113,150,173

Columbus, C. 哥伦布 7,135,212 - 213,214 - 215

Comaroff, J. 科马罗夫 201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参见欧洲委员会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委员会 222

Common, J. 康芒 121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new 传播新技术 4,12,61,64,77; *see also* cable, satellite 亦参见有线,卫星

Communism 共产主义 86,208

community 社会群体: imagined 想像中的社会群体 67; in new Europe 新欧洲的社会群体 181 - 188; inhibition and 抑制和社会群体 188 - 193; media and 媒介和社会群体 176 - 181; virtual 虚拟社会群体

132 – 133
Condorcet, Marquis de 孔多塞 201
Connell, I. 康内尔 53 – 54
Connolly, W. 康诺利 122
Conte-Helm, M. 康特 – 赫尔姆 120
Cookson, C. 库克森 116,120
Cope, N. 科普 150
Corm, G. C. 科尔姆 23 – 24,153,155
Cornford, J. 康福德 33,34
Courlet, C. 库莱 30
Cresson, E. 克雷松 147,158
Critical Regionalism 临界性区域主义 2,41
Crookes, P. 克鲁克斯 36
Crusades 十字军东征 21,156
cultural discount 文化折扣 62 – 63
Cumings, B. 卡明斯 162
Curran, J. 柯伦 127
Curti, L. 柯蒂 132

Dahrendorf, R. 达伦多夫 101
Dale, P. N. 戴尔 164
Dallas 影片《达拉斯》 15,53,64,111,126 – 127,133
Davidson, I. 戴维森 88
Davis, H. 戴维斯 197
Delcourt, X. 道森 199
DeLillo, D. 德利洛 125,168
DeLiss, C. 德利斯 212
deMause, L. 德莫斯 140
Derrida, J. 德里达 161,187,201,207
Dickson, M. 迪克森 14
Disney Studios 迪斯尼电影制片厂 151, *see also* Walt Disney Company 亦

参见沃特·迪斯尼公司
Disneyland 迪斯尼乐园 111
Donald, J. 唐纳德 45,46,49,51,58,78–79
Donzelot, J. 唐泽洛特 65
Dougals, M. 道格拉斯 159
Dowmunt, T. 道芒特 227
Drakulic, S. 德拉库里克 142,143,145
Dufour, Y. R. 迪富尔 144
Dufour-Gompers, N. 迪富尔–贡佩尔 144
Duncan, S. 邓肯 37
Dupuy, G. 杜普伊 75
Durham, J. 德拉姆 57,217
Dutch 荷兰人 *see* Netherlands 参见荷兰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109
Eastern Europe 东欧 12,48,60–61,75
Eco, U. 伊科 82,88,216–217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Festival 爱丁堡国际电视节 11
Ehrenberg, A. 艾伦伯格 196
Eliot, T. S. 艾略特 19–20,85,199
Eliss, J. 埃利斯 67
Elsaesser, T. 埃尔萨塞 92,101,102
Emberley, P. 恩伯利 121
Emilian model 艾米利亚模式 28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39,160,199–200
enterprise culture 企业文化 118–121
environment 环境 91
Enzensberger, H. M. 恩策斯贝格尔 98
E. T. 影片《E. T. 外星人》 15
ethnic cleansing 种族清洗 2,144
ethnicity 种族特性: English 英国的种族特性 49; globalisation of 种族特

性的全球化 113－114；modernity and 现代性和种族特性 159－160,171,173；pan-European 泛欧种族特性 22－23
ethno-centrism 种族中心主义 8,49,206－208
ethno-nationalism 种族民族主义 20
EUREKA programme “EUREKA 计划” 3
Europe 欧洲：and its Others 和他者 5－9,82－84；attitude to Islam 对伊斯兰的态度 21,99,156；attitude to Japan 对日本的态度 6,21,147,152－154；attitude to USA 对美国的态度 79－82；audiovisual area 视听区 17；boundaries 疆界 22,190；cinema market 电影市场 18；citizenship 公民身份 19,82,184－185；concept of 欧洲的概念 2,5,58－61,155－156；culture 文化 45,76－79,176；fortress 堡垒 20,69,71,76,88；identity 认同/同一性 3,19－21,80,122,176；integration 一体化 79,179,181；media 媒介 176－181,196－197；postmodern geography 后现代地理 4；public sphere 公众领域 193－197；role of television 电视的作用 77；sense of identity 认同观 77－78,122；under-class 下层阶级 82－83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EBU) 欧洲广播电视联盟 60
European Cinema and Television Year “欧洲电影电视节” (1988)3
European Commission 欧洲委员会 2－3,34－35,51,76－79；publication cited 引用出版物 34－35,76－77,176,178,180
European Community (EC) 欧洲共同体 174－181；creation 创建 40,99,107；cultural identity 文化认同 17－18,44,76－79,200；European citizenship 欧洲公民身份 19,82,184－185；territorial integrity 领土整合 21－22
European Community Television Directive《欧共体电视规程》174
European Single Market 欧洲单一市场 6,21－22
European Union 欧盟 2
Exile 流落他乡 84,123
Eyal, J. 艾尔 190

Fabian, J. 费比恩 134,203

Fallows, J. 法洛斯 152,162,165,166,167
family 家庭 65 – 68
Feher, F. 费尔 21,153
Feraud-Royer, R. M. 费劳德 – 罗耶 84
Ferguson, J. 弗格森 129
Ferro, M. 费罗 144
Finlay, M. 芬利 39
Fischer, M. 费希尔 134
Fish, S. 菲什 201
Flintstones, The 影片《打火石》15
Flores, E. 费洛里斯 127
Foa, S. 福 145
Fontaine, J. 方丹 65
Fordism 福特主义 27 – 28, 72 – 73
Fortress Europe "欧洲堡垒"69,71,76
Foster, B. 福斯特 120,121
Foucault, M. 福柯 134,207
Fox, W. 福克斯 157
Fox Broadcasting 福克斯广播电视公司 32,112
Fox Film Corporation 福克斯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157, *see also* Twentieth Century Fox 亦参见 20 世纪福克斯公司
Frampton, K. 弗兰普顿 2,41
France 法国: attitude to Islam 对伊斯兰的态度 99; attitude to Japan 对日本的态度 147; cultural exports 文化出口 224; *hostility to Americanisation* 敌视美国化 18;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20; television 电视 60
Frankenburg, R. 弗兰肯伯格 163
Franklin Lytle, P. 富兰克林·莱特尔 143
Fraser, N. 弗雷泽 112
Frèches, J. 弗雷歇 34
Free Enterprise Zones 自由商业区 36
freedom, American strategy 自由,美国战略 221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208
Friedman, C. 弗里德曼 166
Friedman, J. 乔纳森·弗里德曼 186
Frith, S. 弗里斯 57,67
Fu Manchu 傅满楚 46,154
Fukuyama, F. 福山 8,22,200,201,203 - 207
Fusco, C. 富斯科 114

Gabler, N. 加布勒 157
Gallissot, R. 加利索 188
Gama, V. da 达·伽马 211
Gandhi, M. 圣雄甘地 43
Gardels, N. 加德斯 199
Garitaonandia, C. 加里涛南迪亚 18
Garnham, N. 加纳姆 32,33,53
Garnier, J.-P. 加尼埃 31
GATT 关贸总协定 18,179
Gauron, A. 戈隆 27
Geertz, C. 吉尔兹 201
Geisler, M. 盖斯勒 95,98
Gellner, E. 盖尔纳 201
Geography 地理: culture and media 文化和媒介 128 - 133; making of 地理的构成 107 - 108; placeless 无地方特征 112; postmodern 后现代地理 4,72 - 76,121
Germany 德国: cinema 电影 101 - 120; *Heimat* debates 关于影片《故乡》的辩论 5,85,92 - 93,95 - 98,101 - 104; *Holocaust* viewing 观看《大屠杀》92 - 93; image of 德国的形象 94; language 语言 93 - 94,96; reunification 重新统一 20,88,100 - 101; television 电视 60; Turkish workers 土耳其工人 99,102
Gibson, W. 吉布森 169
Giddens, A. 吉登斯 86 - 87

Gifreu, J. 吉夫鲁 35
Gillespie, A. 吉莱斯皮 73
Gilroy, P. 吉尔罗伊 49,206
Ginsberg, A. 金斯伯格 43
Gitlin, T. 吉特林 121
Glenny, M. 格伦尼 48
global 全球(的/性): accumulation 积累 109 - 111; culture 文化 111 - 115; interconnectedness 全球互联 219 - 220; -local nexus 全球 - 地方关系 115 - 118; media 媒介 1 - 2, 10 - 12; village 地球村 126, 208, 220, 227
globalisation 全球化 108
Godelier, M. 戈德里埃 205
Goodwin, M. 古德温 37
Gorbachev, M. 戈尔巴乔夫 78, 87, 88, 98
Gordon, R. 戈登 73
Gramsci, A. 格拉姆西 45
Granada, Spanish reconquest 西班牙再度征服格林纳达 7, 212
Grass, G. 格拉斯 191
Grassmuck, V. 格拉斯乌克 170
Greater London Council (GLC) 大伦敦市政会 36, 115
Greece, ancient 古希腊 19, 51, 154 - 156, 199, 200, 208, 216
Greenblatt, S. 格林布拉特 7, 127 - 128, 210, 212 - 216
Gripsrud, J. 格里普斯拉德 127, 224
Grotstein, J. 格罗斯坦 80
group illusion 集团错觉 139 - 140
Guback, T. H. 古巴克 177, 220
Gulf War 海湾战争 7, 135 - 142, 165, 166, 227 - 228
Gunder Frank, A. 冈德·弗兰克 205
Gupta, A. 格普塔 129
gypsies 吉普赛人 191

Habermas, J. 哈伯马斯 80
Habsburgs 哈布斯堡王朝 24
Hadaway, T. 哈德韦 121
Hägerstrand, T. 哈格施坦德 36,41
Hall, S. 霍尔：(1981)127;(1986)206;(1987)130;(1988)49,123;(1992)6,7,88,208;(1993)196
Hannerz, U. 汉纳兹 217
Hansen, M. 汉森 93
Harootunian, H. D. 津丹晴八郎 159,165
Hartley, J. 哈特利 67-68
Hartmann, P. 哈特曼 133
Hartsock, N. 哈索克 202
Harvey, D. 哈维 29-30,37,74,125,128
Hassan, I. 哈桑 166
Hassner, P. 哈斯纳 188
Häussermann, H. 豪泽曼 119
HBO 美国家庭票房公司有线电视网 13
Hearn, L. 赫恩 161
Heath, S. 希思 90
Hebdige, D. 赫布迪杰 50,54-55,56,81,124
Hegel, G. W. F. 黑格尔 203,207
Heimat 影片《故乡》5,85,91-93,95,98
Held, D. 赫尔德 73,187
Heller, A. 赫勒 21,153
Hepworth, M. 赫普沃斯 111
Herder, J. G. von 赫德 202-203
heritage culture 遗产文化 118-121
Herodotus 希罗多德 216
Higson, A. 希格森 90-91
Hillsborough disaster 希尔斯巴勒足球场惨案 131
Hirohito, Emperor 裕仁天皇 151

Hiroshima 广岛 159
Hitler, A. 希特勒 136,139
Hjarvard, S. 夏瓦德 185,193,194
Hobsbawm, R. 霍布斯鲍恩 47,183,186,212
Hoggart, R. 霍加特 55,55
Hoggett, P. 保罗·霍加特 135,139,191
Holborn, M. 霍尔本 148,171
Hollywood 好莱坞: cultural domination 文化统治 18,90; Japanese take-overs 日本接管 6,149 – 152,158,173; role of Jews 犹太人的作用 157 – 158; Vietnam films 越战片 93
Holocaust 电视连续剧《大屠杀》92 – 93
Holston, J. B. III 霍尔斯顿三世 117
Home Office 英国内政部 119
home, homeland, Heimat 家,家园,故乡 4 – 5,86 – 90,98,123
Hondius, F. W. 霍迪斯 35
Hone, H. 霍恩 92
Hood, S. 胡德 48
Hoover, H. 胡佛 220
Horton, D. 霍顿 130,219
Hoskins, C. 霍斯金斯 52,62,80
Hourani, A. 霍拉尼 136 – 137
Howard Johnson 霍华德·约翰逊 52
Hudson, R. 赫德森 73
Huey, J. 休伊 151
Huillet, D. 于伊埃特 86
Husband, C. 赫斯本德 133
Hussein, S. 侯赛因 135 – 136,138 – 140
Hutton, W. 赫顿 143
Huyssen, A. 哈伊森 55
hypodermic model "皮下注射"模式 126 – 127,136,224

IBM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10,38
IDATE 欧洲视听与电信研究所 14
identity 认同,同一性,同一体,身份,特性: as difference 表示差异的认同 45 -48; collective 集体认同 72;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通信和文化 70 -72; communications and memory 传播和记忆 90 -93;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构建文化认同 44 -45; European 欧洲认同/欧洲同一性 3,19 -21; hidden face of 我们同一体中的隐形者 23 -25; negative 对立认同 21 -23
image spaces 图像空间 31 -37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205; cultural 文化帝国主义 223,224 -225
India 印度: Arab trade 阿拉伯贸易 211; Chinese trade 中国贸易 209; imperialist history 帝国主义者的历史 205; Star TV 卫星电视 16
Indians, American 美国的印第安人 135,212 -217
Indonesia, Star TV 印度尼西亚,卫星电视 16
information mode of development 信息发展模式 29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 222 -223
Innis, H. A. 英尼斯 70
integration: European 欧洲一体化 79,179; mechanisms 整合机制 47 -48
Iraq 伊拉克 138, *see also* Gulf War 亦参见 海湾战争
Iron Curtain 铁幕 22,60,86
Ishihara, S. 石原 147 -149,151,162,166,171
Islam 伊斯兰 (Muslims 穆斯林): encounter with the West 遭遇西方 137 -138; European boundaries 欧洲的边界 86;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义 115,163;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和欧洲的关系 21 -22, 99,155,156,163; Sarajevo airlift 萨拉热窝空运 145
Isozaki, A. 矶崎 168
Italy 意大利: 'denationalisation' of 意大利"丧失独立国资格" 44; television 电视 60
ITV 英国独立电视公司 34,55

Jackson, M. 杰克逊 152

Jameson, F. 詹姆森 37,38,125
Januszczak, W. 贾纳斯泽克扎卡 *149*,*158*
Japan 日本: economy 经济 153－154; European attitude 欧洲的态度 6,21,147,152－154; foreigners as barbarians 被当成野蛮人的外国人 211; Hollywood takeovers 接管好莱坞 6,149－152,158,173; modernity 现代性 159－160,171,173; *nihonjinron* 日本人论 164－165; Orientalism and Occidentalism 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 160－166,171; *otaku* generation "你们"这代人 169－170; Star TV 卫星电视 16; relationship with USA 与美国的关系 6,148－149,52－54,158－159,165－166; technology 技术 149,*167*－*171*; *Western attitudes to* 西方对日本的态度 147,171－173
Jaspers, K. 贾斯珀斯 57
Jerusalem, reconquest 再度征服耶路撒冷 212, *see also* Crusades 亦参见十字军东征
Jews, Judaism 犹太人,犹太教 7,99,156－158,210,212
Joffe, J. 乔菲 175
Johnson, S. 约翰逊 152
Jordan, J. 乔丹 85
Jouanny, P. 儒昂尼 41
Julia 美国电视连续剧《茱莉娅》131
Julien, I. 朱利恩 207
Jurassic Park 影片《侏罗纪公园》15
JVC 日本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150

Kaes, A. 凯斯 91,92,95,96,130
Kant, I. 康德 203
Kaplan, C. 卡普兰 56
Kato, H. 凯托 168
Katz, E. 卡茨 64,127
Katzenberg, J. 卡曾伯格 151
Keane, J. 基恩 51,78

Kearney, R. 卡尼 38 - 40,101,103,144,155
Kelm, E. J. 凯尔姆 35
Kennedy, J. F. 肯尼迪 132
Keynes, J. M. 凯恩斯 50 - 51
Keynesianism 凯恩斯主义 27
Khaldun, Ibn 赫勒敦 210
King, A. 金 218
Kings of the Road《大路诸侯》95
Knightley, P. 奈特力 154
Kramer, F. 克雷默 211
Kreutzner, G. 克罗伊策纳 96
Kristeva, J. 克雷斯特娃 25,180,186,191
Kublai Khan 忽必烈 212
Kundera, M. 昆德拉 60,78,79,81
Kureishi, H. 库里什 124

language 语言: barbarian 野蛮人的语言 215 - 216; cultural identities 文化主体 41; European 欧洲的语言 17 - 18,19,60,61 - 64,212; German 德国的语言 93 - 94,96; New World 新大陆 215 - 216; role of English 英语的作用 60,62 - 64; satellite television 卫星电视 61; Spanish 西班牙语 213
Lanzmann, C. 兰茨曼 92
Largo Entertainment 拉戈娱乐公司 150
Las Casas, B. de 拉斯·卡萨斯 213,215 - 216
Lash, S. 拉什 30,119
Latin American 拉丁美洲 67,75,205
Le Pen, J.-M. 勒潘 20,99
Leach, E. 利奇 201
Leadbeater, C. 利德比特 168
LeBard, M. 勒巴德 166
Leith, W. 利思 141

Lerner, D. 勒纳 204
Lesser, A. 莱塞 129
Levin, T. 莱文 93,96
Levinas, E. 莱维纳斯 8,125,207
Levitt, T. 莱维特 15,110,113
Levy, C. 莱维 197
Ley, D. 利 74,116
Liebes, T. 利布斯 64,126 – 127
Lincoln, E. J. 林肯 173
Linforth, I. 林福斯 216
Lipietz, A. 利皮茨 27
Lipschutz, R. 利普舒茨 184
Lithuania 立陶宛 15
Live Aid《直播辅导》132
localism 地方主义 115 – 118
Locksley, G. 洛克斯利 32
Lockwood, D. 洛克伍德 47
Logica 洛吉卡公司 32
London Weekend Television 伦敦周末电视台 34
Luce, H. 卢斯 198,220 – 221
Lummis, C. 拉米斯 168
Lyotard, H. A. 莱昂塔德 201,206 – 207,208

Maastricht Treaty《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80
McBride, S. 麦克布莱德 216
MacCabe, C. 麦凯贝 31
McCann Erikson 麦卡恩·埃里克森公司 51
McGrane, B. 麦格雷恩 6
Mackinder, H. J. 麦金德 58,199
McLuhan, M. 麦克卢汉 12,125 – 126,208,220,227
Magas, B. 马加思 142

Magiciens de la Terre《地球魔术师》展览 113－115
Magris, C. 马格里斯 21,86
Major, J. 梅杰 47
Malaysia, Star TV 马来西亚,有关卫星电视的情况 17
Malcolm, D. 马尔科姆 18
Malcolmson, S. 马尔科姆逊 22
Mandel, R. 曼德尔 102
Mandela, N. 曼德拉 131－132
Mani, L. 马尼 163
Marcus, G. 马克斯 134
marketing 销售 15,52,110,114
Marshall, A. 马歇尔 29
Martin, J.-H. 让-于贝尔·马丁 113,115
Martin-Barbero, J. 马丁－巴伯罗 67,69
Marx, K. 马克思 207
Mascia-Lees, F. E. 马希亚－利斯 201
Massey, D. 梅西 23,73,128,201－202,217－218
Matsushita 松下 13,14(图),150－151,168
Mattelart, A. 阿曼德·马特拉特 41,47,51－52,59,126,224
Mattelart, M. 马特拉特 41,47,224
Mayer, L. B. 迈耶 157
Mayer, M. 马吉特·迈耶 119
MCA-Universal 美国音乐家俱乐部－环球公司 150
media 媒介: American domination 美国主宰、统治 220－224,225; consumers 媒介消费者 126－127,177; culture and geography 文化、地理、媒介 128－133;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new order 新秩序下的文化和政治 17－19; European Community 欧洲共同体 176－181; European public sphere 欧洲公众领域 194－197; global and local 全球媒介和地方媒介 1－2,10－12; hypodermic model 皮下注射模式 126－127,136,224; imperialism 媒介帝国主义 125－128; new order 媒介新秩序 12－17; regulation 媒介管理 10－11,176

MEDIA programme “媒介计划” 3,18,179
Melot, M. 梅洛特 161
Melucci, A. 梅卢西 72
Menzies, J. E. P. 孟席斯 192
Mercer, K. 莫瑟 8,135,207
Metro-Goldwyn-Mayer 梅特罗－戈尔德温－迈耶公司 157
Mexico, television exporter 墨西哥,电视出口国 224
Meyrowitz, J. 迈耶罗维茨 125,132
Michaels, E. 迈克尔斯 126
Milburn, J. 米尔本 121
Miller, D. 米勒 128
Mills, P. 米尔斯 44,61,63
Milne, A. 米尔恩 53
Minear, R. H. 迈尼尔 161,164
Miner, E. 迈因纳 161－162
Minh-Ha, T. T. 明－哈 134
Mirus, R. 米鲁斯 52,62,80
Mitsuhiro, Y. 光广 169
Mitteleuropa 中欧 60,79,86
Mitterrand, F. 密特朗 50
Miyoshi, M. 三好 159,165
modernity 现代性: ethnicity and 现代性和种族特性 159－160; Gulf War 海湾战争 137－138; project of 现代性的事业 86; techno-Orientalism 技术东方主义 167－171; Western 西方的现代性 137－138, 149,153,159－160,172－173
Mohammed 穆罕默德 156
Mongolia, Star TV 蒙古,卫星电视覆盖 16
Monnet, J. 莫内 44
Montaigne, M. 蒙田 215
Moors 摩尔人 7,212
Moragas Spa, M. de 莫拉加斯·斯帕 79

Morin, E. 莫林 101,183
Morita, A. 森田昭男 149,152,167,173
Morley, D. 莫利:(1992)7,126,136,224; Ang and 昂和莫利 (1989) 57;Brunsdon and 布伦斯登和莫利 (1978)66
Morris, M. 莫里斯 51
Mortimer, E. 莫蒂默 99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美国电影协会 179,220
MTV 音乐电视 13,15,16,63
Mulgan, G. 马尔甘 53,63
Muardoch, R. 默多克: empire 帝国 32,38,58,70; global dream 全球梦想 16-17; News Corporation 新闻集团 13,16,112
Muschg, A. 穆施格
music 音乐 61,113

Nagasaki 长崎 159
Nairn, T. 奈恩 186
narrowcasting 小范围播送 4
nation state 民族国家 183-184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cultural 文化民族主义 48; English 英格兰民族主义 48; ethno- 种族-民族主义 20; European Community 欧洲共同体 179,184-185,200; European regionalism 欧洲地区主义 3,179; in Balkans 巴尔干的民族主义 143; origins 渊源 183; resurgence in Europe 在欧洲复兴 8,20,48,186-188
nationhood 民族性 90
natives 本地人 128,134
NATO 北约 98,99-100
N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10,14(图一),117
Neale, S. 尼尔 90
Nebrija, A. de 内布里亚 213
Netherlands 荷兰: *Dallas* responses 对《达拉斯》的反应 126; television 电视 61

network flows 广播电视网流 35
New Historicists《新历史决定论者》201
New World 新大陆 7,135,208,212 - 217
New World Order 世界新秩序 8,190
Newcastle 纽卡斯尔 120 - 121
News Corporation 新闻集团 13,14(图一),16,112,126
News coverage 新闻报道 195,223,225,227 - 228, *see also* Bosnia, CNN, Gulf War 亦参见 波斯尼亚,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海湾战争
Nicholson, L. 尼科尔森 202
1900《1900 年》97
Nippon Television Network 日本电视网 149
Nissan 尼桑 168
Nora, P. 诺拉 87
Norris, C. 诺里斯 136,201
nostalgia 怀旧情愫 5,8,87,116,118,188
Not Reconciled《没有和解》86

objectivity 客观 39 - 40
Occidentalism 西方主义 165 - 166,171
Ohmae, K. 奥梅 109
OIRT 国际广播电视组织 60
Olivetti 奥梨维蒂 117
Orient 东方: construction of 构建东方 137,154 - 156; demonology of 认为东方是魔鬼的信仰 133; Greek roots 希腊的根源 208; Japan 日本 147,160 - 166; modernity and 现代性和东方 137 - 138,159 - 160
Ortiz, J. 奥蒂兹 214 - 215
Orwell, G. 奥维尔 54,55
Otherness, media representations 媒介表述他性 133 - 135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24,99,156
Owen, Lord 欧文勋爵 190
Owens, C. 欧文斯 206

Pacific era 太平洋时代 154,168
Pacific Rim 环太平洋地带 6,153
Padre Padrone 影片《老板父亲》97
Page, I. 佩奇 120
Panasonic 日立 168
Paramount 派拉蒙 14(图一),59,157
Parekh, B. 帕洛克 83
Peacock Report《皮科克报告》34
Pearl Harbor 珍珠港 166
Peet, R. 皮特 70 – 71
Pentagon 五角大楼 222,228
Pickering, M. 皮克林 121
Piemme, J.-M. 皮埃姆 59
Pieterse, P. 皮特斯 200
Pinon, R. 皮农 154
Pioneer Electronics 先锋电器 150
Piore, M. 皮奥尔 27
PLO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99
Pocock, J. G. A. 波科克 22,176,189,200,210
politics 政治 17 – 19,177,193 – 197
Ponpidou Centre 蓬皮杜中心 113
Poole, T. 普尔
Portugal, early travellers 早期到日本的葡萄牙人 211
post-Fordism 后福特主义 27 – 29, 72 – 73
postmodern 后现代: condition 后现代状态, global / American 全球的/美国的后现代 206 ; culture 后现代文化 38 – 39,40,74 – 75; era 后现代时期 198,202; geographies 后现代地理 4,72 – 76,112 ,121; time-space compression 压缩时空 125,218
postmodernism debate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辩 206 – 207
postmodernity 后现代性 8,128,217 – 220

Powell, E. 伊诺克·鲍威尔 76
Powell, N. 鲍威尔 18-19
Prebisch, R. 普雷比希 205
Prime Sports 强档体育台 16
Proulx, S. 普罗克斯 81
psychoanalytic theory 心理分析理论 7-8
Puerto Rican expatriates 波多黎各流亡者 127
Puig, M. 普伊格 43

Rabinow, P. 拉比诺 134
RACE *programme* “竞赛计划” 3
racism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British 英国的种族主义 49,133; Eurocentric 欧洲中心主义的种族主义 49,82,188; fear of Other 恐惧他者 103; US 美国的种族主义 159; Western 西方的种族主义 160,170
Rafferty, K. 拉费蒂 173
Ramonet, I. 拉蒙内 195
Rancière, J. 朗西埃 191
Ranger, T. 兰杰 47
Ranvaud, D. 兰沃德 97
Rath, C.-D. 拉思 61,67,75,130-131
Ravlich, R. 拉夫利赤 75
Read, M. 里德 130
Reed, C. 里德 173
Regulation School 管理学派 27,72
Reich, J. 廷斯·赖克 100
Reich, R. 罗伯特·赖克 152
Reith, J. 里思 10,53,66
Reitz, E. 赖策 5,85,89,91-92,97,103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155,199,208
Renan, E. 勒南 156
representation 表述 134

Reuters 路透社 16
Richards, B. 理查兹 106
Ricoeur, P. 里科尔 25,57
Rieff, D. 里夫 199
Roberts, J. 罗伯茨 211
Robertson, R. 罗伯逊 165
Robins, K. 罗宾斯:(1993)136,140 ; and Cornford 和康福德(1994) 33; and Gillespie 和吉莱斯皮(1988)73; and Hepworth 和赫普沃斯(1988)111;and Webster 和韦伯斯特(1989)119; and Webster 和韦伯斯特(1990)11;Aksoy and 阿克索和(1992)13,33,113,150; Pickering and 皮克林和(1984)121; Pickering and 皮克林和(1989)121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罗彻斯特技术研究所 162
Rockefeller Center 洛克菲勒中心 149,158
Rodney, W. 罗德尼 205
Rome, ancient 古罗马 19,51,199
Rond, R. 龙 86
Roosevelt, T. 罗斯福 154
Rorty, R. 罗蒂 39-40
Ross, S. 罗斯 11-12,13,17
Rostow, W. 罗斯托 204
Rushdie, S. 拉什迪 99,107,115;(1982)8,104,123-124,218;(1990) 90
Rustin, M. 拉斯廷 39,74,87

Saatchi & Saatchi 萨奇公司 15,51,110,111
Sabel, C. 萨贝 27-28
Said, E. 赛义德:(1978)6,83-84,133-134,137,154-155,161, 1763,207;(1984)84;(1988)84;(1989)83,84,106,123;(1992)99
Sakai, N. 酒井 155,159,164
Samuel, R. 塞缪尔 48-49,59,105

Sangari, K. 桑格里 226
Sanger, D. E. 桑格 151
Sarajevo 萨拉热窝 142 - 146
Sassen-Koob, S. 萨森 - 库伯 83
satellite television 卫星电视: global marketing 全球营销 15; impact 影响力 68 - 69, 112, 226 - 228; information flows 信息流 43; political role 政治作用 12; young viewers 年轻观众 61
Saussure, F. de 索绪尔 45
Scannell, P. 斯坎内尔 10, 65 - 66
Schiller, H. I. 希勒: (1969) 7, 126, 221 - 222; (1985) 222 - 223; (1990) 150; (1991) 12 - 13, 15, 224; (1992) 7, 225, 228
Schindler's List 影片《辛德勒的名单》92
Schlesinger, P. 施莱辛格: (1986) 43, 44, 60; (1987) 44, 45 - 46, 71; (1989) 48, 78; (1993) 175, 181 - 182, 197
Scholte, R. 斯科尔特 134
Schudson, M. 舒德森 47 - 48
Scobie, W. 斯科比 117
Scott, R. 斯科特 159, 169
Scotland 苏格兰: film-going 看电影 52;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3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167, 198, 220, 221
Sennett, R. 森内特 122
Senocak, Z. 泽诺卡克 102 - 103
Shamoon, S. 沙穆恩 111
Shelley, M. 雪莱夫人 138
Shibusawa, M. 涩泽 153
Shillony, B.-A. 希洛尼 157
Shue, H. 舒 187
Sibley, D. 西布利 122
Sibony, D. 希博奈 174, 192
Siebel, W. 西贝尔 119
Silva, M. 西尔瓦 166

Singleton, J. 辛格尔顿 219
Sistine Chapel 西斯廷教堂 149
Sivanandan, A. 斯瓦南丹 49,82,83
Sjögren, B. 施耶伦 166
Sky Channel 天空频道 32,61,112
Sky News 天空电视网新闻台 16
Smith, A. 史密斯 223
Smith, N. 史密斯 108
Snoddy, R. 斯诺迪 15,16
Soja, E. 索亚 28,74,107
solidarity 团结、休戚相关性 39 - 40
Sontag, S. 桑塔格 7,21,87 - 88,141
Sony 索尼: Columbia-CBS acquisition 收购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113,149 - 151,173; European equivalents 同等的欧洲公司 17; global presence 在全球的存在 13,58; Morita's resignation 森田昭男辞职 173; technology 技术 168; turnover 营业额 14(图一)
South East Asia 东南亚 75
sovereignty 主权 20,184 - 187,210
Soviet Union 苏联 21,99 - 100,190
space 空间 28 - 31
Spain 西班牙: expulsion of Jews 清除犹太人 7,212; New World 'discovery' "发现"新大陆 7,135,212 - 217; reconquest of Granada 再度征服格林纳达 7,212
Spielberg, S. 斯皮尔伯格 92
Springsteen, B. 斯普林斯廷 152
Sreberny-Mohammadi, A. 斯里伯尼 - 莫汉麦迪 226
Stalin, J. 斯大林 99
Stam, R. 斯塔姆 131
Star TV 卫视 16 - 17
Star Wars 影片《星球大战》15

states, national 民族国家 183 - 188
Stefano, C. di 斯蒂法诺 202
Stephanson, A. 斯帝芬森 37 - 38
Stiegler, B. 施蒂格勒 75
Storper, M. 斯托珀 33
Straat, J. van der 斯特拉 209
Strabo 斯特拉博 215 - 216
Straub, J. -M. 斯特劳布 86
Suhr, H. 苏尔 102
Super Channel 超级频道 61,63

Taguieff, P. -A. 塔吉埃夫 20
Takakura, K. 高原健 159
Tavianis, P. and V. 塔维阿尼 97
TCI 美国电信公司 14
technology 技术 167 - 171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 影片《青少年突变忍者神龟》6,152
television 电视: American domination 美国主宰、统治电视 223 - 224; channels 频道 13,68; European integration role 整合欧洲的作用 77, 179; family audience 家庭观众 66 - 67; geography 电视地理 130 - 131; image 电视形象 38; images of violence 暴力图像 141,144 - 145; imagined community 设想的社会群体 67 - 68; impact of 电视的影响力 130 - 133,226 - 228; journalism 新闻业 144; pan-European 泛欧电视 178; production 制作 32; religious role 宗教作用 131; representation of Others 表述他者 7,130; scheduling role 安排的作用 69; role in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ies 构建集体记忆的作用 91; without frontiers 无疆界的电视节目 5,35,78,174,179; *see also* cable, satellite 亦参见有线,卫星
Thackara, J. 撒克雷 169
Thames Television 泰晤士河电视台 34
Thatcher, M. 撒切尔夫人 47,50,76

Thibaud, P. 蒂博 175,190
Third Italy 第三意大利 28,115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41,99,114,204,224,225
Thompson, B. 汤普森 120,121
Thrift, N. 思里夫特 31
time 时间: cultural effects 文化效应 226 – 227; -shift 时间转移 4,131; -space compression 压缩时空 125,218,227 – 228
Time Warner 时代华纳 11 – 12,13,14(图一),17,126
Tisch, L. 蒂施 152
Tocqueville, A. de 德托克维尔 51
Todorov, T. 托多罗夫 7,135,210,212 – 214,215 – 216
Toshiba 东芝 168
Touraine, A. 图雷纳 175,190
tourism 旅游业 113,154
Toynbee, A. 托因比 207
Toyota 丰田 168
Tracey, M. 特雷西 81
tradition 传统: British 英国传统 105 – 7,122; invention of 创造传统 47
Tran, M. 特兰 152
transformation 转变 105 – 107,122 – 124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跨国公司 223,225
tribalism 部落主义 143
Trinidad, television viewing 特立尼达岛,收看电视的情况 128
Truman, H. 杜鲁门 221
Tunstall, J. 滕斯托尔 126,220
Turgot, A. R. J. 蒂尔戈 202
Turkey 土耳其: admission to EC 允许进入欧共体 22,58,98 – 100,190;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24,99,156; Star TV 卫星电视 16
Turner, T. 特纳 16,18,227
TV – AM TV – AM 台 34
Twentieth Century Fox 20 世纪福克斯公司 13,32,112

Tydeman, J. 泰德曼 35
Tyne Tees 泰恩河-提兹河台 34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美利坚合众国: American Century 美国世纪 198,220-221; black actors 黑人演员 131; broadcasting 播送 10; cinema market 电影市场 18; cultural domination 文化统治 14-15,18,90; culture in Britain 美国文化在英国 53-57; culture in Europe 美国文化在欧洲 50-52; economy 经济 153; entertainment industry 娱乐业 80; European period 欧洲时期 199; European attitudes to 欧洲人对美国的态度 79-82; film industry 电影业 33,220, *see also* Hollywood 亦参见好莱坞; Gulf War 海湾战争 139-140,165; imaginary America 想象中的美国 79-82; Japanese takeovers 日本接管 6,149-152,158; nuclear weapons 核武器 148,159; Pentagon 五角大楼 222,228; Puerto Rican families 波多黎各家族 127;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同日本的关系 148-149,152-154,158-159, 165-166,171-173; television 电视 13,67-68,80-81,223-224; Vietnam Syndrome 越南综合症 140;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93
Universal 环球公司 13,150
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城市发展公司 36
Urry, J. 厄里 30,119

Valenti, J. 瓦伦蒂 179
Vargas Llosa, M. 瓦加斯·劳萨 123
Veeser, H. 维塞 201
Vespucci, A. 韦斯普奇 209
video 视频: images of violence 暴力图像 141; possibilities 可能性 68; religious services 宗教仪式 131; time-shift 时间转移; uses of 用途 127
Vietnam Syndrome 越南综合症 140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93
village 村 128; global 地球村 126,208,220,227
violence, screen 播映暴力 141-142

Viriho, P. 维里利奥 75,112
Vitona, F. de 维托里亚 214
Vittet-Philippe, P. 维泰特－菲利普 36
Vogel, E. 沃格尔 165

Waits, T. 韦茨 198
Walker, M. 沃尔克 51,60,61,83
Wallerstein, I. 沃勒斯坦 205,209
Wallraff, G. 沃尔拉夫 83
Walt Disney Company 沃特·迪斯尼公司 13,14(图一)58,126, *see also* Disney 亦参见迪斯尼
Wark, M. 沃克 75,158
Warner, B. 华纳 157
Warner Bros 华纳兄弟公司 157
Watanabe, T. 沃塔纳比 211
Waterman, D. 沃特曼 81
Waugh, E. 沃 54
Webster, D. 韦伯斯特 55,56,95,96
Webster, F. 韦伯斯特 11,119
Wendelbo, H. A. 温德博 51
Wenders, W. 温德斯 94,95－96,101,103
West, C. 韦斯特 8,198－199,206
West 西方: Arab world and 阿拉伯世界和西方 210－211; development of 西方的发展 208; Orient and 东方和西方 137－138,159－166; story of 西方的说法 209－210
Westphalian model "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184,187－188
Wete, F. 韦特 225
Whelan, J. 惠兰 120
Whitton, B. 惠顿 202
Wigan Pier 威根皮尔市 116
Wilk, R. 威尔克 226－227

索引

Wilkinson, E. 威尔金森 153
Williams, R. 威廉斯 26,27,38,40,59,80
Williamson, J. 威廉森 136,157,159
Winram, S. 温拉姆 15,110
Winterson, J. 温特森 85
Wohl, R. R. 沃尔 130,219
Wolf, E. 沃尔夫 87,123,129,199,204,226
Wolferen, K. van 沃尔夫伦 152,172
World Film News survey《世界电影新闻》的一份调查报告 52
Worpole, K. 沃波尔 53,54
Wright, P. 赖特 46,91,105 – 106,209

xenophobia 排外 49,82,89,103,170,188

Yeo, E. and S. 艾琳·约和斯蒂芬·约 76,182,193
You Only Live Twice 影片《你只活两次》152
Young, I. M. 艾里斯·扬 188
Young, R. 罗伯特·扬 156,160 – 161,207
Young, R. M. 扬 39
Young and the Restless, The 美国电视连续剧《年轻人与永不停歇的人》128
Yugoslavia, former 前南斯拉夫 78,142 – 146

Zaretsky, E. 扎罗茨基 65
Zizek, S. 齐策克 145,156,183
Zwkar, A. 朱科尔 157